



劳工的全球化

政见众包翻译组 ————— 译

LIVE WORKING OR DIE FIGHTING

How the Working Class Went Global

————— Paul Mason

保罗·梅森 (Paul Mason)

英国记者及电影制作人。著有《稀土元素》(*Rare Earth*) ——一部关于中国的小说,以及将于 2017 年以中文出版的《后资本主义: 我们未来的指南》(*Postcapitalism: A Guide to Our Future*)。他曾担任英国广播公司 (BBC)《新闻之夜》栏目 (*Newsnight*) 的经济编辑, 并曾供职于第四新闻频道 (Channel 4 News)。

劳工的全球化

Live Working or Die Fighting

How the Working Class Went Global

著=保罗·梅森 (Paul Mason)

译=政见 CNPolitics 众包翻译组

项目指导=邱林川

项目执行=张 烨

文字校对=张 烨

图书设计=钱争予

本书英文版由 Haymarket Books 出版

Published 2010

by Haymarket Books

P.O. Box 180165, Chicago, IL 60618

Haymarket Books is a radical, independent, nonprofit book publisher based in Chicago, a project of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and Social Change.



© 2017 PAUL MASON

Live Working or Die Fighting: How the Working Class Went Global (the Chinese version) by Paul Mason is licensed under CC BY-NC-ND 4.0.

You are free to Share—copy and redistribute the material in any medium or format, under the following terms:

Attribution—You must give appropriate credit, provide a link to the license, and indicate if changes were made. You may do so in any reasonable manner, but not in any way that suggests the licensor endorses you or your use.

NonCommercial—You may not use the material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NoDerivatives—If you remix, transform, or build upon the material, you may not distribute the modified material.

No additional restrictions—You may not apply legal terms or technological measures that legally restrict others from doing anything the license permits.

The licensor cannot revoke these freedoms as long as you follow the license terms.

NOTICES:

You do not have to comply with the license for elements of the material in the public domain or where your use is permitted by an applicable exception or limitation.

No warranties are given. The license may not give you all of the permissions necessary for your intended use. For example, other rights such as publicity, privacy, or moral rights may limit how you use the material.

保罗·梅森所著《劳工的全球化》以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 4.0 国际协议共享。

你可以自由地分享——在任何媒介以任何形式复制、发行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

署名——你必须给出恰当的署名，提供指向本授权条款的链接，并指出（本作品的原始版本）是否被更改。你可以通过任何合理的方式完成署名，但不得以任何方式暗示授权人为你或你的使用方式背书。

非商业性使用——你不得将本作品用于商业目的的使用。

禁止演绎——如果你混编、改写本作品，或依据本作品创作新的作品，那么你不得发布演绎之后的作品。

不得增加额外限制——你不得增设法律条款或技术措施，来限制别人依授权条款本已许可的行为。

只要你遵守许可协议条款，授权人就无法收回你的这些权利。

注意：对于作品中属于公共版权的元素，或者对于你获得了特别许可的部分，不必遵循上述协议。本协议并不保证给予你所有必要的许可。比如，形象权、隐私权或道德权利等可能会限制你对本作品的使用。

献给 约翰·梅森（1927—1986）

目录

中文版序	VII
中文版代序	XI
英文版序	XV
第一章 像狮子一样站起来	1
第二章 所有与美丽相关的事物	37
第三章 破晓将至	69
第四章 每一个值得拯救的族群	113
第五章 伟大的大工会	151
第六章 弟兄之战	207
第七章 全然无知的工人	255
第八章 苍天与大地共鉴	291
第九章 希望带来的喜悦	339
后记	391
中英对照表	403

中文版序

我出生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工业区之一。那是英国的利（Leigh）镇，位于曼彻斯特的市郊。我的孩提时光要么在早期工厂的废墟上攀爬，要么在溪流里趟过——那里曾为了给水轮发电而驻坝拦截，顺着开凿的水道，源源不断的煤和棉花流向各地。

200年前利镇作为世界工厂的场景，如今在中国的广东省上演。即便在1960年代，你还能依据突然涌上街的一群群轮班工人来分辨时间：清晨6点，下午2点，晚上10点。

这些轮班的间隔正好是8个小时。这一成果，得益于我的先辈们在棉纺织机和梳理机旁发明的事物：渴望实现民主的独立的劳工运动。

最初的抗争当然是艰难的。在最开始的20年间，工厂雇佣了大批住在宿舍的妇女和儿童——这一情形与1920年代的上海一模一样。第一次大规模的抗争发生在1818到1819年间，本书的开篇就讲了这个故事。紧接着是一场以建立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抗争，发生在1832到1848年间，以失败告终。

在这之后，风潮渐渐平息。棉纺织厂的工作不仅受人尊敬、薪水高，而且只招男性。棉纺织工人的工会自此进入了和工厂主长期合作的阶段，这一阶段直至 1960 年代中期棉纺织业倒闭才结束。

正是因为棉纺织业和工人自我组织持续已久，我们才会假定它们永远不变。我喝下第一品脱啤酒的酒吧，也正是我的祖父第一次开始喝酒的地方。

但是，那个酒吧现在已经被拆毁了。我故乡的 21 处煤矿以及所有的棉纺织厂，也都被关闭了。

面对这些变化，以及在 1980 和 1990 年代不断上升的贫困率和犯罪率，人们可以选择向前看或向后看。和大多数人一样，我选择将目光投向未来——那里我的故乡可以存活并再次崛起，成为全球一体化产业的一部分。

然而，也有一些人选择向后看。在我的故乡，如今与工党和工会并存的，是围绕在右翼英国独立党（UKIP）周围强大的、组织化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治团体。这就是现今的进步分子在英国所面临的处境。

我写这本书，是因为不管如今我们的产业如何凋敝，我们几代人为了工人的权利——包括组织工会的权利——而奋勇抗争的故事都值得书写。它是一个更宏大的世界现象的一部分。

将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在过去 200 年间的抗争史保存下来至关重要。这是因为，在当权者书写的历史中，连一些最基本的事实都会被删减，亦或被压制、遗忘。

2003 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并和当时开始为农民工发声的律师和 NGO 交谈。我发现，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将经历同样悲欣交加的过程——首先形成一支产业劳动力大军，然后建立独立的组织来捍卫他们的权益。

因此，能够将本书的第一份中文版呈现出来是我莫大的幸福。从这本书开始写作的 2007 年起，各类巨变撼动着整个世界，而前方有更多的艰难

险阻等待着我们。

工人阶级故事的下一篇章将由中国、亚洲的其它各国、印度、非洲和拉丁美洲来书写。我希望，这本书至少能让我的中国读者们明白，他们正在经历的，不是历史上的新鲜事——同样的错误有人犯过，同样的困难有人尝过。读者们因此可以从这群勇敢的、卓尔不凡的故事主人公身上汲取灵感，他们曾告诉身边的工人兄弟姐妹们，站起来，迎接战斗。

保罗·梅森

译 = 赵宇超

中文版代序

2012年年底,我偶然读到保罗·梅森的这本新书。书中充满了生动的故事和个性鲜明的人物,更有超越主流话语的大历史观,令人耳目一新、爱不释手。看完全书,我萌发了一个念头:这本书应该译成中文,让同学们和草根行动者们都看到!

这念头来自我的阅读体验:该书不但内容丰富、观点鲜明,更用生动的笔触调动读者情绪,令读者得以跟随来自第三世界(包括中国)、英美西方的劳工运动关键人物,在历史长河中逆流而上,重新建构出全球工人阶级的集体叙事。

这念头也来自我的教学经验:我在香港和美国从事了十多年新闻媒体与全球化教学,但从未碰到这样一本书。它深入浅出,从西方左翼视角串联欧美劳工运动历史与全球南方亚非拉各国的苦难现实。它还特别关注中国——从1920年代的上海工运到21世纪初的深圳工伤工人——以及中国与世界的联系。

作为中国人,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需要强调的是,当代国人对资本主义的体验是极为特殊、

极不具代表性的。各国人民，包括 1949 年前的中国人，大都经历过资本主义带来的奴役、萧条、战乱和野蛮。然而，在后毛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国人，其生命记忆是中国式资本主义在 1980 年代以来，持续扩张的三十年。这期间，社会主义被妖魔化，劳工运动被边缘化，似乎只有资本和市场才是人类发展的最终归宿。

保罗·梅森是当下英国最有影响力的左翼资深记者、社会活动家，也涉足小说、戏剧等文创媒体领域。这本著作让我们跳出狭隘的“中国经验”，看到全球资本主义的真正面目，更看到劳工运动原来不只属于少数领袖人物，也不是孔武男性的专利。星星之火，兄弟姐妹，工友们的血泪汇聚成 1819 年英国彼得卢屠杀和 1927 年“四一二”惨案的血雨腥风，也汇聚成 1871 年巴黎公社和 1886 年芝加哥工运的电闪雷鸣。

以史为镜，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过去的故事，还有当下的压迫、歧视、分化、隐忍、妥协、抗争、团结和革命。原来全球化不一定是大企业与官僚国家间的游戏。全球资本在建造帝国霸权的同时，也在不断生产出自己的掘墓人：一个遍布全球的工人阶级。其重心正是作为“世界工厂”的当代中国。

北京的新工人艺术团说得好：“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这里的一个关键是，谁是“我们”？“我们”中国和“他们”外国有什么关系？今天的“我们”如何理解过去和未来的“我们”？保罗·梅森的答案是阶级的、辩证的、历史的。“我们”是所有的劳动者。“我们”勤劳坚毅、不计小我、目光远大、不怕牺牲。

这本书讲述的是“我们”的故事。

听故事的各位，欢迎你们成为“我们”。

由衷感谢政见团队组织众包翻译计划。你们让我美梦成真。特别感谢

为此书中文版问世付出辛勤劳动的各位译者。你们让中文世界的读者可以阅读到这本价值独特的著作，让“我们”可以去共同想象、共同实践出一个新的世界。

邱林川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2017年8月7日，于安徽德懋堂

英文版序

凌晨5点的基贝拉（Kibera）郊区，在容纳了一百万人的肯尼亚贫民窟内，一场庞大的人潮拥堵开始了。人群从狭窄的巷道里跌跌撞撞地涌出，挤满了整条道路。他们朝工厂区走去，去那里包装明天将摆上欧洲超市的青豆和郁金香。

每间工厂门外都有一排长椅，十几二十个年轻人整天耗在这里。他们对着马路啐口水或睡大觉，无所事事地等待工作。这些长椅并非出于慈悲之心：“它是劳资关系的重要一环，”一位基贝拉居民嘲讽道，“要是你工作不够努力，外面随时都有十个人等着顶替你”。

你可能曾见过基贝拉。它是剧情片《疑云杀机》（*The Constant Gardener*）的拍摄地，也是每个飞往内罗毕（Nairobi）的西方人会在途中注视、却又感到如鲠在喉的地方——绵延几千公里的简陋棚屋，周围是满溢着粪便的河水，而孩子们则在河间玩耍。这是第三世界图景的一部分。但你可能未曾见到或想到的是，生活在这种地方的人还会工作。

在媒体呈现的意象中，基贝拉意味着贫穷而非就业，

当然更不会是“工人阶级”的代名词。对外人而言，这些充斥着临时足球电影院、骗人的教堂、立式水管和暴力威胁的小巷，更像是某类最下层阶级的栖身之所。

然而，基贝拉的世界和那些超市中堆满了青豆和郁金香的世界，是同一现实中不可分割的两部分。正因为基贝拉人生活在连自来水都没有的破败棚屋里，他们才会为一点点钱出卖劳动力——这里的工资甚至远低于中国工厂内工人能拿到的每月 100 美元。当他们还要为自己的棚屋可能被当地流氓拆毁而担心的时候，“劳资纠纷”就是次要和零星的问题。强制驱逐、用水权和艾滋病防治意识才是这里的自发组织团体所抗争的重心。

基贝拉人属于非洲工人阶级，也是全世界 30 亿劳工的一部分。这一庞大劳工群体的形成是 1989 年以来的关键事件，其意义比 9·11 之后的反恐战争或通信技术革命都要重大。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称之为全球劳动力的“伟大翻番”，但它的故事却几乎从未被人提起。从肯尼亚到印度，再到中国和拉丁美洲，这一事件都正在发生。任何熟悉西方劳工史的人，都不会对它所唤起的反抗形式感到陌生。但遗憾的是，这些人里并不包括在基贝拉的大多数。

我写这本书是为了填补一个空白。今天，工人阶级的队伍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壮大，并且在迈向真正的全球化。但它却失去了自己的故事和讲故事的能力。这种能力之所以丧失，一方面是因为即使在西方社会，经历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失利后，传统工人阶级团体已分崩离析，其传播机制也被打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工人阶级的故事从未被真正讲述过。

这本书致力于讲述这群组织起来的劳工的故事。书中将从劳工运动缔造者的角度出发，将他们的故事讲给新一代工人和支持社会正义的活动分子听。对于这些无论在地理、工作环境还是家庭方面，都与这 200 年来发

达国家劳工运动史没有丝毫关联的听众而言，一切都是新鲜的。

书中包含这些鲜活的人物：一位英格兰兰开夏郡（Lancashire）的诗人纺织工，认为谁不相信仙女的存在就是亵渎神明；一位巴黎蒙马特（Montmartre）的中学女教师，把冻僵的孩子们的双脚放在怀中捂暖，然后拿起步枪冲向路障区；一位一头金发、为自由抗争的犹太斗士，设法进入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纳粹死亡集中营，又竭力逃回犹太社区，将集中营的真相公之于众。当然也有一群有瑕疵的人：一位和自己妻子的妹妹幽会时，被侦探当场捉奸的工会工人；一位对上海风月圈了如指掌，从而通过妓女向客人发放反帝宣传单的人。这两群人要是同处一室，无疑会大吵一架，挑起几段桃色事件，并最终拳脚相加。但他们是能成事的人。

他们是梦想家，是漫游者，是漂泊客，是能将纸上谈兵的“有组织的劳工”付诸实践的人。但历史却一再地伤害他们。他们被今天的主流历史单纯地忽略，正如被当年的主流媒体毁谤中伤、画成讽刺画，并最终遭到遗忘。

与此同时，几十年来的“劳工史”也把他们当做人偶剧场里形象单薄的纸片人。劳工史有比个体更重要的事情要关心：它是关于“力量”和周期的历史。革命与镇压、群众运动的兴起和衰落，这些当然总是被经济危机、利润率、帝国之间的冲突等更宏大的结构性因素所决定着。

那些莫斯科（Moscow）出版的泛黄简装书还教会我们，应该忽略的不仅仅是个体，还有历史中的个人因素。工人阶级或许被认定为历史的“主体”，他们整体所发挥的“主观因素”也可能被看做是决定性的，但单独的个体本身无足轻重，除非他占据了马克思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万神殿中的至高一席。

这本书中的人物，几乎没有在死后留下传记或英雄式的崇拜，他们多

半被当做其它重要事件的一部分：起义的一个参加者，某位伟大的革命或改革领袖的追随者。我曾找到一本1831年里昂（Lyon）丝织工暴动发起者的回忆录，他提出的运动口号被用作本书的标题。然而，这本回忆录却只能静静地躺在大英图书馆内，在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此治学的整段岁月里，它始终无人问津。

另一个难题是资料的获取，但它正在被迅速地解决。得益于在线宗谱数据、数字化图像收藏、电子化的绝版书籍和手稿，我们今天能比马克思、巴枯宁（Bakunin）¹甚至任何一位亲历者，知道更多有关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的细节。

随着我们知识的改变，宿命论的桎梏也不在了。一幅全新的劳工史图景已经展开。在劳工们组织起来的头150年里，活动分子们并非生活在“产业劳动”与“政治”泾渭分明的世界，他们的生活也不像斯大林主义神话所描述的工人英雄一般单调无趣。他们生活在生机勃勃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²里，这是他们教育、社会福利和友谊的主要来源。他们为人类自由而战，而非为了一系列空洞抽象的目标，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却为同时代的卫道士所诟病。

这本书讲述了这些故事。我并没有试图包罗万象，只是在劳工史头一百年的巨大进步潮流，以及随后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危机和灾难中，挑选出了一些重大事件。

由于劳工史的头150年主要发生在以白人为主的国家，并形成了主要

1. 俄国思想家、革命家，著名无政府主义者。——译者注

2. 亚文化的一种，倡导与主流文化相异或相反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观。——译者注

以男性为主的工会组织，本书主要是关于那些在欧洲、美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白人男工的故事。由于本书依靠口述史、传记和学术研究——这些学者本身也依靠同样的资料，所以我主要关注了那些资料可寻且可靠的国家。本书首次出版后，一些读者对没有看到任何关于俄国或西班牙内战前的劳工运动的事表示失望，对此我只能说，我也感到同样遗憾，但这是因为信息来源和资源的问题。

不同于劳工史叙述的惯例，我并未花大量时间来刻画事件的历史背景和当时的政治主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罗斯福（FDR,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路易·拿破仑（Louis Napoleon），或者是乔瓦尼·乔利蒂（Giovanni Giolitti）³的事迹，维基百科上就有足够的资料供你查阅。

长久以来，像这样的一本书看似并无必要。无论何时，当强大的劳工运动在发达国家爆发，在有着强大口述传统的稳固社区中，每个人都会知道基本的历史。如此看来，在我长大的那个盛产煤炭和棉花的英国小镇上，正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所言，伴随我成长的工人们似乎“生来就了解了我从书本中慢慢学到的”劳工史。总之，最棒的故事都已经被讲完了。

但我错了。在我长大的兰开夏郡的小镇利（Leigh），与我祖父母还在下井挖煤的1913年相比，1960年代的它并没有什么大变化，依然是一个充斥着白人苦力、虔诚教徒、铜管乐队、英式橄榄球和年度矿工盛会的世界。可现在的它已截然不同：二十年的全球化已然摧毁了大部分曾经恒久不变的事物。矿工工会被摧垮了，制造业被迁移到中国。如果你看看今天工会

3. 意大利政治家，曾5次担任意大利首相，任内推动了进步的社会改革。——译者注

里的活动分子，他们大多是教师、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医护人员。目前镇上关于社会正义的议程是社会失序，当然，还有移民的问题。

利镇的工人如今在劳动力市场面对的竞争，既可能来自本地高技能、低薪水的东欧移民，也可能来自印度班加罗尔（Bengaluru）的一个车站，或是深圳的一个贫民窟。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200年来建立起的文化，在20年中就已分崩离析。哀悼它的消逝没有任何意义，但存在着一种普遍而又不被承认的现象，即在所有曾经有过组织起来的工人和工人阶级的地方，社会凝聚力都曾一度强大。

我曾经在底特律（Detroit）的一家福特汽车厂里发现过这样的情况。在一个裁员和再安置的会场上，我询问了那里的车间工人。一位女工，在想到失去了汽车厂和工会组织的工作后，生活会变得怎样时，不禁嚎啕大哭。“当我想到他们对我们做了什么，对我们的工人、我们的工会做了什么的时侯……”她啜泣道，用难以置信的口吻说，“唉！我不明白这一切究竟从何而来”。

类似的场景还出现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克莱尔顿（Clairton）——一个工会城镇，以及印第安纳州的埃尔克哈特（Elkhart）——一个坚定的非工会城镇，也是露营车和铜管乐器的制造之都。这些地方似乎都弥漫着某种普遍的悲伤之情，在治愈过程中无法言说。那是工人阶级在战后经济繁荣期曾经拥有的，团结、体面、高度受教育、他人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逝去的悲痛。

虽然长远来看，相同的进程也曾在过去发生，但今天的情况已不仅是传统劳工史所迷恋的那套“上升—衰落”的周期理论所能解释的了。这更像

是一整个时代、一整套生活方式的解体，以及新的替代物的产生。这和美国工会在 1860 到 1890 年间的情况很相似，那时也是整个工作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改变。

今天，那种世代代在同一家工厂工作、在同一个酒吧喝酒的本地化的劳工，正在被一个形成中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劳工所取代。后者的特征是高度流动，绝少扎根。

究其成因，首先，自共产主义瓦解以来，全球的劳工都分享了同一套在市场经济内工作的经验。那个将东西方工人的经验区隔开来的“铁幕”（iron curtain）⁴已不复存在。

其次，工作场所内的实践正在全球范围内走向标准化。在任何一台电脑上，F7 键的功能都是一样的。尽管中国和美国的工资和人权状况不同，两国汽车厂内的质量监测员讨论的都是相同的话题。一个麦当劳巨无霸汉堡的制作过程，正如其旧的广告语所言，“全世界都一样”。

最后，当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劳动力，开始和来自欧洲、美国、日本的高收入劳动力竞争的时候，全球化已经迫使劳工组织进行全球思考，尽管他们在全球行动上进展缓慢。

客观上来说，全球性的工人阶级已经存在。但主观上来说，对于那些工厂内的工人们而言，事情却更加复杂。在发展中国家，成千上万的农民和栖身于棚屋的贫民们，被卷入了一个看上去振奋人心，实则无比残酷，由工资、加班、公司宿舍和消费资本主义组成的世界中。他们正在经历的，

4. “铁幕”一词出自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演讲，指的是冷战时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分界。——译者注

是 200 年前我故乡的第一代工厂工人所经历过的。不同的是，当今的经济环境下，信息像水银一样多变，消费文化在全球扩张，前工业社会的文化残余却还令人恼火地拒绝退出历史舞台。

作为一名记者，在尝试讲述这则现代故事时，我遇见了因为不完善的安全标准而致残的中国工人，以及在我祖父那一代都无法忍受的恶劣条件下挖煤的玻利维亚（Bolivian）矿工。还有印度的制衣工人们，他们可以认出自己缝到运动衫上的标签，却对他们被谁雇用、何时可以领到薪水毫不知情。

这本书把他们的故事和前几代活动分子的故事放在一起。每一章里，我都会以当下的片段开场，然后追溯到劳工史的某一时期。其目的不是为了进行粗略的比较，毕竟很难说过去的“斗争经验”和今天有什么直接关联。其目的是为了展示出，对于首次置身于历史中的人而言，历史是多么散乱和悬而未决，你必须退回到过去来理解它的含义。

此刻在伦敦，来自索马里、库尔德和巴西的移民清洁工们，正试图在那些投资银行的总部建立工会。但他们仍未能很好地理解这座城市的地理和历史。他们并不知道，在 100 年前，那些住在他们今天所住贫民区的爱尔兰和犹太移民们，也曾发起过类似的抗争；他们也不知道，这些之前的移民们是如何取得胜利的。为什么他们就应该知道呢？在无休止的变化中，我们不能再依赖过去那些使工人阶级的故事得以延续的口口相传、家庭、传统和社区了。

作为一名记者，我认识到，你从他人的讲述中发掘的素材，永远比最初想要追寻的故事精彩得多。如果你用同样的方法对待劳工史，你也会得到令人惊叹的结果。你会发现，英国彼得卢兰开夏郡的摘棉工人们，开创了之后 190 年间几乎所有可见的组织类型和行动策略。你会了解，法国里

昂那些“注定失败的”纺织工人们，不是在打一场反对机器化的徒劳战争，而是在捍卫一种高效、进步、彼此连结的经济模式。你会惊觉，巴黎公社的革命者们不过是一群无聊的、反对罢工的工会干部。你还会意识到，犹太人同盟（Jewish Bund）——一个自 1903 年后从官方马克思主义历史中完全退场的组织——创造了迄今为止最发达的工人阶级文化之一。

如果说这些故事中有什么反复出现的主题，那便是控制。在政治上，工人运动对改革还是革命的问题存有争议。在实践中，让两派都感失望的是，工人们虽已做好超越改革的准备，但又在革命前偃旗息鼓。一旦你理解了工作场所内的控制欲，以及那些同样富有控制欲的社区，你就能更好的明白这本书所叙述的斗争动力及其局限。

这些底层工人活动分子们伟大发现是：权力是和阶级一样重要的问题。正是那位手持步枪、来自巴黎蒙马特贫民窟的女性，在 140 年前大声疾呼：

“无数人和我们一样，并不把任何权力机构放在眼里。因为我们亲眼目睹了，各式各样的权力没有为我们带来任何东西。我们的体会，来自活生生的见证和血淋淋的教训。权力本应像珍贵的玉斧，由大洋洲的不同岛屿轮流拥有。被垄断的权力是邪恶的……”

我决定将书中的历史叙述停止在 1943 年。当时，世界上半的工人生活在法西斯专政之下，另一半不是和美式资本主义结合，就是和斯大林式共产主义结合。许多奥威尔称之为“工人阶级之花”的个体，不是死于法西斯主义，就是被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所摧残，亦或成为战争的牺牲品。

当国际工人运动在 1945 年后得以重振，它却成为了不同的事物。接下来的 40 年间，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决策里占了一席之地。但你在本书中将会遇到的，那些骨子里就洋溢着无政府主义激情和无师自通的浪漫精神的人们，已经消失不见了。

对我来说，那段工人运动蓬勃向上的经验，当事关共和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意识形态争论，在工人聚集的酒吧餐桌上温和碰撞的时候，似乎更贴近今天而非 1945 到 1989 年间的情形。或许，从个体而非“历史动因”的角度更好地理解那段经验，对那些仍然饱受世界变化之伤害的人而言，对那场令亲历者们成长起来的运动而言，都是最好的良药。

世上并无这样的铁律，要求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们必须重演本书所描述的，过去那种自发组织、自我教育的漫长进程。他们或许能快进并跳过所有步骤。但他们仍然面对我们的先辈遗留下的艰巨的阻力：集团犯罪、种族敌对、怪异宗教、农村网络，还有与之相伴的自动化生产。当今世界的新工人群体，完全有可能无法进行自我组织了。如前文所提到的基贝拉一样，专断式的资本主义、慈善和宗教，如今成了城市贫民组成的自发团体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面对的基本架构。

如果新的全球劳工运动真的出现，这本书里的故事就会成为工人阶级的史前史。那些 100 年前照片里的白人男性反叛者们，将被视为一场多种族、以发展中国家为中心、用短信实时交流、以女性为主的新的运动的先驱。

无论结果如何，我在本书中试图呈现的是，缔造工人运动的是那些活生生、和你我一样的人，不是什么冷血的社会主义机器，亦或无政府主义式的超人。

在基贝拉，我曾经碰到一位女工，她的工作是打包那些会出现在发达国家餐桌上的四季豆。“我从没尝过它们的滋味，”她说。“拜托，”我说，“那不可能。”她静默片刻，接着承认道，“好吧，我的确曾经尝过一次，而且它尝起来味道不错”。

我有一种直觉，对劳工运动的先驱而言，运动是如何开始的——其初

哀和上述这位女工的故事如出一辙。在劳碌和贫穷相交织的社会不公底下，他们短暂地享受到了一些更美好的事物，从而下定决心，如路易斯·米歇尔（Louise Michel）⁵ 曾经所言，“要让所有人都加入到生活的盛宴”。

保罗·梅森

译 = 赵宇超

5. 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巴黎公社重要人物之一。——译者注

像狮子一样站起来

1819 年曼彻斯特彼得卢惨案

译=杨硕

像睡醒的狮子一样站起来
你们的人数多得不可征服；
快摆脱束缚着你们的链索
像抖掉沉睡时沾身的霜露：
你们是多数，他们是少数。

——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

《暴政的假面游行》（*The Masque of Anarchy*），1819 年¹

1. 珀西·比希·雪莱（1792—1822），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著名诗作有《西风颂》《致云雀》等。译文选自《玫瑰集》（江枫 [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译者注

2008年，中国深圳

“我们第一次罢工的时候，老板特别狡猾：他让厂里的灯一直开着，让我们以为其他人仍然在上班，所以我们就回去了。第二次我们就变聪明了，”从湖南来的女工罗春丽（音）说，“我们就到车间去，等到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坐在那儿，什么也不干。”

“你们怎样组织罢工？”我问道。她像看一个傻瓜一样看着我：“你就把一张写着‘罢工’的小纸条顺着生产线传下去，大家就会罢工。”

26岁的罗春丽已经是罢工老手了。中途辍学的她像其他1.5亿农民工一样，在中国的出口加工厂中找工作。如今她在深圳打工者中心做志愿者，那是一家位于龙岗——深圳市郊的出口加工区——的小店面。她机警地瞧着中心外面的街道，叫我离门远一点儿：短短半年里，这个地方已经被手持钢管的暴徒砸了两次。

这里的陈设朴实无华：一台80年代生产的老掉牙的电脑，几条横幅，一块详细写着中国就业法主要条款的黑板。门口有一个摄像头，监视着可能出现的袭击者；街对面也有一个摄像头——警察安装的——盯着罗春丽和她同事的一举一动。

一些人从街上徘徊着走进了中心，罗春丽正在向他们提供咨询。一位郭姓女子的两根手指神经被割断，却收到工厂老板娘的死亡威胁，要求她不要打官司。一对中年夫妇因为不想从他们已经工作了9年的地方自愿离职，而被削减了工时。在罗春丽为他们出谋划策时，一个男子走进来，付了一块钱，从中心的图书馆借了一本破旧的平装小说；他没有打开它，而

是放在面前的富美家²桌子上，头枕着它睡觉。

与此同时在店门口，几个年轻姑娘准备去发传单：“鞋厂中需注意的危险”；“姐妹们，让我们共享更健康的生活”（有关性骚扰）；“怎样进行工伤索赔”。

我问罗春丽她们在哪里发传单，这又惹来了她略带鄙夷的目光：

“当然是医院急诊室啊。”

这就是新式的中国工人运动所呈现的样子：这些年轻的、以女性为主的志愿者缺少资金，缺乏安全，少有高学历，却成为一场正在席卷中国工人的剧变的一部分。

这场剧变在中国人眼中是不寻常的，但对任何见证了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工人抗争兴起的人来说，它却并不陌生。有劳动力的短缺；有飞涨的物价和提高工资的呼声；有超时工作及拖欠工资的纠纷，更有罢工。这个在法条上禁止罢工的国家，在 21 世纪头 10 年末成为了世界罢工中心。

2007 年 11 月 27 日的爱高电子厂罢工，就是这一现状的典型事件。这个厂满满当当地占据了厚街³——广深高速途经的一个工业镇——的一整个街区，为一家加拿大公司生产电子元件。这样一个拥有 8000 名员工的大型企业并非血汗工厂：宿舍从外面看很不错；换班后的工人鱼贯而出，走在春天的蒙蒙细雨中，信心十足，精神饱满；男人们留着规定的寸头，显得很神气。工资也体面，高于每月相当于 100 美元的平均线。

引发罢工的是不断上涨的食品价格。在那个全球商品价格疯涨的年代，

2. 一种耐高温、易清洗的表面饰材，由富美家公司（Formica）生产。——译者注

3. 在广东省东莞市西部。——译者注

食品支出年均增长 23%。工人在食堂内一日三餐的费用将从他们的工资里扣除，而管理层计划将这笔费用提高一倍（中国的轮班时间很长，工人有时间吃早、午、晚三餐）。

罢工者自己拍摄并在网上发布的一系列照片记录了后面发生的事情。他们涌上厂区外的大道并封堵了它。一切都很和平，直到防暴警察到来：他们身着好几种制服——有蓝色的，也有迷彩的，很多还牵着德国牧羊犬品种的警犬。他们驱赶罢工者退回厂区，然而一大群人堵在了大门口。照片中女工们叠着胳膊，和她们对面的防暴警察一样坚定地站立着。警察用警棍逼迫她们后退，并且逮捕了一些人。虽然这些照片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只存在了几个小时就被撤下，但是它们讲述了这样的故事。

我去爱高了解罢工者的情况，然而事情进行得很不顺利：那片区域每个角落都有警察巡逻——而此时是星期天早晨 7 点。我们问了几个来往于小巷中的工人。“你想聊罢工？快走吧！”一对夫妇说。一个女人把我们带进一个门口，向我们解释罢工是怎样解决的：“老板不涨价了，我们回去上班。”换句话说，他们赢了。

这是中国劳动纠纷的新模式。他们是自发的：工人通常一致同意罢工，并且会封堵街道。警察前来处置，共产党的官员也会过来：2006 年，胡锦涛总书记指示他们不要把所有罢工都当作对政治稳定的威胁来对待，要居中调解而不是强力镇压。在爱高，一出现有人被逮捕或殴打，就有官员很客气地给这家在香港上市的公司的老板下了指令，让他们收回食堂涨价计划，罢工就结束了。

游走于这家工厂以及珠三角地区其他工厂的边缘时，我很清楚地看到，罢工已经成为日常惯例，无关意识形态。“我们罢工了而且赢了，那又怎

样?”态度似乎如此,“《流行偶像》⁴里谁领先呢?”将劳资关系与政治合法性及抗争等更宽泛的议题分离,是中国统治者的一项成就,但它也给政府对工人运动的处理方式带来了一个主要变化。

2006年,共产党要求官方的全国总工会着手组织农民工。后来《劳动合同法》被通过并于2008年1月起生效。这部法律在制定阶段就被多次弱化:首先来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里亲市场的中共代表,他们在中国的立法机关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公开行动,竭力反对该立法;随后是美国商会的游说。尽管如此,法律仍然赋予了中国工人工作满10年后索取遣散费的权利⁵,限制了临时工合同的连续使用,更保证了书面劳动合同的权利——根据官方估计,有多达6000万农民工从未见过它。

立法的效果十分显著,却出乎意料。据广东省总商会称,法律生效3个月内有大约1万家工厂关闭。原因不仅是这些多数来自香港和台湾的老板厌恶集体协商,他们对工人长年工作后被解雇时可索取补偿的权利也恨之入骨。甚至连日本相机制造商奥林巴斯这样的大企业,都宣布鉴于新法律的影响,他们将收缩在华业务。

其他企业只想绕过这些规定。崔氏夫妇茫然无措地走进深圳打工者中心:来自四川、已近不惑的他们已经在同一家工厂——为LG公司生产耳机的信彰电子——工作了9年。现在经理要求所有长期工“退休”。

4. 《流行偶像》(Pop Idol),一档英国音乐选秀节目,于2001—2003年在英国独立电视台(ITV)播出,被视为电视选秀节目的鼻祖。——译者注

5. 遣散费是用人单位同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时向劳动者支付的经济补偿。依照我国《劳动合同法》,劳动者因劳动关系解除而获得经济补偿不需要满足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条件。——译者注

“他们要求我周一走人，”崔先生说，“他们说可以按一年工龄换一个月工资的比例付钱给我。我们拒绝离开，他们就把我们的工时砍到了法定的每周42小时。可是我们每个月正常情况下要加100个小时的班，那样我们的工资才会涨到每月2000块。如果没有加班，工资就掉到900块了。”

崔女士插话道：“扣掉住宿的钱，我们就只剩500块了。我们有一个孩子在上高中。孩子上学是个很重的负担，所以我们才来这儿打工。我觉得没什么希望。我们无能为力。也许我们会回老家吧。”

在信彰厂外，我打算和一些被招进来替代像崔氏夫妇这样的老员工的年轻姑娘聊一聊。在雨中闲逛着等待换班结束时，我意识到自己正站在另一家工厂的废墟上。你在珠三角待得越久，越能深刻地认识到这一切多么地转瞬即逝；在这破旧的全球化工业中心，这些工厂和宿舍是多么地不堪一击；周围毫无用处的荒地是多么地普遍。

这些刚刚从中国内地坐火车来的姑娘，对《劳动合同法》一无所知：“老员工都走了，我们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其中一位正与工友手挽手挤在一把便宜的雨伞下面，笑道，“我们是新来的。什么都不知道。”她们仿佛把这当作一项成就来说。

实际上，二十年来事情似乎就是这个样子：农民工对在工厂上班感到新奇，为之着迷。不论工资多么低，不论宿舍多么昏暗，有多少老鼠肆虐，他们一只脚已经踏上了现代社会的自动扶梯，并且不愿下来。对无数离乡谋生的第一代农民工而言，仅仅来到这个有工资、加班和购物的花花世界就已经足够了。

然而，在深圳打工者中心主任黄庆南看来，代际的变化正在发生。他在2003年成立了这个打工者中心，用的钱来自他因工厂失火而面部大面积烧伤后得到的补偿金。去年年底，因为帮助一个工人讨薪而被工厂的暴徒

砍伤，他又住进了医院。

我们看到了态度上的巨大变化。像我这样的三四十岁的工人，他们是直接从农田里走出来的。他们被欺骗后往往保持沉默。但是80后的这代打工者不一样。他们看到其他人衣锦还乡，以为在工厂当工人会挣很多钱。一旦他们发现真相，他们将无法忍受。

黄庆南对血汗工厂和律师都深恶痛绝。珠三角有很多专门做讨薪的群体性诉讼的律师事务所，但是黄庆南认为他们都是在骗钱，他告诉我：“法律写得很清楚，甚至一个十三岁就不再上学的人，都能在不请律师的情况下上法庭打赢官司。找律师只会增加工人的依赖性。”像中国所有的劳工活动分子一样，黄庆南明白罢工可以变得如何暴力和非理性，一般他会劝阻那些过激行为。但是他提醒“没有法律说你必须要上班”。

变化是如此地迅速。2003年，我第一次来深圳，为了见一位律师，他帮助那些因落后的生产安全水平而受害的工友们维权，而我不得不偷偷摸摸秘密寻访。当时，周立太律师和他那些肢体残缺的客户是离我最近的、来自工人的独立声音。仅仅因为帮助工人个人索赔，周立太已经被地方官员赶出了城。如今，据本地媒体估计，珠三角地区有多达50位劳工律师，还有数量众多、形形色色的，由像黄庆南这样有更全面追求的人领导的非政府组织（NGO）。

随着打工者中心的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中国当局也在苦苦思索如何应对它以及其他劳工NGO。十月，深圳市总工会的领导王同信将黄庆南和其他独立劳工权利倡导者召集到一起，告诉他们：

你们做了很多本应是政府职责的工作，用了一些不同的方法，有些造成了损失，有些是非常规的。但总的来说，它们是卓有成效的，从结果上看推进了政府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们）正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

漫步于打工者中心外围的小巷，我明显感受到工人阶级生活的快速变化。这里除了宿舍和未完工的道路，还有鳞次栉比的公寓楼。在街上，即使在连绵的春雨中，他们仍然过着他们自己的传统中式市井生活。他们坐在仓库似的房子里，“啧啧”地吃着面条，下着棋，或者坐在几乎每个街角都有的网吧里，脸被电脑显示器照得发蓝。街上最显著的特征是一家街角小店，配备了一个可骑乘的塑料大象，小孩儿们可以吵闹着求妈妈让自己骑上去玩。而十年前，农民工都把孩子留在村里。

他们的生活已经告别了20世纪90年代肮脏破败、孤苦伶仃的宿舍。刚刚走出农村，梳着辫子，懵懂无知的小孩儿形象可以更快地与这样的街道相融。罗春丽这样描述她自己从漠不关心到积极行动的历程：

2000年起我到过很多城市，在很多工厂里上过班。我总是在寻找一家理想的企业，但是最后发现他们都一样：所有的老板都剥削你。所以我开始意识到，除非社会有更大的转变，否则你工作再努力，学得再多，离职去找一家更好的公司的次数再多，都无关紧要。

我很生气。我意识到我的人格尊严正在被践踏。有一次我抓狂得想把工厂烧了！有时候确实会发生工人自焚或者杀死老板的

事——但是每一个这样的故事背后都有尊严被践踏的人。

如今她愈发冷静，甚至在分发传单和提供咨询时，一只眼睛仍然注意着门，以防那些公司雇的打手回来。他们取得的进展已经如英国工人从1799年取缔工会⁶到1819年彼得卢示威那20年间一样快了。深圳的工人在当前全球资本主义中的地位就像200年前曼彻斯特（Manchester）⁷工人在当时的地位一样：他们的工作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然而他们势单力薄，外面的世界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当我准备离开时，罗春丽将一本打工者中心简报重重地放在我手里。她反复地指着简报的大标题，我的翻译绞尽脑汁将它译成英文，最终确定为：“After cold winter, Spring certainly comes（寒冬过后，春天自来）。”

我说：“‘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怎么样？”

“完美啊，”翻译说，“你怎么知道这句？”

我岂能不知？这是一首伟大的，充满希望和正义的英语诗⁸的最后一行，出自一个令彼得卢暴动永远被铭记的诗人。雪莱的词句穿越几个世纪和几个大洲，来到深圳这条偏远的小路，提醒人们如今的中国工人与当年的英国工人之间高度的相似：他们接下来所做的将深刻地影响这个世纪。

6. 英国为防止工人在战争时期对政府施压，于1799年颁布《结社法》禁止工会活动和集体协商。——译者注

7. 英格兰西北部工业重镇，18世纪起因棉纺织业而兴盛。——译者注

8. 出自雪莱的名作《西风颂》。——译者注

1819 年，曼彻斯特

8月16日，星期一，早晨8点。工厂一片寂静，织布作坊里的织布机并未开动。对来自曼彻斯特郊区米德尔顿（Middleton）的织布工萨缪尔·班福德（Samuel Bamford）而言，最关键的就是避免任何产生暴力的借口出现。新的工业劳动力令雇主恐惧，而今天将成为其历史上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一天。在约定好的时间——

有至少 3000 人围成了一个方形，还有几乎同样多的人在他们的周围，人群安静下来后，我提醒他们，要去参加的是为议会改革⁹所举行过的最重要的会议。¹⁰

他们以 100 人为一队，在三级指挥结构的带领下开始向曼彻斯特进发。这是一场身着盛装、纪律严明的游行，只有年长者被允许带着手杖，与暴民行动完全相反。

走在队伍前面的是精心挑选出的 12 个最标致、体面的年轻人。他们站成两排，每排 6 个人，每人手里握着一枝象征友善与和

9. 18 世纪英国工商业的发展使英国人口分布和社会阶层发生显著变化，而议会在议席分配和选举权等问题上不能满足新兴工商业地区及阶层的诉求，后者因此呼吁议会改革。议会最终于 1832 年通过《改革法案》，重新分配议席并扩大选举权。——译者注

10. Bamford, S., *Passages in the Life of a Radical*, London: 1967, p. 146.

平的月桂；紧随其后的是来自若干个地区的人，5人一组；然后是个很棒的乐队；接着是一片五彩斑斓的旗帜：一面蓝色丝质的，上面有金色的“团结就是力量”“自由、博爱”等题字；一面绿色丝质的，上面有金色的“议会一年一选”“选举人人有权”等字样；在它们中间，一顶帅气的、织得很有品味的深红色天鹅绒帽子支在一根手杖上，上面插着一丛月桂，帽子前面写着“自由”（Libertas）。¹¹

这是自由之帽——国际流行的共和主义¹²象征，源自那场英国军队与之交锋了近30年的法国大革命¹³。它的出现如同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展开一面镰刀锤子旗¹⁴。

像这样的队列从周围的16个市镇向曼彻斯特进发，同时城里的工人也离开工厂，沿街列队。当班福德的小队在日光斑驳的树林中偶遇另一支队伍时，“我们会面——万人齐声怒吼，回声震彻树林和山谷。然后万籁俱寂，只能听到音乐的气息；而后我们神情肃穆，继续前行。”¹⁵

11. 同上。

12. 共和主义主张人民主权，反对君主制，法国大革命后在欧洲影响广泛。——译者注

13.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英国于1793—1815年七度组织反法同盟与法国交战。——译者注

14. 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受冷战格局影响，美国国内兴起反共浪潮，大量政府部门及文化界中的疑似共产主义者与进步人士遭调查和迫害。——译者注

15. Bamford, S., *Passages in the Life of a Radical*, London: 1967, p. 147.

他们要去听一个名叫亨利·亨特（Henry Hunt）¹⁶的人宣讲在当时听起来如天方夜谭的观点：普选，一年一选，以及废除旨在维持食品价格居高不下的进口控制政策¹⁷。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来自中产阶级专业人士，而绝大多数参与者却是体力劳动者及其家属，有10万这样的人就聚集在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St Peter's Fields）的木制讲台周围。一群律师和记者坐在那儿等待亨特的到来。这是曼彻斯特见证过的最大的集会。

它并不是那个夏天发生的第一场激进游行。伯明翰（Birmingham）¹⁸人民在7月已经召开了一次震动英国贵族的群众大会。他们不仅要求选举权，并且在当时当地就举行了投票。那时几乎所有大城市都没有选举权，可是伯明翰却选出了一个“立法代表”——一个非官方的，席位并不存在的议员。这是意图的宣示。现在当局害怕亨特在曼彻斯特令这一幕重演。他们一周前已经取缔了一次会议，如今也做好准备，一旦有人提及选举，就将此次集会驱散。

天很热。亨特抵达讲台开始讲话。他在曼彻斯特工人阶级中备受推崇；在一些激进的主日学校¹⁹，班长们的项链下挂的不是传统的耶稣受难像，而是他的肖像。然而，当亨特开始演讲，班福德却做了工人活动家在大热天

16. 亨利·亨特（1773—1835），英国工人阶级激进主义活动家，绰号“雄辩者”（Orator）。——译者注

17. 英国粮价在与法国交战期间受贸易禁运影响而大涨，战争结束后因进口增加而又大跌。为维护地主阶级利益，英国议会于1815年颁布《谷物法》限制粮食进口。——译者注

18. 英格兰中部工业重镇，18世纪起成为英国制造业中心。——译者注

19. 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又名星期日学校，是由基督教团体开办的为儿童和青年人提供初等教育的机构，始于18世纪末的英国。——译者注

被请来听冗长的演说时经常做的事——去小酒馆。

我对一位熟人提议说，既然演说和决议不太可能包含什么对我们来说新鲜的东西，而且既然我们能从报纸上读到它们，那么在精力不太旺盛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离开一会儿去喝两杯，反正我很需要。他表示赞同，我们就到了人群的外缘，这时一阵喧嚣及一种奇怪而低沉的声音向教堂方向传来。有人说是布莱克本（Blackburn）²⁰的人来了，我踮起脚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看到一队身着蓝白制服的骑兵疾驰而来，手里还握着剑。²¹

这是曼彻斯特义勇骑兵团²²，一个被招募来镇压工人起义的民团。为了这次行动他们磨刀霍霍，恶向胆边生。他们上午在一个酒吧里。我们借助当时的一份激进报纸得知了参加此次行动的101人中每个人的名字和职业。工作头衔中出现最多的是酒馆老板，那天骑在马鞍上的有13个。11位磨坊主和7位屠夫在这个团里也十分显眼²³。它是这座城市骑在马背上的商人黑帮。亨特让人群给予他们三声倒彩。从旁边一座房子中透过窗子观察这一切的治安官们被吓坏了，认为这一举动是“最明目张胆的挑衅”。骑

20. 英国西北部城市，工业革命时期因纺织业而兴起。——译者注

21. Bamford, S., *Passages in the Life of a Radical*, London: 1967, p. 151.

22. 义勇骑兵团（Yeomanry）是18世纪末英国为抵御法国入侵而在地方组织的志愿民团。——译者注

23. *Manchester Observer*, 10 August 1822. 引自 Read, D., *Peterloo: The “massacre” and its background*, Manchester: 1958.

兵们将人群冲开。治安官们经由两队警察构成的通道向前走。他们逮捕了亨特及其他几个在讲台上的人，所有这些人都很平静地被带走。

此时，由于酒劲儿影响了骑术，义勇骑兵团陷入了麻烦。人群将他们团团围住，拳头砸向他们，砖块和棍棒扔向他们。治安官们判断这些义勇骑兵团已经“溃败”，请求在附近的小巷中待命的正规军前来增援。第15轻骑兵团，参加过滑铁卢（Waterloo）战役²⁴的老兵，列阵进攻。一位在场的军官写道，这次进攻——

横扫前方的这一大群人；平民，义勇骑兵团和警察试图躲避，却慌不择路，互相踩踏；以至于当我们扫荡到广场的尽头时，真的，逃窜的人已经堆积如山。²⁵

透过尘埃，旁观者们目睹了刀起刀落。班福德就在受难者之中：

人群踌躇片刻，稍作停顿；接着就是一阵潮水般势不可遏的冲击；那些无法逃跑而被裹挟在人群中受屠刀杀戮的人发出闷雷般的，夹杂着惨叫、祈祷和咒骂的声音。²⁶

24. 1815年6月18日，英国与普鲁士联军在滑铁卢（今属比利时）战胜拿破仑率领的法军，标志了拿破仑的最终失败。——译者注

25. Sir William Joliffe, in Bruton, F. A., *Three Accounts of Peterloo by Eyewitnesses*, Manchester: 1921, p. 53.

26. Bamford, S., *Passages in the Life of a Radical*, London: 1967, p. 152.

广场十分钟内就被清空。班福德记得“阳光透过闷热而凝滞的空气投射下来”。

广场上仍然有几处人堆，他们在那里倒下，被压瘪，以至窒息。他们中有些仍然在呻吟，有些瞪着眼睛大口喘气，有些已经永远停止了呼吸。除了这些低吟，除了战马偶尔的响鼻和马蹄刨地的声音，一片死寂。²⁷

曼彻斯特的街道上满是哀号着向自己所在的城镇跑的人们，“他们面如死灰，有些脸颊上还淌着血”²⁸。

报纸将这一事件称作“彼得卢（Peterloo）惨案”，以讽刺参加过滑铁卢（Waterloo）战役的军队的出现。依现代的标准看，它其实稀松平常：11人死亡，400人受伤，其中140人被刀砍伤。消息两天后传到伦敦（London），至9月5号为那位使此事在英语文学中得以不朽的诗人所知。

对雪莱而言，意大利的港口利沃诺（Livorno）是个不错的自我政治流放的地方²⁹。在一个白天可以听农民的歌声及水车的“吱呀”声，晚上有萤火虫飞舞的阳台上，他重新焕发了精神。正是在这个浪漫的场景中，他打

27. Bamford, S., *Passages in the Life of a Radical*, London: 1967, p. 153.

28. Prentice, A., *Historical Sketches and Personal Recollections of Manchester intended to illustrate the progress of public opinion from 1792 to 1832*, Manchester: 1831.

29. 19世纪初英国国内统治阶级与底层人民的矛盾十分尖锐，民众的暴力抗争与政府的血腥镇压频发。持温和改革立场的雪莱对这样的政治形势感到失望，于1818年携亲友离开英国，前往意大利居住。在意大利期间雪莱多次前往利沃诺。——译者注

开了快邮送来的一包伦敦的报纸，其中有对彼得卢事件及其政治影响的描述。带着“在我血管中沸腾的……愤怒的洪流”，雪莱开始创作《暴政的假面游行》，他写了12天，完成后立即寄给他的出版商。

这首诗被称为“用英语写就的最伟大的政治抗争诗”³⁰。其以“像睡醒的狮子一样站起来”为开头的末节已经融入英国工人运动文化中。2003年，当消防员罢工³¹抗议工党³²政府时，“像狮子一样站起来”就被他们作为口号印在了工会的T恤衫上。然而彼得卢的受害者们没有机会聆听雪莱的诗作。诸多混乱的起诉使亨特与班福德身陷囹圄，绝大多数的激进出版物被封，群众集会被禁止，在这样的氛围中，雪莱的出版商认为此时发表这首诗并不明智；直到1832年它才重见天日。

《暴政的假面游行》尽管伟大，却有一个较大的缺陷：雪莱对组织彼得卢集会的工人运动一无所知。在雪莱对工人阶级的经济苦难令人心碎的描述中，他们如一群愚民，贫困中保持高尚，却短于思考；为所面对的不公正的严重程度灰心丧气，无法以非“血债血偿，以暴制暴”的方式走出消极抗争的局限。雪莱对工人阶级的这种认识主导了他所倡导的行动策略：

如果，那些暴君仍然胆敢
纵容他们横行在你们中间，
刺、杀、砍劈，无所避忌，

30. Holmes, R., *Shelley: The Pursuit*, London: 1974.

31. 2002底至2003年夏，英国的消防员多次举行全国范围的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待遇。——译者注

32. 英国主要政党，政治立场偏左，传统上代表工人阶级利益。——译者注

权且容他们为所欲为一时。
只是抱紧双臂，目光坚定，
不必畏惧，更无须乎吃惊，
就注视着他们肆虐、行凶，
直到他们的怒气消耗殆尽。³³

同样的消极抗争的策略在惨案发生后为亨特和班福德所推崇。但是它早在 8 月 16 号当天晚上就被否定了。

在位于曼彻斯特市中心的新十字（New Cross）贫民区，轻骑兵团构成了“强大的夜间警戒”以维持秩序：

警戒一占好位置，一群暴民就聚集起来，随着夜色渐深入越来越多；他们向士兵们扔石头，轻骑兵多次清场，将暴民驱赶上通往新十字的街上去。然而这些试图避免混乱的努力仅成功一时，因为人们穿过房子和小道，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又向军队发动了袭击，许多人和马都被石头砸中。³⁴

忍耐了 90 分钟后，军队开火了。一个步兵连三次齐射，致使四名闹事

33. Shelley, P., *Shelley's Revolutionary Year: The Peterloo Writings of the Poet Shelley*, London: 1990. ——作者原注。译文选自《玫瑰集》（江枫 [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译者注

34. Sir William Joliffe, in Bruton, F. A., *Three Accounts of Peterloo by Eyewitnesses*, Manchester: 1921, p. 56.

者重伤。第二天曼彻斯特成了被军事占领的城市：“街上有军队、警察和辅警巡逻；商铺关张歇业，一片沉寂；仓库大门紧闭，用挂锁锁住。交易所空无一人；大炮蓄势待发”³⁵。

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8月17日又有骚乱发生，不仅在城内的贫民区，还在邻近的斯托克波特（Stockport）镇³⁶与麦克莱斯菲尔德（Macclesfield）镇³⁷，那里有一名警察遇害。8月19日新十字地区有一些冲突，而到了20日，“本地的暴徒与骑兵展开群殴”³⁸。

作为反对使用暴力的人，班福德这样描述彼得卢惨案一天后工业区的气氛：

当我回到家，我发现镇上一片躁动。许多年轻人准备好了武器或搜寻着可以改造成武器的东西。有人在磨镰刀，有的在磨小斧子，还有磨螺丝刀、锈迹斑斑的剑、干草叉及拖布针³⁹的；任何可以砍或刺的东西都被宣称可以拿来用。然而计划没有定下来——什么事都没安排好——武器到后来就为一切可能发

35. Bamford, S., *Passages in the Life of a Radical*, London: 1967, p. 157.

36. 在曼彻斯特东南郊。——译者注

37. 在曼彻斯特以南。——译者注

38. Read, D., *Peterloo: The “massacre” and its background*, Manchester: 1958, p. 142.

39. 旧时制作拖布，用一根一端有较平的底座，另一端较尖锐的金属针，将布料从针的尖端穿过，固定在底座，然后将针的尖端插入把手。——译者注

生的事留着。⁴⁰

工人阶级在彼得卢表现出的温和与有意的和平主义，是班福德在因煽动叛乱而被起诉时进行辩护的核心内容，后成为被 19 世纪中期的社会主义者们接受的事实，他们视彼得卢那一代人为幼稚地依附中产阶级领导人的政治初学者。雪莱的诗并未起到扭转这种观念的作用，在媒体的报道日益减少的情况下，它流传了下来，并使认为聚集在圣彼得广场的运动只不过是一大群无组织的工人的观点得以延续。

对事件根源更细致的考察则揭示了另一番真相：在彼得卢惨案几个月前，兰开夏郡（Lancashire）⁴¹ 的棉纺织工人建立了一个非常成熟的组织网络，可以说预示了其 200 年里工人运动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人性最丑恶的一面……”：

那么彼得卢的男男女女们有什么新鲜的呢？答案比他们挣工资或操作机器这样简单的事实要复杂得多。事实上当时存在两类工人：像班福德这样在家用手工织布机做计件工作的织布工，和在工厂里上班的纺纱工。理解他们带给上层阶级的恐惧的关键是他们组成的联盟。纺纱工是最早的现代“无产者”；而织布工是更古老的工人阶级精英，他们享有特权的生活方式正在衰落。民主对于一直梦想它的中产阶级律师和记者来说似乎不可能

40. Bamford, S., *Passages in the Life of a Radical*, London: 1967, p. 158.

41. 位于英格兰西北部，濒临爱尔兰海，是工业革命发源地，为当时世界棉纺业中心。——译者注

实现，直到这些工人联合起来将它作为口号。

1819年的棉纺纱工人，最早体验到了一种他们无法控制速度和生产流程的系统所带来的影响。机械化一旦实现，纺棉纱就从家庭转移到了工厂，男性取代女性成为纺纱劳动力的核心。随着机器越来越大，管理它们的技能越来越复杂，管理人员的薪酬也越来越高。最后一个要素是蒸汽取代水力，使工厂可以扩大规模并建在城镇而不必靠近农村河流。到1800年，一个由成年男性纺纱工组成的核心技术劳动力群体已经形成，这一劳动力的主要补给是从孤儿院招募的儿童，他们和工厂主签订“契约”并被要求住在宿舍中。

新式工业的工作最具决定意义的特征是形形色色的强权。法律将公共土地废除⁴²，迫使劳动力离开农村。贫穷成为了犯罪⁴³。新的穷人被迫将孩子送进孤儿院，从这一点来说，在兰开夏郡的工厂中工作似乎是一种解脱。

一旦进入工厂，工人就成为了一个仿效监狱和军队建立的纪律体系的一部分。这种体系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人类运动的速度历史上第一次由机器主宰。从童年到做工、从田野到工厂、从家庭劳动到工业纪律，所有这些转变都在这第一代工厂童工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其中就有当时10岁的萨拉·卡彭特（Sarah Carpenter）：

他们带我进账房并给我看一张带有红色马形印章的纸，让我在

42. 18—19世纪，英国议会通过颁布法令的形式使大量公共土地被私人圈占，大批农民因此进入城市谋生。——译者注

43. 英国自17世纪起通过立法建立了贫困人口救济制度，强制贫民通过劳动获取救济。——译者注

上面摸一下然后画个十字⁴⁴，我照做了。这就意味着我要在克雷斯布鲁克工厂（Cressbrook Mill）待到21岁……梳毛工的头儿名叫托马斯·伯克斯（Thomas Birks）；但除了“魔鬼汤姆”他从未被叫过其他名字。他非常坏——他受雇主怂恿，对所有人都很粗暴，尤其是孩子。我经常看见他抓着十七八岁大姑娘的衣服将她们提起来，横着扔在他膝盖上，然后当着男人和男孩们的面用手打她们。每个人都被他吓怕了。他甚至不让我们说话。有一次他感觉不舒服，然后我们都很高兴。我们盼着他死。⁴⁵

罗伯特·布林科（Robert Blincoe）的人生故事在彼得卢惨案后的几年里成为了畅销书，他永远忘不了在工厂的第一天：

他们五点半到工厂……他一进门就被噪音吓住了，而且恶臭几乎难以忍受……分配给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将散落在地上的棉花捡起来……不习惯这股恶臭的他很快病倒了，背部也因持续弯腰而疼痛。布林科因此获得了坐下的自由；但是他很快发现在棉纱厂里这样的态度是被严格禁止的。他的工头（史密斯，Smith）告诉他必须坚持站起来。他照做了，直到十二点钟，共六个半小时，一刻也没有休息。⁴⁶

44. 旧时英国文化程度较低的人在签契约时通常以画十字代替签名。——译者注

45. *Ashton Chronicle*, 23 June 1849.

46. Brown, J., *A memoir of Robert Blincoe, an orphan boy sent ... to endure the horrors of a cotton-mill*, Firlie: 1977, p. 28.

早期工厂里的权力结构并非简单的“他们和我们”；布林科的回忆录显示，暴行通过两级中间人传导。首先有工厂的监工和宿舍的头儿，他们有权打人、罚款、雇人、解雇，甚至布林科暗示还有强奸。在他们下面是有技术的男纺纱工，他们雇儿童帮工并且被允许用恐怖手段管理：

一个臭名昭著到无法否认的事实是，纺纱的、拉幅⁴⁷的、捻纱⁴⁸的等等，他们中最冷酷而凶残的那些人已经习惯于对接断线头的、清理散棉花的、把纱线绕在线轴上的，以及其他屈服于其淫威的少年施以重罚，强迫他们吃脏兮兮的蜡烛，舔干净香烟上的口水，张开嘴让肮脏的无耻之徒向里面吐痰……趋于表现人性最丑恶一面的是，绝大多数冷眼旁观的人是作为教区学徒⁴⁹来到工厂的，他们自己经历过所有这些令人反感的强迫行为。⁵⁰

工厂中的工人明显地身形佝偻，体态消瘦。当时最普遍的职业病是膝盖残废、视力衰退和驼背；许多人被机器割掉了胳膊或腿。许多工厂中存

47. 利用纤维在潮湿条件下所具有的一定可塑性，将织物幅宽逐渐拉阔至规定的尺寸并进行烘干稳定的整理过程。——译者注

48. 将多股细棉纱捻成一股粗纱的过程，以增加其紧密性。——译者注

49. 根据英格兰《1601年济贫法》，贫民家庭的孩子以教区（parish）为单位被送往手工作坊或工厂做学徒，这类具有强制性的学徒被称作教区学徒。——译者注

50. Brown, J., *A memoir of Robert Blincoe, an orphan boy sent ... to endure the horrors of a cotton-mill*, Firlie: 1977, p. 57.

在普遍性的暴力、强奸与滥交的亚文化，被一位改革家评价为“一种足以毁坏整个社会的放荡，就像潜伏的疾病，看上去不起眼，效果却很致命”。

他们就是那样工作的。而他们的生活是这样的：在彼得卢惨案后调查过的 7000 个曼彻斯特家庭中，2200 个没有厕所，900 个被认为不适宜居住。“在他们家中找到的小家具是最原始最普通的那种，很多都裂开了，”外科医生菲利普·加斯凯尔（Philip Gaskell）报告说。他们睡在柴草铺的床上，许多人挤在一间屋子里。“社会与家庭私密性的彻底缺失产生的令人沮丧的效果应该在被理解之前被看到。通过赤裸裸地展现所有的性欲及性行为，它将对行为端庄与衣着得体的关心一扫而光。”⁵¹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2 万人住在这些廉租房的地下室中，经常与牲畜为邻。他们主要有爱尔兰裔织布工、砌砖工与街头小贩：“所有人都衣衫褴褛、肮脏不堪、道德败坏”，加斯凯尔写道。

一旦纺纱工开始反抗，迁入军事化管理的工厂与臭烘烘的贫民窟的经历会给他们的组织方式留下特殊的印记。但是那来得有些迟。他们像如今在深圳的农民工一样，忙于挣和花这种他们以前作为农民只能梦想的钱。反而是家庭织布工最先组成了一些以互助为目的的“联合体”组织，向议会游说以增加工资。彼得卢惨案前的 30 年里，织布工的工资快速下降，直到他们除了尊严一无所有。班福德的家是个两居室：一个房间里放他和妻子用的手工织布机；另一间则是地位的象征，将家庭织布工的生活与工厂纺纱工的区分开：

51. Gaskell, P., *Artisans and Machinery*, London: 1968, p. 81.

在我们的左边有一张简陋却干净的床，被颜色较深、式样过时的帘子遮着。床脚的窗户紧闭，以免路过的人向内窥看。床旁有几把椅子和一张桃花心木⁵²圆桌；然后是另一张椅子，它旁边有一张长桌，擦得非常白。长桌上方有一面镜子，两边各贴着一幅《复活与升天》，“是鲁本斯（Rubens）画作的复制品⁵³……”⁵⁴

这就是一种正在衰落的特权文化：机械化纺纱意味着纺出的棉线更多且更易于织布。由于参加过拿破仑（Napoleon）战争⁵⁵的复员军人加入劳动力大军，手工织布黄金时代的文化和薪资水平都被摧毁了。到19世纪30年代早期棉纺织本身实现机械化时，织布工的境遇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整个一门手艺和一种文化跌入了谷底。这个过程催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不满。

请愿失败，罢工就爆发了。1799年，政府以《结社法》（*Combination Act*）回应罢工，在其后25年里事实上将工会定为非法组织。作为回应，工人的不满逐渐向更无政府主义的道路发展。1808年曼彻斯特的纺织工人发动骚乱、罢工并与军队发生冲突，最后失败。棉纺织业老板们如梦方醒，意识到这是曼彻斯特第一伙不为教会和国王而游行的“暴民”。到了1812年，

52. 一种名贵木材，红色，质地坚硬，抗腐蚀，易加工，常用于制作高档家具和乐器。——译者注

53. 鲁本斯（1577—1640），弗兰德斯（今属比利时）画家，巴洛克画派早期代表人物，擅长祭坛画、肖像画、风景画及有关神话和寓言的历史画，以反宗教改革闻名。——译者注

54. Bamford, S., *Passages in the Life of a Radical*, London: 1967, p. 158.

55. 指1803—1815年间拿破仑与欧洲反法势力进行的一系列战争。——译者注

曼彻斯特陷入了卢德运动⁵⁶：诺丁汉郡（Nottinghamshire）⁵⁷的织袜工占领了他们的村庄，砸毁了正在将他们及他们的技术取代的动力织布机。兰开夏郡的织布工也加入了运动，袭击了为数不多的开始自动织布的工厂。这场运动最后被镇压，付出了7人被处死，17人被流放澳大利亚的沉重代价。与此同时，工厂纺纱工们旁观着这一切，并稳步使自己越来越强大。

真正点燃了纺纱工行动火焰的是经济的衰退：一旦工资停止增长，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补偿工厂生活的残酷了。从1817年到彼得卢惨案的这段时间，曼彻斯特的纺纱工和织布工创建了工会、夜校、民兵、地方议会和早期政党。当19世纪末的工人运动还坚持认为政治与经济有严格区别的时候，彼得卢时代的纺纱工仅用了两年就明白它们是密不可分的。

动乱的头一个迹象是1817年命运多舛的反饥饿游行。300人带着毯子在圣彼得广场集合，带着一份致摄政王⁵⁸的请愿书向伦敦进军。有12,000人来为他们送行。整个游行被军队驱散。8位领导人（包括实际上反对此次进军的班福德）被控叛国。入狱几个月后，指控没有成立，他们就被释放了。

如今斗争势头从政治转移到了经济。1818年7月至9月间，整个兰开

56. 1811—1816年，英国多地的纺织工人因担忧自身工作被机器取代及不满于资本家剥削而破坏纺织工厂中的机器。由于传说最早破坏机器的是一个名叫卢德（Ned Ludd）的工人，这一运动因此被称为“卢德运动”（Luddite Movement），参与者被称为“卢德分子”（Luddites），后成为工业化、数字化、信息化和新科技的反对者的代名词。——译者注

57. 位于英格兰中部，以蕾丝织品闻名。——译者注

58. 1811—1820年，因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患有精神疾病，王储乔治（即后来的乔治四世）兼任摄政王。——译者注

夏郡工业区都被罢工潮震动了：首先是纺纱工，因为给他们涨薪的承诺没有兑现，然后是织布工。虽然工会活动被法律禁止，但是纺纱工通过从凌晨4点开始向一个又一个工厂行进的方式组织罢工。地方治安官报告说，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强力或恐吓的手段夺走那些会被安排去工作的人，即使没有任何对和平的暴力破坏”⁵⁹。这些人是历史上第一批罢工鼓动家。随着他们的聚集，工厂老板们目睹了他们在厂里施行严刑峻法的惊人后果。一个半文盲的警方密探报告：

他们的计划是这样的，母（每）⁶⁰厂选出一个人，给大家下命令，让大家站好排，带大家去游行，作为为（唯）一⁶¹的司令官，它（他）们⁶²对他要像军对（队）⁶³对上校那样严各（格）⁶⁴服从，要像在军团里那样少说话。⁶⁵

报告呈现了更令人恐惧的细节。“所有纺纱工都出来了，只剩下 500

59. Home Office papers 42/178, 29 July 1818. 引自 Hammond, J. L., and Hammond, B., *The Skilled Worker 1760–1832*, London: 1919, p. 99.

60. 原文为“Eich”。——译者注

61. 原文为“soal”。——译者注

62. 原文为“the[y]”。——译者注

63. 原文为“armey”。——译者注

64. 原文为“Strictley”。——译者注

65. Home Office papers 42/178, 29 July 1818. 引自 Hammond, J. L., and Hammond, B., *The Skilled Worker 1760–1832*, London: 1919, p. 99.

个左右，”密探向他的上司报告，还说罢工者的行进通过一个观察点需要“二十三分半”时间。他们平均身高5英尺2英寸⁶⁶——贫穷和工厂劳动对身体造成的影响意味着“那些本应以成年人面貌出现的人却像十五六岁的孩子”。这个密探提供了一份最终建议。他提到改革家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⁶⁷一直在敦促将工作日减少到11小时，并写道：“如果国王陛下的大臣们能够在那一天或任何一天见到那些工人，它（他）们肯定会通过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法案”⁶⁸。

被释放出狱的激进领袖们如今加入了纺纱工的罢工。当雇主们开始对罢工采取法律行动时，他们以一份号召成立“总工会”的传单作为回应。这份文件是“阶级意识”最早的表现之一——承认来自不同工作场所、城镇和行业的工人拥有一个最重要的共同利益。它呼吁工人仿效他们雇主的行动：召开会议，并“不带个人情感地，一丝不苟地”执行会议上决定的事。

每个劳工分支，即农民、全阶层织布工、染工、棉麻裁剪工、棉布印染工、全阶层纺纱工、全阶层制帽工、机器制造者、细木工、砌砖工、泥瓦匠、制鞋工、裁缝……应立即召开区会

66. 合167.64厘米。——译者注

67. 罗伯特·皮尔（1788—1850），英国政治家，从男爵，1834—1835和1841—1846年两度出任英国首相，主张天主教解放、降低粮食进口关税及改善工人工作环境，是英国保守党及现代英国警察制度的创建者。——译者注

68. Home Office papers 42/178, 29 July 1818. 引自 Hammond, J. L., and Hammond, B., *The Skilled Worker 1760–1832*, London: 1919, p. 99.

议，并任命代表参加在一些便利的中心地区举行的会议……⁶⁹

代表大会于1818年8月19日召开。会上决定组建总工会，由一个选举产生的11人委员会领导，“每月轮换，使整个委员会三个月一换”，以杜绝官僚主义。任何个体行业未经其他行业允许不得罢工；一旦罢工被允许，工会的全部资源都将用于支持任何进行罢工的行业。会议在这个阶段禁止提及政治和宗教，“第一次触犯罚3便士⁷⁰，第二次罚6便士”，当晚缴纳。

这个总工会以及罢工本身仅持续了两周。饥饿与法律行动迫使纺纱工回到工作岗位，一场发泄式的骚乱和枪击标志了事件的终结。委员会原来每天从上午7点半到晚上8点在一家名为“步枪手”的酒吧处理日常事务，如今他们都被逮捕，工会也垮了。

织布工9月举行了罢工。他们和平地游行，并且拒绝在他们的大会上听任何煽动激进的人发言。他们在一次代表大会上草拟的请愿书大量援引了推崇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⁷¹的思想。他们的罢工也被当局宣布为非法。领导人被捕并被处以两年徒刑。织布工直到1818年秋天还是决定不加入纺纱工、总工会和一般的激进政治，然而随着他们选出的领导人第二次被捕，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69. 引自 Hammond, J. L., and Hammond, B., *The Town Labourer 1760–1832*, London: 1978, p. 308.

70. 英国辅币单位，1971年以前1便士合1/240英镑，1971年后合1/100英镑。——译者注

71. 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现代经济学创立者，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与贸易政策，其著作《国富论》影响深远。——译者注

“人类幸福的促进……”：

1819年5月，英格兰北部涌现出许多“爱国工会社团”。其中之一，“斯托克波特人类幸福促进工会”（Stockport Union for Promotion of Human Happiness），在激进媒体中有详细的描述。和总工会一样，它的制度旨在防止官僚终身制。这个小镇被分为12个区，每个区都选出一个代表。每个区又分为12人组成的一些“班级”，他们每周会面一次，交1便士会费。镇中心的房子被租来上课，每周有四天晚上用来教成年人阅读、写作和数学。周六这里有诗歌朗诵。周日它们被用作孩子们的学校。所有这些运作的目的是“以一切正当方法，……通过使所有男性获得选举权，推动激进的议会改革……任期不超过一年，选票选出的议会”⁷²。

在阅读材料上，这些工会社团有像《曼彻斯特观察家》（*Manchester Observer*）这样的激进报纸和极激进的《黑侏儒》（*Black Dwarf*），其中一个通讯员这样解释学习这些书的目的：“我们竭尽全力告知我们自己和他人，在情势需要时，我们有能力做热爱我们国家和人类的人。”⁷³他们在积蓄政治力量。

一位斯托克波特工会会员详细叙述了这些会议：

我们一般在班级会议上阅读半个小时，如果在场有任何人不理

72. *Manchester Observer*, 5 August 1819. 引自 Read, D., *Peterloo: The “massacre” and its background*, Manchester: 1958, p. 48.

73. *Black Dwarf*, 2 June 1819. 引自 Read, D., *Peterloo: The “massacre” and its background*, Manchester: 1958, p. 50.

解阅读课程中任何东西，他都会得到它的完整解释……在阅读后，大家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做一般性讨论，每个成员都陈述他的观点和对政府的想法……⁷⁴

许多妇女出席了会议；这是个劳动妇女遭受性骚扰如家常便饭，甚至妇女在上流社会中也是二等公民的时代。在一场于萨德沃思荒原（Saddleworth Moor）⁷⁵举行的会议上，班福德提出一个在那个时代被认为十分革命性的建议——允许女性参加投票。

这是个全新的主意；在那荒凉的山脊上参会的众多女性对此非常高兴，男性也不持异议，表决的时候妇女们笑着举起她们的手；从那一次起，女性在这些激进的会议上和男性一起投票。⁷⁶

其他地方也成立了女性工会团体。布莱克本的妇女们组织起来，明确提出以“向我们孩子的思想中灌输对我们腐败而专横的统治者深切的恨”⁷⁷为目的。

74. *Sherwin's Political Register*, 6 June 1819. 引自 Read, D., *Peterloo: The "massacre" and its background*, Manchester: 1958, p. 51.

75. 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的南奔宁山区。——译者注

76. Bamford, S., *Passages in the Life of a Radical*, London: 1967, p. 123.

77. *Manchester Observer*, 26 June 1819. 引自 Read, D., *Peterloo: The "massacre" and its background*, Manchester: 1958, p. 53.

彼得卢惨案两个月前，一场工会团体的代表大会在奥德姆（Oldham）⁷⁸召开，全北方工业区有 28 个市镇派代表参加。这就是那场走向彼得卢的运动。

两年内，曼彻斯特的工人阶级从开展反饥饿游行到举行罢工，到成立了被法律明确禁止的总工会，再到成立政治组织为激进民主而斗争。他们在这过程中反复地运用代表制度来防止官僚主义的产生。他们比政府早整整 100 年给予妇女投票权。他们利用晚上的时间——在 12—14 个小时的工作之后——教育自己在貌似近在咫尺的民主国家做公民。而这些还不是全部……

“我们冲向甘爽的空气……”：

1819 年的盛夏，正是工会团体组织代表团为曼彻斯特的大会进行“军训”。萨缪尔·班福德后来在审判中认为军训意义不大。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因煽动叛乱被审判，害怕失去与自己同为被告的人的支持，班福德的动机很容易明白。但是对其他人而言，军训带有革命的意图。数以千计的人于晚间一起横穿曼彻斯特周围的荒原，来参加一场全新形式的群众活动。

当黄昏降临，我们看不见东西而无法再工作时，我们跳出织布机，冲向甘爽的空气，或在田野，或在荒原，或在绿道旁。我们集合，列队，面对面，行进，停步，转身……或者，在晴

78. 英格兰西北部工业城市。——译者注

朗的周日早晨，一片灰蒙蒙中，我们沾着夜晚的花香，漫步穿过晨雾。⁷⁹

有关亨特的首次曼彻斯特会议被取缔的那个夜晚，一份告密者交给警方的报告捕捉到了一些处于这个关键时刻的军训细节：

他们军训过后围着指挥官站成一个圈，指挥官告诉他们，由于他们的报纸不合法，原定的会议被取消了，但是这样给了他们更多时间军训；然后他说他们必须有旗子并且必须捐钱……⁸⁰

几千人参与其中，通常由“老步兵”率领。警方报告中持续出现的一个细节是以拍手来模仿步枪成排开火的声音。这令班福德对其只是个“玩笑”的解释很难被人接受。治安官 8 月 10 日取得的一份目击者陈述描述了 3000 人在米德尔顿附近军训：

右边队伍首先向前走，然后传来指挥官的话，“射击，前排跪下”，当指挥官说“射击”的时候，他们就击掌；指挥官然后以同样的指令让左边队伍前进，然后命令他们射击；这样重复了好几次。⁸¹

虽然工会团体领袖只把军训当作一种维持秩序的手段，然而在兰开夏

79. Bamford, S., *Passages in the Life of a Radical*, London: 1967, p. 132.

80. Norris, J., 12 August 1819. 引自 Bamford, S., *Passages in the Life of a Radical*, London: 1967, p. 138.

81. Norris, J., 10 August 1819. 引自 Bamford, S., *Passages in the Life of a Radical*, London: 1967, p. 139.

郡的工人阶级中无疑有一大部分把这种行为当真了。他们打算像军队那样向曼彻斯特进发；如果沿途遇到攻击，他们打算自卫。他们预计，自己不得已开枪战斗的时刻已经不远了，也许是作为更广泛的共和分子起义的一部分。

那个下令制造惨案的治安官詹姆斯·诺里斯（James Norris）在惨案发生六个星期前写道，“不断有人听到下层阶级悄声说几个星期内会有爆炸发生之类的威胁……我担心确实有些人在为自己准备各式各样的武器”⁸²。

乔治时代⁸³的英格兰统治者确信他们在1819年将面临一场总暴动，而这也就是他们在彼得卢先发制人的原因。

“如果那天我们在整个英格兰相会……”：

这场运动并未终结于彼得卢。它在后来的那个冬天逐渐消退，伴随着审判、掩盖与政治分裂。此时班福德还在监狱等待审判。他是支持消极抵抗的大多数活动人士中的一员。一小部分激进分子号召在1819年11月1日发动全国起义，但是亨特命令他们取消。贸易恢复正常，议会通过了一系列紧急状态法令禁止公共集会、武器、军训和激进媒体。最终，政府的密探令一群在伦敦的激进领袖卷入了一场企图“为曼彻斯特的血报仇”而炸死内阁成员的阴谋，这是致命的最后一击。虽然这件阴谋与曼彻斯特的工

82. Home Office paper 42/188. 引自 Read, D., *Peterloo: The “massacre” and its background*, Manchester: 1958, p. 53.

83. 指英国历史上四位名为乔治的国王（乔治一世、乔治二世、乔治三世和乔治四世，通常也包括乔治四世的继任者威廉四世）连续在位的时期（1714—1837）。——译者注

人毫无关联，但它的败露为工人运动画上句号。织布工恢复了他们温和的立场。

就在11月1日起义被取消后，当改革与革命的争论还在解决之中时，一位告密者向警方描述了曼彻斯特工人当时的动向。在拥有12,500会员的曼彻斯特工会社团的一次代表大会上，许多人对取消起义非常遗憾。有些人说自己已经武装好了时刻准备着。有个人向起义反对者吼道“他应该教他的孩子骂他们没有起义……（因为）如果那天我们在整个英格兰相会，这事早就做成了”⁸⁴。

在这个时间点上，房东告诉他们不能继续开会了，因为他们对设在这里的学校造成了干扰。这所学校挤满了因为戴象征悼念彼得卢惨案的白帽子而被逐出主流学校的孩子。会议在对资金的争论中以剑拔弩张的气氛收场，而曼彻斯特工会社团也就此终结。

“主人，与其说是别人的主人，不如说是他们自己的主人……”：

班福德因在彼得卢惨案中的角色而服刑两年半。出狱后他试图重返家庭纺织业，但是那时手工纺织业已日薄西山。他成为了一名记者，被曼彻斯特的中产阶级接纳，并立即与激进共和主义者划清界限。他写道：

与希望创造突变和推翻体制相比，将无知——这个源源不断制造傲慢与冷漠的根源——本身摧毁更好。群众的修养应该

84. Home Office paper 42/188. 引自 Read, D., *Peterloo: The “massacre” and its background*, Manchester: 1958, p. 222.

得到提高；教育辅弼上帝的慈悲……一切冒犯正确感受或与人类幸福作对的东西都会消失，并全神贯注于思想的大起义。许多现在只是微尘的人那时会变得崇高……许多人会成为主人，与其说是别人的主人，不如说是他们自己的主人……

这些话是推崇“道德力量”的社会主义和后来的劳工主义的经典表述，但是在19世纪60年代上层工人被赋予选举权之前，注定是孤掌难鸣。

当我们回顾1819年的曼彻斯特时，我们可以看到工人历史上所有事情的开端：草根工团主义，工人民兵组织（虽然缺少枪支），大罢工，社会主义教育俱乐部的小世界，最重要的是旨在与官僚作风作斗争的代表制度。绝大多数弊端也被预见：鼓惑工人行动而自己却不行动的演说家，在罢工中途带着纺纱工会的钱潜逃的人，有技术的纺纱工人对无技术的妇女儿童的残忍行径。至于有特权的旧劳动力与饥渴地以贫穷和自由换来工资和残暴的新劳动力之间的敌意，没有比现代中国更能看到它是如何持续的了。

“团结就是力量”，班福德举着去彼得卢的横幅上这样写道。这件事留下了一些阶级意识遗存，一首伟大的诗篇，一个工人阶级的传奇——仅此而已。关于那些成就了它的组织的记忆已烟消云散。余下的只有由兰开夏郡工人传给后代的一种出于本能的感受：在这一切的开始，就有一些可怕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而我们永远不会忘怀。

所有与美丽相关的事物

1831年里昂丝织工人的反抗

译=吴蓄涵

我非常惊讶地发现织工们自己、他们的孩子和与生产
图案有关联的所有人，关注着一切与美丽相关的事物。

——约翰·鲍林（John Bowring），
关于里昂丝织业的议会证词，1832年

2005 年，印度瓦拉纳西

是列宁（Lenin）的祖父决定叫他列宁的。如今他已经不再使用他的高种姓姓氏拉古瓦施（Raghuvanshi），也不再行医，因此瓦拉纳西¹（Varanasi）的纺织工简单地称呼他为列宁医生。他经营着一个专门救助童工的非政府组织（NGO）。但现在他面临着一个更大的挑战：“以前，我们的主要关注点是童工，但现在童工不再是个问题，因为压根连工作都没有了。”这是 2005 年的 9 月，瓦拉纳西的手工丝织业正在慢慢凋敝。在过去五年里，随着印度开放国内市场，廉价的中国丝织品大量涌入。

曾经，一套瓦拉纳西的纱丽²对一个印度新娘的意义，就像是一套萨维尔街³（Savile Row）的高定西装对一个首席执行官的意义。他们在这里纺织丝绸已经至少一千年了，而现行的体制只有 200 年之久。传统上是由穆斯林种姓⁴从事丝绸纺织，于是我在列宁的带领下来到了这座古城中心的穆斯林纺织区。

-
1. 瓦拉纳西：印度北方城市，坐落在恒河中游左岸，是印度教圣地、著名历史古城。——译者注
 2. 纱丽：是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妇女的一种传统服装。用丝绸制作的纱丽一般长 5.5 米，宽 1.25 米。——译者注
 3. 萨维尔街：位于伦敦，以传统的男士定制服装而闻名。“定制”一词就起源于此。萨维尔街被誉为“量身定制的黄金地段”，其中客户包括温斯顿·丘吉尔、纳尔逊子爵和拿破仑三世。——译者注
 4. 穆斯林种姓：印度种姓制度中的伊斯兰教徒。——译者注

安瓦尔·阿里（Anwar Ali）把我们叫进他的工作坊。这是一个单间，被一台纺织机填满，一个灯泡照亮整个房间。房间里湿气浓重，仿佛在晾晒着看不见的潮湿衣物的巷道里那样，却正是理想的织丝环境。阿里 36 岁，有一个妻子和五个孩子。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学会了纺织，从他的背心和破烂裤子看起来，他似乎没什么特别。但当他的手一触碰上纺织机，你就会对他另眼相看。

在丝织工作间，光线本身就是原材料，它透过门，在紫色的经纱⁵上映下深深的光晕。这些经纱沿着整个织机水平伸展，从安华的腹部逸走。他坐在地板上，双腿垂在一个浅坑里。他的一只脚踩着踏板，在他的头顶上空，一个由木头和铁块组成的沉重机器发出沉闷的撞击声，一条棕色的、粗糙方形穿孔纸板组成的传送带在移动中发出咔哒的响声。这些卡板看起来像早期计算机的残骸，但这一织机技术却远早于计算机的发明。这是约瑟夫·雅卡尔（Joseph Jacquard）于 1801 年在法国里昂（Lyon）发明的提花织机。

纸板上的孔运作起来和自动钢琴的打孔纸卷原理相似，它们将一些经线抬高一英寸，不影响其他部分。在这些经线的空隙之间，安瓦尔·阿里把梭子抛来抛去。总共三支梭子：木制，黑色，六英寸长，独木舟形，每一支里都嵌着银丝线轴。他抛梭子时从来不需要看或思考，梭子刚离开他的右手的瞬间就稳落在他的左手。接着，他把一块横梁拉向靠近肚子的地

5. 经纱：各种织品都有长度和宽度，与布边平行的长度称为匹长，匹长的方向就为织物径向；与布边相垂直的长度称其幅宽，幅宽的方向为织物的纬向。在织布时，用于径向的纱为经纱，用于纬向的纱称为纬纱。只有经纱上有图案的颜色，而纬纱是白色的或素色的。——译者注

方,将三股波浪形的银纬纱⁶推入到位。刚刚还只是成团的乱线经他之手已经成了几毫米的蝉翼纱,浅色半透明的纱闪着微光,两边各有两英寸宽的银色花边饰带。

房间里没有其他东西是美丽的:泥墙、从街上窥视的脏兮兮的孩子、甚至安瓦尔阿里自己。但他织造的丝绸纱丽分外美丽,完成一条需要三天时间,这丝绸纱丽是印度最古老的手工艺的最高体现。“看呐,”他用印地语说道,指向透着银色光泽、轻薄的亮紫色丝织物。然后他谦逊地点着自己的胸膛,压低目光,仿佛鞠了一躬。

瓦拉纳西的丝织业有 25 万台这样的织机。问题在于,只有一半仍在工作:

过去五年里境况在倒退,就业率在下降。我们得到更少的钱,通货膨胀却愈演愈烈。自动织机制造的物品更便宜,手动织机的纱丽很昂贵,没有人再买了。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到目前为止,列宁已经聚集了一整条街的织工。他们都像阿里那样沉默寡言。年轻一些的尊敬地站在后头,让中年人发表讲话。“我们过一天算一天。有时得忍受没有食物的日子,饥饿的人们睡不着觉,晚上也只能醒着。我是家里唯一一个工作的人,我有整个家庭需要供养。”

你很容易会以为我们迎来的是一个长期衰落的行业的悲伤终结,但并不是这样。在过去 20 年里,手工织业的劳动力实际上在大幅增长。由于

6. 同上。

印度的大型织造厂在上世纪 90 年代的市场改革期间逐一关闭,织造工人将工作搬到了家庭工作间或小工厂。再加上贫困农民生活水平的下降,这些转变使得当地织工人数增加了约 70%。现在瓦拉纳西方圆 80 英里内约有 50 万人以手织工作为生。除了古城里世代做着纺织工作的穆斯林种姓,如今还有成千上万的印度教达利特 (Dalit) 种姓⁷加入了手工织造,这些达利特种姓的贫穷村民都来自“不可触碰的”贱民阶层。

瓦拉纳西的丝织品是硬挺的,硬挺的质料中带着它标志性的金银丝线。硬挺是因为它是纯手工制成的,带有的微小瑕疵反映着它的制作日期和制作它的人。相比之下,中国丝织品给人一种油滑感,千篇一律而且便宜。它们是由一天可以制造 500 米织品的机器织造而成的,列宁说,中国政府正在印度市场倾销这些物品。不像车达干酪⁸或法国香槟,瓦拉纳西的纱丽设计未受保护,中国人仿制它们而不受惩罚。

列宁带我去参加一个织工会议,约有一百名社区领导、NGO 工作人员和活动在分子在讨论经济衰退的原因。有人指责动力织布机的发明,有人指责中国人,有人指责政府。而列宁自己则发表了一场激昂的演说——这演说十分对得起他的名字——把经济萧条归责给了世界贸易组织。他希望纺织品能在世贸组织正在讨论的贸易规则中得到豁免。在演讲的最后,他鼓动人群众喊出响亮而整齐的口号:“世贸组织下地狱!织工协会万岁!”

我们开车到附近的山客普尔 (Shankarpur) 村庄去见一个叫维斯汉巴

7. 达利特种姓:印度的种姓制度中,最底层的人被上等种姓叫做“不可接触者”,即贱民,他们自己自称为“被压迫的人”,即达利特。——译者注

8. 车达干酪:英国索莫塞特郡车达地方产的一种硬质全脂牛奶奶酪,色泽白或金黄,组织细腻,口味柔和。——译者注

(Vishambar) 的织工。他是一个达利特，40岁，穿着明亮的白色长袍。他的名字曾登上当地的报纸——当他决定把他三个还没饿死的孩子送去孤儿院的时候。他带我去看他以前的工作室，现在是个空荡荡的小棚屋。然后他在他的新家旁蹲下身，那是一个树枝搭成的小屋，里面有他最后的财产：一个木碗，一把细枝做的刷子和一个杯子。

我得到了政府贷款，但我没有能力能偿还。十年前，我拿着贷款开始了手工纺织工作。但在过去五年里几乎没有接到任何工作。无论我赚到多少，我首先得喂饱我的孩子，剩下的留给自己。如果没有什么剩下，我就只喝水，我的身体也就这样日渐虚弱。

他的妻子是第一个死去的，然后是他的女儿。印度官员称其为“饥饿死亡”，但环顾村庄，你会意识到，如果这里发生着饥荒，它也是针对特定人群的。村子里没有浮肿着肚皮的孩子（营养不良的症状之一），周围的田野满是茂盛的草木、稻米和玉米。肥牛放牧在茂盛的稻田间，有充足的谷物供它们吃。但在2005年9月前的十二个月中，在官方的记录里，瓦拉纳西地区有39名织工饿死或因贫穷自杀。用一根悬挂在织机的顶杆的绳子上吊是常见的自杀方式。

我问他们这是怎么发生的，人们怎么会这样的环境中饥饿而死。“问题在于我们那封建的骄傲啊，”维斯汉巴说。“他指的是种姓制度，”列宁解释道，“织工宁愿饿着也不愿乞讨——虽然现在他只能靠乞讨活着。他们饿得都思绪不清了，但还是不会告诉邻居自己在挨饿。”

列宁，不同于那位与他同名的革命领袖⁹，并不想推翻资本主义体制，他更想引进它。他想消除封建主义但保留纺织的艺术，通过互联网推销手工制作的丝织品。为此，他需要解除印度政府在世贸组织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

这不是一个甘地主义¹⁰的事情，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事情：我们想要创建一个织工的信托机构，一个可以取代中间人的联合公司，将我们的产品直接卖给世界。我想要消除封建制度，但封建制度中有些事情是好的。比如没有人想要毁掉泰姬陵（Taj Mahal）¹¹！同样，我认为我们是有可能保持我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权利并保护我们的艺术的。

印度有 1250 万操作手摇织机的织工，其中的大多纺织棉花而非丝绸。纺织业是该国仅次于农业的最大产业。如果手工纺织业被摧毁，不会是因为技术进步，而会是因为经济政策：取消贸易保护，将令一个被种姓制度和半封建金融制度削弱的产业受到全球化的冲击。当它被终结之时，经

9. 与他同名的革命领袖：列宁，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思想家。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人。——译者注

10. 甘地主义：即不使用暴力的抵抗主义。印度国父甘地是该主义的创造者和实践者。——译者注

11. 泰姬陵：印度古迹之一，世界文化遗产，是一座白色大理石建成的巨大陵墓清真寺，莫卧儿皇帝沙贾汗为纪念他心爱的妃子于 1631 年至 1653 年在阿格拉而建。——译者注

济学家会说，用提花织机进行手工纺织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像列宁医生、安瓦尔阿里和维斯汉巴那样的人们只是在做徒劳的抵抗。然而，1831年里昂所发生的事情，表明这些经济学家或许是错的。

1830年，法国里昂

城市就像一块磁铁，吸引着工人；他们从瑞士、意大利和法国其他地方步行而来。18岁的约瑟夫·贝诺特（Joseph Benoît）已经像传统短工那样“漫游”了一段时间了，从一个城镇徘徊到另一个城镇搜寻可做的工作：

到达里昂的时候，我已经身无长物，那是1829年的冬末，阴冷又多雨。我忍受着饥饿、寒冷和其他我的职业所带给我的艰难困苦，在布罗托（Brotteaux）平原上一个树篱的后面，在美丽的星星下待了两个晚上。¹²

他的工作是织丝，而里昂是世界的丝绸之都。由于提花织机的发明，城市迅速发展起来。到1810年，法国有110 000台提花织机；到1830年已经有3万台，而其中大多数在里昂，外人称里昂为“法国的曼彻斯特（Manchester）”。

12. Benoît, J., *Confessions d'un prolétaire*, Paris: 1968, p. 41.

但里昂毕竟不是曼彻斯特；只有一家有一定规模的工厂作为试验而建立，却迅速破产了。技艺熟练的男女织工在小作坊里通过脚踏驱动的设备，完成将丝线变成绸缎、天鹅绒、薄纱、锦缎或有机棉的工作。除了还没有电灯，那场景就像是今天的瓦拉纳西。

提花织机的发明并不是将织造的人力劳动自动化，而是将设计实施的过程自动化。它并未降低对织造者的技能要求，而是保留了他们的手工技能，并使他们能够生产“快速时尚”（fast fashion）¹³。这就是为什么当所有经济天才都认为丝绸产业注定消亡时，这个商业模式仍然存留了下来。

四百个丝绸制造商构成了里昂丝织业系统的最顶层，它们被称为工厂（fabrique）。他们购买纺丝，委托设计，并将成品销售到国内外蓬勃发展的时尚市场。他们是没有工厂和直接劳动力的资本家。这成了一个老笑话，他们其实没有制造任何东西。他们大部分的资本被锁在丝线和带有设计图样的穿孔卡上。高大的仓库排列在城市周围河流的码头上，是他们在里昂唯一的实存。

位于第二层的是 8000 名工匠头，他们拥有自己的工作坊和两到六台织机。典型情况下，工匠头和他的妻子会一起织造。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有 7000 名妇女织造者。其余织机将由短工和见习学徒操作，他们的人数大约有 2 万人。这些短工被称为伙计或是学徒（compagnons）——这个词同时意味着同伴和朋友；他们形成了独特的一层，有他们自己的酒馆和群架亚

13. 快速时尚：源自于上世纪中叶的欧洲，本是对服装秀场设计的快速回馈和模仿。随着服装设计和终端销售的日益密切，时至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快速时尚”演变成为时尚服饰企业对秀场的时尚设计快速反应，并制成紧贴最新时装潮流的产品，以低廉的价格流入卖场，主攻主流消费者的一种销售模式。——译者注

文化。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的工作：在织机上一坐就是 12 到 14 小时，用踏板驱动，用踏板的过程中会轻撞肚子，每天最多能达到 3 万下。贝诺特来到的世界是一个肮脏工厂城市的反面：

在我说的时代，工人通常住在工匠头的家里，并以这种方式成为后者家庭的一部分……里昂工人是法国最有道德的，因为他们的家庭生活伴随着日常工作。¹⁴

操作着织机的总劳动力达到了 4 万人，再加上成千上万从事贸易的人，里昂的 14 万人口中有一半以上都依靠着丝绸贸易。他们被贬义地统称为“卡努特”（canuts）。阿多夫撒拉（Adolphe Sala），这个城市的大人物之一，自豪地写道，“里昂的卡努特从不需要铃声催工……里昂的工人有一种道德独立，这种精神没有其他制造业重镇可以理解。”¹⁵

这就是一个贵族眼里的“集体制造”系统，它自然有利于社会秩序。对于卡努特而言，吸引力则是不同的。“集体制造”系统使他们可以控制自己的工作、自行定价，且一般不需要与老板直接联系。

工作时工人是受信任的；他可以自由决定操作的方式。他掌握自己的时间和意志，只需服从自己的判断或需求。在里昂丝制商的仓库里，你只能找到他雇用的工人的产品，却从来看不

14. Benoit, J., *Confessions d'un prolétaire*, Paris: 1968, p. 45.

15. Sala, A., *Les ouvrières Lyonnaises en 1834, esquisses historiques*, Paris: 1834, p. 10.

到他指导他们的行为或工作。¹⁶

这是前工业时代典型的、所有手工工作坊工人普遍能够掌控的体制，而提花织机通过保存这个体制，还保存了别的东西——卡努特们将这古老的文化和传统带进了工业时代。他们是“倾向于神秘主义和暴力事件的梦想家”。¹⁷

卡努特们没有塞满工厂，他们集中在住房区。提花织机需要高高的天花板，这样的房子要到城市外有着悬崖般房舍的红十字山地区（Croix-Rousse）以及河对岸的另外四片郊区中才能找到。它与工厂生产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路易-瑞内·维勒梅（Louis-René Villermé）记录下了工业贫民窟的恐怖景象，他写道，“卡努特们远非传闻所说的那样道德退化或智力低下，恰恰相反，他们是真正的文明中最先进的人。”¹⁸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鲍林（John Bowring）被派往寻找里昂的成功秘诀，他如此报告：

我非常惊讶地发现织工们……关注一切与美丽相关的事物，无论是布局还是颜色。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织布工走路时收集花朵，将它们摆放成最有吸引力的形状。我发现他们经常向织工

16. 同上。

17. Rude, F., *Les Révoltes des Canuts: 1831-1834*, Paris: 2001, p. 14.

18. Villermé, L.-R., *Tableau de l'état physique et moral des ouvriers employés dans les manufactures de coton, de laine et de soie*, 2 vols, Paris: 1840, I p. 377.

头建议改进设计。¹⁹

织丝并不会生产出强壮的战士。为了保护丝绸，窗户需要关得紧紧的；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孩子们可能会患上脊柱弯曲或淋巴结核。整体的气氛病怏怏的。就像是织物的绵软和柔顺渗透进了卡努特们的身体，成为他们的一部分。织工头皮埃尔·查尼尔（Pierre Charnier）向他的同事抱怨：

我们中间有太多胆怯的人。胆怯，就像你知道的那样，是丝绸工人的性格。没有其他行业比我们更不外向。我们久坐的生活方式……塑造了我们的精神面貌。它是缺乏活力的，就像我们的身体。为了弥补这双重的弱点，我们必须为我们行业创造士气。只有一种方式：组织……当我们完全寻回我们作为人的尊严，城市的其他人……将停止使用“卡努特”这个称呼来侮辱我们。²⁰

1827年，查尼尔成立了共同责任协会（Society of Mutual Duty）——他

19. 引自 Cottureau, A., “The Fate of Collective Manufactures in the Industrial World: the silk industries of Lyons and London 1800–1850,” in Sabel, C. F. and Zeitlin, J., *World of Possibilities: Flexibility and mass production in western industrialisation*, Cambridge: 1997, p. 75.

20. Rude, F., *Les Révoltes des Canuts: 1831–1834*, Paris: 2001, p. 15.

将其描述为“工人阶级的共济会”²¹。它按照一个严格的组织计划：十四个“团体”（companies），每个由二十人组成，每个“团体”有一位被称为理事长（syndic）的指挥官和两位秘书。只有 25 岁以上的工人才能加入。他们必须是至少担任了一年、有良好名声的织工头。但是作为一个秘密协会，除了通过激烈的咖啡馆讨论抱怨丝绸降价和增进“互助”精神，它也没有什么可做。于是，在 1830 年 7 月，丝绸制造商们不得不展开了一场他们自己的革命。

在三色旗²²和价目表（Tarif）之间：

让-克罗德·罗曼（Jean-Claude Romand）是一个裁缝，生意的破产令他从中层中产的位置掉下来，成为卡努特和激烈的咖啡讨论桌上的一员。

我会在那些房子里度过我的晚上，我知道那里人们自由讨论政治……那儿的讨论充满非常明显的自由主义。你可以阅读反对派的报纸，有时还有宣传册……我们唱着贝朗杰（Berenger）²³

21. 共济会：字面之意为“自由石匠”（Free-Mason）全称为“Free and Accepted Masons”，出现在 18 世纪的英国，是一种带宗教色彩的兄弟会组织，他们自称宣扬博爱和慈善思想，以及美德精神，追求人类生存意义。世界上众多著名人士和政治家都是共济会成员。——译者注

22. 三色旗：此处指由红、白、蓝三色组成的法国国旗，红、白、蓝三色代表自由、平等与博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译者注

23. 贝朗杰（1875 年 8 月 19 日—1857 年 7 月 16 日）是一位多产的法国诗人和流行歌曲作家，其歌曲以自由和人道主义观点，在法国受到极大的欢迎。——译者注

的歌，激动地反对着那些事物的既定秩序。²⁴

罗曼受过教育并且有读写能力，有钱的时候他经常去剧院、图书馆和歌剧院。没钱的时候，他就沿着河岸漫步，遐想着“一场我迫不及待要加入的大规模反抗”。1830年7月29日，他梦想成真：

有一天我在罗纳河畔的珍珠咖啡厅（Café de la Perle）附近，在一个大群人中间，当从巴黎来的邮政车到达的时候，它带着一面小小的三色旗从我们的眼前跑过，迎接它的是人群的一片欢呼。我向前冲去……但是一个更靠近旗子的老人先到了那里：他拥抱了很多次三色旗。我碰不到旗子。我能认出那位老人曾是〔拿破仑〕大军（Grande Armée）中的一名老战士。²⁵

三色旗在那个时候是被禁止的。波旁王朝²⁶在滑铁卢战役后复辟，十五

24. Romand, J.-C., *Confession d'un Malheureux, Forcat Libérée*, Paris: 1846, p. 61.

25. 同上, p. 61。

26. 波旁王朝：是一个在欧洲历史上曾断断续续统治法国、西班牙、卢森堡等国的跨国王朝。其在法国的统治于1589年开始。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查理十世在1830年七月革命中被推翻；七月王朝亦在1848年革命中倾覆，波旁王朝在法国的统治最终结束。波旁王朝在意大利的统治于1860年告终。波旁王朝在西班牙的统治于1936年被推翻，但于1975年第三次复辟，是目前西班牙的王室。——译者注

年间试图在旧旗下用以前的高高在上的冷漠原则——“让他们吃蛋糕好了”²⁷——治理法国。但是这已经是一个不同的法国了，在工业经济中崛起的中产阶级决心要使这个国家走向现代化。

当波旁王室试图否认中产阶级的投票权，巴黎反抗了。在三天的街头战斗中，复辟的波旁王朝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²⁸的“公民国王”——他相当于那个时代的戴安娜王妃（Princess Diana）²⁹。此时，七月革命³⁰随着三色旗到达里昂。令罗曼和贝诺特这样的年轻工人失望的是，这更像是街头戏剧而非街头战斗。丝制商“停止了所有的织机，命令工人在主要广场上武装列队以支持运动，不参加解雇论

27. “让他们吃蛋糕好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贫穷的巴黎人民因为没有面包而暴动了，而玛丽·安托瓦妮特王后对此十分冷淡，或许是为了打趣，或许就是因为无知，她说出了这个愚蠢的建议——既然没有面包吃，那就“让他们吃蛋糕好了！”——译者注

28. 路易·菲利普（1830—1848）：法国国王。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他参加支持革命政府的进步贵族团体，次年参加雅各宾派俱乐部和国民自卫军，并任北路军少将指挥官，曾参加瓦尔密和热马普等战役。1830年七月革命后，被资产阶级自由派等拥上王位。在位期间，镇压巴黎共和派起义，1831年和1834年里昂工人起义，平定波旁王朝残余和路易·波拿巴所策划的叛乱，1848年二月革命中，在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起义的压力下于2月24日逊位，后逃往英国。隐居和老死于英格兰的萨里。——译者注

29. 戴安娜王妃（1961—1997）：出生于英国诺福克，是爱德华斯宾塞伯爵的小女儿，1981年7月29日与威尔士亲王查尔斯结婚。1987年6月，戴安娜将她所拍卖的79件服装所得350万英镑，全部捐给慈善事业。她的品行深深地感动了普通人，尤其是苦难之中的人们。——译者注

30. 七月革命：指拿破仑在滑铁卢惨败之后，1830年7月法国推翻复辟波旁王朝，拥戴路易·利浦登上王位的革命。建立的新王朝也就是“七月王朝”。——译者注

处。工人们愉快地接受了命令,准备好使出所有的力量支持他们的老板”。³¹市政厅被占领,没有流血事件,新政府成立了。

工人们一度移除了主广场的鹅卵石,建起由煤矿车和驳船构成的巨大路障,现在他们又高兴地把它们全部拆除。贝诺特对其中的被动感到困惑和沮丧,决定通过大喊“自由!”和“共和国!”活跃气氛,但他很快就被人群中大多数人的吼叫声淹没。³²这座城市的新市长站在眺台上,宣布了里昂“繁荣新时代”的到来。

然而,席卷而来却是一场经济萧条。政权变更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上层中产阶级对运动的新鲜感随之而去。突然地,丝绸的订单骤减直至枯竭。此时,贝诺特才开始看到里昂商业模式的消极面:

工人受到与他们没有合同义务的工业家的支配;这种关系是暂时的,并且这关系并未产生其他行业中老板和工人之间那种团结。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表面上看起来使得工人保有独立性的安排,恰恰是造成它毁灭的一个原因。³³

织品的价格暴跌,数以千计的工人失去工作,和他们的家人们流落街头。贝诺特记得:

31. “L’Echo de la Fabrique,” in *Rude, Les Révoltes des Canuts: 1831-1834*, Paris: 2001, p. 8.

32. Benoît, J., *Confessions d’un prolétaire*, Paris: 1968, p. 33.

33. 同上, p. 44.

产品价格连续削减,工人们陷入最悲惨最不稳定的处境……你可以看到在街道和公共广场上工人们肮脏痛苦的脸,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衣衫褴褛。³⁴

随着痛苦的持续,卡努特们不得不承受看着自己的家庭生活和社会地位被玷污的羞辱。贝诺特愤怒地写道:“悲伤的是,对于年轻女孩,对于曾点燃过剥削者的欲火的年轻母亲,她们总是面临着致命的选择,要么饿死,要么受辱地活。”

1830年的冬天,贝诺特失业了8个月:“我从未饱着肚子离开过餐桌。”破产的罗曼,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加入国民自卫军(National Guard)³⁵的游行上,国民自卫军的游行在七月革命后就开始接受手工艺工人的加入。”游行对我的自尊是件好事,对我的钱包是件坏事”罗曼说。对查尼尔来说,七月革命看上去就像一场假革命:社会体制的确是变了,但被赶出宫殿的专制主义,却在(丝绸制造商的)现金桶里找到了避难所。³⁶

里昂有许多方式应对经济危机。丝绸制造商在商会开会讨论对策;市长和行政长官也被授权干预商业事务。还有一个可以追溯到拿破仑时代的

34. Benoît, J., *Confessions d'un prolétaire*, Paris: 1968, p. 46.

35. 国民自卫军: 1789—1871年的法国非正规军,城市民兵组织。1789起义胜利后,各大城市群起仿效,建立国民自卫军。法国大革命中,国民自卫军逐步制度化。1795年10月被拿破仑·波拿巴击溃后解散。七月革命胜利后重新组建。1848年2月国民自卫军参加推翻七月王朝的革命,后被临时政府利用,镇压巴黎工人六月起义。——译者注

36. Bernard, M., & Charnier, P., “Rapport fait à M. le Président du Conseil des ministres, sur les causes générales qui ont amené les événements de Lyon,” Lyon: 1833.

选举出的工业法庭。解决方案还有先例可以参考：1786年，织工们曾受到被称为“塔里夫”（tarif）的法定最低价目表的保障。随着工资的暴跌和工作日延长到18小时，这样的保障正是现在工人们想要的。

为了使工人们在争取最低价目表的谈判中更有优势，那时还是秘密组织的“共同责任协会”做了三件事：首先成立了名为“工人委员会”（Workers's Commission）的公开组织，加入了国民自卫军，并创办了历史上第一个工人报刊。

10月25日，市长召集了丝绸老板们，让他们同意推行最低价目表。当他们聚集在城市光鲜的行政楼时，他们注意到由六千个织工汇聚而成的队伍已经安静地出现在楼下的广场上。

庞大的人群从红十字山上安静有序地行进，穿过城市，填满广场……这些饥饿的人聚集在此，想要了解自己的命运。他们一言不发地站着。他们手中没有枪，没有马刀，甚至没有长棍。只有一面三色旗在他们头顶上空飘扬。³⁷

从窗户上看下去，一个丝绸商人写道：“他们的领导者指挥着他们前进或是后退，像一个将军般熟练和精准。”³⁸面对这样的局势，会议只进行了四个小时就通过了最低价目表。³⁹

37. Blanc, L., *L'Histoire de Dix Ans: 1830-1840*, Paris: 1840, p. 56.

38. 引自 Rude, F., *Les Révoltes des Canuts: 1831-1834*, Paris: 2001.

39. *L'Echo de la Fabrique*, Issue 1, 25 October 1831.

工人报纸《工厂的回声》(*L'Echo de la Fabrique*)的第一期在那晚赶印了出来,其中整整五页纸都是关于新的价目表的。刊物中还有一首为这件事而写的歌,工人们在居住区唱起来,歌声响彻深夜。并且,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份工人报纸,它自然而然地包含了一个另类新闻简报的栏目,题为《班车的爆炸》,它玩味地描述了那天丝绸老板们的困境:我们听说他们之中不断有人去学者咖啡厅,请学者先生们到字典里查一查“塔里夫”的意思。⁴⁰

当活动分子们在黎明之前偷偷将新价目表钉到仓库门上时,看起来,里昂坚韧的社会网络——从老板们的咖啡厅延伸到贫穷劳动者的家里——避免了灾难的发生。但罗曼知道得更清楚。

我认识的两个织工头……向我确认丝织工人们会马上组织一场新的抗议,因为价目表并不会被执行;而且这一次会发生严重的冲突。我开始设法获取弹药,在必要时武装自己。⁴¹

11月10日,140名制造商签署了一封信,拒绝承认价目表。市政府迫于压力,宣布价目表从来都只是供参考的指导方针。

“苟活工作,还是以死抗争……”:

《工厂的回声》从来没有真正呼吁过起义,但其11月6日的八卦专栏证明其非常有预见性:

40. Romand, J.-C., *Confession d'un Malheureux, Forcat Libérée*, Paris: 1846, p. 76.

41. *L'Echo de la Fabrique*, Issue 2, 6 November 1831.

有传言称……群众已经准备好起义了；红十字山地区的人将带着黑旗进军，他们将攻击市政厅，并按照可能拟定好的黑名单冲击某些制造商的家里。⁴²

11月20日星期日，国民自卫军被召集到里昂的主要广场游行。这些游行单元是按区召集的。市中心的队伍主要包括丝绸制造商和他们的职员，而织工地区的单元主要是织工头。最高要员们在站台上自娱自乐，并没有注意到实际上有两个敌对的队伍在游行；同时，两只队伍开始相互谩骂对方制服的质量。

第二天早上，黑旗出现了一工人委员会呼吁大家通过罢工以执行“价目表”。四百个短工涌入红十字山的街巷和隧道，以阻止织机开动。上午10点，一支国民自卫队队伍出现在街头，其军官命令“暴民”立即解散。在其中一个决定了时代走向的命运的关键时刻，这支队伍恰巧是城市中最时髦的队伍，完全由丝绸制造商组成。罗曼见证了这场对峙，最开始的时候，队伍中的人们正享受着一杯上午的葡萄酒：

国民自卫军饮尽杯中的酒，轻狂地地向几码以外的丝织工人们敬酒，充满了羞辱人的意味。“卡努特们，为了你们的健康，干杯！你们这些吃白食的人！……想要最低价目表？去死吧你——它在这里！”说着最后这些话时，他们挥舞着手中的子弹袋。

42. Romand, J.-C., *Confession d'un Malheureux, Forcat Libérée*, Paris: 1846, p. 80.

当自卫军在固定刺刀时，工人用鹅卵石投向他们，迫使他们撤退，一些甚至丢了他们的武器。工人队伍开始下山，胳膊连着胳膊唱起了歌。但他们碰上了另一支国民自卫军队伍，后者向工人们开了火。现在整个城市，工人们跑上街喊道：“他们杀了我们的兄弟。”一支小分队举着黑旗，在那个时刻，它并不代表无政府主义，而只是一个哀悼的象征。旗帜上的口号是罗曼想出来的，这些词句使卡努特们在整个欧洲大陆闻名了几个世纪：“苟活工作，还是以死抗争”。

一个常规步兵团已部署完毕，却拒绝开火；其中许多人是波旁的支持者，他们憎恨中产阶级和他们新潮的国王远多过憎恨工人。中午，行政长官和国民自卫军的指挥官一同带领一支纵队上了山。他们全副武装穿过所有路障，站在红十字山的眺台上呼吁人群疏散，并实施抓捕。后来，一支龙骑兵⁴³和炮兵构成的武装力量设法在半山腰开辟了前线，但此时，国民自卫军中所有织工队伍都已经倒向了起义者的一边。

11月22日上午8时，市当局试图用常规部队推进。罗曼到达现场时外衣下藏着一把步枪，最初被人群误认为是老板中的一员：

我向后退了两步，双手抓住我的卡宾枪⁴⁴枪管末端，向空中举起枪托：“第一个靠近我的人会后悔的。傻瓜，你认为我来这里是为了愚蠢地与你斗争吗？不，我属于人民并为人民战斗！”说

43. 龙骑兵：大体上骑马步兵都可以称龙骑兵，这个兵种最早出现要追溯到1552—1559年的意大利战争。——译者注

44. 卡宾枪：即马枪、骑枪。它是枪管比普通步枪短，子弹初速略低，射程略近的较轻便的步枪。——译者注

完这番话，他们对我放心了。我意识到士兵正准备开火。我给枪装上子弹，沿街前进了几步，我有枪的消息迎来了人群的欢呼，而几秒钟前这些人还试图解除我的武装。⁴⁵

罗曼不是唯一有军事经验的人；那年早些时候，700名“罗纳志愿者”组成的团队曾试图“解放”意大利皮埃蒙特省（Piedmont）和萨沃伊省（Savoy），最终失败了。这支队伍有多投入于操练就有多投入于喝酒。在避免了这起国际冲突后，法国当局很乐于让他们继续做这两件事。但现在，曾在罗纳志愿者中担任军官的三名织工头，正带领着一场反攻。冲突开始跨过桥蔓延到城市的北边和南边，越来越靠近权力的中心和丝绸仓库。

在一座桥上，一个名为艾提安·斯坦尼斯拉斯（Etienne Stanislas）的非洲丝绸染工带领着起义队伍，他的形象后来被用于流行雕刻品中。让-巴普提斯特·蒙法康（Jean-Baptiste Montfalcon）是当地的一名医生，后来成了该市亲政府的主要记者。他用新职业的所有工具记录下了这一幕：

这个可怕的黑人……从莫朗桥（Pont Morand）选择他的攻击目标，他的眼睛喷火，口泛白沫，双臂被鲜血染红，每一次在他带领下通过有技巧地瞄准，成功干倒一个龙骑兵或炮兵，他都会发出野蛮的嘶吼，欢呼雀跃。⁴⁶

45. Romand, J.-C., *Confession d'un Malheureux, Forcat Libérée*, Paris: 1846, p. 88.

46. Montfalcon, J.-B., *Histoire des insurrections de Lyon*, Lyon: 1834, p.82. 引自 Popkin, J. Press, *Revolution and Social Identities in France 1830–1835*, Pennsylvania: 2002 p. 303.

那天晚上，军队撤离了城市，工人们掌握了城市的控制权。超过 100 多名士兵死亡，263 人受伤；工人一方，63 人死亡，负伤人数是死亡人数的一倍。工人们的领导者组成了一个临时参谋部维持城市运作，他们包括两类人：一类是织工头和罗纳志愿者，另一类是中产阶级共和党人——政治家、记者和律师。共和党人对暴动感动震惊，但现在打算领导它。

临时政府从市政厅颁布了针对抢劫的法令，释放了因债务而入狱的人，但仍将普通罪犯监禁在狱中。同时，要求选举新的地方法官，并承诺将举行“初级议会”的选举。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织工们想要价目表，共和党人想要共和国，并指望得到法国南部其他国家的支持。随着争论拖至深夜，工人代表回到了红十字山，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大本营。罗曼亲眼见证了这场政治危机：

丝绸工人已经取得了胜利，但他们却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他们抱着手臂，以为已经完成了任务；而那些之前刺激了他们的人，那些把他们当做工具希望利用他们获得权力的人，看到他们如此快地冷静下来而感到愤怒。⁴⁷

罗曼抱怨说，现在管理这个城市的人对工人区很陌生。他试图与共和党领导人进行对话，但却受到了冒犯，他说：

这些投机分子装腔作势了起来，展现出比以前那些行政长官

47. Romand, J.-C., *Confession d'un Malheureux, Forcat Libérée*, Paris: 1846, p. 101.

——我的手枪为他们的免职做出了贡献——更贵族化的想法。我对他们来说只是区区一个裁缝，只是一个无产阶级，只是他们利用后就可以丢弃的工具之一。⁴⁸

三天后，叛乱被平息，城市被政府军重新占领。在被押往监狱的路上，罗曼注意到，共和党领导人受到了特殊待遇：

……其余的人被两两锁在一起，但是公平地说，每个人都被允许选择与他锁在一起的人……我选择了黑人斯坦尼斯拉斯，据说，在桥上的时候他面对敌人的攻击首当其冲。在我看来，相比其他人他的情况与我最接近……

政府进行了逮捕行动，但没有进行系统性的报复，甚至对织工作出了重大让步。共同责任协会继续它的工作，派遣查尼尔前往巴黎，希望能见到“公民国王”。城市报纸急着忘记这场事端。但在红十字山的街道上和酒吧里，工人们热烈谈论着黑旗的传说。记者蒙法康（Montfalcon），留心听着这些对话，总结道：

11月的胜利给里昂的工人一种自豪和勇敢，使他们变得很难对付。这将是未来几个世纪车间里最受欢迎的故事，这个伟大的事件将代代相传，最后一个织工将激情洋溢地告诉最后一个

48. Romand, J.-C., *Confession d'un Malheureux, Forcat Libérée*, Paris: 1846, p. 103.

学徒：“很久很久以前，我们赶走了丝织商和卫兵，占领了城市。”⁴⁹

社会主义发现了工人：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工人组织迅速成长，变得激进化。《工厂的回声》宣称自己不仅是丝绸工人的报刊，而是整个“无产阶级”的报刊。短工们模仿织工头的协会创立了自己的协会。国民自卫军的成员日渐减少，许多工人被禁止加入，制造商热情减退。这场反叛使卡努特们的名声在整个欧洲传开，一位亲眼目睹了事件的巴黎记者记录下了整个事件，震惊了欧洲大陆：

里昂起义揭示了一个根本性的秘密，即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内部社会冲突。威胁社会的野蛮人并不在高加索山脉或鞑靼草原；他们在我们制造业城市的郊区。⁵⁰

对社会秩序的核心威胁是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一个惊人的新想法。这理所当然地使巴黎边缘一个废弃的修道院里的人们兴奋了起来，那是一小

49. Montfalcon, J.-B., *Le Temps* 13 April 1834. 引自 Rude, F. 前揭。

50. Girardin, S.-M., *Journal des débats*, Paris: 8 December 1831. 引自 Popkin, J. 前揭 p. 2.

群社会主义者居住的公社，他们实践着自由的爱。他们是亨利·圣-西蒙⁵¹（Count Henri Saint-Simon）的追随者，圣西蒙是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梦想家，最近刚去世。他给他的追随者留下了大量的钱和指示，以建立一种可以根据科学原则重塑社会的新宗教。教会由两个“神父”，珀斯泊·安方汀（Prosper Enfantin）和迈克·修瓦利（Michel Chevalier）管理。公社成员穿着一条蓝色束腰外衣，从背面扣起来，白色的背心上用红色印着各自的名字，红色的衣领，白色的长裤，红色的贝雷帽，闪亮的黑色皮带和平滑的围巾。由于在法国，除了小丑以外其他人的衣着主要是黑色或灰色，招新工作进展得十分缓慢。但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奋斗目标。

安方汀宣布，“对我们来说，政治理论现在已经完成；政治实践的生活开始了！”他派出使者向卡努特们演讲，一个当地追随圣西蒙的医生也开始为《工厂的回声》写稿。同时，织工头查尼尔被派到巴黎游说政治家，他与这个历史悠久的宗派混在一起，这些工人活动分子发现自己是提倡自由的爱的社会主义者中的一员。

到1832年11月，计划变得十分宏大：他们计划把整个公社搬到里昂，连同他们的服装、戏剧表演和秘密仪式。在一本名为“去里昂！”的宣传册中，修瓦利命令到：“前往里昂，巨大的工人；他会给我们一个“工资的洗礼”，我们将把我们的药膏抹在他发烧的额上……”⁵²他保证道，“我们将

51. 亨利·圣-西蒙（1760年10月17日—1825年5月19日）：生于巴黎，法国社会理论家，基督教社会主义（Christian socialism）的首席创始人。在他的主要作品《新基督教》（*Nouveau Christianisme*）中，他宣称兄弟情谊必将伴随着工业和社会科学组织的产生和发展。——译者注

52. Chevalier, M., *A Lyon*, Menilmontant: 23 November 1832.

在进入时戴着和平的贝雷帽，它是红色的恐怖之帽的变形。”

他们在起义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抵达，全副武装地坐着马车在街上游行。但他们面临两个紧迫的问题：所有圣西蒙留下的钱已经花光了；修瓦利和安方汀此时都在监狱里。因此，他们成为了第一代“去到人民百姓中”的中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变装的诗人、医生和音乐家的混合体在车间中找到了卡努特的实习工作。但工资的洗礼被证明进展艰难。教派的临时领导者埃米尔·巴罗（Emile Barrault）抱怨道：

从早上五点到晚上八点，我像机械手一样工作，每天赚40苏⁵³。

我的手变得僵硬，我的四肢变得粗壮；我的身体逐渐习惯了工作；在道德力量的支撑下，我的身体力量才没在第一天的工作后就耗尽。⁵⁴

在织机前工作了不到一个月后，巴罗就认定了，对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想法来说，里昂这个舞台太小了。他决定将教会搬到亚洲，并改名为妇女协会（一路上，他们将第一次尝试挖掘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苏伊士运河）。目睹他们离开的约瑟夫·贝诺特（Joseph Benoît）总结了第一次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干预”的影响：

圣西蒙主义只是一颗闪亮的流星，以其毫无保留的明朗照亮社

53. 苏：苏是法国古代的货币名称。1法郎 = 20苏。——译者注

54. 引自 Rude, F., *Les Révoltes des Canuts: 1831-1834*, Paris: 2001, p. 82.

会瞬间。在动摇了知识分子和煽动了里昂的群众之后，它就仅限于一小群忠实的人，很快就只对工人产生有争议的影响。它的追随者采取的宗教教条——甚至包括穿制服——把它变成了主流社会以外的一个教派……共和党人的想法相比之下更为有利：这是一种经过试验的政府形式，有追随者和传统。里昂的工人，在吸取了1831年的经验教训之后，开始致力于共和主义思想。⁵⁵

当你需要面对一切的时刻：

1833年的丝绸生产创了纪录，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工人组织也开始壮大。共同责任协会的活跃成员人数翻了一番，全新的更激进的一代领导人接手了组织。《工厂的回声》报道了印刷工、金匠、石匠和帽匠各自形成的互助协会，并为后者筹集了罢工基金。一份名为《工人之声》(*L'Echo des Travailleurs*)的新的工人报纸发布了，指责其竞争对手立场太过温和。

卡努特们退出了工业法庭。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贸易周期带来的不安全感，他们提议建立“中央织房”，这是一个类似合作社的机构，加入者每贡献一台织机，就可以在固定日工资以外按一份额的比例分享合作社的利润。一百七十年后，瓦拉纳西的纺织工也想出了同样的想法。

1834年2月，为了应对新的订单下滑，制造商削减了丝绸的市场价格，造成了大规模罢工，最严重的时候，整个城市所有的织机都停止了运作。六

55. Benoît, J., *Confessions d'un prolétaire*, Paris: 1968, p. 51.

天后，面对制造商和政府的统一战线，织工投票决定退让。政府基于英国反工会法案迅速通过了新的立法：所有工会必须在警局登记；秘密社团的成员将被处以一年监禁；举行秘密会议的酒吧发现后将被关闭。六名织工领袖将被审判。

对强加的法律的愤怒，和在法庭上看着自己人被拖上审判台的侮辱，促使最温和的织工头都决定与共和党联盟。他们成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示威活动与织工们的审判同时开始。1834年4月9日，第二次里昂起义开始了。

这次起义中，工人们从一开始就拥有武器，并由共和党地下领导。一场全面的战斗持续了六天。在工人们夺取了大炮，并弄懂了粉末应该在炮弹之前放入后，双方都开始使用重型武器。约131名士兵和192名工人死亡。

一位曾当过士兵和秘密社团主席的丝织工人，留下了一本匿名的战斗日记。它总结了卡努特们从工会主义到工人阶级共和主义的政治旅程：

是的，我是共和党人。是的，和我一起战斗的伙伴都是共和党人；我们没有发起攻击，也没有寻求战斗——虽然我们从来不怕战斗。我们凭着勇气和共和国的名义——这一唯一使人民权利能得到保障的政府形式——对武力作出了反应。因此，承认这一点，记者先生：这些勇敢的人，这些在5,000名士兵的火力中存活了六天的人，若不是以共和国为奋斗目标，是不可能因其他任何原因而支撑24小时的。

他阐明了丝绸工人在共和政治和社会正义之间建立的联系：

以热情和勇气相互砥砺，他们决定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死：最

终，每个人都履行了他作为人和公民的职责。我们被迫回应向我们发出的挑战，不仅是为了赢，而且是为了向我们的压迫者表明，我们关心国家的福祉，在他们自以为锻造了铁链的时刻，我们一定会将其挣脱。⁵⁶

技术工人的社会主义：在第一次起义后不久，一位圣西蒙的追随者告诉《工厂的回声》的读者：

在我看来，丝绸产业必须尽快走上棉纺织业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求我的同胞特别注意曼彻斯特和兰开夏郡（Lancashire）发生的事情……⁵⁷

他不是最后一个认为工厂系统——包含着成千上万的工人、机器驱动和大规模生产的系统——是资本主义的自然商业模式和革命最肥沃的土地的社会主义者。技术工匠被19世纪中叶的革命者视为活恐龙，注定要灭绝，他们的工艺心态是“阶级意识”的障碍。

后见之明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卡努特们。里昂系统看起来很像今天的硅谷：一个技术专家和创业者的网络，资本锁定在设计上而非机械里，工作场所有自主和创新文化。技能和提升技能的权利被视为工人的

56. 佚名，“Curieux journal d'un ouvrier de la Croix-Rousse, president d'une société patriotique, sur les événements auxquels il a pris part,” in Sala, A., *Les ouvrières Lyonnaises en 1834, esquisses historiques*, Paris: 1834, p. 150.

57. *L'Echo de la Fabrique*, 1832.

资产，而非老板的资产。和今天的硅谷一样，创新和协作竞争也是里昂 19 世纪 30 年代商业模式的核心。在干预期⁵⁸的每一个十年里，都会形成一支劳动力队伍，他们通常在世界经济最活跃的角落，在那里，技能、激进主义和自尊并存着。

卡努特们并非一无所有，除了镣铐再无可失，他们拥有装满了昂贵织机的房间，有家庭和艰苦赢得的社会地位。但他们知道，可能比同时期任何其他工厂工人知道得更清楚，他们要“赢回一个世界”。《工厂的呼声》让卡努特们明白，他们是一个新的阶级，“无产阶级”，它是全球性的，有全球性的利益。

卡努特们实践着所谓的“技术工人的社会主义”，认为民主权利和争取尊严优先于工资基本问题。第一次起义不久之后，《工厂的呼声》开始定期刊登自我教育指南，它所节选的经典读物，可以作为今天任何大学级别启蒙哲学和文学课程的基本阅读书单。到 1833 年中，《工厂的呼声》的编辑们已经从圣西蒙追随者所宣扬的自由恋爱女权主义带来的震惊中回过了神，开始呼吁更多的妇女合法权利。

对于技术工人来说，他们不得不承受的最大损失是在工作场所内的控制，他们的控制权来自对技能和技能培训的垄断，以及设定工资水平的能力。他们会以生存为此辩护，甚至不惜通过起义来实现。但是，只要他们仍然有控制权，他们就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保有那些拿工资的工厂奴隶和贫民窟的穷人没有的筹码。他们不敌视社会主义，但倾向于把它看作一种可能性，而非下一步的出路。

58. 干预期：指的是分隔开两个重要事件或节点之间的时期。——译者注

在卡努特们的反抗中,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促成全球劳工运动的三个“大诉求”:自我改善,工作场所自主权和民主权利。早在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们撰写经典著作前,工人们已经发现了一种围绕这三大诉求的权宜的意识形态——一种工人阶级的共和主义。

在1848年,共和国在法国成为现实,革命在欧洲各地爆发。那时,困扰发达世界的幽灵是工人阶级。曼彻斯特在彼得卢惨案时所经历的苦难,现在在比利时(Belgium),法国北部,西里西亚(Silesia),莱茵兰(Rhineland)和新英格兰(New England)被见证。但是,1848年的剧变期间,正是世界上的技术工匠——织工、鞋匠和金属工人——引领着工人组织。

让-克劳德·罗曼离开监狱的时候,已经是一个被改造了性格的垮掉的人,他的回忆录警告工人不要参与革命。约瑟夫·本诺特成为了一个热情的社会主义者,直到去世。他参加了1848年的革命,那场革命在里昂相对平静。他写道:

里昂工人决定了所有未来斗争的特点……用不朽的口号来标记自己,用几个词便总结了现代社会的需求和展望。他们将口号写在了他们的旗帜上:苟活工作,还是以死抗争!

破晓将至

1871 年巴黎公社

译=李静云

旧社会正在土崩瓦解。笼罩着大地的黑夜的裹尸布即将被撕开。天就要亮了……今天，伴随着属于人民的胜利，劳动的时代开始了……全世界的弟兄们，我们的血液为你们的自由流淌，我们的胜利属于你们；起来！黑夜就要结束了……

——朱尔斯·瓦莱斯（Jules Vallès），

《抗议》（*L'Insurgé*），1871 年¹

1. Valles, J., *L'Insurge*, Paris: 1970.

阿姆科科，尼日利亚，2005

一名自称是警察的人示意我们停车。他透过卡车的挡风玻璃向里张望，眼神透出一丝恐惧，边说话边把他的短管 AK-47 枪弄得咔哒作响。司机直勾勾地盯着那人光着的脚，面露嫌恶之色，好像在说“别装了”，然后稍稍往前坐了一点。在拉哥斯（Lagos）贫民窟边境的双行道上，每隔一英里都有警察设的路障，但他们通常不会到这么远的地方来。

阿姆科科（Amukoko）到处都是棚屋和小巷，一排排一层楼高的小屋杂乱无章，围绕着有时有四层高的临时混凝土建筑。一条水渠从棚屋之间穿过，水色泛绿而脏臭，漂满了菜叶和排泄物，孑孓在其中游动。因为这条水渠，十岁以下的孩子中每 25 个就有 1 个会因为光脚在街上跑跳而染上疟疾身亡。在阿姆科科，只有 5% 的家庭有自来水。“我们把它叫做贫民区，”史蒂芬·欧路瑞米（Stephen Oluremi）说，“住在这里的人挣的钱仅够维生。”然而住在这里的有三百万人。

晚上，八到十个人挤在一间房里，睡不下的就睡在过道、储藏室或楼梯间里。白天，走廊和过道里充满了家庭生活的烟火气：一个女人正在为做饭的小锅生火、孩子们穿着符合他们年龄的衣服互相追逐。最小的孩子一丝不挂；到上学年纪的男孩子们穿着破破烂烂的短裤；青春期的孩子们呢，如果他家运气特别好，可能会穿着褪色的利物浦（Liverpool）和尤文图斯（Juventus）的球衣，上面印着五年前的某个著名球星的名字。

这里几乎看不到老年人；阿姆科科是属于外来工的城市。年轻的母亲们占据了街道，她们穿着尼日利亚（Nigeria）各地部落的服饰：来自北部的豪萨（Hausa）妇女带着穆斯林的头巾打水，旁边是来自南部的伊布（Ibo）

妇女，她们裸露着肚皮，梳着装饰华丽的长发辮。

男人们大多数都在外打工或者找工作。但是一个阿姆科科人能找到什么工作呢？如果你是个小孩，你可以卖东西。距离阿姆科科步行半天以内的每个岔路口上都是孩子，卖着各种第三世界生产出来的不值钱的新鲜玩意：电话卡、手机充电器、从英文成功学著作上撕下来的几页书。堵车的时候，一个男孩向卡车司机兜售着一把黑色电缆；司机挑了一根拿走，然后车流突然向前涌动，司机没有付钱就开走了。男孩一下子大哭起来，但是很快就在飙升的肾上腺素作用下边喊边追了上去。

如果不卖东西，你也可以当一个裁缝，头顶着一个小白垫和一个上世纪50年代古旧的胜家（Singer）牌缝纫机，在拉哥斯四处转悠。有时候需要裁缝并且请得起裁缝的人家会听到你的吆喝，你就有活可干。其他时候你只是优雅地梗着脖子，顶着缝纫机行走在大街小巷。

尽管阿姆科科有印花的围巾、烧得火红的炭和各色球衣，它的主色调仍是灰色。一层灰色的污泥覆盖着街道和下水沟。但“污泥”一词并不准确，它其实是层层叠叠的有毒垃圾：几十年前丢掉的塑料袋、一年前扔掉的地毯和昨天新扔掉的鸡骨头，被无数行人的脚碾在一起，干燥均匀地糊在地表。同样的灰色不明物体覆盖在屋顶上，甚至渗入了人们的衣服里——人们的衣服被低质量的洗涤剂洗到褪色，又晾在室外，因为雨水也遭到了污染，所以随着降雨，衣服就被染成了灰色。

肺结核、疟疾、麻疹和艾滋病是致死率最高的疾病。分娩依靠传统的接生婆，然而这些接生婆遵循的却是会害死人的传统。圣洁的尼日利亚修女们晚上躲藏在修道院中，白天则溜到大街上分发药物，号召大家拒绝使用避孕套。

阿姆科科是一个典型的贫民窟。全世界有十亿人住在贫民窟里，占全

球总人数的六分之一，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据联合国估计，到 2030 年，贫民窟人口将达到二十亿。或许你不觉得阿姆科科的贫民窟和外面的工厂、写字楼有什么关系，或许你认为贫民窟和现代化的工作场所是两个互相独立的社会存在，但是在像尼日利亚这样的国家里，二者是息息相关的。

拉哥斯的工业中心伊凯贾（Ikeja）离阿姆科科不到两英里。一条两边都是铁丝栅栏的笔直铁路，两边坐落着许多耳熟能详的公司：金氏（Guinness），邓禄普（Dunlop），多乐士（Dulux），伯爵油漆（Berger Paints），尼日利亚钢铁线材公司（Nigeria Steel and Wire）。男人们从工厂里出来，在街头小贩那里买吃的，他们看起来很强壮，浑身是灰但是充满自信。伊凯贾和阿姆科科如同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而像史蒂芬·欧路瑞米这样的人则横跨两个世界。²

欧路瑞米在一个金属加工厂工作，生产适配家用电器的铝锅。他没有结婚，只有二十出头，手上已经全是硬茧，衣服也破破烂烂。在他工作的地方有 250 名永久职工和 200 名临时工。他就是 200 名临时工中的一员：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钻了法律的空子：在这个国家，临时工和正式职工干一样的活，拿的却是不一样的钱。你没有劳动合同。有工作的人应该有不错的收入，但是临时工根本赚不到钱。哪怕你和正式员工干一样的工作，你的工资依然不高。这就是临时工的命。

2. 受访者要求化名并且隐去他同伴的身份。

他一个月的工资是 5000 奈拉——合 21 英镑，大概是一个中国工人工资的一半。劳动时长尚能接受——早上七点到下午三点。尽管工作环境很艰苦，但是他自认为还算幸运，因为他在生产线上，不需要手工打磨铸件：“工人们手工打磨的区域被称为‘村子’，村子里特别热。我在那个地方撑不到两天就会病倒，因为那里的工人是在拼尽全力工作。”

和尼日利亚大部分的大工厂一样，他工作的地方也有工会。20 世纪 70 年代，尼日利亚的工会得到了法律认可，并强制实行一种通过公司从工人工资中扣取工会费用的制度。尽管最近政府将这项强制措施变成了自愿的，但是在 NGO 的监督下，大部分的外来投资者并没有撕毁与工会达成的各种协议。事实上，他们还给了他们的核心工人大量福利。但是，欧路瑞米没办法进入核心工人的圈子。他已经在工厂里待了四年，根据法律，他应该在工作六个月之后就转正的。但是他没有，这成为了他对老板、其他工人和工会最不满的地方。

人们为了这个工作牺牲了身体。我已经病了——明天我本应该去医疗中心——但是如果我请了病假，我就没有工资了。一个临时工是没有带薪病假的。哪怕医生说你的病要休养三个礼拜，你在病假期间也拿不到钱。但是正式职工是有钱拿的。如果医生让你休息的时间超过了一个礼拜，对临时工来说都是很难办的。

如果算上住房和医疗补贴，合同工的收入是临时工的两倍，所以欧路瑞米住在贫民窟里，他一半的收入都用来通勤，另外四分之一用来和另一个年轻的工人合租房间。他工厂的工会领袖同时也是一个高级管理人员。如

果想在这儿找到工作，你要和管理层或者工会的人有点儿关系才行。那么，如果这些工人们对此现状如此不满，他们为什么不向工会领袖抗议呢？

那些工龄比较长的人被称作“老人”。年轻人说话的时候，老人们总是反对，所以他们团结不起来。每次竞选的时候，我们年轻人会选出一些候选人，而老人们也和自己人聚在一起。临时工是不能竞选工会领导的，只有正式职工可以，而正式职工里老人又比年轻人多，这就是为什么少数人的工会统治着多数人。

尼日利亚不久前才去军政化，因此该国的劳工运动也发展得小心翼翼。劳工运动在外资工厂和公共部门中很常见，但是却很难在阿姆科科这种地方的工人之中扎根。在贫民窟地区，社会关系主要围绕清真寺、教堂、生存艰难的小诊所和 NGO 展开。欧路瑞米和大部分在拉哥斯贫民窟的工人们连维持生计都困难，更无暇顾及什么宏大的政治运动：

就拿和我一样的人来说吧，在下班之后，我想去上学。工作结束之后，我可能会去我朋友那儿，或者去计算机学校学习。工作结束之后，我还得继续奋斗。为了生存，我必须得为自己的人生奋斗。

尼日利亚劳动委员会（Nigerian Labour Congress）是尼日利亚最主要的工会，但它只有在极特殊的时期才会考虑贫民区工人的愿望和利益。2003年，尼日利亚政府提升了石油价格，该委员会随即发动了一次大罢工。重工业和石油产业的工人都很团结。但当一个亲政府的工会组织活动，号召

大家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一帮从拉哥斯贫民窟来的年轻人带着大刀、点燃了路障，攻击这些破坏罢工的人。到2003年7月7日晚，这些抗议者中已经有十人被警方击毙。2003年10月，在工会再次发动大罢工的威胁下，政府削减了石油价格，自此之后，政府和工会之间就达成了休战协定。

史蒂芬·欧路瑞米生活在两种现实之间，一边是不受法律约束的平民窟，另一边是现代化的工作场所。它们看起来像是两个毫不相关的世界，但二者都是外资涌入、农业衰退、人口向城市流动、腐败的管理和失业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劳工运动已经在正式的经济生产领域扎根，却难以进入非正式的领域。工人运动的领袖很少采取罢工的手段，因为他们知道罢工会导致不可控制的局面。

如何才能的核心工人群体之外，和平地把穷人、贫民窟人口和临时工都团结起来，又不挑起动乱招致政府镇压？这也是各个发展中国家工会面临的共同困境。其实，在19世纪下半叶，欧洲和美国——尤其是巴黎（Paris）——的工会也面临过同样的问题。在当时的巴黎，独裁者正试着进行民主化改革，核心的工人群体试着自我组织，还有大量来自城市郊区贫民窟的人们，他们像史蒂芬·欧路瑞米一样，“奋斗只是为了生存”。

巴黎，1867年4月

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尽管现在还有许多蓄着胡须的革命者流亡海外，但是他们已经受到通缉，浑身都是失败的伤痕。1848年在维也纳（Vienna）、

柏林（Berlin）和布达佩斯（Budapest）的起义已经成为了回忆。³在巴黎，宽广的大道取代了古老的小巷，以避免再建起来 1848 年革命时的那种路障，同时也让大炮打击的效果更致命——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期待这个变化。现在的欧洲大陆有着强有力的政府，新的技术和可靠的工作。工业博览会的时代已经开始。

在巴黎的一个小礼堂，图书装订工互助会（Bookbinders' Mutual Society）即将选出代表，去参加万国博览会（Universal Exposition）。⁴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科技博览会，刚刚在塞纳河畔的一幢玻璃和钢铁建成的宫殿中开幕。政府提供了一笔钱，用来补贴工人们参加博览会的开销，礼堂里有的工人提议接受这笔补助。但是站在讲台上的人反对：“如果我们要保持独立，保护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必须拒绝任何形式的资助，用我们自己的资源组织代表团。”⁵

尤金·瓦尔兰（Eugène Varlin）知道要怎么弄来“资源”。两年前，为了争取十小时工作制，他曾经组织图书装订工们进行了一次罢工。他筹集到了一大笔用来支持罢工的基金，然后通过坚持斗争获得了胜利。瓦尔兰今年 28 岁，一头黑发，胡子蓬乱，圆脸，还有一双求知若渴的眼睛。他开办了一个工人食品杂货店；有人还写诗歌颂他。他技术熟练，自学成才，坚信技术可以带来社会进步，从各方面看，他都是那个时代一位典型的劳

3. 1848 年革命，也称民族之春（英语：Spring of Nations）或人民之春（英语：Springtime of the Peoples），是在 1848 年欧洲各国爆发的一系列武装革命。——译者注

4. 指 1867 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的第二节巴黎世界博览会。——译者注

5. Foulon, M., *Eugène Varlin: Relieur et Membre de la Commune*, Clermont-Ferrand: 1934, p. 72.

工运动成员。

他一直试图说服雇主们,新技术应该带来更短的劳动时间和更高的工资:

工业的发展应该使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由于机器使用的增加,产品也不断增多;只依靠富人是消费不了这么多产品的。工人也必须要成为消费者,所以他们的钱要够花,也要有足够的时间来享受买来的东西。⁶

这个观点并不新鲜。四十年之后,亨利·福特(Henry Ford)几乎一字不差地把这些话重复了一遍。⁷拿破仑三世(Louis-Napoléon)的看法也差不多,这位风格鲜明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后来出资支持万国博览会。⁸当年他镇压了1848年的革命,把巴黎的贫民窟碾成粉末,但他这样做是有原因的。法兰西要建立起世界一流的工业体系,就需要世界一流的劳动力。在革命结束之后,工人们在皇帝的恩准下可以合法建立互助基金和合作社,

6. Foulon, M., *Eugène Varlin: Relieur et Membre de la Commune*, Clermont-Ferrand: 1934, p. 31.

7. 亨利·福特是世界上第一位将装配线概念实际应用在工厂并大量生产而获得巨大成功者。亨利·福特不是汽车或是装配线的发明者,但他让汽车在美国真正普及化。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使汽车成为一种大众产品,它不但革命了工业生产方式,而且对现代社会和美国文化起了巨大的影响。——译者注

8. 拿破仑三世(法语: Napoléon III, 1808年4月20日—1873年1月9日),即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法语: Charles Louis-Napoléon Bonaparte),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唯一一位总统及法兰西第二帝国唯一一位皇帝。他在1848年当选总统之后,在三年后发动了一次政变,获得成功。他随即在次年,亦即拿破仑一世登基第48周年称帝。1870年9月4日,他战败退位。他是法国第一个普选产生的总统和最后一个君主。——译者注

不过开会的时候仍然不能讨论政治，并且要把会议记录簿交给警察。

经过投票，巴黎的图书装订工们决定拒绝接收皇帝的资助，并且选出瓦尔兰参加博览会，学习世界上的工业奇迹。法国各地的熟练工，机械工、鞋匠、做帽子的、铸铜匠，都在投票选举他们的代表。所有人穿着他们参加礼拜时才穿的盛装，带着笔记本，在万国博览会齐聚一堂。

在欧洲各国的王室一一就座，骑兵游行结束之后，博览会正式开始了。展厅里陈列着各种现代奇观：时髦的紧身胸衣，国际度量衡，高雅艺术……但是最受欢迎的是大大小小的机器。美国人带来了马考米克（McCormick）的收割机和摩尔斯（Morse）的电报；德国的钢铁大亨克虏伯（Krupp）向大家展示了一座重达 50 吨、能发射 1000 磅炮弹的大炮；法国人展示了一个能把兔皮做成帽子的新奇装置。

博览会在 11 月结束了，工人代表们把他们观察到的编写成册，交给政府的文员，由他们把这些资料呈给皇帝。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这些报告与其说是对机械化的赞美，不如说更像是对 19 世纪中叶社会秩序的批判。鞋匠代表这样问到：“机器真的是属于所有人的吗？是成千上万的工人们维持着机器的运转。当机器被垄断，只为少数人牟利的时候，这难道不是与社会公正背道而驰的吗？”⁹

工人们坚持认为，新的劳动分工夺去了他们的技术和地位。但是工人们不是反对技术革新，而是要求共享发展进步的果实。

9. 引自 Ranciere, J., & Vauday, P., “Going to the Expo: the worker, his wife and machines,” in Rifkin, A., & Thomas, R., *Voices of the People: The Social Life of ‘La Sociale’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Empire*, London: 1988, p. 28.

目前的体系整体上很好,但是它的上层是不公平的。尽管每个人都参与了生产,但是只有一少部分人获利。因此我们必须齐心协力,在尊重既有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建设一个分配更加公平的经济体系。¹⁰

做帽子的工人们也准备发表不满。就拿织帽机来说,工人们开玩笑说它可以把活兔子直接做成帽子。诚然,织帽机是工业现代化的象征,但是在工厂里,这个机器却象征着工人们的无用。

这个织帽机被放在大楼角落里一个狭小昏暗的房间,人们觉得这样还不够保险,又拿木板把它围了起来,弄得跟一尊神像似的,仿佛必须要隔开公众的视线……它几乎已经成为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象征。¹¹

机械工的代表们离开的时候非常激动。他们热切地想,有了这样的机器,以后就再也不需要体力劳动了。这些现在整日整夜地在润滑油和铁屑之间劳作的工人们已经开始想象一百多年后的机器人了:“我们希望由机器来做所有的实质性工作,再生产足够数量的机器,这样人只需要每天做几个小时的监督工作。”¹²

10. 同上, p. 31。

11. 同上, p. 28。

12. 同上, p. 31。

这些报告比稀有的银版摄影术更好地捕捉到了熟练工人们的思想转变。自我教育、工人的尊严、生活的改善……这些关键词常常在报告中出现。工人们希望建立一个以新技术为基础的合作型社会，这是他们对于社会正义的期待，劳动、技术和尊重将成为这个新社会的核心价值。这些机械工人们秉持着对于人类进步的信念，将展览会上的蒸汽火车头也描述得多姿多彩。他们不仅把它看作是一种交通工具，而且是将它看做一个全球的大众传播体系的基础。

……大众传播体系通过传播普世观点、原则、权利和义务，将会加速实现一个人和人能互相理解的未来。这一体系最终会永远地推翻人们所受的压迫，去除资本和狂妄带来的枷锁，让人们最大程度地受益于机器。¹³

这些工人们了解世界的唯一方式就是在煤气灯下读借来的书，但是他们凝视着这些蒸汽机器的时候，却在互联网还没有发明的时代想象着几乎类似互联网的存在。

拿破仑三世认为这些在车床上做着细活、礼貌地出席博览会这一资本主义力量最大展示的能工巧匠们，肯定不会是革命分子。社会改革还将继续跟进。毕竟，革命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13. 同上, p. 33。

“罢工会造成巨大的创伤……”：

在法国以外的国家，熟练工们也从激进走向温和。哪怕是拥有较大政治自由的工会也会非常谨慎。1866年，美国内战刚刚结束，铸铁工人们的领袖威廉·塞尔维斯（William Sylvis）成立了全国劳工联盟（National Labor Union），代表6万名工人。塞尔维斯说：“罢工会对劳动阶层造成巨大创伤。”¹⁴ 英国工会的创始会议中也表达了这一观点。

温和化成为了各个活动领域的口号，除了在支持外国革命的时候。熟练工阶层表现出了一种集体性的心理移情，他们把自己的革命热情转向了国外反奴隶制反压迫的战争。兰开夏郡（Lancashire）的棉纺织工人在美国内战时支持联邦，尽管支持联邦意味着要挨饿；数以千计的纽约（New York）工人们聚集在一起欢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奥多诺万·罗萨（O'Donovan Rossa）；和瓦尔兰同一时代的巴黎人，崇拜意大利的自由战士加里波底（Garibaldi）和19世纪60年代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波兰人反抗俄国统治的起义遭到了镇压，大量人被判处死刑或流放，他们的反抗得到了世界各地工会的同情。

正是波兰大屠杀催生了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工人组织。1864年9月，为了表示对波兰（Poland）的支持，伦敦（London）的工会领袖召开了一个公开会议¹⁵，法国的工人互助会也派了代表前来参加。会议在朗爱克街（Long Acre）的圣马丁堂（St. Martin's Hall）举办。讽刺的是，今天这个地

14. Foner, P. S., *Hist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47, Vol. 1, p. 374.

15. 该会议为工人联合会伦敦理事会召开。——译者注

方已经成为了时装品牌 FCUK 的经营场所。

来开会的人把大厅挤得水泄不通（因为显然工人阶级正在迎来复兴）……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国际工人协会”（Working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译注：即“第一国际”），负责“协调”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各国的工会，总理事会设在伦敦……¹⁶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担任了该次会议的记者，在会议记录中，他厚脸皮地自称为德国工人阶级的代表（记录显示他的职业是建筑师）。身为一位流亡海外的革命分子，他在会议中没有发言，但是很快，他的支持者们就和他的对手——另一位革命者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的支持者之间起了摩擦。¹⁷蒲鲁东是无政府主义之父，他笃信工人合作社的力量，反对给女性权利，这和许多熟练工工会成员的看法不谋而合。

蒲鲁东曾说不应该允许女性在工厂工作。他说：“从本质上来说，男人拥有行动的力量，女人则是人们迷恋的对象。”今天你很少会在哪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网站上看到这种话了。依据他的设想，在无政府的社会中，家庭

16. Marx, K., “Letter to Engels 4 November 1864,” in Marx, K., & Engels, F., *Collected Works*, Vol. 42, London: 1987, p. 11.

17. 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法语：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年1月15日—1865年1月19日），法国互惠共生论经济学家，首位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人，也就是无政府主义的奠基人。——译者注

负责维持社会秩序，是无政府主义政体中“绝对的君主”。女性的性自由会导致社会崩塌；性交易则是社会中最大的恶。

在 19 世纪 60 年代，这些理论很合工会中男人们的胃口，并成为第一国际遵循的政策。蒲鲁东的支持者们领导着法国的互助会。瓦尔兰是唯一一个投票反对禁止女性参加工作的法国代表，他在第一国际在日内瓦的议会上说，“禁止女性参加劳动等于承认慈善机构和性交易制度的合法性。”¹⁸ 尽管如此，瓦尔兰和第一国际的其他人一样，对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依然非常狂热。

“吃的虽然不怎么样，卖相却不错…”：

合作社是 19 世纪中叶工人运动的主旋律之一。合作社可以是像塞尔维斯在纽约设立的非盈利钢铁厂那样的生产者合作社，也可以是类似于 19 世纪 40 年代在兰开夏郡开办的那些商店一样的消费者合作社。按照合作社原则，人们可以一起批量采购，低利率地贷款，甚至在没有工头的情况下开展生产活动，希望能通过这些方式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外开辟出一片天地。在马克思的另一个死敌——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的领导下，德国工人运动在选举中的主要诉求就是获得国家对合作社的资金支

18. Varlin, E., *Pratique Militante & Ecrits d'un Ouvrier Communard* (ed. Lejune, P.), Paris: 2002, p. 21.

持。¹⁹用拉萨尔的话说,合作社这一战略的美妙之处就是“它的手段即它的目的”。实现合作社不需要革命,也不纯粹是一种选举策略。通过合作社,你可以把创意十足的社会改革和争取议会代表性和国家资助的漫长运动结合起来。

在瓦尔兰那个时代的巴黎,合作社这一构想广受欢迎。各种慈善机构反而遭到了工人们的仇视,因为工人们觉得这是皇帝强加给他们的施舍。机械工在参观完博览会后的报告里抱怨说“流动食堂、廉价公寓和教堂”太多了,“虽然我们完全肯定这些东西的意义,但是我们信奉自由,希望你们能明白,我们想要主宰自己的生活,我们需要的只是这么做的自由。”²⁰

除了怨恨之外,人们还有担忧:在把工人和巴黎上流社会的“赛马和婚外情”隔离开来的同时,“受人尊敬的”工人阶级难免会受到贫民窟的陋习和败坏的道德的污染。和那个时代所有的熟练工一样,人们对乞丐、罪犯和妓女们充满深深的厌恶。马克思把后者称为流氓无产者;巴黎人把他们叫做贱民(*canaille*),意思是下等人、乌合之众或者杂种,究竟是哪个意思取决于你怎么用这个词。

维多琳·布罗谢(Victorine Brocher)是一名鞋匠的妻子,出身于一个值得尊敬的工人阶级家庭。由于一直徘徊在贫困的边缘,她加入了第一国际,因为她孩子的医生是第一国际的成员。在万国博览会开幕之前,她近

19. 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 1825–1864),普鲁士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法学家、工人运动指导者,社会主义者。德国早期工人运动著名领导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创立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机会主义路线的重要代表。——译者注

20. 引自 Ranciere, J., & Vauday, P., “Going to the Expo: the worker, his wife and machines,” in Rifkin, A., & Thomas, R., *Voices of the People: The Social Life of ‘La Sociale’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Empire*, London: 1988, p. 41.

距离目睹了贱民们的生活：

我看到穷人家的妇女被迫抛下年迈的双亲和小孩，为了一点点微薄的工资每天工作十二到十四个小时。工作的地方不通气，阳光照不进来，也没有灯光，她们要在这样危害健康的工作环境里待很长时间……在礼拜天，如果他的丈夫一切正常，晚饭后他就待在家里；如果他是酒鬼，他就会觉得自己是全天下最不幸的男人，觉得自己在家里待不下去了。他会去当地的舞厅寻求慰藉……²¹

对于像瓦尔兰和布罗谢这样受人尊敬的工人们来说，合作社在两个方面提供了保障：它让工人们摆脱富人们的救济获得了自由，也保证了工人们不会直接变成贱民，贱民阶层是无力支撑起社会主义这样的高尚理想的。1868年1月19日，瓦尔兰开办了一个合作社餐馆，店名叫做“汤锅”（La Marmite）。巴黎餐饮业从来没有见过像这家店一样激烈的宣传语：

工人们！顾客们！自由是我们改善自己生活的唯一途径。我们通过自由的联合变得更加强大，摆脱寄生虫一样的中间商，这些奸商从我们的伙食费里捞油水，残害着我们的身体健康。让我们联合起来，保卫我们的工资，更保卫我们吃饭的尊严！²²

21. Brocher, V., *Souvenirs d'une morte vivante*, Paris: 1976, pp. 61-2.

22. Varlin, E., *Pratique Militante & Ecrits d'un Ouvrier Communard* (ed. Lejune, P.), Paris: 2002, p. 34.

“汤锅”里卖的都是很便宜、很基本的食物。虽然“汤锅”的主要目的是给那些住在出租屋的临时工们提供伙食，但是这里很快成为了瓦尔兰的同志们的聚集地。一个人回忆道：

在这里你吃的不怎么样，但是卖相却不错，而且餐桌上洋溢着快活的气氛。顾客很多。你要自己点想吃的菜，自己把价格写在账上，再和钱一起交给收银的同志。一般你不会待太久，一吃完就离开，给别人腾地方。有时候，有些同志也会再多待一会，互相聊聊天。我们也会唱歌……²³

“汤锅”成了一个传奇的地方。许多年后，很多在伦敦苏活区（Soho）²⁴流亡的巴黎劳工又开了一家“汤锅”分店，夜夜在那里排遣忧愁。²⁵现在，在8000名捐助者的支持下，“汤锅”在巴黎又开了三家分店，并且开设了一家信用合作社。

但是在“汤锅”大快朵颐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皇帝注意到第一国际不仅影响力日益增大，还参与了欧洲各地的罢工运动，很快就宣布第一国际非法。第一批领导人在1867年12月遭到逮捕，三个月后，第二批领导人也遭到逮捕，其中包括瓦尔兰。在审讯中，瓦尔兰告诉法官，“第一国

23. Charles Keller, 引自 Varlin, E., *Pratique Militante & Ecrits d'un Ouvrier Communard* (ed. Lejune, P.), Paris: 2002, p. 37.

24. 伦敦的苏活区以娱乐业著称，曾是著名的红灯区，20世纪早期的时候不少外国人在该地区开了廉价餐馆。——译者注

25. 店址在鲁伯特街（Rupert Street），莱斯特广场（Leicester Square）的北面。

际从原则上反对罢工，我们认为罢工是种浪费。这句话第一国际在日内瓦说过，在各个地方都说过。”²⁶ 瓦尔兰和其他人一样被判了三个月。在扫清了第一国际之后，拿破仑三世对改革的进一步开展充满了信心，准备对公共集会进行立法。等到瓦尔兰出狱的时候，巴黎已经改头换面。

“贫民窟就是他们的宫殿…”：

当旧式的小巷被拆除，工人们只能搬到巴黎核心地区附近的小山上。从西北部的巴蒂尼奥勒（Batignolles），经过蒙马特（Montmartre），再到东边的美丽城（Belleville）和梅尼孟丹（Menilmontant），工人的廉租房地带连成一道弧线。巴黎现在成为了一个个同心圆构成的城市：中心非常繁华，外面一层环绕着宽广的大道，再外是贫民区，最外层是象征着城市边界的防御工事。在大量移民的影响下，劳动阶层的人数从1851年的130万飞速上升为1870年的190万。

这里工厂并不多，大部分人都在小型或者中型的作坊里工作。成千上万的女性在家纺织或者做纸花，只为了不沦为像妓女和强盗一样的底层人民。属于工人阶级的巴黎是世界知名的波西米亚之都，这里到处都是像路易斯·米歇尔（Louis Michel）一样填不饱肚子还在追梦的人。一位记者曾形容米歇尔“36岁，身材矮小，浅黑色皮肤，脑门很大很突出…她的长相看起来非常严肃，从头到脚穿着黑衣。”²⁷ 米歇尔本人会反驳说，“我其实挺

26. Villetard, E., *Histoire de l'Internationale*, Paris: 1872, p. 149.

27. Michel, L., *Red Virgin: Memoirs of Louise Michel* (ed. Lowry, B., & Gunter, E. E.), Alabama: 1981, p. 81.

高的。”

她认为自己是一个诗人、小说家和作曲家，但检察官认为，她实际上只是蒙马特的一位贫困潦倒的小学老师。检察官说，“在有空的时候，她在讲台上宣讲思想自由，让小学生们唱她自己写的诗，里面有一首叫做‘复仇者’（*The Avengers*）。”²⁸

米歇尔不属于工厂，也不属于消费合作社，而属于贫民窟。她免费地教成人识字，组织共和主义的讲座，加入了女权主义者领导的组织“妇女权利运动”（*Campaign for Women's Rights*）。她是第一国际的成员，但是鉴于第一国际对女性的态度，她对其并不是非常热衷。在日后她会这么回忆：“这就是路易·米歇尔，别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只因为她不停地说每个人都有权享受生活的果实。”²⁹

将巴黎的上流社会和外层的贫民窟隔开的那条繁华大道上开满了剧院和舞厅。年轻的工人们在这里买醉，跳舞或者找人上床。有很多情侣同居在一起，因为对很多姑娘们来说，和男友住在一起是摆脱贫困的唯一方法。因为不能从事政治活动，工人们便在舞厅和酒吧里醉生梦死，在醉成一团之后哭着唱歌来宣泄自己的不满。有一首叫“贱民”（*La Canaille*）的歌还在法兰西帝国崩溃前夕成为了舞厅里的热门曲目。

1868年，拿破仑三世取消了对公开集会的禁令，于是二十年来的不满像开香槟一样喷射而出。舞厅、酒吧和马戏团变成了成百上千人谈论政治

28. Michel, L., *Red Virgin: Memoirs of Louise Michel* (ed. Lowry, B., & Gunter, E. E.), Alabama: 1981, p. 83.

29. Michel, L., *Red Virgin: Memoirs of Louise Michel* (ed. Lowry, B., & Gunter, E. E.), Alabama: 1981, p. 52.

的地方。会议记录不再有了,但是勤奋的帝国警察仍然非常详细地记了900页的笔记。这些笔记向我们讲述了贱民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故事。

第一次集会在一个叫做沃克斯堂(Vaux-Hall)的地方举行。工人们没有在繁文缛节上浪费时间,而是直接开始针对当时第一国际内部的热点问题展开辩论。那次活动的名字叫做“女性的工作”,很多人都来看身为女权主义者的记者们和笃信蒲鲁东的男人们的唇枪舌战。这些男人们准备好用左翼的言论来反对女性的工作权。左翼的教师古斯塔夫·勒弗朗谢(Gustave Lefrançais)问道:

对于整日做针线活,给器皿抛光,做纸花做得手指流血的女工来说,能不能投票有什么意义?能不能支配那些本来不属于她们财产有什么意义?能不能和丈夫平等地出轨有什么意义?³⁰

事实上很有意义。会议结束的时候举行了投票,投票结果与第一国际的观点恰恰相反。大多数人认为,女性应该有工作的权利。

随后讨论的方向更加一发不可收拾。到10月6日的时候,人们辩论的话题已经足以让蒲鲁东主义者大吃一惊: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结合不需要任何法律的认可,唯一的条件就是双方互相喜欢。这种社会体系的胜利将会开启一场改变

30. 引自 Thomas, E., *The Women Incendiaries*, New York: 1966, p. 31.

社会的革命。³¹

每夜都有成千上万的工人来开会。在未来的两年，共有 933 场会议在 63 个不同的地方举办。会议的名字从“资本和利益”到“养兔子赚 300 法郎之道”（这个名字是用来糊弄那些坐在旁边的警察的）不一而足。资料显示，与会者大部分都是当地人并且经常来。想象一下，每天，你都去附近的舞厅，遇见你的朋友，给那些煽动性十足的演讲叫好；第二天晚上你还会来这儿，和同一批人喝酒跳舞。就是在这煤气灯光和廉价香水味混合的地方，图书装订工和机械工人信奉的蒲鲁东的温和无政府主义，被这些来自贫民窟的男人和女人们批得一文不值。

第一国际的活动家们积极地参与着公共集会运动，但是他们也面临诸多困难。在蒙马特不起眼的角落里，一种另类的社会主义思想生根发芽。这种另类社会主义思想来源于马克思的敌人之一——1848 年的另一位大胡子英雄奥古斯特·布朗基（Auguste Blanqui）。³² 布朗基喜欢恐怖和暴动，如果工人们无法解决问题，就用枪来帮他们解决。他坐牢坐了半辈子，现在流亡在外。但是他的信徒们因为瞧不起互助会、工会和第一国际，依然在后街扮演着罗宾汉的角色，深受贱民们的接纳甚至欢迎。泰奥菲勒·费雷（Theophile Ferré）是蒙马特地区布朗基主义者们的领袖，他和路易·米歇尔

31. Dalot, A., & Feiermuth, J.-C., “Socialism and Revolution,” in Rifkin, A., & Thomas, R., *Voices of the People: The Social Life of ‘La Sociale’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Empire*, London: 1988, p. 264.

32.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法语：Louis Auguste Blanqui；1805 年 2 月 1 日—1881 年 1 月 1 日）是一位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曾以领导人的身份参与过 1871 年在法国爆发的巴黎公社。布朗基也以其布朗基主义而闻名。巴黎公社议会主席。——译者注

有一段柏拉图式的恋情。他曾在一次公共集会上说,“我信仰共产主义,不惜把它强加给全世界。”³³

在这种氛围中,反对女性工作的观点最先被推翻。接下来被推翻的就是合作社。1868年的夏天,蒲鲁东的支持者们创办的一个合作社银行垮了,创办合作社的熟练工们不得不花时间和那些穷人打交道。因为对穷人来说,欠债就要还钱,商店永远都是商店,管它是不是合作社。

工会反对罢工的观点也遭到了挑战。虽然瓦尔兰因为支持罢工坐了牢,但是在他出狱没几个月,罢工就到处都是了。在1869年,就有棉花工人罢工,梳毛工人罢工,罗亚尔(Loire)地区的一个大型的矿工罢工。在罗亚尔的罢工中还有11名工人被击毙。连巴黎都受到了感染:百货商场里的售货员也出来罢工了。公共会议中的一个人说道:

到目前为止,罢工还没有取得什么好的成果,因为所有人都只顾自己的利益,没有大局观念。工人们应该联合起来,一起要求涨工资,否则他们就不工作了,然后你就会看到老板追着工人们,答应他们的要求。³⁴

现在政府开始镇压各种集会,逮捕最激进的发言者,并且开出罚款。但是转移了会议地点之后,人们又聚集了起来,各种关于起义的集会被冠以

33. Dalotel, A., & Feiermuth, J.-C., “Socialism and Revolution,” in Rifkin, A., & Thomas, R., *Voices of the People: The Social Life of ‘La Sociale’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Empire*, London: 1988, p. 260.

34. 同上, p. 281。

“法国裙衬的兴衰”这样低俗的名字。

对路易·米歇尔这样天生的反抗者来说，两年的公共集会运动就像梦一样美好。每次她和她的同行一起从集会走回来的时候，她们“会聊很多东西。另一些时候我们则一言不发，一想到可以一扫过去二十年的羞耻就激动得说不出话来。”³⁵

对瓦尔兰来说，公共集会暴露出了许多东西。在他坐牢期间，瓦尔兰和支持布朗基主义的狱友有过争论，现在，在舞厅黑暗的角落里，他再次听见布朗基主义的观点从贫穷的工人们口中喊出。在1869年的春天，他写道，“八个月的公开辩论揭示了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大多数积极参与改革运动的工人们都是共产主义者。”³⁶

拿破仑三世想要妥协，但是为时已晚。他释放了在罗亚尔罢工中被捕的矿工，为工人们设立了自愿参与的保险基金。但是工人们毫不领情。到1870年1月的时候，他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到目前为止虽然有罢工和零星的骚乱，但是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示威。

愚蠢的行为有时也会成为机遇。在一次小小的争执中，皇帝的外甥，一个出名的登徒子，对着一名叫做维克多·努瓦尔（Victor Noir）的激进记者的胸膛开了枪。第二天，十万人涌上巴黎街头参加葬礼。路易·米歇尔记得，“几乎所有参加葬礼的人都希望回家的时候他们已经重新成为共和国的

35. Michel, L., *Red Virgin: Memoirs of Louise Michel* (ed. Lowry, B., & Gunter, E. E.), Alabama: 1981, p. 54.

36. Varlin, E., *Pratique Militante & Ecrits d'un Ouvrier Communard* (ed. Lejune, P.), Paris: 2002, p. 66.

公民，或者干脆不回家了。”³⁷ 罗莎莉·博达斯（Rosalie Bordas），一个来自巴黎歌厅的年轻歌手，被众人拥到马车顶上高唱“贱民”。这首歌的歌词写的时候被当作自嘲的玩笑，而现在听起来像是开战的宣言。

在法兰西的旧城里
有一个种族叫铁人
他们燃烧的灵魂好似熔炉
他们铜色的皮肤在此锻铸
他们的孩子在干草堆出生
贫民窟是他们的宫殿
他们是贱民
我是他们中的一员³⁸

对瓦尔兰来说，这是个极具象征性的时刻。葬礼那天，布朗基主义支持者们想鼓动人们大闹巴黎，瓦尔兰花费了一天时间和他们争辩。他知道如果他不能对贱民的能量加以驯服和引导，一个危机就要发生。

一周以后，勒克鲁佐（Le Creusot）施耐德工厂（Schneider plant）的矿工和炼钢工人上街罢工。施耐德工厂是法兰西最大的工业场所，糟糕的是，它的老板是对皇帝俯首帖耳的议会主席。在公共集会上，“和罢工的工人团结一致”成为了会议的主旋律。瓦尔兰改造了第一国际的巴黎支部，并

37. Michel, L., “La Commune,” Paris: 1999, p. 29.

38. Bouvier, A., “La Canaille.” http://fr.wikisource.org/wiki/La_Canaille

且说服工会团结起来成为联盟。

拿破仑听说了各种罢工和维克多·努瓦尔葬礼的消息，又听一份警方报告说第一国际有 433,785 名法国成员之后吓坏了，他发起了一次全民公决，试图恢复自己统治的权力。在 1870 年 5 月 8 日，有 700 万人投票支持皇帝，另外 150 万人投票反对。皇帝获得支持主要是因为蒙马特和美丽城地区的法国农民们在投票中占多数，这些农民既不关心歌厅，也不关心合作社。第一国际当时实际上只有七万多名成员，大部分招募自罢工期间，但依旧再次遭到禁止。瓦尔兰则逃到了布鲁塞尔（Brussels）。

如果第二帝国的改革进行得快一点，尤金·瓦尔兰可能会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工会领袖，维多琳·布罗谢可能永远默默无闻，路易·米歇尔可能会教孩子们唱革命歌谣教一辈子。但是在 1870 年 7 月 19 日，拿破仑三世永远地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他对普鲁士（Prussia）宣战了。

“这些词语现在都是空话……”：

战争的起因是西班牙的王位继承问题，更深的原因则是对欧陆霸主地位的争夺。接下来的故事你们在历史书里都学过了：一封封电报、一位位将军、一场场战役和它们的日期、巴黎动物园死去的大象，乘坐热气球的惊险逃亡。整个过程仿佛一出五幕的悲剧，尽管前半部分看起来更像一个喜剧。

第一幕：法国军队行进到边境上，又被实力更强、指挥有方的敌人打了回来；第二幕：拿破仑三世带领第二批法国军队（十万人构成的没有受过训练的军队）的前去救援；第三幕：普鲁士军队捣毁了这项计策，战败的皇帝投降，成为了阶下囚。

48个小时之后，巴黎的警察站成一排，试图阻挡涌来的人群，维多琳·布罗谢是人群中的一员。人们反复喊道，“我们要的不是皇帝退位，而是建立共和。”一个骑兵军官骑马带头领着他的军团，对着人群挥舞着出鞘的军刀，“法兰西万岁！共和国万岁！”

第四幕：共和国的新领导人说“战争必须继续”，人民同意了。第一国际向德国人发去请求：“发动这场战争的人对死亡一无所知，他现在已是你们的阶下囚。对我们来说他并不存在。法兰西共和国请求你们以正义之名撤军。”³⁹德国皇帝拒绝了，对于很多法国工人来说，尽管他们一开始反对战争，但现在为了保卫他们新的政治自由，他们必须要打这场仗。

国民自卫军⁴⁰在匆忙中重新建立起来，工人们成群结队地报名加入。路易·米歇尔和维多琳·布罗谢都登记了。瓦尔兰在流亡归来之后也加入了进来。但是他们用的枪都已生锈，将军也指挥的力不从心。普鲁士军队围困了巴黎一百天，当年在1867年的万国博览会上展出过的巨大的克虏伯加农炮现在派上了用场，把巴黎的市郊夷为了平地。人们忍饥挨饿。

1871年1月27日两国签署了休战协定，法国割让了一块领土，并允许普鲁士在巴黎进行一次胜利游行。在游行之后，普鲁士军队撤回了郊区。

第五幕：法兰西共和国的领袖准备召开选举。新选出来的人在凡尔赛宫（Versailles）见面。当食物开始到达巴黎的时候，维多琳·布罗谢注意

39. Brocher, V., *Souvenirs d'une morte vivante*, Paris: 1976, p. 102.

40. 国民自卫军指的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各城市效仿巴黎的国民自卫军组建的民兵组织。这是一支区别于正规军的独立军事力量。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它响应国防政府抵御普鲁士人以保卫巴黎的呼吁，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871年3月至5月的巴黎公社起义中，国民自卫军成员在巴黎已扩大到包括所有身体健全可携带武器的公民。公社被法国军队击败后，自卫军于1872年3月14日被镇压并解散。——译者注

到身为私生子的孩子们只能得到正常配额一半的食物。这个有工作的女性悄悄说道：“可怜的小坏蛋们，他们从来没有要求过要被生出来呀。我们生活的还是共和国吗？”

国民自卫军众军团成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来确保工人们的地位不会被边缘化。瓦尔兰说服了第一国际同意让他加入。中央委员会在巴士底狱举行了示威，呼吁左翼的自卫军成员在扣眼里别上红色的丝带。布罗谢的指挥官命令她别上蓝丝带，她大发脾气。

我离开了军团，我也永远不会再回去……我一个人去了巴士底狱示威，那里有很多人，不是共和国宣称的罪犯或者贱民。大家都异常激动。每个人都相信，如果足够幸运的话，我们离拯救法国只差一点点距离。⁴¹

日子一天天过去。布罗谢惊恐而无助地目睹她的孩子病死。她和其他巴黎人一样在炮火连天的恐惧中过活。

上帝！祖国！共和！这些鼓舞人心的宏大词语如今再也不能在我的内心激起一丝波澜了。这些词语现在都是空话，只能徒增苦难，毁灭人类。我需要一个新的理想。⁴²

41. Brocher, V., *Souvenirs d'une morte vivante*, Paris: 1976, p. 146.

42. Brocher, V., *Souvenirs d'une morte vivante*, Paris: 1976, p. 151.

新的政府迫不及待地想把生活拨回正轨。新政府下令所有在战争中累积的债务都要在 48 小时内偿还,并且派遣政府军前往巴黎运走城里的大炮。所需的费用都来自于人们的捐款。人们怕普鲁士人要把大炮搬走,还给工人区人工运了 400 支枪来保管大炮。1871 年 3 月 18 日,正规军在凌晨 4 点的浓雾中集结。这看起来像是一出剧的谢幕,但是故事还远没有结束。

“绚烂的黎明”:

一个精瘦,深发色的女人尖叫着跑过了连接着蒙马特和下方大路的鹅卵石街道。她是路易·米歇尔,她夹克下藏着一支步枪,大喊着“卖国”。她刚刚目睹了政府军拿走了摆放在蒙马特大炮公园的枪。小巷中敲起了鼓,很快米歇尔回来了,一起回来的还有她的男朋友费雷和一帮武装起来的平民。

蒙马特站起来反抗了……黎明刚刚到来,你能听见警钟的声响。我们知道山顶上有一支军队正在集结,准备作战,便如离弦之箭一样向山上冲去,准备好了为自由战死。那种感觉就像是我们从尘世中升起……在某个时刻,一群群的人看起来就像是人海中泛起的波浪。山丘沐浴在一片白光之中,那是绚烂的黎明。⁴³

政府或许正在摆开阵势,但他们并没有进入战斗状态。天一直在下雨,军官们忘记带马过来搬运大炮,所以所有人只能像傻瓜一样原地待命几个

43. Michel, L., “La Commune,” Paris: 1999, pp. 139–140.

小时。现在，一群妇女又给他们造成了挑战。米歇尔回忆说，“当女人们冲上去面对炮火的时候，士兵们却一动不动地站着。”⁴⁴ 指挥政府军的将军勒康特（Lecomte）下令对着人群开火，但是无济于事。相反，正规军开始解散，和人群混在了一起，勒康特被他们抓了起来。

在两英里以东的巴蒂尼奥勒（Batignolles）的工人居住区，瓦尔兰在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中央委员会一直开会到凌晨3点30分，瓦尔兰精疲力竭，然而现在墙上贴着很多标语说中央委员会不合法。起初，中央委员会的军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兵营，但瓦尔兰最终还是把他们赶到了街道上。当地市长报告说，“我看到了一个团的士兵，大概有三百人，就像接受检阅似的有条不紊地前进。领着他们的是瓦尔兰。”⁴⁵

在早上8点30分，巴黎上空响起了炮火声。一个南方的国民自卫军指挥官在发射空包弹，想要号召工人行动起来。这个人就是杜法尔（Duval），他是一个钢铁工人，曾经因为加入第一国际而坐牢。据一份情报称，“该地区完全控制在杜法尔将军的手里，他特立独行，还准备招募当地的流浪儿，给他们发铁锹让他们去挖战壕。”⁴⁶

士兵们不分敌我地亲密地联合在一起，政府军被迫撤出巴黎。只有中央委员会可以作为民间力量来取代政府军，但是他们没有控制权；贱民们现在掌握权力。一伙暴民包围了勒康特将军被关押的房子，把他拖出来枪杀了。同时被处决的还有一名共和国老将军，他曾在1848年屠杀了很多工

44. Varlin, E., *Practique Militante & Ecrits d'un Ouvrier Communard* (ed. Lejune, P.), Paris: 2002, p. 153.

45. 同上, p. 154.

46. 引自 Jellinek, 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London: 1937, p. 111.

人，他出门想看看发生了什么，随即遭遇不幸。

维多琳·布罗谢冲出门外，及时赶到了市政厅，目睹了政府军携带着钱款和巴黎当局的各种档案渐行渐远。在街垒上，国民自卫军的成员在摆着造型拍照；在工人居住区，人们纵情畅饮。布罗谢回忆道：“我们相信一个新时代终于到来了…每个人都沉浸在一种节日的氛围。他们说暴徒是残忍下流的，我个人认为这非常愚蠢：弱肉强食是规律，而这一次，弱小的一方太傻了，太愚蠢了。”⁴⁷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国民自卫军的中央委员会成为了巴黎仅剩的管理者。

“这就是黎明…”：

在意识到自己手握政治权力之后，中央委员会决定选举成立一个“公社”——一个投票选举产生的市议会。过去80年，这样的机构一直不被允许在巴黎成立。一周之后，起来反抗的那二十三万人民前往投票站，选举产生新的巴黎公社。在选出的92个成员中，有24名工人，其中17名曾是第一国际的成员。几天之后，政府军进攻巴黎，开始了第二次围困，整个四月份，巴黎城外都会时不时地打仗。在五月初，政府军取得了突破；两周以后，在与一直驻扎城外的普鲁士人的默契配合下，政府军进入了巴黎。在一周血腥的街巷战之后，政府军和国民自卫军都互相扣押了人质，其中有些遭到枪杀。公社的最后一次反抗发生在美丽城的一个街垒，那是5月28日，一个下着雨的周日午后。

47. Brocher, V., *Souvenirs d'une morte vivante*, Paris: 1976, p. 157.

对历史学家来说,研究巴黎公社的政治运作很容易,因为巴黎公社留下了准确的会议记录,并且把他们的公告贴满了巴黎的大街小巷。当幸存者日复一日地被各种人的各种事吸引,试图搞明白是哪里出了问题;老革命领袖们则对着长篇大论的著作分析抚须深思。他们要解开的谜题是:为什么巴黎公社对社会主义高谈阔论,却几乎没有什么成功的社会改革?为什么是中产阶级的激进分子提出了最极端的措施,而不是工人?为什么第一国际的成员最后会不同意对公社内部“叛徒”的镇压?尤金·瓦尔兰是这场辩论的中心人物。他是自3月18日中央委员会夺权以来最有名的人,是在公社内部领导大家反抗威权化趋势的人,也是公社最后两天的军事部长。

若想知道巴黎公社是哪里出了问题,就要在社会学中寻找答案。尽管自学成才的熟练工人和巴黎的穷苦工人互相认识,生活圈重叠,但他们的利益却各不相同。那些受人尊敬的工人阶级,参加过万国博览会,现在在巴黎公社的工人代表中占据三分之二多数,但是公社整体上有三分之二的人倾向于激进共和主义和布朗基主义。大部分留在巴黎继续战斗的中产阶级技术专家都是浪漫派的革命分子,决心通过法条和报纸文章来解放全人类。他们的策略和修辞与贱民的街头政治融合的很好,尽管后者的政治文化多在舞厅中形成,而前者是在工会。

所以,双方的激进分子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符合己方正义理念的工作上:游击队员去堡垒上作战,演讲者则在公社内演讲;第一国际内的改革者掌管委员会运作。但是,尽管巴黎公社在战争上花了2200万法郎,它花在社会改革上的钱只有26万7千法郎。

对于巴黎公社的敌人来说,公社在政治上取得成就已经足够骇人听闻了。它废除了道德警察;废除了常备军和征兵制;强制每个人参加国民兵和政府官员选举;规定选举出来的公社成员的工资和熟练工人的工资一样

高；规定政教分离，在公立学校中禁止做祷告以及雇佣神职人员。

与此相比，经济改革可以说是微不足道。公社从未动用过法国银行里的钱；没有工厂被收归国有，除了那些已经被工厂主抛弃了的。公社抹除了人们在巴黎受困期间欠下的房租，并且宣布所有债务可以延期两年偿还。为了给新的生意让路，公社还关了各种当铺，并且强制要求当铺主归还所有低于 20 法郎的东西。面包店的夜班也被公社禁止了。

时间不足，财力不足，没有重心——这些都是公社的社会改革拖了它政治改革后腿的原因。但是这只是故事的一半。

夺取权力和摆脱束缚是两回事。在看到自己老板们的权力丧失殆尽之后，巴黎的工人们并没有想着自己要去夺取政治权力，相反，他们只想控制自己的命运，不论是在家中，在感情上，在工作上，还是在街垒上。社会革命确实发生了，但是它自下而上地发生在人们的生命里。

“我不会鼓吹国际革命”：

瓦尔兰在自己的老本行——严肃的政府工作中得到了解脱。在第一周，他试着去降低期望。当第一国际的瑞士支部提议把革命的火种传播到山区时，瓦尔兰打消了他们的想法：

[瓦尔兰说] 新闻报道让他们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他不会鼓吹国际革命；3 月 18 日的那场运动唯一的目的是在巴黎进行市政选举，并且这个目标现在已经达到了；选举次日就会进行，在议会选出来之后，中央委员会就辞职，这个阶段即将暂告段

落。⁴⁸

他在巴黎公社的第一个工作是管理财政委员会。他在法国银行那里担保了一个信用额度，并负责给三十五万人提供食物。他的一天是这样的：早上步行上班，在午饭之前决定给铁路公司多征几项税，然后去一个便宜的饭馆吃饭，下午的时候否决国民自卫军长官要求更换新制服的提议。在傍晚，他会和同志们一起在“汤锅”吃饭。当战争开始时，他没有选择冲到前线，或者身着全身军装照相留念，他仍然继续着他官方的日常工作。除非你了解与此同时在民间都发生了些什么，你将无法理解他平时的工作。

全巴黎的工人都在提出自下而上改革社会的方案：石匠们建立了一个意外保险系统；蜡烛匠和屠夫在全城范围内组成了合作社。工会列出了各种绝妙的点子：禁止在工作时罚款，八小时工作制，国有工厂加薪……这些想法都由第一国际管理的公社劳动委员会负责稳步执行。

在公社的教育改革中，把神职人员从公立学校中清除只是一个开始。正如路易·米歇尔经常认为的，法兰西帝国统治下的小学教育就是“垃圾”。现在，当地的激进分子想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改革课堂内容，其内容应该“仅限于教授那些已知的和已被证明的事实，而不是那些未经人类理性考验的事物。”⁴⁹

瓦尔兰相信公社的职责不是实现社会主义，而是允许各种社会实验。他相信随着科技进步和工人阶级的自我教育，社会主义必将到来。但那是未

48. Guillaume, J., *L'Internationale*, Vol. 2 pp. 133–4. 引自 Cordillot, M., *Eugène Varlin: Chronique d'un espoir assassiné*, Paris: 1991, p. 220.

49. Jellinek, 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London: 1937, p. 406.

来。目前，他知道贱民的力量，也知道在一个支持共和的独裁者的煽动下贱民们会做出什么。他深知公社应该成为底层社会改革推动者，并且会不惜一切去保护这些改革不受威胁。

在四月底的时候，第一次有一名职业士兵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的总司令，巴黎安全委员会成立，来镇压那些支持政府的“叛徒”。当时布朗基已经成为政府军的俘虏，但是政府军成立本身就是遵循了布朗基主义的原则。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雅各宾专政就是先例。⁵⁰有些人支持布朗基主义；有些人则认为它会像在专政时期那样让革命与其精神背道而驰，瓦尔兰站在反对它的一边。他说，为什么要建立独裁政府？革命的全部目的难道不是让工人们的生活更加多元和自由吗？

只有在政府军攻破巴黎之后，瓦尔兰才放弃了维持公社民主的政治斗争，投笔从戎。作为国民自卫军第六军团的指挥，瓦尔兰组织了巴黎左岸的抵抗，退到了河对岸的美丽城那里。在布朗基主义的支持者团体分崩离析之后的最后几天，瓦尔兰被任命为公社的最后一任军事部长。

5月26日，星期五，瓦尔兰正在巴黎东郊哈克索街（rue Haxo）的街角履行自己指挥官的职责，就在这时，一伙暴徒向一列支持法国政府的人质发动袭击，杀死了47人。受害人中有神职人员、将军和警方的卧底。瓦尔兰穿着平民的衣服就跑到了街上，爬上墙高喊，呼吁大家冷静。他和另外四个公社成员一起恳求那伙人放过这些人质。一个目击者称：“那些公社成员用身躯站成了一道墙，挡在那群暴徒前面。那些暴徒们大声叫骂……有

50. 雅各宾专政，即恐怖统治（法语：la Terreur，1793年9月5日—1794年7月28日）时期，是法国大革命一段充满暴力的时期，两个对立的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政治派系之间煽动冲突后形成的。——译者注

一个人甚至哭了！他们叫公社社员们滚开。”⁵¹

另一个目击者回忆道：“然后瓦尔兰回到了指挥岗，他沮丧、严肃、万念俱灰，但是表情冷峻。他知道他关于正义和博爱的美梦已经死了。”⁵²

在公社的最后一天，只剩三条街还在负隅顽抗，瓦尔兰领导了最后一次反击：

瓦尔兰、费雷和坎邦领导了一只五十个人的小型队伍冲到了大道上。他们的腰上围着红围巾，后膛步枪斜挎在肩上。队伍前面，一个身材伟岸的加里波第信徒扛着一面巨大的红旗。⁵³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公共集会”：

对维多琳·布罗谢来说，公社在战斗中带来了解放。她和她的丈夫帮助建立了一支部队，士兵们都是从南非招来的复员军人。他们搬进了一个旧军营的军官宿舍，用一面红旗把那里的雕像都盖了起来。“我们的部队没有组织、没有统一服装、没有装备、没有枪。我们身边的是阿尔及利亚人组成的轻步兵、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我的助手是黑人，他是个非常善

51. Valles, J., *L'Insurge*, Paris: 1970, p. 286.

52. Foulon, M., *Eugène Varlin: Relieur et Membre de la Commune*, Clermont-Ferrand: 1934, p. 237. 来自与另一名巴黎公社成员卡梅利纳（Camelinat）的访谈，卡梅利纳当时也试图阻止人质被杀。

53. Lissagary, *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London: 1976, p. 302.

良的男孩。”⁵⁴ 在一开始他们生活优渥，食物充足，布罗谢甚至能给军官住宿处的穷人们开办一间流动厨房施舍粥饭。但是政府军在4月3日的进攻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受到了自己法国同胞的袭击，还因为他们听说杜瓦尔将军和他的部下被俘虏之后，在一堵墙前排成一排然后被枪杀。

布罗谢参加了四月份期间零星发生的几场战斗，在四月的最后，部队在战略要地伊西（Issy）那里打了一大仗，损失惨重。她在照顾伤员的时候回忆道：

不论如何，受伤的士兵们从没有一句怨言。他们虽然受着苦，但是他们很高兴能重新把要塞夺回来；很高兴能把他们的生命奉献给让社会变得更公正、更美好的事业。对我们来说，“共和国”是个有魔力的词语，通过建立共和国我们能成就伟大的事，造福全人类。⁵⁵

我们不清楚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会怎么看维多琳·布罗谢。对布罗谢来说，蒲鲁东所说的“男人拥有行动的力量，女人则是人们迷恋的对象”如同天书。

当战斗从防御工事处转移到大街小巷的时候，布罗谢和她所在部队失联了。当时还活着的大部分活动分子都去了市政厅，她和十二名同伴也去

54. Brocher, V., *Souvenirs d'une morte vivante*, Paris: 1976, p. 159.

55. 同上, p. 178。

了那里，准备和敌人决一死战。她遇见了路易·米歇尔，米歇尔非常想招募她去一个全女性的医疗部队，但是她拒绝了。“我不认识她，我更不知道妇女运动是什么东西。我从来没有去过公众集会……”⁵⁶

布罗谢的小组在射杀人质的第二天赶去了瓦尔兰的指挥岗所在的哈克索街街垒。在那时，政府军已经开始处决任何穿着国民自卫军制服的人。因此，布罗谢换上了平民的衣服，剪掉了头发，她的婚戒、她的盒式项链——里面藏有她死去孩子头发，都送给了别人。她已经决心和她部队里剩下的那些人一起战死。子弹打完了，“我们站在一起，旗帜飘扬，准备进行最后一战。和我们在一起的有来自各个部队的走散的、流浪过来的人们，还有公社成员，这些人我一个都没有见过。”⁵⁷

“仿佛连子宫都被剖开”：

对路易·米歇尔来说，在现实世界中，解放没有尽头；不论是打仗，阶级斗争，还是妇女运动都不能满足她富有创造力的能量。这种能量充满了她的想象。如果瓦尔兰代表熟练工人们的公社，布罗谢代表在街垒上作战的共和国战士，路易·米歇尔则代表着贱民们的革命精神，不时地会走向极端。

在被围困期间，她曾组织蒙马特的妇女警戒委员会（Women's Vigilance Committee），恐吓那些牟取暴利的人，并以“革命征用”的名义劫富济贫。现在她组织着一个医疗团队，但也时不时以战士的身份参与作战。“我们

56. 同上，p. 190。

57. 同上，p. 206。

目前的这个项目致力于教育平等，交易公平，这样卖身才不会成为妇女们唯一能赚到钱的途径。”⁵⁸

她在公社的日子里每天晚上都去圣伯纳德教堂（Saint-Bernard de la Chappelle），但是她并不是去祈祷的。这个教堂和其他很多教堂一样，已经成为了一个工人們的辩论俱乐部。米歇尔所在的俱乐部叫做“革命俱乐部”。这些俱乐部每天晚上都举行集会，尽管他们在公社内部并无实权，但这是进行本地控制的一个途径。俱乐部内热衷投票。在5月18日，革命俱乐部投票同意：

限制地方执法官的权力，废除法律规范，用司法委员会取而代之。限制宗教，立即逮捕神职人员……每隔24小时就处决一名重要人质，直到身为公社委员的公民布朗基被释放为止……⁵⁹

这里是贱民们发声的地方，路易·米歇尔则是努力将这些愿望变成现实的诸多女性中最重要的一个。公社为这些贫穷的女人们解开了生命的枷锁，它也无法再控制她们了，对她们来说，“名誉，品德和忠贞这些词都是空洞的”。没错，惊恐万分的法国政府曾经以莫须有的罪名对工人阶级女性进行政治迫害，指责后者在巴黎公社统治的最后几天用汽油在巴黎城内纵火；但是同样没错的是，在暴力革命最激进的支持者中，也有女性的身影。

哈克索街的屠杀是一名女性医疗人员提议的，但是最后只追究了男性

58. Michel, L., *Red Virgin: Memoirs of Louise Michel* (ed. Lowry, B., & Gunter, E. E.), Alabama: 1981, p. 59.

59. Michel, L. 同上, p. 83.

的责任。那名医疗人员在随后的访谈中说：

她一点也不关心社会斗争……但她的妹妹是一个神父的情妇，她怀孕了之后，那个神父抛弃了她，并偷走了他们的积蓄。“这就是为什么我从窗户爬出来要见一见那些神职人员；这就是为什么我拽掉了一个和尚的胡子，因为他长得很像勾引了赛琳（Celine）的那个男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大喊去死；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双手沾满鲜血。”⁶⁰

贫民窟的女性成为了暴力革命的忠实支持者，米歇尔很高兴。

我们的男性友人们比我们女性更容易心软。一个看起来柔弱的女性比任何男人更懂得如何去说“必须这样做”。她可能感觉到撕心裂肺，仿佛连子宫都被剖开，但是她仍然坚定不移。她能够不带怨恨，不带愤怒，对人对己都没有怜悯，她都能说“必须这样做”，不管她的心有没有在滴血。这就是公社的女人们。

对米歇尔来说，公社最后几天的日子充满着灾难降临的预兆。她所在的部队撤回到了蒙马特的墓地，不断地遭到炮火轰击。

当我出去侦查的时候，我很享受炮火轰击为我带来的孤独感。

60. Vallès, J., *L'Insurge*, Paris: 1970, p. 288.

一个炮弹落在树林中，弄得我身上到处都是开满鲜花的树枝，我就把这些树枝分别摆在了两座坟墓前……公社已经从四面八方被包围，很快就要覆灭。它唯一能做的就是勇敢面对，它的确这么做了。在濒死的时刻，它打开了通向未来的大门。那是它的宿命。⁶¹

“像守护宝藏一样守护它……”：

那些身为熟练工的工会成员，那些从来没有去过公众集会的街垒战士，和那些来自后街的神秘女权主义者，这些是构成巴黎公社的原型。在最后一周，武装起来作战的有 15,000 人，支持者更是数以万计。妇女联盟在最后一次集会后全体上街作战，领头的是一个女图书装订工，她之前曾在“汤锅”当厨师。在巴蒂尼奥勒区的街垒，120 名拿着步枪的女性坚持战斗，直到全军覆没。

或许是工人在大城市掌权令政府受到了惊吓。工人们在保卫巴黎的过程中战死三千人，但是在政府军重新控制了巴黎之后，遭到屠杀的人数达到三万，许多人被埋在万人冢里。在随后的审判中，又有几千人被判劳役或者被流放到太平洋上关押犯人的殖民地。

路易·米歇尔在 5 月 24 日投降了，因为政府拿她母亲作为人质相要挟。她被关进了集中营，在那里每天下午都有犯人被随意地枪杀。在法庭上，她

61. Michel, L., *Red Virgin: Memoirs of Louise Michel* (ed. Lowry, B., & Gunter, E. E.), Alabama: 1981, p. 68.

承认了为巴黎公社作战的罪名，“因为说到底公社想进行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是我最大的心愿。”当法官想让她住嘴时，她大喊道：“如果你不是胆小鬼的话，就杀了我吧……”她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New Caledonia），直到1880年的一次赦免之后才回到了巴黎。在一次无政府主义示威游行之后，她在1883年又被判了三年，后来她移民去了伦敦，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支持者，她在劳工运动中形单影只。1905年，她与世长辞。

维多琳·布罗谢在停火之后离开了哈克索街的街垒，和同志们一起藏在一所附近的房子里。政府军枪决了一直在拖延时间的房主，布罗谢趁机从后窗逃了出来，随身带着她所在的军团的旗帜。她的同志们对她说，“像守护宝藏一样守护它。如果未来再有一场革命，它将有可能再次飘扬在那些为保卫人权而战死的烈士们的头顶上空。”⁶²

她跌跌撞撞地走过血流成河、横尸满地的巴黎街道，她的短发让她看起来像个小女孩。在她走回自己住的地方附近时，惊恐万分的商店主就像看一具尸体一样看着她。她被以扔汽油弹的罪名判处死刑，后被确认已经死亡，但其实敌人杀错了人。她隐姓埋名在巴黎生活了几个月，一年后用伪造证件逃去了瑞士。她也成为了一名流亡在布里克斯顿（Brixton）和洛桑（Lausanne）的无政府主义者。她在1922年去世，死前写了一本书叫做《一个行尸走肉者的回忆录》（*Memoirs of a Living Corpse*）。

尤金·瓦尔兰离开了最后一个街垒，忧郁地坐下来等待逮捕。他被指认之后移交给了政府军。

62. Brocher, V., *Souvenirs d'une morte vivante*, Paris: 1976, p. 210.

瓦尔兰的双手被绑在背后，被拖行在蒙马特的街道上，接受着拳打脚踢和侮辱，整整一个小时。他那满是博爱、年轻智慧的头脑，被军刀划开，很快就血肉模糊，眼球从眼眶中掉了出来。等到了蔷薇街的时候（rue des Rosiers），他已经站不起来了，完全是被拖着的。他们把他放下，对他开枪。那些恶棍用他们的枪托打他，肢解了他的尸体。⁶³

革命的年代结束了，之前工业博览会时期的那些日常营生很快就会重新开张。

63.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London: 1976, p. 309.

每一个值得拯救的族群

美国工人如何创造了五一国际劳动节

译=彭欣

我不想声称自己有任何预见未来的能力，但在我的面前，我能看到一个将会覆盖全球的组织。它将包容每一个工种、教派、肤色的男人和女人；它将覆盖任何一个值得拯救的族群。

——尤利亚·斯蒂芬斯 (Uriah Stephens),

劳动骑士团创始人¹

1. 引自 Foner, P. S., op. cit., Vol. 1, p. 437.

2006年，伊拉克巴士拉

巴士拉（Basra）²不是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理想之地，但他们还是决定试一试。100多个工会成员在红色标语后游行，一些标语上有锤子和镰刀。在伊拉克当一名工会主义者一直都很冒险。在复兴党（Ba'ath）³的政权下，有一个雇满了萨达姆·侯赛因⁴亲信的亲政府工会。1987年，这个工会宣布“阶级结构”已经在伊拉克消失；石油工人已经不再是工人而是公务员，并且不再需要加入工会。之后，萨达姆颁布了150号法令，禁止国营部门成立工会。

“从150号法令颁布以来出现了将近三代人，而他们在这么长时间内完全没有任何关于劳工组织的实际经验，”哈山·祖马（Hassan Juma）说。他是南部石油公司工会（Southern Oil Company Union）的秘书长，在萨

2. 巴士拉，为伊拉克巴士拉省省会，伊拉克第一大港及第二大城。——译者注

3. 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伊拉克地区是伊拉克的一个政党。其前身是复兴党在伊拉克的分支机构，由福阿德·里卡比于1951年组建。1963年，复兴社会党曾在伊拉克短暂夺取政权。1966年，复兴党分裂为伊拉克复兴社会党和叙利亚复兴社会党两个互相敌对的党派。1968年，伊拉克复兴社会党重新夺取政权。1979年，萨达姆上台之后，实行独裁统治，直到萨达姆政权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被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推翻为止。此后，伊拉克复兴社会党被列为非法政党。2006年12月，萨达姆被处决之后，伊扎特·易卜拉欣·杜里继任伊拉克复兴社会党书记，成为该党的领导人。——译者注

4. 伊拉克前政治人物、独裁者，从1979年至2003年任伊拉克总统、伊拉克总理、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总书记、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与最高军事将领等职。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萨达姆的复兴党政权被美国推翻，其本人也在逃亡半年后被美军抓获，后于2006年12月被执行死刑。——译者注

达姆倒台 11 天后他成立了这个组织。

一开始南部石油公司有 20 个工会积极份子，我们全都深受前一个政权的迫害。当美国士兵到达的时候，管理层不相信有在石油行业中恢复劳工工会的需要，但在伴随着占领军进驻的一片混乱中，这一需求确实存在。

工人们巡逻各种设施以防止趁乱打劫，并且搜寻多余的零件以维持正常运转。他们的下一个问题是工资：美国承包商带来了廉价的亚洲工人，让他们维修油井和管道，并且为伊拉克工人引进了一套工资表格。根据这套表格，一名拥有 3 年工作经验的技术人员的起薪只有每月 18 英镑。在美军占领的早期，抗议示威是刑事犯罪。

……然而我们有不少人对抗凯洛格·布朗 & 鲁特和哈利伯顿 (Kellogg Brown & Root and Halliburton)⁵，而且当我们试图在南部精炼厂组织工会时发生了冲突。但是因为他们需要精炼厂为军队生产燃料，我们赢得了这场让现有工资标准得以保留的战斗。

三年过去了，在巴士拉附近的油田，工会已经有了上千名会员，并且隶属于一个更广泛的联合会——石油员工总工会 (General Union of Oil Em-

5. 哈利伯顿集团始创于 1919 年，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能源公司之一。——译者注

ployees)。但祖马面临的难题在成倍增加。加上令他无比愤恨的占领，这个国家已经被叛乱和宗教宗派主义分裂得肢离破碎。祖马抱怨道，“宗教战争是美国在伊拉克社会中宣传并扶持的。在美国人到来之前，我们并没有卷入到谁是逊尼派、谁是什叶派的纷争中。”但是石油员工总工会，正如所有伊拉克的工会联盟一样，声称自己的立场超越了宗教冲突。

在工会中有世俗主义者、伊斯兰教徒和从属于不同团体的人，但他们都是为了劳工的利益而非政治平台工作。我们需要把宗教问题从我们的劳工工作中抽离出来：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工会开始自相残杀，因为我们的成员有什叶派、逊尼派和基督徒。

关于叛乱，石油工人的工会划了一条并不为占领军认可的界线。它反对伊斯兰主义者，但支持所谓的“神圣抵抗”：“这是伊拉克社会的一部分，而且得到了工人的大量支持，”祖马说，“但在这当中杀害无辜伊拉克人的恐怖份子工人们坚决反对的。”

石油工人们必须重新学习工会主义，与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工会建立联系。只有年纪在五十岁以上的工人还记得萨达姆的政变摧毁自由工会组织前的时光。

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工作重点放在了年轻工人的身上。我们试图向他们讲解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的原则。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历史上曾经有一批英雄，他们在英国的统治下挺身反抗英国石油公司，虽然他们的名字已经被人遗忘。但我们没有相关的资源，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去阅读并了解劳工运动的材料，因为

从六十年代后期开始，在萨达姆的统治下，这些材料都变得十分歪曲。

这让2006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更加值得铭记。当社会处于宗教内战的边缘，大部分政治团体都与某种形式的种族或宗教势力结盟的情况下，伊拉克工会是少数准备主张建立世俗和统一国家的势力之一。在占领期间，工会领导人为这一立场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在游行三天前，医护人员工会的领导人侯赛因·萨比特·阿里（Hussein Thabet Ali）的尸体被发现，上面布满了子弹，并且带有遭受过电击和机械钻折磨的证据。他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在占领造成的权力真空中，工会领袖发现他们正在遭受想要算旧账的宗教狂热人士和前复兴党人双方的攻击。

但是在2006年的5月1日，伊拉克的工会组织要纪念的不止是他们自己的，还有美国的烈士。“今天，”在巴士拉示威集会派发的宣传单张上写道，“百万民众为了自由和平等站在一起……这是我们团结起来去纪念芝加哥工人的一天，一个世纪前，他们为了对抗资本主义献出了他们的生命。”⁶ 这是一个被许多在五月一日示威的人遗忘，但被巴士拉的石油工人所牢记的事实——五一劳动节是1886年在美国创立的。在那时，美国也是一个遭受内战创伤的国家，它的劳动人民也被肤色、工种和教派分裂。但在第一个五一劳动节的准备阶段，工人们发起了一个庞大的全民运动，致力于弥合分裂。在那些年头，如今的占领士兵称之为家的美国小城镇正是阶级战争的战场。在这场斗争中，无辜的人们即将死去……

6. Federation of Workers Councils and Unions in Iraq leaflet, 26 April 2006.

1869年，美国费城

像许多美国工会一样，费城裁缝工会成立了，又消失了。它的罢工失败了，成员也在减少。在1869年12月9日晚之前，它七年的工作成果只有九名活跃成员，而摆在他们面前的决议只有解散工会。这对于美国劳工运动来说并不新鲜。美国工人们在1786年便组织了他们第一次罢工，在1792年就成立了第一个工会。在1861年南北战争开始前，组织起来的劳工已经进行了超过半个世纪的罢工、杯葛、联合行动、组织工会、甚至是组建政党。而它们所拥有的共同点便是从来无法持续。

在南北战争前，美国资本主义也曾有过短暂而狂热的感觉：工业家和铁路工人在商业上和政治上都被南方的奴隶主限制住了。像裁缝工会这样的潮涨潮退只不过反映了经济的起起落落而已。

但现在奴隶制已经废除，南方战败，美国的雇主正明显地站在一个新时代的起点。这是美国从一个分裂的、乡村的前殖民地向世界第一大工业力量转型的30年的开始。那天晚上聚集起来解散工会的费城裁缝之一，尤利亚·斯蒂芬斯（Uriah Stephens），感觉到工人们相应地提高筹码的时机到了。斯蒂芬斯是一名浸礼会的传道者，对于他来说，工会的领域太狭小，罢工太徒劳。他把6个裁缝叫到一边并告诉他们，“我决定努力去实行一些不一样的东西。”⁷

他成立了劳动骑士团神圣崇高会（Noble and Holy Order of the Knights

7. Foner, P. S., op. cit., Vol. 1, p. 433.

of Labor)。他称自己为工师 (Master Workman) 并给他的六位忠诚的追随者派发了职位, 名称如德圣 (Venerable Sage)、尊领 (Worthy Foreman) 和无名骑士 (Unknown Knight)。他参考共济会 (Freemasons)⁸ 的模式草拟了一个复杂繁琐的启动仪式; 骑士们宣誓完全保密并互相帮助, 还学习了守则规范以及特殊的握手方式。

这是一种比普通工会更优的东西: 它将是一个致力于消除工薪奴隶制 (wage slavery) 和创造“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和谐”的组织。如果今天这些目标看来自相矛盾, 对斯蒂芬斯来说工薪奴隶制其实是垄断——土地掠夺者和华尔街的金融炼金术师——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过错。它的目标是通过合作而非阶级斗争来改变社会: 抵抗抬高物价的店主的消费者合作社, 经营工作场所的生产者合作社, 以及没有老板和中间人的农场。当需要直接的行动时, 杯葛比罢工更受青睐。而且更重要的是, 技术精英主义那足以致残的效果被抛在了身后: 这个组织对“每一个值得拯救的族群”开放。

然而, 保密是这一计划的核心。斯蒂芬斯见过太多因参加工人运动而被停工、解雇、列入黑名单的人们, 以至于他不再相信工人运动可以在没有保密的情况下存活。在最初成立的 10 年内, 在这个团体以外都没有人听到过它的名字; 印刷品中的 5 个星号便是它的标记, 所以它的代号是“五星” (Five Stars)。工人历史上的一个星号, 意味着如果美国不曾改变的话将是什么样子。但奴隶制结束时释放出的那股力量、垄断组织的崛起加上非技术性工作的增加即将令经济形势反转。到了 1886 年, 劳动骑士团已拥

8. 共济会, 是一种带宗教色彩的兄弟会组织, 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庞大的秘密组织, 他们自称宣扬博爱和慈善思想, 以及美德精神, 追求人类生存意义。世界上众多著名人士和政治家都是共济会成员。——译者注

有 70 万名成员，是全世界最大的工人组织。

战士是怎样炼成的：

在发现劳动骑士团之前，马丁·艾恩斯（Martin Irons）已经战斗、组织、迷茫、失败了将近 40 年。艾恩斯是一代激进活动分子的代表，他们从骑士团找到了毕生求而不得的问题的答案：如何组织跨越技术、性别和肤色界线的劳动者。

19 世纪 40 年代，作为一名苏格兰移民，十四岁的艾恩斯在纽约的一家机械商店当学徒。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具有浪漫主义精神的叛逆分子，不仅顶撞他的雇主，还有服装业的老板，他们的血汗工厂在城市里泛滥成灾。

那些起早贪黑、飞针走线以养家糊口（有时需要养活好几个孩子甚至是一个残疾的丈夫）的穷苦女人，所得的待遇令我感到触目惊心。为了获得工作，她们被迫从一家店走到另一家店，乞求得到一个 5 分钱做一件衬衫的机会……常常，在一个贫穷而虚弱的女人做完了十几件衬衫后，没良心的雇主会挑她们的毛病，说她们少缝了几针，然后把她们的工钱减半。⁹

艾恩斯发誓“成为接下来几年第一批帮助人类获得人性，让那些有能力欺压弱者的人不再残暴的人。”他用自己的工资请了一位律师，代表一群

9. Irons, M., “My Experiences in the Labor Movement,” *Lipincott's Monthly Magazine*, Vol. 37, June 1886, p. 618.

女人提出了13个独立的诉讼，控告一个臭名昭著的压低工资的雇主，那个人马上妥协了。“我再没接到其他投诉，”他回想道。“这事发生在我做学徒期间，因为我的工资非常少，我可以做的事情自然非常有限。”¹⁰

19岁时，艾恩斯搬去了路易斯安州（Louisiana）当机修工和包工头，之后他开了一家杂货店，在那里“我没有办法狠心拒绝穷人的余账，他们恳求我宽限几天时间，或者等到发工资的那天——而那一天总是遥遥无期。”濒临破产，他又回到老本行，去肯塔基州（Kentucky）做金属加工。在那里，他第一次成功组织了罢工。

在最早的一张照片上，艾恩斯看起来矮小而警觉，睁着大眼睛。他把长长的沙色头发像南方骑士军官一样披在身后，浓密的胡子耷拉在后缩的下巴上。在这之前他已经在中西部地区游荡多年，有点像19世纪60年代的“无因的反叛”¹¹。在工作了一年却“没有任何令人惊叹的经历”后，他充满懊悔地离开了圣路易斯（St Louis）。他加入了秘密共济会（Oddfellows）——共济会的精简版组织。他还加入了农民协进会（Grangers）——一场由致力于合作生产粮食的小农组成的激进运动。他避免在南北战争中参战，回到杂货店，制作绳子，勘探铅矿，同时还“在工厂中主张工会主义，8小时工作日，反对土地垄断和在工厂中雇用妇女童工。”当遇到劳动骑士团时，他终于不再漂泊和迷茫。

“一人受伤，全员关切”当骑士团精神那美好的口号在我的生命

10. 同上。

11. 作者在此借用了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1955年主演的电影《无因的反叛》（*Rebel Without a Cause*）。——译者注

中回响,当我了解到骑士团精神博大而深沉地拥抱每一种诚实的劳作——当我了解到这意味着广泛而全面的工人联合,这一联合建立在可以反抗那些聚合并的财富所带来的权力、并带给财富的创造者一份应得的财富的基础上——这时我感到我已经找到了那个我准备贡献余生的领域。¹²

那是1884年。直到现在,身材瘦长结实而脾气火爆的马丁·艾恩斯的到来对于那些傲慢自负的包工头和血汗工厂主来说都是坏消息。现在,这个坏消息传到了美国最大的铁路巨头杰伊·古尔德(Jay Gould)¹³耳边,艾恩斯盯上了他的工资单。但是要理解骑士团如何抓住了这一类人的想象力,我们首先需要知道为什么其他所有的组织都失败了。

工人阶级共和主义者:

行业工会(craft unions)存在两个问题:它们以技术为基础,所以很少能组织起不同行业的人,而且它们本质上是地区性的,所以永远不可能打倒强大的全国性的垄断雇主。在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当经济衰退深深影响到工资和工时,工会便节节败退。所以工人们转而投身政治。《铸铁模具工杂志》(*Iron Moulders Journal*)抱怨道:

12. 同注4。

13. 杰伊·古尔德,绰号海盗大亨,19世纪美国铁路和电报系统无可争议的巨头,“镀金时代”股票市场的操纵者。在1869年对黄金市场的狙击导致了被称为“黑色星期五”的大恐慌。——译者注

这个运动中数百名最有能力的人,已经失去了对于通过工会组织,工人们会有与资本抗争到底的力量和意志的希望……这样一来,我们发现他们已经不再推动劳工组织成为贸易和劳工工会,而是强烈要求其为政治目的服务。¹⁴

但是是什么样的政治呢?在这时,社会主义者有一个选择:你可以追随马克思主义者的步伐,他们的理论是工会主义很重要,但只是作为组织夺取最高权力前的大本营,或者你可以加入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¹⁵的追随者,他们宣扬工会是徒劳的,而倾向于竞选活动和合作社的形式。当两个派别间的辩论在同一组织——社会主义劳动党(Socialist Labor Party, 简称 SLP)¹⁶内发生时,情况便更为残酷了。要想清楚地了解发生了什么你需要会说德语,因为党是由出于某种原则拒绝说英语的移民领导的。

艾恩斯是一名 SLP 成员,但是像大部分非德裔成员一样,他与重点工作保持着一定距离。每当处理关于“接下来做什么?”的政治问题时,社会主义者对于他这种人没有更多可说的。像绝大多数好战的工人一样,他在

14. *Iron Moulders Journal*, June 1875. 引自 Foner, P. S., op. cit., Vol. 1 p. 475.

15. 费迪南德·拉萨尔,德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参加杜塞尔多夫民主派的革命活动,并与马克思、恩格斯结识。——译者注

16. 美国历史上初具规模的社会主义组织是1876年设立的劳工党(Workingmen's Party)。1877年劳工党改名为社会主义劳动党(Socialist Labor Party)、简称 SLP 并沿用至今。自从1890年以来,马克思主义一直是 SLP 的理论基础;直到1900年,SLP 是美国唯一的全国性社会主义政党;1919年美国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USA)成立时,许多 SLP 成员加入并对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译者注

内心深处是一名工人阶级共和主义者，致力于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并坚信挡路的是华尔街的势力。

这种朴素的对资本主义的反对本质上是出于道德，而非马克思主义。艾恩斯写道：

我从没见过哪一场罢工不能被简单的对人类平等权利的认知或者对理性和常识的运用所避免……罢工是不对的，尽管它们作为对错误的抗争看起来是必要的。但它们也不应该被视为必要的。然而，它们可以避免激发更有害的行动。

1877年，一场大规模自发性罢工浪潮席卷了铁路系统。它在暴乱、枪击和牺牲中挫败。煤矿罢工的情况也一样：在一个只是摆摆样子的公审后，一群被称为“莫利马贵”（Molly Maguires）¹⁷的爱尔兰矿工目睹了他们的领袖被绞死。突然间，劳动骑士团早期古怪的保密措施变成了必需品。激进分子转移到地下组织，剩下的人被迫退出，而曲线救国的选举政治也步履蹒跚。在这一关头，却有一个名叫泰伦斯·V·保德利（Terence V. Powderly）的人接管了劳动骑士团，领导他们进入了公开行动的眩目之光中。

* * *

17. “莫利马贵”是一个以武力反抗矿主的秘密矿工团体，它的主要目的是反抗矿主对矿工们的剥削、胁迫甚至是谋杀。——译者注

劳动骑士团是怎样成长的：

团会进步缓慢。不管有多么大的抱负，它始终是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一个只有白人技术人员的组织，成员不到1万人。保德利，一个铁路工人，于1874年加入了骑士团。他是一个金发碧眼的拳击手，还具有诗歌和演说的天赋。“英国小说家认为拥有保德利这样长相的人是诗人、贡多拉船夫、哲学家和失恋的英雄，”一名记者热情洋溢地写道。¹⁸当他在铁路工会过多地开口发言时，他被骑士团的其中一个创立者叫到了一边。

一天晚上他邀请我去他的房间，锁上门，让我跪下来。我以为他想让我和他一起祷告，所以我拒绝了，直到他那番助焊剂一样的话俘获了我。他说我正是他要找的年轻人。他们听到了我说的话，喜欢我的多愁善感——就像他们一样——并且渴望我加入致力于使所有辛苦工作的人的权利得到认可的团体。¹⁹

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保德利在骑士团里的等级迅速升高。1877年的罢工之后，他意识到如果没有一个正式的宪章和集中的控制，团会无法走得更远。他劝说团会放松保密措施，将仪式化繁为简，并实施了一个政治计划。这时，尤利亚·斯蒂芬斯退出团会并从公共生活中隐退。

保德利撰写了一份融合了基本改革和要求削减垄断势力的方案。骑士团

18. John Swinton's Paper, 17 October 1886. 引自 Powderly, T., *The Path I Trod*, New York: 1968.

19. 同上。

主张8小时工作日、同工同酬、国家支持的针对小型企业的信用额度和合作社的建立。随之而来的是一项策略性的要求——废除对铁路、电报、电话系统和银行的垄断，将其国有化。虽然工人们需要组织起来，去抗衡日益强大的大企业，但仲裁仍是比罢工更受青睐的方式。罢工，保德利说，“无法改变学徒制度，无法消除司法管理中不公正的技术细节，也无法管控供求的法则……”²⁰

有了保德利的管理，骑士团通过两种主要方法发展壮大：招募非技术工人参加“混杂的”本地集会，以及允许现存的技术工人贸易工会分支甚至所有工会联合起来。对于非技术工人来说，混合集会具有启示作用；工会在矿业和工业城镇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他们没有办法接纳来自不同行业的人们。现在，来自不同行业的男性工人坐在女性工人——甚至在一些州还有黑人工人——身边。到1880年，团会在阿拉巴马州（Alabama）已经有了19次本地集会，据该州的《联合工人杂志》（*The Journal of United Labor*）报道：

在尽职尽责、严格出勤、按时完工、乐善好施和其他一切使人成为好成员好公民的事情上，（黑人成员）并不比团会内任何其他种族差。²¹

然而在南部，这一操作变成了让组织者们去鼓励形成专门的黑人集会。

20. Proceedings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1882. 引自 Foner, P. S., op. cit., Vol. 1 p. 508.

21. *Journal of United Labor*, 15 August 1880.

虽然保德利公开禁止将黑人排除在主要由白人组成的集会之外，他在私底下却告诉他们“让有色人种自己组织起来”。但是有人反对，正如一位来自印地安那州里士满（Richmond）的组织者解释说：

引导有色群体举行另一场集会并不难，但他们不会这样做，至少他们没有表示出这样做的意愿，正如他们中的一员在最近的一次集会上说的那样：“这是唯一一个我们可以与白人平起平坐的组织，而且它很重要，除非我们可以在这里工作，否则我们不会去任何地方工作。”看起来这种平等已经在他们心里扎下了根。²²

对于技术工人工会来说，骑士团最大的吸引力便是提供了由全国罢工基金支付薪水的有偿组织者。这些组织者向美国工人运动引入了游击战的概念，直到保德利被久久遗忘之后依然影响深远。他写道：

我们夜以继日地前行。我们只在能找到食物的时间地点、而不是肚子饿了的时候吃饭。我们大家共享家庭、餐桌和床铺。经常有两到三个劳动骑士和我一起度过夜晚。在完成我们的工作之后，我们在棚屋、灰坑、运货车厢、或者在任何夜色笼罩着我们的地方入睡。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们做的事是必要

22. Joe B., *Kewley letter to Powderly*, 14 May 1883. 引自 Foner, P. S., op. cit., p. 68.

的，而且我们想要成为有用的人……²³

在骑士团 1880 年彻底废除保密措施之前，它已经有了 2 万 8 千名成员。到 1884 年年底，由于它的开放政策和朴素理念，已有超过 7 万人加入。十分偶然的是，正是在这时候，它与自封为华尔街巫师的杰伊·古尔德打了场遭遇战，并创造了历史。

“金融投机的大型游戏”：

骑士团于 1883 年在电报员中间发动了史上第一次全国大罢工，那是它第一次遭遇古尔德。他们失败了，但又在铁路系统发起了第二轮战斗。古尔德拥有美国中西部的整个铁路网——人称西南系统（Southwest System），那是连接密苏里（Missouri）、堪萨斯（Kansas）和德州（Texas）的主干线。当古尔德减薪时，工人们出走了。

骑士团直捣古尔德工业帝国的中心，其象征意义就像今天发动新闻集团（News Corp）²⁴或谷歌公司员工出走一样。古尔德的铁路系统既是交通运输网络，也是信息网络。它对美国和整个世界都具有经济上的重要影响。因为美国西部地区生产的廉价粮食对世界市场造成的影响就像今天中国生产的廉价电子设备一样：让世界通胀维持在较低水平。至于古尔德，他曾

23. Powderly, T., *The Path I Trod*, New York: 1968, p. 59.

24. 新闻集团，是一个庞大传媒帝国的名称。新闻集团涉足所有的媒体领域，它的首席执行官鲁伯特·默多克用五十多年的时间将一个普通地方报业公司变成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综合性传媒公司之一。——译者注

经扬言可以出钱给一半的工人阶级让他们去杀掉另一半。他的传记作者写道，“他买了很多很多东西，但从来没有买过一份悼词。他是金融投机的大型游戏的玩家，为了收益无所不用其极，既不伪装，也不道歉。”²⁵

马丁·艾恩斯在第一次反抗古尔德的罢工前夜加入了骑士团，并成为它在密苏里州锡代利亚（Sedalia）的主要组织者。州劳动检查员对他的成就感到惊异：

至今为止，这是第一场罢工工人被如此全面而系统地组织起来的罢工，并且管理和控制权都掌握在组织手中。每一次运动都由执行委员会指挥，并由完美的纠察制度维持秩序，铁路公司和个人的财产都因此受到了很好的保护。²⁶

一开始古尔德的策略是撤退。他取消了降薪，但向所有工人关闭了工厂，试图使罢工组织者成为罪人。保德利则用覆盖整个古尔德系统的联合罢工予以回应。华尔街巫师马上投降，承诺将未来所有劳资纠纷交付仲裁。

古尔德战败的消息就像平地一声雷，不仅响彻美国工人阶级，也震动了政治权力的中心。《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立刻派出了它最好的调查记者：

25. Northrop, *Life and Achievements of Jay Gould*, 1892, p. 480. 引自 Allen R., *The Great South-west Strike* (University of Texas Publication 4214), Austin: 1942, p. 13.

26. “Investigation of Labor Troubles in Missouri, Arkansas, Kansas, Texas and Illinois,” *49th Congress Report No. 4174*, Washington: 1887.

在这个国家,5个人掌控着50万工人的主要利益,而且可以随时威胁到250万人的生计。这些人组成了劳动骑士团神圣崇高会的执行董事会……他们可以截留几乎所有电报员敏捷的敲击,可以关闭几乎所有工厂,可以让铁路瘫痪。他们可以颁布不利于任何一种制成品的法令,让他们的人停止购买,让商人停止销售。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部署劳工反对资本,让工人为了平静而固执的自卫、或为了愤怒而有组织的袭击而采取防守或进攻姿态。²⁷

有了这样的公关,他们根本不需要做任何广告。一年之内,骑士团已经招募了60万新成员,总数超过了70万。他们成为了一支大型群体运动的力量,保德利则成为了整个美洲大陆的英雄。但杰伊·古尔德还没完。

对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召唤:

当骑士团奇迹般地发展壮大时,传统工会正挣扎着达成全国范围的合作。1881年,一个全国的工会联盟成立了,但它通过了一些决议以外乏善可陈。然而,其中一项决议意义深远。南北战争以后,有六个州接受了8小时工作日的法律,但它在实际操作中却被大量忽略了。当工人运动在19世纪80年代初复兴的时候,8小时工作日变成了一项联合所有人——从戴怀表的铁路兄弟会的火车司机到劳动骑士会大堂里的黑人农民——的立法

27. 引自 Bimba, A., *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London: 1927, p. 179.

要求。

1884年,25名工人代表出席了在芝加哥举办的工会联盟大会,他们只代表了5万名工人。当听到木工工会的代表报告工人们为争取8小时工作日引发的动荡后,代表们受到了激励。那位木工工会的代表提出了一个新的实施办法:“自下而上”实现工时减少。“我们想让工人们自己实施法令,在某一天,8小时就是一天的工作时间,而且他们将自己去执行这个法令。”²⁸决议提议将大约两年后的1886年5月1日作为行动开始的日子。决议毫无异议地通过了,并连同其他许多良好的意愿一起埋在了大会的会议记录中。

工会联盟现在开始接触骑士团,后者也决心实行“对工作超过8小时的一般性拒绝”。但当泰伦斯·V·保德利努力将一个被罢工刺激得无比兴奋的群众运动赶进畜栏,变成他们所反对的组织时,他的局限性变得越来越明显。在对古尔德胜利的余波里,5千名密歇根的伐木工人发起罢工,导致77间工厂关停,,尽管平克顿安保公司(Pinkerton)和州自卫队为此出动了150名武装人员。罢工工人大部分是波兰移民,很多人初来乍到,对于他们来说骑士团像是一个伟大的理念。他们纷纷加入了骑士团。

现在,保德利被来自地区集会的信件狂轰滥炸,他们要求骑士团重返由工会联盟计划的罢工之中。惊恐的他告知团会的年度大会:

大会不应该赞成为了缩短工时计划在1886年5月1日的实行而发起的大罢工。对这个计划最感兴趣的人还没有在运动中受到足够的教育,而且当前形势下的罢工必然会失败。定下来的时

28. Foner, P. S., op. cit., Vol. 2.

间不合适，实施的计划也不合适。²⁹

在这之前，保德利那些肆无忌惮、富有演技的的管理骑士团的方式简直堪比奥兹国的魔法师³⁰；而现在他听起来就像那只胆小的狮子。他的下一步棋则是名符其实的稻草人行为；他改变了规则，罢工只有在一个秘密投票中拿到三分之二多数票才能发起，而且还要经过他本人的同意。结果适得其反。到了1885年8月，他抱怨说，“超过200个工厂停工，因为雇主们以为我们的成员无法在不违反团会条例的情况下罢工。”

于5月1日罢工的势头在工会和骑士团中间不断积蓄。与此同时，杰伊·古尔德乘着他的游艇驶向西印度群岛，让他的两条铁路线路自行破产，并在整个西南系统实行减薪。

西南大罢工：

1886年2月的最后一天，马丁·艾恩斯给保德利发了一封电报：“这里的情况将很快失控。如果在1886年3月1号两点钟前不能解决，则必须出动德州和太平洋地区的员工。”24小时后，在火车汽笛尖锐的鸣叫声中，工人们沿着古尔德铁路系统罢工。动乱爆发点像是一连串西部B级片里的地名：红河谷（Red River），瓦科（Waco）、沃思堡市（Fort Worth）、格兰德河（Rio Grande）……现在很难想象这些德州边境的城镇——如今新保守

29. 引自 Foner, P. S., op. cit., Vol. 2, p. 106.

30. 奥兹国的魔法师（Wizard of Oz）、胆小的狮子（Cowardly Lion）和稻草人（Scarecrow）均为《绿野仙踪》（*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里的角色。——译者注

主义共和党的要塞——曾经上演过工会工人和美国企业间的大型冲突。

与去年不同,这次罢工的主要是非技术工人;火车司机仍继续工作——或者至少试着去工作。所以,骑士团这次的策略不是保护公司财产,而是去夺取或者摧毁它;这里将没有可供火车司机驾驶的火车。一份编制于那年动荡之秋的国会报告描述了罢工的势头:

3月3日,几个桥梁工程队以及朗维尤(Long View)交界处所有圆形机车库工人都开始罢工。3月4日,50个蒙面人毁掉了比格斯普林斯(Big Springs)圆形机车库的六台引擎。隶属德州和太平洋铁路的戈登(Gordon)矿区的矿工拔出了火车上的连接销,并通知机车司机在罢工结束前都不要回来。这家公司位于沃思堡市(Fort Worth)的电报员除了一人以外全部出走,形势因此困难重重。³¹

温和的骑士团是怎样最终领导了这场位于充满枪枝、暴力、工会组织里名符其实的蛮荒西部的罢工呢?经济是最主要的因素:在短短几年内,古尔德的铁路就成为了一个垄断寡头,雇佣了机师、工人、矿工和白领电报员。当工人们在没有收到骑士团任何成文命令的情况下,跨越专业和技能联合起来夺取了铁路的时候,国会山³²的弦绷紧了。华盛顿的政治精英收到了大量关于配枪的前线罢工工人受到广泛支持的报告,这让他们更加沮

31. "Investigation of Labor Troubles ...," op. cit., (I), p. 131.

32. 国会山(Capitol Hill),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一个街区,美国政府最高的权力象征——美国国会大厦即座落于此。——译者注

丧。雪上加霜的是，罢工者们的目标已经是底线：不减薪，每天 1.5 镑的工资，具有约束力的仲裁，并让那些为了参加会议而翘班被解雇的职员恢复原职。

罢工的前三个星期，罢工者们只攻击货运列车，乘客服务还照常运行。根据管理者的报告，骑士团很明显是在展示工人们铁路的控制权，他们可以让火车正常开动，也可以废掉他们不想移动的车。“171 号引擎……有一个气泵需要维修，骑士团的委员会为此派去了一个技师。我提起这件事是为了说明，在那时如果没有他们的许可，做任何事情有多么困难，”堪萨斯州艾奇逊（Aitchison）的负责人报告说。³³

3 月 22 日，同一个城镇的火车司机发现了塞在他们设备中的宣传单：

致工程师和锅炉工：小伙子们，我们希望你们不要把火车开出艾奇逊。我们很抱歉地把你们称作兄弟。如果你们把火车开走了，你们将为此负出生命的代价。小伙子们，我们想要摆脱奴隶身份的束缚，变成像你们一样自由的人类。不要拒绝给予我们你们曾经祈求得到的东西。³⁴

第二天，40 个手持步枪和左轮手枪的蒙面人夺取了修理店并毁坏了引擎。直到三月底，武装掠夺、火车脱轨、破坏引擎、切断传送带、和有组织的骚乱的模式都在整个中西部持续。美国商业中枢的煤炭、粮食和通讯

33. 同 31。

34. 同上，p. 133。

都陷入瘫痪。在此之前也存在大型罢工，但从未如此暴力或有效，而且从未得到大批感同身受的旁观者如此的盛赞。

事后，堪萨斯的副官长 A·B·坎贝尔（A. B. Campbell）试图向国会议员解释罢工者的情绪：

坎贝尔：他们表达了强烈的愤慨——反对杰伊·古尔德的情绪。

问：他们提到了古尔德先生做的任何伤害或不利于他们利益的具体举措吗？

坎贝尔：没有，除了他整体贪婪的本性。他通过不正当手段攫取大量财富的事实。³⁵

这就是针对企业垄断趋势的第一次大型罢工。它实现了一个初步的由武装纠察强制执行的工人掌权系统，削弱了整个美国的经济贸易。在形成了铁路网主要结点的大城市，骑士团发动了针对反工会企业的杯葛。《堪萨斯城市杂志》（*Kansas City Journal*）因为拒绝承认印刷工人工会遭到杯葛。任何在上面刊登广告的公司也同样被抵制，抗议者们强行将顾客从被定为攻击目标的商店里拖走。在堪萨斯城西边几英里的德索托（De Soto），当地全体神职人员都支持罢工，并被封为团会的荣誉成员。

35. 同上，p. 117。

“一系列的不公平导致了罢工，”一个名叫 C·F·欧利里（C. F. O’Leary）的天主教神父说；“腐败、不公和暴政在他们之间无处不在，而这些情况存在于整个制度之中，上至古尔德，下至最基层的官员。这就是我的经验，而我一直是一个近距离的观察者……这一切都是与美国精神相违背的。”³⁶

当神父为使用“任何有效手段”辩护时，一名出离愤怒的国会议员问他这是否意味着使用炸药也可以接受。“甚至炸药也可以接受，”他回答说，并加上了一句，因为他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不认可随意使用炸药。”

到了3月底，杰伊·古尔德吩咐他的地方代表参与仲裁，保德利介入，试图达成和解。3月31日，艾恩斯命令所有与101地区有关的人员重回工作岗位，并说道，“荣誉要求那些出来支持你的人率先回去工作。”但这并没有发生；古尔德的经理们拒绝反聘那些他们所知的战士，并且撤回了仲裁的提议。当保德利命令艾恩斯无论如何都要解决罢工事宜时，艾恩斯拒绝了，于是争议迅速升级，超出了大工师³⁷的控制，要处理“另外30起罢工和工厂停工”的他返回东海岸，让艾恩斯做主。

报道罢工的记者马上嗅到了艾恩斯与保德利的不和意味着什么：美国第一次大型工人运动是会走向极端，还是停留在它的创始人设定的限制内呢？“保德利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艾恩斯是一个疯子，”《沃思堡公报》（*Fort Worth Gazetteer*）写道。

36. 同上，p. 469。

37. Grand Master，即保德利。——译者注

保德利会通过寻找并消除社会和工业顽疾的根源来实现工业发展和社会救济；艾恩斯则会为了治疗疾病把病人杀死。保德利是哲学家；艾恩斯是社会主义者。在组织内他们各自拥有拥趸。爱好和平的人支持保德利。喜欢煽风点火的人、无政府主义者和一切无知分子站在艾恩斯一边。肯定会有什么事发生；保德利或艾恩斯的小集团一定会有一方胜利，而另一方投降。³⁸

罢工现在正朝着它暴力的终结前进。艾恩斯后来否认写过召唤中西部地区大罢工的传单，但它依然具有他、以及罢工在全球产生的具大影响的号召力。

这场战斗的目的不是为了现在——也不是为了明天——而是为了这个世界将来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我们的孩子，和我们孩子的孩子。全世界的工人们，向战场行进吧。各行各地的工人们，走进争论的焦点吧。古尔德和他的垄断集团一定会倒下，不然你的孩子将会成为奴隶。³⁹

4月9日，40名骑士团成员在阿肯色州小岩城（Little Rock）的修理铺发动了武装袭击，随后陷入了与地方武装队对峙的僵局。警长命令他们解散，表示他将保护公司财产哪怕倒在铁轨上。“那就去死吧，”据报道其中

38. *Fort Worth Gazette*, 11 April 1886, p. 4. 引自 Allen, R., op. cit.

39. 引自 Allen, R., op. cit.

一名骑士团成员大喊：

就在那一瞬间他们齐齐开火。对方反击，枪战直到双方互射了将近 200 发子弹才停止，骑士团终于撤退，在黑夜中销声匿迹。⁴⁰

同一天在东圣路易斯（East St Louis），一群罢工工人和围观群众遭遇了另一伙装备了温彻斯特连发步枪的地方武装军队，后者首先开火，打死了 7 个人，打伤了更多。“紧随流血事件而来的是纵火，”一份官方报告记载，罢工工人放火烧毁了搁浅的货运列车。

4 月中，骑士团在德州沃思堡市召开大会，考虑给艾恩斯号召的大罢工盖章放行。但投票并未通过。取代联合罢工的是保德利承诺的经济援助。现在，从墨西哥湾到圣路易斯，士兵们涌入罢工中心。争议发展至暴乱和小规模游击战，直到一名国会议员代表前来设立了 5 月 1 日的仲裁小组才平息。但在那之前，美国的其他地区都战火纷飞。

烈士是怎样造就的：

奥古斯特·斯皮斯（August Spies）是另外一种反叛人物。同艾恩斯一样，他的青年时期也是在周游美国中度过的，但他是更年轻的一代——你可以从他最著名的照片上看起来：更短的头发，修剪整齐的胡须，眉眼之间少了一些浪漫主义色彩，多了一些困惑与不安。拍摄这张照片时他面临

40. 同上，(I), p. 375。

着不少麻烦；照片说明写着“判处死刑”。

斯皮斯的家庭在 1873 年离开了德国来到纽约。他的传记——写于死囚牢房，愤怒、漫无边际、杂乱无章——记录了他对美国的第一印象：

工厂：可耻的管制、监视、间谍系统、奴性而缺乏男子气概的工人、老板和奴隶傲慢武断的行为——所有这些给我造成的印象我到现在都没办法忘怀。一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工人——他们中有好多年老而驼背——沉默而毫无怨言地承受着喜怒无常的包工头或老板们的劈头盖脸的侮辱。⁴¹

他在 1877 年铁路大罢工的前夜搬去了芝加哥。

那一年发生的大事件，叫苦连天、心照不宣的工薪奴隶用残暴的武力聚集了起来，让我感到了类似抗争的必要性。这样的抗争需要组织。不久之后我加入了“教育与防御协会”（Lehr & Wehr Verein），这是一个工人武装组织，当时有大概 1500 名训练有素的成员。⁴²

奥古斯特·斯皮斯的理念与马丁·艾恩斯有着平行的起源。他在等待

41. Spies, A., *An Autobiographical Sketch by A. Spies*, Manuscript August Vincent Theodore Spies papers, Chicago Historical Society, Chicago Illinois.

42. 同上。

行刑时写下的最喜爱的作者名单，读上去像是 19 世纪决定论⁴³的初级读本，不仅包括了卡尔·马克思还有将达尔文主义原则应用到人类学中的路易斯·摩尔根（Lewis Morgan）⁴⁴，以及将它们应用于历史学的亨利·巴克勒（Henry Buckle）⁴⁵。艾恩斯的极端主义具有浪漫主义的特点，并且植根于美国式的个人主义；斯皮斯的极端主义则是理性的，并且最重要的是，他将人类个体视为历史性力量无能为力的“承受者”。

斯皮斯很快便发现社会主义劳工党的芝加哥分支过于温和了。他与一个名叫艾伯特·帕森斯（Albert Parsons）的工会组织者一起离开了这个组织，后加入了无政府主义运动，称自己为社会主义革命者。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可追溯至巴黎公社：在俄国革命者巴枯宁（Bakunin）的影响下，它变得更加倾向于暴力，更加集中于摧毁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更加疏远议会政治，以及更加迷恋“行动宣传”（propaganda of the deed）⁴⁶——这里所说的行动最好能包括一根炸药的引线。

43. 决定论（Determinism），又称拉普拉斯信条，是哲学的一种命题，认为每个事件的发生，包括人类的认知、举止、决定和行动都是因为先前的事而有原因地发生。如果从原始宇宙以来，有一连串的事件注定地、从未中断地发生，自由意志则是不可能的。——译者注

44.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美国知名人类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他的社会理论影响了后来的左派理论家。——译者注

45. 19 世纪初英国著名实证主义史学家、旅行家。著有书籍《文明史》，但未完成。——译者注

46. 行动宣传（英语：propaganda of the deed）是对政敌进行暴力行为以此启发群众催化革命的一个概念。——译者注

厌倦了与马克思主义者、拉萨尔主义者⁴⁷以及痴迷于炸弹的无政府主义之间旷日持久的辩论，斯皮斯起草了一个新的策略。对于斯皮斯来说，工会、社会团体和讨论会很明显可以让工人在为政治权力做好准备的同时行使这一权力。斯皮斯为了非技术工人加入工会的权利、工人自卫队、喝醉酒的自由以及必然的进步而斗争。在芝加哥的一个小圈子里，他发明了一套全新的工会主义哲学，这一哲学将在1914年之前实现飞跃的国际工人运动中获得广泛支持。无政府主义圈子内部称之为芝加哥理念，历史上称之为无政府工团主义（anarcho-syndicalism）。

尽管出于不同理由，斯皮斯与保德利一样对8小时工作日嗤之以鼻。“居然同意让资本家拥有我们8小时的劳动，”他写道，“……这简直就是承认了工资制度是合理的。”⁴⁸但他不会错过大型工会运动开始的时机。他成为了左翼鼓动5月1日大罢工的领导之光。“5月，”斯皮斯在他的报纸《工人时报》（*Workers' Times*）上写道，“将带来无数今人无法想象的东西。”⁴⁹

一个小伙，两大战略：

在两大战略和两个组织的竞争下，芝加哥工人迎来了1886年5月1日。

47. 19世纪德国工人运动中的社会主义思潮。以拉萨尔为主要代表。认为无产阶级只要通过和平的合法的斗争，争得普选权，就可以把君主专制国家变为自由的人民国家；否认无产阶级进行经济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译者注

48. *Alarm*, 引自 Foner, P. S., op. cit., Vol. 2, p. 102.

49. “People's Exhibit 91,” *Arbeiter-Zeitung* (newspaper) article, editorial notice, 1886 Apr. 22, Chicago Historical Society.

一边是骑士团,植根于维系了美国一个世纪进步的浪漫主义和共和主义。另一边是新兴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移民的产物。当一个普通工人面对这场理念的战争时会怎样呢?两个字,困惑。多亏了艾伯拉罕·比斯诺(Abraham Bisno),我们得以管中窥豹。他是一个来自立陶宛的年轻犹太裁缝,留下了他早年在芝加哥服装业的打字文件记录。比斯诺是以1882年俄国大屠杀中的难民身份来到美国的。他被赶到了芝加哥一个临时搭建的贫民区,同胞们都不敢到市中心冒险,因为爱尔兰小孩会拿石头砸他们,还扯他们的胡子。他们意外地卷入了8小时工作日运动。

我们对那个运动一无所知;但它无处不在,而且好像已经穿过边界来到了我们的定居点,因为(1886年)二、三月我们的人也对工作所得的钱有诸多不满。⁵⁰

4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关于在地区礼堂举行会议的谣言开始散播。没有人表示对此负责,人群需要贿赂经理打开大门。会议最后他们决定罢工,发动纠察队并“打烂所有拒绝加入的人的头”。这是一场外包工人的罢工,拉入了作坊主和裁缝。当比斯诺在20世纪20年代回首这些事件时,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工会领导的他感到十分困惑:

没有人知道是谁发起了第一次会议,也没有人知道是谁让骑士

50. Bisno, A., *Abraham Bisno Union Pioneer*, Milwaukee: 1967, p. 66.

团给我们派了一位代表……我们中没有人知道一个组织必须得有主席、秘书、规定和秩序、以及一个人发表意见时别人必须安静地坐着听他把话说完的进行模式——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当我们发动罢工时，我们没有投票权。当我们同意加入骑士团时，我们也没有投票权……当我在这么多年以后回想起这件事，我很欣慰当时有人故意帮忙散布了会议将要举行的消息……

很显然，骑士团有一些足智多谋而且敬业的活动分子。但这位犹太裁缝很快便发现了团会的缺点：所有谈判都由全职的骑士团职员处理，而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犹太人、立陶宛人或裁缝。无法梦想8小时制的立陶宛人其实愿意接受十小时的工作时间。然而劳动骑士团“嘲讽我们，”比斯诺说。

他们召集了一场大型集会。许多罢工工人现在正在实实在在地挨饿，而有一些已经无家可归。在那次集会上“一个人被请上来给我们用德语演讲，他讲的棒极了，”比斯诺回忆道。他用很简单的德语演讲，“因为意第绪语是唯一一种我能理解每一个字的德语方言。”演讲者告诉他们，工业发展得越好，工人就越重要，还说他们正在参与阶级斗争，而尽管他祝愿他们在争取固定工时的罢工中好运，“这只是一项次要的工作，我们真正的工作是去彻底摧毁现在资本主义秩序的根茎。”这个讲者正是奥古斯特·斯皮斯。在一个古老国家的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现在将所有工资花在芝加哥的妓院的比斯诺，受到了像电击一样的震撼。

那天晚上我回家时整个人都被点燃了；整个论点像闪电一样击中并穿透了我。我听到了一生中从未听到的观点，它们好像正在抒发了我内心最深处的想法。我想，他是对的……

4月的最后两个周末,芝加哥劳工运动互相竞争的几个分支几乎完全全按种族划分开,为大日子做最后的排练。首先,在美国出生的人和爱尔兰人围绕在劳动骑士团和行业工会的旗帜下,主题温和而节制。然后是无政府主义领导的中央工会(Central Labor Union),将成员召集在街上进行单独示威。5千人参与了游行,参加最后集会的有2万5千人。没有一面骑士团或正式工会的旗帜出现在集会上,“在他们中间几乎没有美国人、爱尔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或苏格兰人,”《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报道。⁵¹

一个由1千名强壮的德裔家具工人组成的分遣队率领游行,紧随其后的是“带着波西米亚特纳乐队的”木匠国际联盟。德裔面包师、波西米亚伐木工人、“带着拉萨尔乐队的”金属工人联盟、屠夫、家具工、“进步的德裔雪茄工人”、马具匠和印刷工人都参与了游行。游行队伍排成了相邻的8个队列,由红色旗帜领导并由25名骑马的司仪保证他们不会走散。在许多足以令人血液凝固的标语和红色旗帜中,“工人兄弟们武装起来吧!”这一座右铭可以排在任何计划着让保德利和他的追随者们突发心脏病的标语榜首。而且这不仅是说说而已。《工人时报》怒吼道:

现在我们号召工人们武装起来。我们只有一条命。请用任何力所能及的方法保护它。在这个关头我们需要警示那些已经武装起来的工人们先把武器藏好,以免它们被团会的走狗偷走,这

51. *Chicago Tribune*, 26 April 1886. 引自 Hirsch, E. L., *Urban Revolt, Ethnic politics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Chicago labor movement*, Berkeley: 1990.

已经不止一次地发生了。⁵²

1886年5月1日是一个周六，工作日。在全球运动史上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抗议活动中，全美34万工人参加了争取8小时制的罢工。有另外10万人已经取得了工时减少。芝加哥是运动的中心，一共有6万人参与了罢工，8万人加入了密歇根大道上的游行。根据白氏（Bradstreet's）杂志的报道，4万5千名芝加哥工人在5月第一个周末前赢得了更短的工时。

这虽然是一次大型运动，诉求却细小而分散。艾伯拉罕·比斯诺的罢工在那个星期达到高潮，裁缝们决心游行至市中心，团结一致拿下大型服装厂。在5月5日，一个星期三，“我们大约600人……像一个有机的整体一样走向市中心。”

当我们穿过范布伦街（Van Buren Street）的桥时，我们完全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大量巡逻马车从城市的四面八方向我们扑来；成百，也许上千的警察迅速从车上跳下……每一个警察都手持警棍，他们开始驱赶并无情地击打我们……我们没有人被捕，没有人有时间做任何可以让人以正当理由逮捕我们的事。我们只是在那，但好多人被打得很厉害，我们只好逃命。⁵³

被打垮的立陶宛人要找个回答。难道他们遗漏了关于美国的什么东西

52. *Chicago Tribune*, 2 May 1886. 出处同上。

53. Bisno, A., op. cit., p. 79.

吗？一些不成文的规定？一些他们在行动前应该先行询问的事情？有一个人刊发了一份德文报纸，解答了这个谜团：周一，芝加哥警察在麦考密克农机制造厂（McCormick Harvester Works）外的警戒哨开火，打死数人。周二，秣市广场（Haymarket Square）召集了抗议集会，宣传单张的标题是“复仇”。集会进入尾声的时候，人群中的 200 名警察出动了。有人丢了一个炸弹，7 名警察死亡。当警察向人群开火时，更多警察和至少 4 名示威者被杀。

在麦考密克制造厂外警戒线演讲的人是奥古斯特·斯皮斯。宣传单张的作者是他，炸弹投掷前站在讲台上的人也是他。正是这个奥古斯特·斯皮斯在前一天的裁缝集会上发言。直到现在这些裁缝们才意识到所有示威都被禁止了。这个事件将作为“秣市惨案”载入史册，但在他们与世隔绝的贫民窟里，它与比斯诺和他的同僚们擦身而过。

烈士：

秣市惨案击碎了所有人的美梦，不只是 8 小时制运动和无政府主义者们的，还有劳动骑士团的。惨案的当晚，在圣路易斯的执行会议上，保德利立刻下令终止西南罢工。在芝加哥，比斯诺的罢工崩溃了。

执行纠察任务变得几乎不可能完成……警察的态度简直就像是整个城市进入了戒严状态。工会遭到突袭、破坏、财产被没

收，警察肆无忌惮地挥舞着他们的警棍。⁵⁴

骑士团在芝加哥的报纸用大写字母在头版印刷：

我们要让全世界明白，骑士团跟那帮被称作无政府主义者的懦弱的凶手、杀人犯、强盗没有任何关系，对他们也没有任何同情和尊敬。他们像午夜刺客一样在这个国家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煽动无知外国人的热情，招摇无政府主义的红色大旗，并制造暴乱和流血冲突。巴尔逊（Parsons）、斯皮斯、费尔登（Field-en），他们的追随者、同情者、协助者和教唆者都应该被立即处决！⁵⁵

没过多久，这些就一一实现了。审判只是走走过场。检方起诉 8 名被告——最著名的是斯皮斯和巴尔逊——因煽动暴力犯有谋杀罪。他们当天没有被判刑。为了确保能给他们定罪，一个经过人工挑选的陪审团被选出，最后有 5 人被判处死刑。

斯皮斯和巴尔逊太快浪费了他们最重要的发现：大型工会组织不仅能作为争取工时和薪资的基础，还可以以此为基础为新社会而奋斗。他们掉入了自己豪言壮语设下的陷阱，连同他们对火药的迷恋和耐心的缺乏，浪费了这个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为反扑提供了借口——到年底前，大

54. 同上，p. 81。

55. *Knights of Labor*, 8 May 1886. 引自 Hirsch, E. L., op. cit., p. 75.

部分五一劳动节预备阶段赢得的更短工时的政策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与此同时，马丁·艾恩斯被打败了，他卷铺盖走人，很快便身无分文。就在秣市惨案发生7天后，他作为最后一个人站上圣路易斯进行的国会调查里的证人席。国会报告把他描述为一个“危险甚至致命的人。”他的检察官像检视“一只有着善良可爱小狗眼神的被捕鼠夹捉住的耗子”一样调查他，但他藐视他们，与审问者玩猫捉老鼠的游戏，阻碍每一次将罢工与大范围暴力破坏联系起来的尝试，还暗示罢工得到了华尔街的支持，但拒绝提供任何确切的人名。他悲哀地总结说：“我并不赞成罢工，我还希望可以把这变成最后一次罢工……如果这次罢工的结果对骑士团有利的话，我之后将不遗余力让它成为最后一次罢工。”⁵⁶

艾恩斯的妻子在罢工的过程中去世了，他被迫变卖自己的家具。没过多久他被以流浪罪的罪名被拉去坐牢。他上了黑名单，再也没有工作。在运动中，当团会不断受到西南罢工反控的威胁时，他便成了替罪羔羊。艾恩斯退出了运动，在德州布鲁斯维尔（Bruceville）度过了人生中最后时光，工人领袖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于1899年在那里发现了他：“他看上去贫穷，健康状况也很糟糕，但……当他讲起社会主义时看起来又容光焕发，灵魂中行将熄灭的火光再一次透过他凹陷的眼睛燃烧了起来。”⁵⁷

1886年10月，奥古斯特·斯皮斯和他的同志们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在证人席上，斯皮斯对着笔记平静地讲了好几个钟头。他的死牢自传读起来痛苦、混乱又糊涂，但他在台上的演讲却正好相反。他一定早就知道这个

56. *Investigation of Labor Troubles* (II), p. 462.

57. Debs, E. V., *His Life, Writings and Speeches*, p. 274. 引自 Allen, R., op. cit., p. 148.

演讲会在全球劳工运动中回响，因为当时已经有一个为5名死囚请求从宽处理的国际运动。在讲台上，斯皮斯的演说对象不是工人而是雇主，他预言了他们终将到来的末日：

先生们，你们是革命家啊！你们反叛的是社会条件的影响，它通过财富之手将你们抛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天堂。没有想也没有问，你们便以为没有其他人拥有进入那个地方的权利。你们很肯定你们是被选中的人，唯一的财产拥有者。那股将你抛进天堂的力量，工业的力量，还在运行。这力量每一天都在变得更强大有力。它将把人类提升到同样的高度，让所有人共享你们现在独享的天堂。愚昧无知的你们以为可以停止文明启蒙和人类解放的浪潮，以为只要在海滩上布置几个警察，几把机枪，几个民兵团就可以了——你们以为在地平线上立几个断头台就可以把涨高的潮水吓回无底深渊。你们，反对事物自然发展规律的你们，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你们，而且只有你们，才是反叛者和破坏者！⁵⁸

1887年11月11日，斯皮斯和巴尔逊连同另外两个人被绞死（第5个被判死刑的人在监狱里上吊自尽）。“有一天，”斯皮斯在绞刑架上高喊，“我们的沉默将比你们今天扼杀了的声音更加强大。”那一天并没有让人久等。1893年，伊利诺伊州州长赦免了3名幸存的罪犯，宣布整个审判是不公正

58. *Chicago Tribune*, 10 October 1886.

的。在那之前，我们会看到，奥古斯特·斯皮斯的理念让工会运动在全球风起云涌。

1914年，已经是一名美国移民局高级官员的泰伦斯·保德利为了与一帮铁路工人聊天，在宾夕法尼亚州跳下了一列火车。“我只是想知道关于这么多年流传下来的教训他们了解多少。”他写道：

我向他们询问关于1877年罢工、1883年电报工人罢工、1886年西南大罢工的信息，没有人知道。然后我问他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马丁·艾恩斯的男人，但这名烈士的鲜血并不为这些今日的教会成员所知……我终于问到了我自己的名字，虽然他们都听过这个名字，但已经不晓得这个人经历了什么，或者象征了什么……⁵⁹

59. Powderly, T., op. cit., p. 115.

伟大的大工会

非熟练工会主义走向全球, 1889—1912

译=王不动

我们要全世界的劳动者组织起来
加入一个伟大的大工会
当我们所有人团结起来
便能争取建立劳动者的世界

——乔·希尔 (Joe Hill),
“我们想要的” (What We Want), 1913¹

1. 引自 Kornbluh, J., *Rebel Voices: An IWW Anthology*, Chicago: 1987, p. 138.

2014年，伦敦金丝雀码头

手拿传单的女人把它们攥得紧紧的，贴着她的粗呢大衣。从街道的布局上看，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就像一个风洞。一小群活动分子聚集在投资银行总部前，在摩天大楼的衬托下渺如蚁群，他们身上的连身工装裤格外刺眼。这里有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和巴克莱（Barclays），还有汇丰银行（HSBC）——这是今晚的目标。这些活动分子本不应该在这里出现，因为这里是伦敦的新金融中心，甚至连公共空间都是开发公司私有的。这些人知道他们可能会被人扔到街上。

白天的金丝雀码头到处是西装革履的男女，这里的平均年薪是6万英镑。在工作时间，有超过8万人在这个玻璃、钢铁和天空围成的小天地里熙来攘往。晚上除了安保人员以外，这里通常人迹罕至。这一小群人是通运工会（TGWU）和东伦敦社区组织（East London Community Organisation）召集而来的。

传单的倡议者们乘坐巴士分批到达。他们都是清洁工，工作是冲洗厕所，打理桌子，用消毒抹布擦拭电话机话筒，从几千个垃圾筐里清理烂苹果核。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移民——并非来自定居于内伦敦的加勒比人和亚洲人社群，而是来自新移民群体——索马里人、尼日利亚人、塞拉利昂人、库尔德人（Kurds）、伊拉克人、阿富汗人、哥伦比亚人、玻利维亚人、古巴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

葡萄牙裔的贝内蒂塔·刚萨尔维斯（Benedita Goncalves）在一家主要银行担任清洁主管，他描述了办公室职员是如何对待这些清洁工的：

清洁工的工作是清扫垃圾,而我们在办公室职员眼里就是垃圾——除了一些上夜班的人逐渐跟我们熟络起来,偶尔会打个招呼说一声“晚上好”。对于其他人来说我们并不存在。我们只在晚上出现,就像老鼠。

移民而来的清洁工总在谈论被办公室职员“无视”的情形,在这些人眼中清洁工连人都不是,更不能算工作伙伴了。一般而言他们受雇于外包公司,不算作核心员工的一部分。清洁工还说,如果有东西失窃,他们常常首当其冲,被当作小偷。但是缺乏尊重才是清洁工们反复提及的问题。贝内蒂塔说:

我在担任清洁工的第一周就开始抗争,因为对清洁工的管理实在是糟糕。他们缺少对清洁工雇员的尊重。你做的一切都被横加指责。他们毫无根据地开除员工——单纯是因为不再需要他们。还有个问题是指着鼻子骂人,比如说,“你这个废物;你算什么东西。”我遭遇了类似的情况,所以我开始向他们抗争。

对于胡安·罗德里格斯(Juan Rodriguez)而言,最大的问题出在劳动合同,或者说根本不签合同。6年前他在新闻国际公司(News International)当清洁工时,他说所有人都不清楚标准工时、工资和职位。目前他们的雇主,一家清洁承包公司,正设法与他们签订个人劳动合同,但是他们已经拒绝了。“所有人都是可以签,”他说,“甚至包括非工会会员。”胡安在意的问题是“尊重和收入”——首先是尊重,并且鉴于清洁工的平均周薪只有200—300英镑,收入问题也很重要。

管理问题困扰着员工，对他们构成了胁迫——最糟糕的是，也是非常非常可悲的是，没签合同的人不敢发表评论。有一些人甚至抵制我们——因为他们害怕工会。

马丁·怀特（Martin Wright）是一名英国黑人，在皇家伦敦医院（Royal London Hospital）做清洁工，他对抱怨做出了响应。经过3年的组织，他设法将清洁工的时薪从每小时5.50英镑提高到7.50英镑，并签订公司内部合同，这样清洁经理就必须对医院经理负责。但是问题依然存在：他不得不去处理尼日利亚、加纳和索马里员工间持续的紧张关系。“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告诉他们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我们的祖先都来自非洲。”胡安和贝内蒂塔都遭遇过同样的冲突。胡安说：

有一些人，因为从正在打内战的地方过来，心中仍留着杀人的念头！有个跟我们一块儿干活的男的，走进屋子里对另一个男的说，“如果你是在我的国家，我就崩了你，”我们对他说（我们都很震惊），“你在胡说什么？”屋子里的人都意识到这个家伙，在他的脑袋里，仍然在打内战。

当我问他们如何解决这些分歧时，他们都提到了一个词：耐心。“你必须保持耐心，充分理解每一个人。”胡安说。“努力从每个人那里学习他们的背景文化，再去思考为什么他的国家跟你的不一样。”他说非洲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难以组织，南美人则最容易，因为他们有左翼思想传统。

“有一个古巴人，他觉得加入工会的话会被枪杀，”贝内蒂塔笑着说。

“没错，我们这儿也有个古巴人说过同样的话，但是他加入工会了，”胡

安提到。贝内蒂塔对此保持乐观：

刚开始总是困难的，但人们慢慢会互相了解。我们来自世界各地，但我们团结起来了，因为有人在给我们的生活制造麻烦。那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联手对抗，停止内部斗争，对不公不义做出反击。

我问胡安，看他是否知道新闻国际公司发生过一次大罢工，就是发行《泰晤士报》和《太阳报》的那家公司。“那很早了吧，很久之前，是的，我听说过，”他说。当我给他讲起1986年持续一年之久的沃平（Wapping）大罢工的故事时——在那次罢工后，印刷业工会的权力损失殆尽——他的嘴巴张得老大。事实上，当初我看到一群高收入的“贵族范儿”印刷工人在大门口把一辆卡车掀翻并点燃的场面时，我自己的嘴巴也张得差不多大。

“你告诉我的这条消息太有用了，”他点头说，仍然很震撼的样子。在此之前，这位操着蹩脚英语的谦逊的西班牙人尚未意识到，他正在努力组建工会的这个地方，正是历史上工会运动遭受象征性溃败之地。

清洁工们，据他们自己承认，完全不了解东伦敦的过去；许多人还在为地名晕头转向。然而金丝雀码头的组织者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在码头所做的一切是多么讽刺。他们的工会就诞生于此；它通过招募非熟练工人而壮大，这些工人被当时的工会认为过于愚昧而难以组织。催生工会的那场罢工距离当前耸立的汇丰银行摩天大楼只有数码之遥。午夜将至，这些活动分子不停地跺脚以求些温暖，虽不能驱走身上的寒意，但他们踏着的是汤姆·曼恩（Tom Mann）的脚印。

1889年，伦敦

工程师汤姆·曼恩已经上了黑名单，因为赤贫不得不卖掉他的小提琴；维克多·格里弗雷（Victor Griffuelhes）是一名穿梭于法国南部大街小巷讨生活的鞋匠；比尔·海伍德（Bill Haywood）是一名内华达州（Nevada）牛仔；爱德华多·吉利蒙（Eduardo Gilimon）正游荡于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的贫民窟为无神论布道；詹姆斯·康诺利（James Connolly）是一名在爱尔兰服役的苦闷的英国士兵。那是1889年，工人阶级历史的转捩点。从那时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工人运动将走向全球，催生出大规模的工会组织，并普及一种新的“工会人生之路”（union way of life）。然而在1889年，促成这一切的人还是无名的独行者，游离于工人群体的边缘。

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们的名字将遍布全世界的小报和警察局，从而变得无人不知。他们将跨过大陆和海洋，去追寻一个双重理想：非熟练工人的工会组织，以及工会组织间的国际团结。这种思想在历史上被称为工团主义（syndicalism），这是一种草率而疏略的主张，就像铁路货车车厢用的没刨平的木头，它发迹于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并终将触怒他们。

但是它为何会如此迅猛地蔓延？答案隐藏于1889年上演的商业和政治巨变当中。该巨变可以用“3M”概括。垄断（Monopoly）：重工业的发展创造了若干个有能力吞并其他同行的大公司；这些公司对于供应方——劳动力，乃至作为规制者的政治家——具有绝对的权力。管理（Management）：未来将建造埃菲尔铁塔和泰坦尼克号的企业家登场。他们需要科学的方式来经营车间，需要保持对生产的控制，又要保证车间内部和谐。于是他们开始从科学上思考对工作人员的管理方式。军国主义（Militarism）：产业

界的势力加入了殖民地区的利益争夺，导致后来 1914 年的战争²；各地的民族主义都在加强。军事对峙和小型战争发出了暴风雨来临的前兆。

这是全球化在历史舞台首次亮相；它与今天所说的全球化不太一样。到 1889 年，有关贸易、运输和货币兑换的全球化体系已经建立，不同国家的工人的国际团结不再只是一项崇高理想，而成为一个现实问题。英国工厂里的姑娘穿着新西兰羊毛制成的披肩来保暖；南非金矿里的中国移民削价竞争，拉低了荷兰白人的工资；伯伦亚（Bolognese）工程师享用着意大利面里的阿根廷牛肉。此外还伴随着大规模的移民。从悉尼（Sydney）到西雅图（Seattle），工人在不断流动，不只从农场迁移到工厂，还跨越大陆和海洋。到处乱跑的工团主义煽动者总能找到听众，在远洋轮船的二等舱里，或是在火车的牲畜运输车厢里。

传统的工会主义（unionism）产生于一个拥有小型罢工、小型公司和本地经济的世纪，无法应对这个新世界中的庞然巨物。它缺少与垄断相抗衡的力量；科学管理削弱了工会对于培训和工资水平的掌控；数量众多的工人找不到（实际上是不想找）加入工会组织的途径。

一小部分核心活动分子努力延续了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但是经历了艰苦的斗争。“马克思主义者中的浮嚣派”曾短暂造访索尔福德街区（Salford streets），彼时那里洋溢着彼得卢（Peterloo）的共和主义，而如今这里的态度已转为敌视。罗伯特·罗伯茨（Robert Roberts）在那段岁月洗礼中长大，他回忆说：

2. 指始于 1914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译者注

我们正在争斗，他们告诉我们（借助一个从我们街角商店借来的醋桶），要挣脱身上的镣铐，解放全世界。多数人漠然走过，少数人停下来听一下，很快就走开了：也许是他们觉得所谓的“无产阶级”问题和他们关系不大？³

“阶级斗争”，罗伯茨对这个词的印象不好。它是工人阶级内部的事务：在熟练工人、半熟练工人、非熟练工人、失业者以及无可救药的酒鬼之间的争斗。社会学家被这块多层奶油蛋糕深深吸引，全球贸易中枢在蛋糕顶端熠熠生辉，那里是伦敦的港湾。然而大罢工将改变一切。

“下等劳工”：

这是 1889 年伦敦港招募劳工的方式。

我们被赶到一个铁门围起来的工棚里，外面有包工头或者承包商，像牲畜市场的商贩一样来回走动，从一堆人里挑挑拣拣，这些人为了被雇主看中而争先恐后、彼此践踏，他们在这里像野兽一样争取一天的工作机会。⁴

如果说从现在来看那种方式相当混乱，对当时的雇主而言，那却反映

3. Roberts, R., *The Classic Slum*, London: 1971, p. 28.

4. Tillett, B., *Dock Wharf and Riverside Uni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Dockers' Union*, London: 1910.

了劳动市场的高度灵活性。海洋不可预测，收成也是，贸易也一样，所以码头工人的收入也不可预测——理论上就是这样。

他们按小时被付予最低的工资，每次雇用一天。碧翠丝·韦勃（Beatrice Webb）是一位社会改革者，她徒步穿行在伦敦东区的街道，摘录下这些劳工的悲惨生活，这里距离金融区不到1英里。

一大早去了码头。正式工看起来体面又精神，衣着整洁。临时工则显得卑贱又野蛮，而且满足于自己的状态。残暴的打架斗殴正在上演，然后夹杂着粗鄙的玩笑和响亮的笑声，人群轰然退散。他们脸上是极度的冷漠；有几个人已经彻底沦丧——多么不幸的苦难……如果一个人因满身疲惫又饿着肚子而昏昏欲睡，他的同伴就会马上去翻他的衣兜，看能不能找到一个便士。⁵

韦勃没有止步于记录贫穷、醉酒和绝望。她深入这个环境，与码头工女儿一起在血汗工厂干活，她后来出版的私人日记震惊了文明社会。然而还是有部分真相因为过于残酷而没有被记录：

我在日记中隐去了对于单间廉租公寓中的乱伦风气的记述。我的一些工友竟然拿她们与自己的父亲或兄弟所生的孩子彼此打趣，这一事实令人毛骨悚然，说明恶劣的社会环境对于个体品行和家庭生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坦率地说，在那些挤在

5. Webb, B., *My Apprenticeship*, Harmondsworth: 1938, p. 345.

贫民窟的单间廉租公寓里、具备正常品行和智力的男女中，性乱交甚至性变态几乎不可避免。⁶

不是只有中产阶级里的改革者发现东区劳工的绝望和不堪。一名身为社会主义者的码头工告诉韦伯，他的工友“缺少组织能力”。因此当罢工发生时，每个人都感到震惊，除了汤姆·曼恩。

曼恩那时已年过三十。他是名熟练的工程师，坚信现有的工会无法在工业现代化的过程中生存，也无法组织起非熟练工人。当其他人都在构建理论来解释当下的形势，曼恩却渴望改变它。“时下的普通工会主义者，”他在一本写给普通工会主义者的手册中写道，“都长着颗化石脑袋。”⁷

动乱爆发于炎热的夏末。一艘船的工酬高低问题引发了一场可悲而无足轻重的纠纷。涉事工人包围了最近的工会办公室，寻求工会的帮助。他们找到了本·蒂利特，他又叫来他的两个同事，汤姆·曼恩和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两人都是社会主义者，对工会在码头上几个月不作为一直满腹牢骚。他们一起着手发动了整个东伦敦地区的罢工。

码头有其臭名昭著的阶层体系：码头工上面是装卸工，相当于临时工长。比装卸工再高些的是船工——尽管收入微薄，这些人有资格穿一种滑稽的粉红色制服。女人的地位最低，韦伯形容她们为“东区的中国佬”，也就是奴隶。在正常时节，运气好的话你能说服这些城市阶级走进同一家酒吧里喝两杯，但现在不是正常时节。一周之内，有3万名码头工，以及相

6. 同上，p. 368。

7. Mann, T., *What a Compulsory Eight-Hour Working Day Means to the Workers*, 1886.

同数量的“同盟产业”工人，加入了罢工队伍。

曼恩、蒂利特和伯恩斯在一间咖啡馆里成立了罢工委员会。曼恩的工作是站在门口，用双腿堵住去路，挡住数千名排队领取罢工补贴的工人。这些人品行低劣，好勇斗狠，从来没参加过罢工，动不动就抢劫他人。排队的人里有一支爱尔兰大军，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小分队。马恩在门口阻挡数千工人的画面给当时的记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光着膀子，汗水浸入打蜡的胡子，开着各种玩笑，冲着被笑话整懵的脑袋来上一拳，这些使他一夜成名。

大会每天召开一次，然后罢工者排着整齐的队伍出发，前往金融区周边。鉴于伦敦金融城（Square Mile）里那些精明的职员认为穷人是自作自受，与酒精和暴力为伍的罢工者预计自己不受欢迎。于是他们设计好布景，带上雕塑品，准备给那些没读过碧翠丝·韦勃的著作的人上一堂逼真的社会学课程。他们带了一只“码头工人的猫”，很瘦，还有一只“老板的猫”，很肥；类似地，码头工的子女，还有老板的子女，分别用棍子串着的玩具娃娃来表现。船工们穿着他们的粉红色制服。

蒂利特回忆，“办事员和金融城职员捐了许多‘便士、6便士和先令’，也许他们就是被队伍里这些贫困和饥饿的象征物所感动”。基督教救世军（Salvation Army）⁸不得不支持罢工，他们是坚定的反社会主义者，但在其发源地东伦敦有很高的影响力。另外天主教会也加入了。

8. 新教中从事传教与社会服务的国际性组织，1865年由英国人威廉·布斯建立，时称基督徒布道团，1878年定名为救世军，同年出版《救世军军令与军纪》，提出“为和平与仁爱而战”，并于1880年传到美国，后传到加拿大、印度等地。救世军强调纪律，模仿军队建制，教徒称军，传道人称军官，有军阶、军衔，还有军旗和军乐队。——译者注

澳大利亚帮助工人们占据了上风。强大的澳大利亚工会利用伦敦罢工事件，煽动针对英国上层社会的仇恨。他们刚开始募集了 2000 英镑，然后是 1.5 万英镑；甚至连昆士兰（Queensland）州政府也捐了钱。当罢工进入尾声，在澳大利亚码头工工会的联动下，共募集了 3 万英镑，至少相当于今天的 270 万英镑⁹。涉事的 6 万名伦敦码头工，以及他们在老鼠滋生的海滨街区的 6 万名酒友和女儿，全部加入了罢工队伍。

“码头工、驳船工、船夫、水泥工、车夫、钢铁工乃至工厂女工都纷纷走上街头。如果罢工再延续几天，”一家伦敦晚报写道，“整个伦敦城就该放假了。作为 500 万人的衣食父母，伟大的机器¹⁰即将停转，这一切该如何收场？俗话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整座都市面临烈焰围城的威胁。”¹¹

8 月 28 日，罢工委员会发表宣言，号召全伦敦举行罢工——号召工人们公开且有目的地拔掉“伟大机器”的插头。因为担心失去公众的同情，一天之后号召被撤回。几天后，在金融城银行家、船主和一位红衣主教的调解下，码头工人获得胜利。在历史的见证下，他们赢得了“码头工的 6 便士”——工酬从每小时 5 便士提高到 6 便士。但是他们的成果不止于此。伯恩斯写道：

下等劳工证明了其自我组织的能力，及其团结和才干。劳工认识到团结能让他们无往不利……他们现在明白，征服自己，便

9. 单以 GDP 平减指数量表计算。来源：<http://eh.net/hmit/ukcompare/>。如果使用平均工资计算（3 万英镑表示 3 万名码头工的平均周薪），结果更接近 1300 万英镑。

10. 这里“伟大的机器”喻指伦敦的整个工业体系。——译者注

11. *London Evening News & Post*, 26 August 1889.

能征服资本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统帅是最冷酷无情的压迫者。¹²

对于碧翠丝·韦勃,东区发生的团结是“一种新思想……改变了我对码头生活的认识”。所有中产阶级社会改良家开始明白,工人不必等待立法和演讲来推动改良。蜂拥加入工会组织的数以万计的非熟练工人同样开始明白这个道理。铁路工会一年内凭空发展到6万5千人;瓦工工会规模扩大一倍,鞋匠工会规模扩大两倍;矿工成立了全国联合会。这次运动被定性为新工会主义(New Unionism)。它的宗旨是吸引非熟练工人加入跨产业工会,以绕过那些狭隘的职业名目,在罢工中淡化职业间的差异。

汤姆·曼恩——一名工团主义者的成长:

汤姆·曼恩的生活完美诠释了非熟练工会主义崛起前英国劳工运动的蛰伏状态。青少年时期,他每星期花3晚在大学,1晚在读经班,1晚在禁酒会,星期天晚上去教堂。“当时还没有人支持社会主义,”他回忆说。”他成为一名禁酒和素食运动的鼓吹者。带着这些信念,他作为一名熟练的工程师搬到伦敦,工作是为大英博物馆切割陨石,从此天文学成为他的业余爱好。

当时工程工厂里的氛围就像今天的软件公司或设计工作室——由轻松的创新和严谨的技术控组成的环境。曼恩身边的同事有乔治·威斯汀豪斯(George Westinghouse),液压制动器的发明人,以及彼得·布拉泽胡德

12. Burns, J., "The Great Strike," *New Review*, Vol. 1, No. 5, October, London: 1889.

(Peter Brotherhood)，鱼雷发动机的发明人。以下是他对布拉泽胡德在克拉肯威尔 (Clerkenwell) 的工厂（也就是今天被称为伦敦“硅谷”的地方）所做的描述：

监工是位优雅睿智的人，开明而宽容。但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其他时间，聊天永远围绕着工作、政令、新推或待推的专利、工程师工会的发展前景、全球机械化对工程师的影响等等这些话题。这里不讨论社会问题；尽管所有人都加入了（工会）……¹³

在风平浪静、和谐安定的工程车间之外，世界正烽火遍地。曼恩是救世军的正式成员，救世军将失业归罪于酒精——然而伦敦正长期笼罩在经济衰退中，以清洁为生的工人都面临解雇。于是曼恩乘船去了纽约，在布鲁克林区 (Brooklyn) 的一家工厂里干了三个月。1884 年，美国的工会开始争取 8 小时工作日，曼恩于同年返回英格兰，在他所在的工会分会提出一项目标相同的动议。他的提案没有通过——票数是 5 对 75。

他逐渐在社会主义者讲坛上崭露头角，进而开始组织失业工人游行。他在一次示威中朗诵了雪莱 (Shelley) 的《像狮子一样站起来》(*Rise Like Lions*)，结果引发了骚乱。在此之前，他拥有“相当不错的藏书、一把小提琴和一副望远镜”。

在码头罢工之前，英国的劳工运动由曼恩这样的人主导——自我教育，以个人技能为荣，受制于工作环境，与社会主义传播者和哲学家们过从甚

13. Mann, T., *What a Compulsory Eight-Hour Working Day Means to the Workers*, 1886, p. 18.

密，鲜少接触“下等劳工”。而在罢工之后，情况有了根本的转变，正如英国工会代表大会（Trade Union Congress）1890年的记述表明：

在体格上，“老一辈”工会主义者比新一代健壮得多……他们当中许多人比较像体面的城市绅士；衣着光鲜，戴着名表和礼帽。并且，他们大都有着出色的身形体态，表现出一副虽不算傲慢也是市议员才有的神气派头。而新来的工会代表中没有一个人戴礼帽。¹⁴

全世界的“下等劳工”正在被组织起来。如果说巴黎公社标志着街头革命时代的结束，码头罢工则开启了工作场所的革命时代。工会组织自己变身为微型的公社：培训和教育工人们实现自治。曼恩和他的同志在实践中已经发现了这种途径，然而理论化工作仍留待法国人完成。

维克多·格里弗雷——工会人生之路：

当维克多·格里弗雷作为鞋匠开始讨生活时，他还是一名在动荡的法国社会中寻找机会的少年。在他1893年来到巴黎之前，他唯一加入过的组织是一个补鞋匠联谊会。但是生活中时有时无的工作、饥饿的星期五、梦想、燃烧的怒火把这个形容憔悴、一蓬乱发、目光深邃的年轻人拉进了工会运动。

14. 引自 Pelling, H., *A History of British Trade Unionism*, London: 1976, p. 104.

身为一名工匠，我遭受过重重困顿，发现谋生极为艰难，渴望结束这样的生活。身为一名雇佣劳动者，我对雇主卑躬屈膝，多么期盼着逃离剥削。但是这些渴望和期盼，只能与跟我有相同遭遇的人一起，通过持续的斗争去实现。所以我加入工会，对抗那些雇主，他们是我被劳役的幕前黑手；对抗这个国家，它是雇主的天然守护者——因为有人要从中获益。我从工会汲取了斗争的决心，在那里我认清了自己的理念。¹⁵

法国工人运动已经在转型。那些在伦敦规模很小的社会主义者俱乐部和政党，在巴黎则很壮大。法国的熟练工人工会还开始吸纳非熟练工人。原来由政府资助的劳工交流管道落入无政府主义者手里，幸亏如此，这些管道现在变成了激进分子的夜间学校和组织中心。这时的工人运动充满一股前所未有的渴望和冲动：开展一场伦敦那样的大罢工。

从1888年起，一个名叫约瑟夫·托特里耶（Joseph Tortelier）的木匠，也是路易斯·米歇尔（Louise Michel）曾经的狱友，就开始在巴黎会议大厅里发表演讲，主题只有一个：“从大罢工通往革命！”现在他感化了劳工交流运动的领导人费尔南德·佩卢提尔（Fernand Pelloutier），后者又感化了一个名叫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的记者，他们一起写了一本手册，书名是《从大罢工通往革命》（*Revolution Through General Strike*）。白里安本应做10次法国总理，拿到诺贝尔和平奖，并写下一部让法国屹立不朽的法典。然而在19世纪90年代的狂热气氛中，他的想象力转向了

15. Griffuelhes, V., *L'action syndicaliste*, Paris: 1908.

革命。他策划了一个大罢工方案，需要5年的筹备时间和4亿法郎的资金。罢工将在15天内让资本主义制度下跪称臣。

跟那种鼓动3万义军对抗20万士兵的传统革命不一样……大罢工的局面将会是：有的地方是20万工人对抗1万士兵，有的地方是1万对抗500，至于其他地方……1000或1200对抗一队宪兵。看到区别了吧？再来看看罢工者手上的筹码！交通全停，路灯全灭，大城市的给养全部阻断……¹⁶

1896年，维克多·格里弗雷加入了鞋匠工会，那一年《从大罢工通往革命》在巴黎的草根咖啡馆里被竞相传阅。两种巨变——政治激进化和工业机械化在法国社会加速上演，加剧了这种狂热。

随着军队中反犹太主义蔓延，德雷弗斯案件（The Dreyfus Case）¹⁷造成法国政界的撕裂，自由主义者将工人视为他们的天然盟友。他们实施了重大改革：公共部门的8小时工作日，劳资纠纷的强制仲裁，工会组织的法人地位。他们开出的条件是与工人合作。1899年，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成为世界首位进入民族国家政府的社会主义政治家。

16. Girard, H., & Pelloutier, F., *Qu'est-ce que la grève générale?* Paris: 1895.

17. 德雷弗斯案件：19世纪90年代法国军事当局对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弗斯的诬告案。1894年9月，德雷弗斯被人诬陷，在证据不足情况下被军事法庭以间谍罪入狱，真正的罪犯却在1898年的秘审中被判无罪。此结果激起社会公愤，要求重审的社会运动广泛开展，将法国社会分裂为德雷弗斯派和反德雷弗斯派两个阵营，直到1906年7月最高法院撤销原判。德雷弗斯案件被视为反映现代社会不公的代表性事件，常被引证司法不公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复杂因素。——译者注

在工业领域，法国早已落后于整体加速发展的世界其他地方。一个从英格兰来访的工会会员这样描述典型的法国工厂：

铸铁厂里毫无纪律可言。比如说，莫里斯（Maurice）或朱尔斯（Jules）突然想跟厂房另一头的亨利（Henry）说话，他们就马上走过去说，既不四处看看监工在不在附近，也不假装继续干活。每天早上有宝贵的 15 分钟浪费在工厂各部门的同志间握手和寒暄上……工人在厂房里完全不受约束，任何想要限制这种自由的努力，就如同薪酬和工时背后的经济地位的压迫，都会招致深深的怨恨。¹⁸

现在是 19 世纪 90 年代，莫里斯和朱里斯必须忍受大规模的现代化。甚至维克多·格里弗雷这样的鞋匠也要应对机械化的问题。

这一代人对这些变化做出的回应是排斥议会政治，甚至排至政党的概念，只依靠工会来改变世界。他们称之为工团主义，由法语里的工会一词变形而来¹⁹。摒弃掉政治、政党、理论以及开明自由主义者同盟这些概念，工人们奔向格里弗雷所谓的“工会人生之路”：

无论是源自团结还是奴役，不管你选择哪个，工团主义扎根于这所有的一切。它由斗争方式所形塑，其特征由工人行动所形

18. Steele, H., *The Working Classes in France, A Social Study*, London: 1904, pp. 16–17.

19. “工会”在法语中是“syndicats”，“工团主义”在英语中是“syndicalism”。——译者注

塑。并且我要重申：驱动该行动的并非含混的公式或理论的断言。它不遵循预先设定的方案。我必须一再强调：它就是我们某一天的作为，立足于我们在前一天的作为。²⁰

一个劳工总联合会（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ur, CGT）成立了，下设联合不同工会的多个委员会。1899年自由主义者建立了新政府，所有人都清楚，必须在两种方式间做出抉择：要么是一剂改革强心针，使工人站在政府一边对抗右翼势力；要么是工会运动与政府的角力，后果是罢工运动的集中爆发。实际上两种情况都相继发生了。

罢工潮笼罩了法国。工作日损失²¹从1898年的120万上升到1900年的350万，再到1901年的370万。1902年，劳工总联合会同意并入劳工交流运动——此前维克多·格里弗雷是劳工总联合会的领导人。一夕之间，他变得无处不在——从法国的一端奔赴另一端，组织罢工，煽动抗议。他就像汤姆·曼恩的法国化身，而且服下了强力药物。格里弗雷的工团主义的关键是它明显含有“革命性”。坐在阁楼里与小提琴、藏书和望远镜为伴的汤姆·曼恩，也许偶尔允许他自己冷静畅想一下起义的美景，但是对格里弗雷来说革命并非梦想；革命是他的唯一目的。工会和劳工交流将成为工人运动发展壮大的“健身房”，不单是为了夺取工业——在众人看来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更是为了权力的实践。

工团主义的巨大吸引力，相对于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信条而言，在

20. Griffuelhes, V., *L'action syndicaliste*, Paris: 1908.

21. 工作日损失：指罢工期间的停工总时长，相当于全部罢工者的累计停工日总数。——译者注

于其植根于工人阶级，并且对激进劳工别有意义。工团主义领导人在街头会议中的声音也许不够洪亮，但至少他们属于街头。工团主义的最大缺陷在于：如果你对其整体构想并不买账，只是希望工会能在劳动中代表你的利益，它看上去就像个骗局。今天我们知道格里弗雷曾秘密会见迷恋暴力的哲学家乔治·索列尔（Georges Sorel），但当时的工会会员对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在工会内核的影响力一无所知。

尽管1914年以前工团主义主导了法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劳工总联合会从未组织起大规模工人团体。由于多数工人在多数情况下希望自己的工会关注劳动工资、时长和环境问题，工团主义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发动大规模罢工并赢取胜利——即便是在它的全盛期。这对于一种依赖大罢工战术的运动构成了极大的障碍。所有的问题在1906年五一劳动节前夕到达风口浪尖。

利摩日——红色之城：

“夜晚，高达数米的熊熊烈火，从烤瓷炉中迸发、聚拢。这些火焰在夜晚为利摩日（Limoges）²²这座巨大的熔炉增添了魅力，制造出当时那两个美国人为之倾倒的奇观。”²³这里的奇观是指瓷器。一个世纪以来，瓷器是从欧洲的陶器工纺里出产，然而现在世界想要数以船计的瓷器。美国企业

22. 利摩日是法国中南部城市，位于维埃纳河旁的一座小山丘，是利穆赞大区的首府和上维埃纳省的省会，18世纪后成为法国陶瓷器等的工艺精品制造中心，被称为法国陶瓷之都。
——译者注

23. Body, M., *Un Ouvrier Limousin au Coeur de la Révolution Russe*, Paris: 1981, p. 16.

家西奥多·哈维兰德（Theodore Haviland）已经掌握了批量生产瓷器的方法。他的工厂确立了利摩日作为世界高端陶制品中心的地位，而他的劳动大军把利摩日变成了世界工团主义中心。不久之后，工团主义也将成为那两个美国人眼中的奇观。

如果上 eBay 搜索，你仍能找到那些极为精致的以花鸟纹饰的盘碟，它们出自走上“工会人生之路”的工匠之手。其上的纹饰不是来自手绘，而是用模具生产。在机械化取代技艺的过程中，成千上万的妇女取代男人进入工厂。在西奥多·哈维兰德的厂子里有 5740 名男工、2400 名女工和 1528 名童工。工厂采用现代生产方式。它本可以成为工厂的典范，除了一件事：监工有强奸女工的癖好。

中世纪的初夜权在法国的说法是“droit de cuissage”，字面意思是“大腿间的权利”。声名狼藉的工厂监工们认为工厂赋予了他们这种权利。1905 年，大腿的主人们觉得她们受够了。马塞尔·博迪（Marcel Body）当年还是个孩子，他回忆说：

1905 年我 11 岁时，利摩日的陶瓷工人正在举行罢工和街头游行。成千上万的示威队伍冲雇主发出阵阵嘘声。一天下午，我们正要放学的时候，听到巨大的喧闹声——那是数千人齐声高唱“国际歌”（Internationale）的声音。²⁴

1905 年 3 月 25 日，哈维兰德工厂一个名叫潘诺（Penaud）的监工开

24. 同上。

除了3名工人。他是个臭名昭著的家伙，经常在他办公室旁边的走廊上强奸女工，并且开除那些拒绝与他发生关系的女工。在一次短暂的罢工后，3名被开除的女工得以复工，但是据3月30号当地报纸的报道：

西奥多·哈维兰德先生的工厂里发生了一次小纠纷，虽然很快就解决了，但纠纷在周二再度爆发，工厂有了新麻烦，所有的漆匠都停工了。他们的要求似乎是开除他们的监工。罢工者晚间在劳工交流中心（Labour Exchange）召开了会议。²⁵

这对潘诺和哈维兰德来说是个坏消息，因为工会人生之路已在利摩日铺开。去年女性陶瓷工会已经举行过3次罢工。

这时候全厂都举行了罢工，哈维兰德的弟弟查尔斯的一间工厂也一样。那间工厂的问题是有名监工被指控加害反对教权主义的工人。目前的危机是一个更广泛的议题：究竟谁才是工厂的老大。有鉴于此，陶瓷协会（Ceramic Federation）即陶瓷企业主的联盟，宣步将利摩日的所有劳工赶出工厂，直到哈维兰德工厂的罢工结束。4月14日，32间工厂里有19间关上了大门。如一家报纸所言，目标是“阻止工人与工会在工业运营和监管中的相互勾结”²⁶。罢工突然成为一个全民故事，剧情出现了奇特的反转，咸猪手监工潘诺摇身一变，变成争取政治权利的法国德弗雷斯（Dreyfus）。

那时候，利摩日有4万名工会会员。在日常的失业工人援助行动背后，

25. Louis M.-V., *Le droit de cuissage: France 1860-1930*, Paris: 1994.

26. *Le Siècle*, 22 April 1905. 引自同上。

劳工交流中心成为焦点。由于哈维兰德攫取了劳工的社保基金，工人们需要依靠捐赠来开展活动，大量资金从全国各个城市和地区募集而来。

在哈维兰德给他的工厂插上美国国旗后，工人们将他的汽车烧成了灰烬。一枚炸弹出现在他的门阶上，引来军队进驻利摩日。4月17日，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马赛尔·博迪继续讲述这个故事：

骑兵冲锋的巨大呼喊声响起，声音飞驰而来……从学校前面经过，刀剑在空中飞舞。与此同时，示威者爬上通向艾克斯（Aixe）²⁷的马路两旁的路堤，把能用手搬起来的一切都扔到马路上。其他人破坏路堤，把大石头搬下来扔向路上的马匹。周围恢复了平静，我们可以离开学校了。我跑到巨大的路障跟前。这不是真的。这么一会儿的功夫，怎么可能有人徒手立起这样的路障？

几天之后在一个公园里，士兵们对一群喧闹的罢工者开枪，20岁的陶工卡米尔·沃德利（Camille Vardelle）身亡，其他几十人负伤。他们用刺刀捅向藏在灌木丛里的工人，马赛尔·博迪回忆说，带着一股“难以置信的愤怒”。第二天，3万人齐聚在沃德利的葬礼。格里弗雷派至利摩日的工团主义煽动者——“女市民佐尔格”（Citizeness Sorge），向工人强调运动背后的意义：

27. 维埃纳河畔艾克斯（法语：Aixe-sur-Vienne）。——译者注

我在任何地方，不管是北部、南部、东部、西部和中部，也不管是在法国还是在国外，都听见在工作的妻子和母亲发出同样的控诉：我们是雇主和监工的兽欲的牺牲品。我向以上所有的妇女致敬——你们毫无畏惧地将胸膛对准刺刀。你们的态度证明，你们深深地懂得成为一名女性无产者意味着什么。²⁸

暴力向日常生活中最宁静的角落投下了震撼弹。博迪记得他随即写了一篇随笔，在他的同学中传阅沃德利遇害的故事。在另一间学校里，孩子们向校长发起请愿，要求终止体罚。学校的黑板上出现了涂鸦：“革命万岁！”。

4月2日，哈维兰德向当地媒体发了封简短的投书：“为了终止利摩日的困境，我将在星期二重开工厂，潘诺先生被解雇了。”²⁹

工团主义的危机：

利摩日的罢工不是昙花一现。在1902年至1907年间，罢工潮席卷法国。出现了矿业和建筑业工人的全国性罢工，以及利摩日这样的全市罢工。另外还有金工要塞埃内邦（Hennebont）这类小城镇里的激烈罢工。暴力事件不时发生。

劳工总联合会发起了8小时工作日运动，巴黎劳工交流中心门前挂起

28. *Le Réveil du Centre*, 23 April 1905. 引自同 26, p. 295。

29. 同上。

一块巨大的帆布，上面绘有运动口号：“从1906年5月1日起我们每天只工作8小时。”最初，工团主义将局部罢工视为浪费精力，现在则改变观念，认为局部罢工可能是通往“伟大之日”的踏脚石……

至于劳工总联合会当前正在筹划的罢工，其特征是明确无疑的。大罢工不是单纯地拒绝劳动；它意味着为了所有人的福祉，将公司开发的社会财富转移给工会。这样的大罢工或者说革命，可能是暴力的或和平的，取决于受抵抗的程度。对全部社会生产力的控制权将会回到工人组织手中。³⁰

在10年的时间里，格里弗雷创造了一个极其有效的工会主义形态；佐以最少的实践历练和官僚机构，激进的工人便可以不时发动一台精悍而坚定的罢工机器。此外，他们的行动并非只因为受到压迫，还因为要决绝地拒绝谈判；从1905至1906年，通过谈判收场的罢工数量只上升了10%。10次罢工里有9次未经任何正式的桌边对谈：要么输掉罢工，回到工作岗位；要么就像哈维兰德的例子，雇主重开工厂并提高薪资。60%的罢工以这种方式结束，工会最终获胜。³¹

但是现在，在工人强迫雇主削减了工时、提升了薪酬、赶走了淫邪的监工后，工会要面对一种意料之外的克制。在1906年5月1日发起一场利摩日那样的有序罢工是不可能的，要发起一场——根据工团主义的信条

30. 同上。

31. Stearns, P., *Revolutionary Syndicalism and French Labor: A cause without rebels*, New Jersey: 1971, pp. 121–35.

——摧毁资本主义的罢工就更不可能了。

1906年五一劳动节的计划就此打了水漂。矿工们在4月初发动了大罢工，起因是一场造成1100人死亡的矿难。加来海峡地区（Pas-de-Calais）的矿主们派来几个团的军队以镇压罢工。劳工总联合会施展了浑身解数，使罢工蔓延到玻璃和钢铁制造业。但是罢工在鲜血、诽谤和刺刀的围剿中失败了。

内政部长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此刻亲自上阵调停劳动节罢工。通过一篇巧妙的论述，他编造了一段剧情，将劳工总联合会说成是缅怀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的顽固分子。格里弗雷争取到一次与克列孟梭紧急会面的机会，却仅是被告知：“我们处于争端的两极，我们双方的最佳选择就是坚持自己的立场。”³²5月1日前夕，克列孟梭以叛国罪逮捕了格里弗雷和整个劳工总联合会领导班子。尽管几个星期后法庭将撤销这些罪名，劳工总联合会的领导人还是在监狱里度过了劳动节。巴黎建筑工人响应了罢工号召，但大多数地方并未发生罢工。

顶住压力，劳工总联合会代表大会同年通过了一份文件，它成为工会组织历史上的一段传奇：《亚眠宪章》（*Charter of Amiens*）。在其中，格里弗雷制定了一份蓝图，从智利到中国都将见到它的副本：工会与政界划清界限，为推翻资本主义而献身，为革命性大罢工奋斗终身，坚信工会力量将接管工业。

工团主义为彻底的解放做了准备，首先必须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32. *L'Action*, 24 April 1906. 引自 Vandervort, B., *Victor Griffuelhes and French Syndicalism 1895-1922*, Baton Rouge: 1996.

它主张将大罢工作为行动的方法；它认为，今天作为一种抵抗性组织的工会，未来将成为一种生产和再分配组织，成为社会重组的基础。³³

这就是它摆脱资本主义垄断和科学管理的途径。它对抗军国主义的方案也同样清晰：“……教育工人，当权力之间开战时，工人将对战争宣言做出回应，宣布发动革命性大罢工。”³⁴

然而在1914年，当战争真正来临时，这些信条将会像精致的利摩日陶瓷一样，被轻易地击碎。

布宜诺斯艾利斯——“欧洲劣根性的浮渣”：

工人们已在面对贫穷和饥饿，然而他们要去的地方却更加险恶，爱尔兰的天主教大主教卡谢尔（Cashel）决心拯救他们。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国际化程度极高，欧洲劣根性的浮渣已在1848年革命中入侵了这座城市。我最郑重地恳求我可怜的同胞们，如果你们珍惜自己将来的幸福，永远不要踏上阿根廷共和国的土地，无论受到何种诱惑——通往舒适家园的道路，或

33. Confederation General du Travail, 1906.

34. 引自 A. Rosmer, *Le mouvement ouvrier pendant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Vol.1, p. 27.

是拥有舒适家园的承诺。³⁵

这条警告遭到了忽视。1889年2月16日,2000名爱尔兰建筑工人和农民,还有他们的妻子和儿女,从船板蜂拥而下,站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码头。从那时起,他们被卷入一种与混乱与绝望相伴的生活,其间仅有的孑生希望是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就在同一天,1000名意大利移民已经由竞争对手的船运公司转送上岸,还有成千上万的移民正在路上,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农民以及俄国和波兰的犹太人。那些不走运的移民将会被搁置在潘帕斯平原(papas)中部做佃农。如果土地可以耕作,其中一些人的子女也许能活过第一个冬天。其他人将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移民旅馆。

男人、女人和孩子一个个脸色苍白,透露出长途跋涉后的疾病、饥饿和疲惫,他们必须睡一觉,睡在天井的旗子上已经是种享受。孩子们光着身子跑来跑去。说他们遭受牲畜的待遇并不符合事实,牲畜的主人至少会提供食物和水,但这些可怜人的生死却无人过问,拿钱的官员理应照顾他们,却没提供任何帮助。³⁶

一船接一船,这就是阿根廷的工人阶级的形成方式:在1879年至1889年的10年里,每年有8.5万人抵达阿根廷;截至20世纪10年代,移民抵

35. Archbishop Croke, *Freeman's Journal*, Dublin 1889. 引自 Geraghty, M. J., "Argentina: Land of Broken Promises," *Buenos Aires Herald*, 17 March 1999. <http://www.irishargentine.org/dresden.htm>

36. Gaughran, Father M., *Southern Cross*. 引自同上。

达的速度翻了一番。截至 1889 年，阿根廷的人口已经翻番为 4 百万，截至 1914 年这个数字会再翻一番。移民路线不止一条；大约三分之一的移民乘船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港，这些人被叫做“燕子”，也就是季节性移民，跟着收获时节，从南欧迁徙到拉丁美洲，再迁徙回去。他们来这里的原因是阿根廷与巴西、乌拉圭一样地多人少，而且还是个世界粮食市场，能支付更高的薪资。

然而阿根廷不是美国；这里的经济主导权掌握在大地主和粗鲁的商人资本家手里，这些人不在乎管理理论和慈善事业。1889 年后，移民劳工薪资开始逐年降低，从赤贫公寓通往豪华宾馆的大门砰然关闭，彻底抹去了社会流动的任何迹象。

巴黎公社成立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移民团体已潜伏在布宜诺斯艾诺丝周边，这些人猛然发现无产者这种新的社会力量已经站上了他们的门阶，并且已经彻底觉醒。

在德拉奎公司的帽子工厂：

数百名女人、青少年和年龄很小的孩子正在工作。他们被这家公司雇用，还得留下现金作抵押——用来交罚款、生病时看医生，以及作为提前 8 天告知才能离厂的保证金——违者一分也拿不回来。在这家公司，许多年轻女孩子每周工作 50 小时，只能挣到 50 美分。³⁷

37. *La Protesta Humana*, 3 September 1899. 引自 Abad de Santillan, D., *La F. O. R. A.: ideología y trayectoria*, Ch. 3, Buenos Aires: 1933.

制帽工人最早开始罢工。爱德华多·吉利蒙是个从巴塞罗那（Barcelona）移民来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回忆说：

各种烦恼伴随着我那艰难的港口生活，我那没有乐趣的生活，缺少刺激的生活，囚禁在简易城市的小房子里的生活——这些烦恼超出了只为谋生的人所面对的问题，而且每况愈下……精英们的财富滋生了强烈的阶级仇恨。³⁸

这是一批奇特的劳动大军，他们不是由大型工厂而是由运输业和农场企业聚集而成。这些人当中包括建筑工人、牧场工人、码头工人、女裁缝和水手——具备工团主义运动的人口学典型特征。行业工会（craft union）尚未成形，也无须煽动阿根廷工人戳破议会政治的假面，因为他们原本就是旁观者。一个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走廊上都可能迷路，因此这座城市成为无政府主义流亡者的避难穴，煽动分子群体迅速扩张，从而确保了劳工运动像在意大利南部或加泰罗尼亚（Catalonia）那样，接受无政府主义的显著影响。

1901年5月，阿根廷劳工联合会（Argentine Labour Federation, FOA）成立，联合了27个被称为抵抗协会的当地工会组织。这时候劳工联合会里既有社会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不过在其第二届代表大会中，长期居于少数的社会主义者退席了。当时的联合会只有6000名工人会员，但是罢工仍然爆发了。1902年7月，先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码头的装卸工发动

38. Gilimón, E., *Un Anarquista en Buenos Aires: 1890-1910*, Buenos Aires: 1971, p. 28.

了罢工，随后是中心水果市场的搬运工罢工。一连串的小型罢工突然爆发，包括铁路工人的声援行动。这些并非革命性罢工；装卸工不过是想让生产袋的平均重量从 100 公斤降低到 65 公斤。水果搬运工希望“每四天结算”变为每天或每半天结算。这些要求与最初引发伦敦码头纠纷的申诉本质上是一样的。

两次罢工都以胜利告终。但这时候阿根廷政府陷入了恐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将几千名士兵派往街头。1902 年 11 月，《居留权法》（*Residency Law*）被匆忙通过，授予政府将无政府主义者和罢工组织者驱逐出境的权力。《居住权法》激起了政治性的大罢工，其结果是大规模抗议、更多的罢工以及更加激进的工会。联合会在 1905 年前已更名为阿根廷地区劳工联合会（FORA），表示其拒绝接受阿根廷作为一个国家概念。联合会于同年通过的章程让英国劳工总联合会的《亚眠宪章》相形失色。它教给每一名工会会员——

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经济哲学信条。该种教育避免了工人的注意力仅集中于 8 小时工作日，从而让他们彻底地解放，最终走向期望中的社会革命。³⁹

战前罢工潮将在 1907 年到达顶峰，期间共发生 231 次纠纷，涉事工人数量超过 17 万。潮闷欲滴的空气，回荡在公寓天井里的操着意大利语、加

39. 引自 Oved, Y. "The Uniqueness of Anarchism in Argentina," in *Pensamiento Político en América Latina*, Estudios Interdisciplinario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Vol. 8, No. 1, Tel Aviv: 1997.

泰罗尼亚语和依地语的政治激辩，再加上完全死寂的社会流动，无不制造出一种革命势必将在阿根廷海滨城市发生的气氛。在罗萨里奥（Rosario）的马车夫罢工期间，因为一次声援罢工（solidarity strike），整个国家铁路系统都受到了冲击。在派去的海军陆战队员对巴伊布兰卡（Bahia Blanca）的罢工者动粗后，全国各地的工程人员都走上了街头。阿根廷以前从未有过全国性的声援罢工，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手册里的特权阶级在劳工中还不多见。吉利蒙回忆说：

那些将“社会问题”归结为贫穷问题的人——认为只有饥饿才会导致人们的反抗，无疑会对这些铁路工人和工程师的罢工感到惊讶。在团结精神的感召下，他们从未动摇，尽管罢工可能会毁掉他们自己相对舒适的生活。这为另一项有重大意义的社会运动奠定了基础：抗租罢工。⁴⁰

1907年以前，在稍微远离主干道的地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区就是民怨现场。爱德华多·怀尔德（Eduardo Wilde）是一名医生，他如此描述杂屋（conventillo）里的生活：

那些容纳了从乞丐到小商贩的形形色色的人的公寓被称为“杂屋”。它有一道通向天井的小门，一扇窗户，别的就没有了。它是个4平米的屋子，包含以下用途：它是男人、女人和“小鬼

40. Gilimón, E., *Un Anarquista en Buenos Aires: 1890-1910*, Buenos Aires: 1971, p. 84.

头”(nipper)的卧室——“小鬼头”是他们的俚语,指的是五六岁大脏兮兮的孩子;另外它还是厨房,食品储藏室,孩子玩闹的地方,以及出恭之所——至少临时这么用。它是个堆满旧衣服(以及新衣服,如果他们有的话)的垃圾堆,狗窝,浴室,储物室,晚上点油灯或蜡烛的地方。总之,每间屋子都是个藏污纳垢的所在,5个甚至更多人住在里面,完全不管任何卫生的、社会的和品位的准则。事实上,如果你试图设计一个违反所有公共卫生准则的地方,你绝不可能比杂屋的建造者干得更漂亮。⁴¹

地球上每个城市的贫民窟都存在类似的状况,但却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大型革命性无政府主义。面对病态的、扩张的天主教系统,南欧的无政府主义者一直努力在工人阶级地区——学校、俱乐部和合作商店——建立替代性制度。如此,1907年的决战在街区而非工厂里发生了。

在一个明媚的早晨,一间杂屋里的居民决心不再缴纳房租,除非得到减租。有一半的人将这种决心当成玩笑,然而它很快就不是玩笑了。拒缴房租的想法传遍了每间杂屋,几天之内所有无产者人群都听说了罢工的消息。杂屋变成了俱乐部。各地出现了街头示威,警察无法杜绝这些活动,怀着可敬的组织精神,

41. Wilde, E., *Obras Completas*, Buenos Aires: 1895, Tomo II, pp. 29–30. 引自 Suriano, J., *La huelga de inquilinos de 1907*, Buenos Aires: 1983.

委员会和分委员会在首都各地区纷纷成立。⁴²

抗租罢工蔓延到其他的主要城市，多个委员会随之成立，以运作罢工和推进罢工诉求。诉求包括：房租下调 30%，对杂屋进行清洁，取消押金和预付租金，罢工者不被驱逐。与利摩日罢工一样，孩子们也自发加入了反抗。

300 名不同年龄的男孩女孩在拉博卡（La Boca）街区举行了游行，手里拿着扫帚，喻意是“清理公寓”。当示威队伍抵达一处杂屋时，与另一支年轻人队伍合并，合并时获得公众的热烈鼓掌。⁴³

罢工持续了 3 个月，又一次以军队的血腥镇压告终——有些情况下 300 名士兵一起冲进一个大杂院。数以百计的抗租罢工者被驱逐回欧洲。然而麻烦很快又会回来。

世界产业工会：

大比尔·海伍德大难临头。他已被绑架，被拖过州界并送进牢房关了一整年。此刻，爱达荷州博伊西市（Boise, Idaho）的审判室里温度高达

42. Gilimón, E., *Un Anarquista en Buenos Aires: 1890-1910*, Buenos Aires: 1971, p. 84.

43. *Caras y Caretas*, No. 468, 21 September 1907. 引自 Suriano, J., *La huelga de inquilinos de 1907*, Buenos Aires: 1983.

90 [华氏] 度，美国媒体似乎已全部到场观看他的绞刑。审判室四周的墙上挂满了著名侦探和政治家的巴拿马礼帽，帽子的主人们看上去异常得意。当时是 1907 年 7 月，媒体的标题是“当代最伟大的审判”，议题是“劳资斗争”。海伍德知道等待他的会是什么，他已是经历过工会与落基山脉（Rocky Mountains）煤矿主之间的 20 年战争的一员老将。他组织的是一群坚强的受害者。

矿工们每天在加工厂、冶炼厂和矿井工作 12 个小时。置身于致病甚至致死的神雾之中。神是有毒的。它使人手脚瘫痪。它导致牙齿和头发脱落。在矿井工作的人长相怪异：他们面容憔悴，脸颊深陷，睫毛和眉毛掉光，皮肤发青。⁴⁴

海伍德被起诉的官方罪名是操控 2.7 万名不守规矩的斗殴和投机分子的会费；非官方罪名是作为暴力罢工运动的人类祸首。他被称为“大比尔”是有原因的，他身高 6 英尺，有强壮的下颚和惊人的食量。他在幼年时失掉了一只眼睛，但不戴玻璃假眼，留着空眼眶。

他的战场始终是美国西部的硬岩矿业城镇，从加拿大边境延伸到墨西哥边境，城镇名诸如特柳赖德（Telluride）、戈德菲尔德（Goldfield）和莱德威尔（Leadville）⁴⁵。爆炸、破坏、贿赂、谋杀，这些都是双方通用的手段。矿工工会把世界最大的白银加工厂炸上了天；把 13 名罢工运动破坏者

44. Jones, M. H., *Autobiography of Mother Jones*, Chicago: 1925.

45. 地名都与矿物有关，Telluride 意为碲化物，Goldfield 意为金矿，Leadville 意为铅地。——译者注

连同他们候车的火车站一起炸上了天。另外在 1905 年 11 月，一名工会组织者哈里·奥查德（Harry Orchard）在弗兰克·斯图恩伯格家门口装了一枚炸弹，也把他炸上了天；斯图恩伯格 5 年前已从爱达荷州州长的职位上退休，但矿工们没有忘记他做的一切。

落基山脉的州长们调来了联邦军队，宣布军事戒严，在木头路面上架起机枪。他们将罢工的矿工赶入“牛栏”——简陋的集中营。当初正是斯图恩伯格发出宣言：“我们已扼住魔鬼的咽喉，我们将令它窒息。任何折中方案都不可接受。”此刻，海伍德正因谋杀斯图恩伯格而接受审判，因为奥查德良心发现，转为联邦的污点证人，并指认他为同谋。

陪审团的成员是虔诚的爱达荷州农民。海伍德被逮捕时，正赤身裸体与他的妻子的妹妹睡在床上，而且手边有一把“大个儿的左轮手枪”——这一事实无助于他的案情。辩护团中已经混入了平克顿侦探事务所（Pinkerton detective agency）的密探。工会唯一的指望是辩方律师克拉伦斯·丹诺（Clarence Darrow）的语言能力。

丹诺日后将作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刑事律师而名满天下，但此时他还默默无闻。他心知肚明，在陪审团眼中海伍德已经是个死人，因此他向陪审团发表了一段演讲，主题是全球范围内的工会组织。

我想对你们说，陪审团的先生们，不属于工会组织、也不属于产业工人的爱达荷州农民们，我想说的是，如果不是因为世界工会组织，不是因为英格兰工会组织，不是因为欧洲工会组织，不是因为美国工会组织，你们今天本应是欧洲的农奴，而不是

自由人。⁴⁶

当丹诺开始最后的辩护时,除了爱达荷州政客的妻子们晕倒的声音,审判室里是一阵难熬的沉默:

我不是想对面前的陪审团说劳工组织是无辜的。我太了解劳工组织都做过什么了……但是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尽管通常遭人白眼,势单力孤,漠视法律,劳工组织却在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他们为弱小者代言,他们为法令全书中的每一条人类法代言。我不在乎这些弱小、粗鲁、野蛮、目不识丁的人,这些对其他力量知之甚少、依靠自己强壮右臂的暴力的人,究竟犯下了多少罪行……我知道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⁴⁷

如果海伍德当年被绞死,这段演讲会被奉为法庭辩词的经典之作,然而自从海马基特审判(Haymarket trial)⁴⁸ 20年来,有些情况发生了变化。

46. University of Missouri-Kansas City Law School, Haywood Trial, Defense Summation.
<http://www.law.umkc.edu/faculty/projects/ftrials/haywood/haywood.htm>

47. http://www.law.umkc.edu/faculty/projects/ftrials/haywood/hay_sumd.htm

48. 海马基特审判: 1896年5月,在伊利诺斯州海马基特广场,工人为争取8小时工作日举行和平劳动示威,有人向阻碍示威的警察投掷炸弹,引发枪击事件,造成7名警察和至少4名平民死亡。在随后举行的公开法律诉讼中,8名无政府主义分子被列为共犯,其中7名被判极刑,1名被判入狱15年,没有找到投放炸弹的元凶,判决缺少明确的证据。在一系列重审后,两名共犯自杀,两名被处绞刑,其余四人被赦免。海马基特审判一般被视为促成国际五一劳动节的标志性事件。——译者注

全球工会运动对知识分子的领导的拒绝，以及它对穷人的坚持不懈的支持，已经激发了普通人的兴趣，甚至在美国蛮荒地区也是如此。陪审团做出了裁定：“无罪。”

在落基山脉沿线的采矿营，准备用于报复行动的炸药现在被“成吨”引燃，纯粹为了刺激取乐。海伍德回忆说：

我后来去了戈德菲尔德，他们带我看了红木酒吧里的凹痕，那是在庆祝我获释的沙龙上，男孩们跳舞时的鞋钉留下的。这种场合他们会喝掉多少威士忌完全无法估计。⁴⁹

比尔·海伍德在狱中进行了大量思考，他从被告席离开时脚步轻快，就像个脱胎换骨的人。

甚至在他被捕前，大比尔已经开始拓宽他的视野。1905年6月，矿工工会成立了一个更广泛的组织：世界产业工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IWW）。在联盟组建期间，海伍德一直思索着与曼恩和格里弗雷同样的问题——非熟练工人与正式工会之间的鸿沟，只不过该问题在美国尤为严重。附属于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FL）的正式工会不接纳非熟练工人——包括黑人、妇女以及正在重塑美国的数百万移民。美国劳工联合会，海伍德说：

不能代表工人阶级。有些组织……附属于劳工联合会，在其

49. Haywood B., *Big Bill Haywood's Book*, New York: 1929, p. 219.

章程和细则中，有的禁止有色人种入会；有的禁止外国人入会。我们当前想要建立的是一个对所有赚取生计的人敞开大门的劳工组织，无论他们是通过脑力还是体力劳动。⁵⁰

在采矿营里，海伍德用一种奇特的沙龙酒吧风格解释这种理念。他会伸出他的手，张开五指。“美国劳工联合会好比是这个……”接着他会掰着指头列举各种技艺和等级。然后他会攥紧拳头大喊：“世界产业工会好比是这个！”但是要向落基山脉东线出拳，矿工们需要城市盟友，于是他们拉拢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混杂联盟，又联合了啤酒工人工会，一起发起了世界产业工会。对于16岁的纽约州人伊丽莎白·格利·弗林（Elizabeth Gurley Flynn），这种诱惑是难以抗拒的。

那些[社会主义的]领导人，恕我直言，都是教授、律师、医生、牧师，都是中年和老年人，我们感觉到一种渴望，渴望一些更积极、更进步、更具活力的事物，因此我们蜂拥加入了新的组织——世界产业工会。⁵¹

弗林回忆，会员来自两个不同的社群：芝加哥东部工厂里的外国非熟练劳工；芝加哥西部说英语的牛仔、矿工、水手和伐木工。他们的共同点是缺少根基。立足于这些无依无靠的外国人和美国人，世界产业工会发动

50. Haywood, B. 同上, p. 181。

51. Gurley Flynn, E., *Memories of the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1977. <http://www.geocities.com/CapitolHill/5202/rebelgirl.html>

了一项使其常驻于美国人想象的运动。

他们被称为“世界产业工会会员”(Wobblies);该别称的由来有所争议,不妨试试用浓重的中欧口音念一下 IWW⁵²。他们的口号是“一个大工会”:通过为各经济分支的工人设立各“产业部门”的统一组织,体现跨越不同肤色、技艺和大陆的团结。它与发起劳动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的思想如出一辙,但是它现在掺杂了外国人的自觉无政府主义以及山地人的半自觉无政府主义。在海伍德入狱的那一年,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为美国工人阶级开创了两项记录:首个公社在内华达州戈德菲尔德成立,以及首次静坐罢工,地点选在通用电气斯克内克塔迪(Schenectady)样板厂的雅致的矮楼丛中。“在产业界,通过组织而引发的释放潜能方面的神奇变化莫过于此了,”通用电气当年发布的手册如是说——他们说的是生产流程,然而这话用来形容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也同样恰当。⁵³

海伍德获释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整肃当时有6万人之众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组织。在接下来的4年里,世界产业工会照亮了美国下层工人阶级。与法国的工团主义者一样,他们相信“以产业的方式组织起来,我们正在旧形态中孕育新的社会结构”⁵⁴。

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为美国开辟了“工会人生之路”,并在其中融入了美国梦的原始意象——流浪的独行者。他们拾起在“丛林”(移民工人的临时

52. 这里作者暗示 Wobblies 这个称呼来可能来带中欧口音的 IWW 读音, I-W's。——译者注

53. American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Engineers, *Schenectady Electrical Handbook*, Schenectady: 1904. <http://www.schenectadyhistory.org/resources/seh/ge.html>

54. St John, V., *The I. W. W.—Its History, Structure and Methods*, Chicago: 1912. <http://digital.library.arizona.edu/bisbee/docs/019.php>

宿营地）自然生长的共产主义，并对它进行组织，在一些州，没有工会会员卡的人甚至都不能从集体咖啡壶里倒咖啡喝。他们在人的工作形态之上加塑了另一层政治形态。“任何地方你都可以直接行动，包括监狱，”建筑工人杰克·米勒（Jack Miller）回忆说。

他们将一群世界产业工会会员送上岩石堆，让他们把岩石敲碎。他们敲碎一块巨石，把碎片当做纪念品四下传递。接着他们敲掉锤柄，把它们扔过围栏。碎石行动完毕……⁵⁵

米勒写道，如果他没有成为一名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他可能已经是一名罪犯。他已远离了宗教，也就不再担心地狱的威胁。然而他所描述的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之路回荡着千年宗教的梵唱：

我们不是在旧形态中建造新楼房、新城市和新国家——我们要建造新世界。这只能依靠我们工人阶级自己来完成，还有什么任务比这更伟大，还有什么事业比这更激动人心吗？

世界产业工会的理念不仅对西部拓荒者有效，对那些乘船抵达埃利斯岛（Ellis Island）和纽约的疲倦、贫困和瑟缩的民众同样有效——并且它第一次为移民描绘了他们在美国的未来。

当然，作为世界性组织，世界产业工会只是以美国职业棒球世界系列

55. Miller, J., in Bird, S., Georgakas, D., & Shaffer, D., *Solidarity Forever: The IWW: an Oral History of the Wobblies*, London: 1985, p. 40.

赛的形态存在——以美国为根本，但也在其思想落地生根的国家举办有影响力的“小联赛”。成立后的一年内，它在加拿大发展了 6000 名会员。到 1907 年，它在澳大利亚也初露头角。从落基山脉来的流动矿工在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成立了工会“俱乐部”。到 1909 年，澳大利亚的世界产业工会会员发现自己卷入了 20 世纪该地区首次大型工会冲突。就在那里，汤姆·曼恩重新登场了。

澳大利亚布洛肯山丘——汤姆·曼恩的坟墓：

墓穴是新挖的，周围荒凉的地貌只能在月亮或澳大利亚内陆找到。面对着小土丘上的一台照相机，3 名警察摆着姿势，身穿英国警察那样的制服，不过换上了白色头盔来防晒。其中 1 名警察拿着步枪。墓碑是一支木棍十字架，墓前是用 1 英尺高的石头字母拼成的“Tom Mann”。为了让伤害升级为羞辱，一个啤酒瓶插在这位终身禁酒主义者的安息地之顶。如果他确实已经死去，想必也会在墓中辗转反侧。然而他并没有死，并且充满活力，而保存在澳大利亚政府档案里的那张照片，不过是个宣传噱头⁵⁶。布洛肯山丘（Broken Hill）的罢工形势正在恶化。

1908 年 9 月 30 日，汤姆·曼恩应联合工会委员会（Combined Unions Committee）之邀前往布洛肯山丘，助其对抗镇上的矿业公司——必和必拓（Broken Hill Proprietary, BHP）减薪 12.5% 的方案。工会会员分散不齐，行业界限分明。水手工会分会设在最近的港口以北 300 英里的地方，证明

56. http://www.peoplesvoice.gov.au/stories/nsw/brokenhill/brokenhill_c.htm

这个喧闹繁荣的小镇正面临流动和碎片化。曼恩从加强团结开始入手。

我们开始行动，在工会分会召开特别会议，邀请其他工会的会员参加。焦点落在团结的迫切性上。还有针对妇女的会议，选在她们方便的时间召开。另外还有街角会议，为了与不太能参加室内会议的部门取得联系……几个星期后，这样的努力带来了彻底的改变，没过多久，大部分符合资格的人都加入了工会。⁵⁷

接下来，曼恩去了皮里港（Port Pirie），这里有必和必拓公司的冶金工厂。冶金工人每天工作8小时，每星期工作7天。工作是拖拉用马车装载的沉重矿石，然后把矿石倾倒在熔炉里。没有任何健康和安全规章，没有工会，没有假期：“最强壮的人也撑不过一年，到时候就会丧失劳动能力。”曼恩知道布洛肯山丘的争端会走向失败，除非有冶金工人的加入。“我一眼就看到关键所在，首先要充分唤醒他们的自尊，这样他们就会对自己默默忍受的处境感到羞耻。”⁵⁸在第一次大会上，冶金工人充满热情地聆听曼恩的讲话，直到他提出将7天工作周压缩为6天。但是又经过两周的鼓动，“我们争取到98%的人加入，一致同意6天工作周的要求”。

在劳动仲裁的努力失败后，罢工开始了。罢工持续了5个月，引来数百名荷枪实弹的警察进入布洛肯山丘。这对曼恩来说是一次改变一生的经历，因为在伦敦码头罢工20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主要在政界活动，

57. Mann, T., *What a Compulsory Eight-Hour Working Day Means to the Workers*, 1886, p. 186.

58. 同上, p. 188.

很少参与直接行动。在伦敦的时候他曾经被弗雷德里克·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形容为“一个和善真诚的家伙……就是没骨气”。他协助成立了英国工党（British Labour Party）。之后他去了南非和新西兰，给自己找了份工作，组建澳大利亚工党（Australian Labor Party）。倘若他真的没有骨气，到1909年4月他就应该一直坐在议会里。但是他现在却蹲在一间牢房里，此前警察介入并终止了矿工在布洛肯山丘周边的定期游行。“有10分钟的时间，我感受到从未体验过的活力，我是它的一部分，”他后来回忆说。

他得以保释，条件是他不再参与罢工，但自从布洛肯山丘被划为南澳大利亚（South Australia）与新南威尔士的州界，矿工就计划组织一列乘坐4000人的火车驶向边境的隔离墙。曼恩站在边境线的一边讲话，人群站在另一边。在那之后他实际上被逐出了布洛肯山丘，他只能从边境线上观望，眼看着罢工平息，变成不上不下的妥协。但是曼恩自己，20年来身作为一名安静的劳工运动整合者，获得了新生。

我更真切地认识到完善产业组织的迫切性。我清楚地看到，经济组织对于实现经济自由是不可或缺的。各个工党的政策无法就这个问题给出承诺，即便再佐以现存的各类工会组织的政治活动也不能。⁵⁹

在此期间，一本小书落入曼恩在墨尔本雅拉河（Yarra river in Melbourne）畔的家中邮筒。书名是“社会主义速成”（Socialism Made Easy），

59. 同上，p. 193。

邮件来自纽约哈德逊河（Hudson）畔，作者是世界产业工会活动分子詹姆斯·康诺利（James Connolly）。康诺利将因为领导 1916 年都柏林（Dublin）复活节起义（Easter Rising）而被载入世界史册，但此时他正专心致志于工团主义。小书富有诗意和宗教色彩，是在歌颂发源于自我教育的工人群体的工团主义。“征服政治国家的斗争，”康诺利写道，“不是战争，它只是战争的回音。真正的战争是为了争夺产业控制权而做的斗争。”

这种思想的力量……怎么高估都不为过。它为寻常的阶级斗争事件中的肮脏细节注入了新的美学意义，它将这些事件还原并呈现为光明与黑暗两军对垒时的遭遇战。⁶⁰

1909 年底，曼恩在南澳大利亚和维多利亚（Victoria）的工会分会演讲，主题是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工团主义经验。1910 年 2 月前他乘船返回英格兰。

当他于 1910 年 5 月 10 日踏上伦敦维多利亚港的码头区时，他对一群等候他的社会主义者说的第一句话是：“咱们去看看直接行动的人们。”5 月 30 日，他前往巴黎开展为期两周的访问，期间他给所有劳工总联合会的领导人发表了讲话，并在几次会议中做了发言。在此之前，格里弗雷已经被迫下台，代替他的领导人是更温和的莱昂·茹奥（Leon Jouhaux）。曼恩与格里弗雷的支持者们展开了定期通信，然后他返回了英国。

1910 年 7 月前，他准备好了新报纸——《产业工团主义者》（*The In-*

60. Connolly, J., *Socialism Made Easy*, Chicago: 1909.

dustrial Syndicalist) 的首期内容。其中一篇文章是曼恩自己写的, 文章解释了垄断的形成、行业工会面对垄断时的危机、世界产业工会与劳工总联合会的策略差异, 以及一个按照工团主义者路线重组英国工会的计划。

团结! 这是马克思很久之前的建言, 但我们从未完全付诸行动。现在是时候行动了, 而且我们要在英格兰实现它。我们要让他们见识一下恶魔的舞蹈, 让他们看看不列颠群岛的工人是否具备精神和勇气。⁶¹

不管人们如何评论他的政治风骨, 曼恩的政治直觉没有出错: 1910 年的夏天标志着全世界罢工潮的开端。直到罢工潮结束之前, 尽管未被列入任何现用词典, 工团主义已经是媒体上最热门的话题。根据一家已停刊的商业杂志的报道, 它会“让世界直面现代文明的最大危机——也许是任何文明的最大危机”⁶²。

大动荡:

历史所称的大动荡 (Great Unrest) 最早发生于巴塞罗那。1909 年, 西班牙政府召集预备役军人镇压了摩洛哥的一次起义。7 月 25 日, 工人团结工会——代表当地 112 家工会组织的一个工团主义者委员会, 在加泰罗尼

61. Mann, T., “Prepare for Action,” in Brown, G. (ed), *The Industrial Syndicalist*, Nottingham: 1974, p. 53.

62. Boyle, J., *The Minimum Wage and Syndicalism*, Cincinnati: 1913, p. 87.

自治区首府发起了总罢工。这是一次近乎完全的罢工，就连安塞尔·莫洛伦佐（Anselmo Lorenzo）这样的老牌无政府主义者都感到震惊。“发生的事情太不可思议了。巴塞罗那爆发了一场社会革命，而且它是由人民自发的。没有人煽动。没有人领导。不是自由党，不是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不是共和党，不是社会主义者，不是无政府主义者。”⁶³

罢工演变为为期一周的武装暴动。在无政府主义鼓舞下，工人们摧毁了70座教堂和修道院，它们是天主教会与西班牙上层阶级统治彻底勾结的廊桥，一部分工人甚至掘开了修士和修女的墓穴，将他们的尸体拖出来游街。军队从城外开来，至罢工结束共有8名士兵和至少104名工人死亡，该事件被称为悲剧的一周（Tragic Week）。

1909年8月2日，瑞典最大的工会组织联合会呼吁制造业和运输业工人举行罢工；3万人响应号召，坚定地开展了一个月的罢工。与西班牙的罢工不同，瑞士的工会组织维持了总体秩序。罢工失败了，数千名工人被捕。

1910年5月，阿根廷发生了一次计划未遂的大罢工。罢工安排在国家独立100周年期间，目的是破坏纪念活动，后来被大规模逮捕和军事管制措施所阻止。爱国青年团伙突袭了工会的办公室，放火烧了激进的印刷厂。数百名工会积极分子被杀害，阿根廷还专门通过了一项法律，防止无政府主义者移民国内。

1910年9月，隶属于威尔士联合企业（Cambrian Combine）的南威尔士煤矿的矿工发动了罢工，要求释放800名被捕的工人。大比尔·海伍德此时正在欧洲访问，汤姆·曼恩的追随者带他与罢工工人见了面。他做了

63. 引自 Bookchin, M., *The Spanish Anarchists: The Heroic Years 1868-1936*, New York: 1977.

千篇一律的演讲，先伸出五根张开的手指，再攥成拳头。

我跟他们讲了我们在西部的行动方法，那里的煤矿及其周边的每名雇工都属于同一个组织；当我们发动罢工时，那里的煤矿会倒闭。他们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出色的体制。⁶⁴

3万名矿工成立了纠察队，将石块砸向管理人员，几天之内就占领了矿业镇托尼潘迪（Tonypandy），直到被军队驱散。罢工行动持续了一年还是失败了，但那时仍旧极为保守矿工们对消极的工会主义充满热忱——如今可以看作汤姆·曼恩的工团主义运动的功劳。

1910年10月，法国铁路工人举行罢工。这是法国在战前最接近工团主义者梦寐以求的大罢工的一幕。然而，目前法国政府的管理者——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正好是一名大罢工专家。作为19世纪90年代的社会主义梦想家，他曾制定过一个大罢工方案；作为世界大战前夕的议会自由主义者，他又调来军队破坏罢工。但是三天之后，白里安不得不求助于全体铁路工人，征召他们入伍来结束罢工行动。比尔·海伍德也出现在那里，后来还向一名纽约来的幸灾乐祸的看客讲述了罢工中的种种破坏活动。

大苹果城〔纽约市〕自身也经历了大动荡的洗礼。1909年7月，三角女衫厂（Triangle Shirt Waist Factory）的150名制衣女工被解雇，一次会议为此召开，塞缪尔·冈珀斯（Gompers）作为行业工会组织（craft trade union）首脑和调停大师参加了会议。在他就大动荡的非正义性发表讲话的

64. 引自 Kornbluh, J., *Rebel Voices: An IWW Anthology*, Chicago: 1987, p. 45.

时候，大厅后方的一名年轻的犹太裔女裁缝站起身来。她讲依地语，语速很快，她说她厌倦了空谈，希望发起一个全体服装行业的大罢工。工会组织者爱丽丝·亨利（Alice Henry）讲述了后面发生的事：

从纽约和布鲁克林的每一家女装厂里，女孩子源源不断地涌出，塞爆了东区的狭窄街道，挤满了位于克林顿厅（Clinton Hall）的总部，又流往附近的24个小厅。她们就像支强大的军队，在夜晚高举义旗，召唤人们倾听。⁶⁵

1911年，大规模罢工激起的巨石落到了英国头上：大罢工在利物浦爆发，水手和码头工的大规模罢工席卷英国和爱尔兰，同期还有詹姆斯·康诺利在都柏林和贝尔法斯特（Belfast）的码头区煽动的罢工行动。在南非，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们发起有轨电车工人罢工；在布洛克山丘，矿工们再次发动罢工。在西班牙，毕尔巴鄂（Bilbao）的金属工人发动大罢工，并引发巴塞罗那的声援罢工。

1911—1913年将会是工团主义的顶峰期——不是因为工团主义工会领导了罢工，恰好相反，是因为他们的队伍随着成千上万名非熟练工人的挤入而迅速壮大，工团主义者此刻接受了传统工会联合会的召唤。

那么，工团主义在其全盛期究竟做到了什么？它将非熟练工人引入工会，其结果是在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法国、阿根廷以及美国部分地区，今天的劳工运动明显背负着当年成立的那些组织的烙印。它领导了大规模

65. Henry, A., *The Trade Union Woman*, New York: 1915, p. 93.

罢工，激发了大罢工，但很少是工团主义理论设想的那种罢工——蔓延以致危及国家的暴动。那些真正危及社会秩序的罢工被军队轻易地降服，这证伪了佩卢提尔和白里安的革命数学理论，他们曾假设军队无法终结大罢工。他们也未曾占领和管理工厂——除了戈德菲尔德和内华达这样的边陲城镇之外；他们的实践领域是社群和自我教育的工人阶级。尽管如此，他们有一项难以抹灭的成就：他们将工会人生之路深筑于工厂、街区和公寓楼。他们证明工团主义能够在传统工会主义者已经放弃或死寂的地方生根发芽。通过将主宰工人命运的艰苦经济现实与他们的梦想联接，他们做到了这一点。就此而言，他们在马萨诸塞州的劳伦斯（Lawrence, Massachusetts）最为成功。大动荡顶峰期的那次罢工震惊了新英格兰（New England），它是工团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的劳工运动中的一枚勋章。

“面包与玫瑰”罢工：

弗雷德·比尔（Fred Beal）在15岁时第一次走上工会人生之路。他当时在梅里马克（Merrimack）河畔的一间毛纺厂里做工。国家刚通过一项法律，将一周工作时间从56小时缩减至54小时。羊毛厂的工作艰辛而枯燥，因此一般情况下马萨诸塞州劳伦斯的工人们本来会欢迎这种变动，然而雇主们降低了工资来应对工时的减少。当比尔步履蹒跚地走出工厂，走入一月刺骨的寒气中，他注意到一个男人站在临时演讲台上高喊着什么。

他言辞激烈地宣称，我们纺织工人是工薪奴隶，所有的工厂主

都是《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⁶⁶里的西蒙·格利(Simon Legree)那样邪恶残忍的驱使奴隶的人。这一点对我来说很新鲜,因为我一直认为只有有色人种才可能当奴隶……爱尔兰工人不喜欢这名演讲者;意大利人则很喜欢。爱尔兰人用手兜成喇叭,每次意大利人一鼓掌他们就大声鼓噪,嘴里嚷嚷着:“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国家,就滚回你原来的地方去!”⁶⁷

这就是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们要面对的状况。劳伦斯是一座纺织镇,却不是一座工会镇。来自25个不同国家的人在毛纺厂里工作。它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初代移民的大熔炉,这些人因过度贫穷而充满希望,罢工则成为一种困扰;狭小的公寓里满是嗷嗷待哺的孩子,养家糊口已经够他们忙了。赶上发薪日,比尔回忆说,全副武装的警卫“像平常的星期五一样”把装满工资支票的箱子推到排队的工人面前。

人们操着各种语言叽叽喳喳聊个不停,比划来比划去。我跟济

66. 《汤姆叔叔的小屋》是美国斯托夫人于1852年发表的一部反奴隶制小说,其中关于非裔美国人与美国奴隶制度的观点曾产生过意义深远的影响,被认为是刺激1850年代废奴主义兴起的一大原因,并在某种程度上激化了导致美国内战的地区局部冲突。汤姆是书中主人公之一,在其主人圣克莱尔去世后被卖给了凶恶的奴隶主西蒙·格利。虽然饱受折磨,汤姆坚守了对基督的信仰,并在死前感化了虐待他的两名监工。汤姆在书中顺从、坚忍并忠心于白人主人的形象一度成为社会对黑人的刻板印象的一部分。——译者注

67. Beal, F., *Proletarian Journey*, New York 1937. 引自 Kornbluh, J., *Rebel Voices: An IWW Anthology*, Chicago: 1987, p. 45.

普（Gyp）站在队伍的中间位置。美好的一刻到来了，最前面的人焦急地打开信封，发现公司缩减了两小时的工资。他们看起来手足无措，又不知道怎么办好。乱成一团的他们期待着有人站出来做点什么。他们不需要等太久……⁶⁸

一名意大利工人站了出来，高喊着“罢工！罢工！”，在空中挥舞着他的双手，像一名拉拉队队长。一名叙利亚工人扳下工厂的电闸，机器咣当一声停下了。

一时间，纺纱间里群魔乱舞……齿轮被捣碎，传送带被剪断。意大利人拿出锋利的长刀轻轻一划，传送带无力地耷拉在皮带轮上。我和左撇子路易（Louie）把设备骨架逐个“肢解”，托尼（Tony）打碎了窗户……我们成群地冲上运河街（Canal Street），高唱着、呼喊着的。外面正在下雪。⁶⁹

几天内，实际上城中整支非熟练劳动大军都加入了罢工。由于美国劳工联合会宣布这次争端为“非正义”，并敦促工人们回去工作，他们倒向了世界产业工会会员。雇主们向哈佛大学求助，那里是当地民团的大本营，学生们“非常乐意过去拿这些人练练手”⁷⁰。

68. 同上，p. 178。

69. 同上。

70. 引自 Kornbluh, J., *Rebel Voices: An IWW Anthology*, Chicago: 1987, p. 159。

第一天，他们用消防水枪对付罢工者。罢工者以大冰块回敬。随着罢工逐步升级，警察用上了子弹和刺刀，杀害了一名意大利妇女和一名叙利亚男孩。埃托（Ettor）和乔万尼提（Giovannitti）作为世界产业工会的两名组织者参与了罢工，他们因为组织纠察队被指控为“谋杀案从犯”，同时军事戒严令也被下发。一名当地学校校长被捕，当时他正在埃托的办公室笨手笨脚地安装炸弹。这时候世界产业工会派格利·弗林和海伍德去领导罢工。劳工中有一半是14岁至18岁之间的女性。工作如此辛苦，福利又如此微薄，以至于“怀孕的妇女在机器旁一直工作到临产前几个钟头。有时候婴儿就在周围全是纺织机的工厂里出生”⁷¹。在移民社群中，有人反对妇女参加罢工会议，因此海伍德单独为妇女和孩子组织了日间会议。“真是不可思议，”格利·弗林回忆说：

这个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大部分时候与讲英语的人一同工作，怎么能这么快掌握与外国人以及妇女和孩子交流的方法。他们都能听懂他[海伍德]的生活化语言，这给我们所有人都上了一课……在他讲到“美国劳工联合会好比是这个”同时张开手指的时候，工人们哄堂大笑，并报以掌声……⁷²

是女性罢工者创造了那句口号：“我们要面包也要玫瑰。”作为对工团主

71. Gurley Flynn, E., *Memories of the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1977, p. 128. <http://www.geocities.com/CapitolHill/5202/rebelgirl.html>

72. Stannard Baker, R., “The Revolutionary Strike,” *American Magazine*, 1912, p. 24. 引自 Kornbluh, J., *Rebel Voices: An IWW Anthology*, Chicago: 1987, p. 157.

义所唤醒的劳工运动的总结，它被涂鸦在立于新英格兰刺骨的寒冬之中的一个标语牌上。

随着罢工持续及暴力化，世界产业工会会员有组织地将罢工者的子女迁出至纽约。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排队接收这些孩子，有的人还排不到。然而当第一支队伍在一月中旬的寒风中抵达时，等候在大中央车站（Grand Central Station）的记者震惊了。大部分孩子还穿着褴褛的夏装，饿着肚子，污秽不堪。

这简直是城市的一次污衣洗礼，劳伦斯当局决定中止它，暴力逮捕了下一批出发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当时他们正站在车站里等火车。这甚至激起了罢工反对者的集体愤怒，促成了一场在国会山（Capitol Hill）举行的听证会。15名青少年罢工者前往华盛顿，向众议院规则委员会（House Rules Committee）亮出他们的伤痕和工资单。在被问及年少失学的原因时，一名15岁的男孩说，“我们必须吃面包，但想要面包可不容易。”在被问及参与罢工的原因时，另一名孩子回答说，“我的肚子告诉我的：我不能继续忍受用糖浆代替黄油、用香蕉代替肉食的日子了。”

1912年3月1日，降薪8周之后，全美国33个城市的纺织业主宣布涨薪7.5%；12.5万名工人涨了工资。到3月14日，劳伦斯罢工尘埃落定。周薪上涨了5%到20%，加班费上调，在罢工中被解雇的工人全部复工。随着新的罢工在梅里马克沿线的工业镇揭开序幕，劳伦斯的工人们转向埃托和乔万尼提的营救任务。两人被宣判无罪，不过是在为期一天的大罢工导致全镇停运之后。

与时至今日的美国一样，一场特殊的悲剧才能挑起新闻记者的眼帘，让他们看到近在眼前的贫穷。劳伦斯罢工做到了这一点，促使编辑部改变了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并且激发了这一时期某种最优秀的“新的新闻业”。

雷·斯坦纳德·贝克（Ray Stannard Baker）为《美国人杂志》（*American Magazine*）做罢工报道，他留下了这段萦绕不去的描述，概括了从污秽和愚昧的伦敦码头走出的工人运动已经发展到何种程度。

这是我生平所见的第一个唱歌的罢工。我难以忘记，当罢工会议上响起国际语言的歌声时，不同国家的人们的那种高涨的情绪和突如其来的奇妙火花。而且他们不只在会议上唱歌，还在羹屋（soup house）和街上唱歌。我见过在救济站里削土豆皮的一群女性罢工者突然哼唱起“国际歌”的情形。他们有一大本歌曲，里面全是朗朗上口的旋律——“八小时之歌”（The Eight Hour Song）、“劳动的旗帜”（The Banner of Labor）、“工人们，主人应该统治我们吗？”（Workers Shall the Masters Rule Us?）不过其中最受欢迎的还是“国际歌”。⁷³

73. 同上。

弟兄之战

德国工人如何试图停止战争

译=张舒语

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是可怕的。同样的经验告诉我们，内战比前者更加残酷。但在所有的战争之中，弟兄之战最为可憎。¹

——菲利浦·谢曼（Philipp Sheidemann）²，1929

1. Sheidemann, P., *Memoirs of a Social Democrat*, Vol. 1, London: May 1929, p. 281.

2. 菲利浦·谢德曼（1865—1939），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领之一，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理。1903年作为社会民主党代表进入国会，支持一战，后参与镇压共产党叛乱。——译者注

2006 年，玻利维亚瓦努尼

卡车和运油车的队列如同白色的伤疤一般，在阿尔蒂普拉诺高原（altiplano）上行进。封锁线在两英里前方的一条路上，地面雨水四溅，散布着塑料瓶、玉米壳和几百辆搁浅的车辆。即便在这里，你都能感觉到砰砰的炸药声。

瓦努尼（Huanuni）³ 的锡矿工人已经设立起了一个路障。那并非一条古老的路；建在海拔 4000 米的地方，它是跨越安第斯山脉（Andes）、贯穿南北的主要干线。这些矿工占领了一间警察局、一个收费站，在路上倾倒了—卡车土。他们的做法是散布数以百计的小型巨石，将它们整齐地摆成难以跨越的 V 字型。200 名纠察队员挤在土屋后面，山上的村庄里还有更多。凭借这些矿工的名气，他们其实并不需要武力。卡车司机遵从道德的力量。他们顺从地闲坐在一起，只为确认每隔十分钟有一串炸弹被投到路上。

他们的诉求很简单，与采矿完全无关。他们想在瓦努尼的学校里新添 55 个教职，为中学教学和职业培训争取更多资金。“教育是我们得到的一切，”矿工“公民委员会”成员玛丽索·瓦拉（Marisol Huaylla）说。她是一位头发花白的社区领袖，她耐心地解释道：“我们的孩子需要教育，否则他们最终会像我们一样。”她戴着一顶主要工会联合会（COB）的棒球帽，其中

3. 瓦努尼，玻利维亚最大的锡矿区。——译者注

字母 B 是一张切·格瓦拉（Che Guevara）⁴ 的脸。

我发现玻利维亚矿工联合会（Miners Federation of Bolivia）的秘书长罗伯托·查韦斯（Roberto Chavez）和他的助理们挤在路中间，密切注视着炸弹投掷员。政府将会妥协，他想，但这并不是他们的目的：

至少我们已经用路障使他们感受到了压力，如果政府不给我们满意的答案，我们会再次出现。我们在这里谈论教育，为了我们的子孙！不仅为瓦努尼，而且为整个国家。

大部分的年轻人都身着深蓝色工装，它们用高科技制成，绣着公司的图标。多亏中国的需求使得锡的价格得以回弹，促进了外销矿区的劳动力增长。纠察队里也有合作社矿工（cooperative miners）。他们不穿工装，但短夹克上印着他们的作业地点。罗伯托·查韦斯热心于让我辨认这两种矿工。那些加入了工会的矿工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将合作主义者视为“小资产阶级”。他们认为，从美国公司那里获得协商一致的工资、工作条件和合同比自己像个清道夫般四处挖掘要好。而合作社矿工则将工会矿工这些公司人称为“新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们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资本主义者工作。二者间的竞争是真实存在的，但在现在这样的时期他们为了更高的利益走到一起，联合起来。

人们小心地点燃并投掷炸弹，即便是那些耗费了两晚将大量自家酿的酒搬到警戒线以内的人，也还是小心翼翼。旁观者站在十米开外的地方。

4. 切·格瓦拉（1928—1967），阿根廷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译者注

投弹员扔出点燃的炸弹时，手在低处直接向前抛出优雅的弧线，不带任何缓冲。炸弹不像在电影中那样发出滋滋声，但最终还是有一声响亮的重击，没有回响。无尽的平原为其消声。雨水很快就将黑色的烟雾溶解了。

日暮降临的时候，政府和工人之间的协商开始了。他们在晚上九点时达成了一致。瓦努尼当局将增设 28 个教职，政府保证在全国新招 3000 位老师。我离开了封锁区，在前往瓦努尼的荒芜之路上加速前行。整个景象在壮丽的安第斯的平原、山丘和雷云的衬托下成为了一粒微小的尘埃……

多洛雷斯（Dolores）矿区周围靠着山腰建着一些单层的棚屋。这里有一间急救站，一间拘留所，然后便是用塑料花装饰的、通往矿区的栅门。矿区一直在运转，每周七天，实行三班制。这是一个合作社矿区，没有老板。合作社矿工联合会（Co-operative Miner's Federation）的安全领事萨比诺·法比加（Sabino Fabrica）解释说，4000 位矿工在这里冒着生命危险工作：

我们的工作环境很差。如果不工作就没有饭吃。这就是我们的体制。很遗憾，跨国公司把我们剥削得干干净净。我们合作社总是挤满了要找工作的人。这些公司抢夺了一切，合作社只能靠剩下的那些深层矿洞过活。

没有老板是一回事。缺乏通风工程、机器、电力和安全标准是另一回事。这一矿区 20 年前有着现代产业化的工程设施，如今却全靠手工。

他们以四人为一队下井。仅有的装备是一个头盔、一盏小灯、一根绑带和一组电池。萨比诺让我们在矿口旁的商店购买这些装备。你需要一双惠林顿长筒靴来抵抗酸性土壤，一双橡胶手套用于攀爬。这里没有工装。合

作社锡矿工人的装备就是一条冒浓烟时用得着的大手帕，破旧的球衣和运动长裤。每位矿工都携带着 60 平方厘米的灰色麻布袋：下矿时里面装着烟草、水和古柯叶，上来时则最多装着 7 公斤锡矿。当这些男女矿工步履蹒跚地走出矿区栅门时，你可以从他们前额暴起的青筋中看出背着 7 斤锡矿爬上 400 米粘滑的木梯是什么样的感觉。

当矿业还是国营产业的时候，这里没有女性矿工。但 20 年的失业问题打破了这一禁忌，妇女委员会的负责人罗克珊娜·埃斯特雷亚·默卡多（Roxana Estrella Mercado）说：

过去他们不让女性下矿，因为玻利维亚和很多国家一样有一个传说，女性会让你丧失矿坑里的矿藏与煤层。如今这里锡矿需求量很大，河底和山腰上的锡矿已经被挖尽了。相信这一传说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为了榨取这最后的剩余，绝望地进到矿井里。最开始只有一两位女性，现在已经有很多了。

天黑之后不久，矿井里的梯子就会变得很拥挤。这是一套双向的系统，一个队伍竭力向上爬的时候，另一个队伍下到井里来，双方几乎都在奔跑。年轻小伙跑到最前方来炫耀他的体力。“兄弟们，晚上好”是他们日常的问候。如果偶遇同伴，还会再讲一个让对方笑到岔气的笑话。

下完两条梯子之后，需要穿过横越在沟谷之上的厚木板，然后再下两条梯子。现在你就到了地下 40 米的地方，即便这相对于 4000 米的海拔来说不算什么。这个矿区过去为公司所有时，一定有另一个更为正式的入口，因为里面的道路有头顶那么高，且有两米宽。这条道路经过专业的开凿，打入了山内部 1.5 英里。但那个入口已经消失不见了，随之而去的还有切割

机、地下铁路和电力资源。尽管现在有一根通风管道和两根粗电缆线分别顺着两面墙直抵地下，并没有空气或是电力能够进来。如果出事了，将没有空气钻，没有担架床和呼吸器。你全靠你的兄弟们，还有蒂奥（Tio）。

蒂奥坐在一个宽敞的壁龛中，一堆小塑料瓶、横幅、烛用蜡和古柯叶之下。一位矿工弯下身，靠近蒂奥的脸，一边小声说话一边点烟。他把烟塞到蒂奥嘴中，给自己再点一支——吸吐了几次以确保火已点燃——然后将烟固定在一个角型烟斗上。他在那里点了五支万宝路（Marboro）⁵，它们构成了一个五角形。矿工的帽灯照着蒂奥的脸，这张脸冷漠而狰狞：发红的脸颊、黑色的眼睛、张大的鼻孔。矿工们来这里进贡水和古柯叶（矿井下的两种基础能源），以安抚这位克丘亚（Quechua）⁶的神明。但这位蒂奥是位狡猾的恶魔。每个月都有两位矿工死在这里。

路过蒂奥之后，是通往锡矿漫长而恐怖的道路。你的世界变成了面前这反复出现的银泥，它由40瓦的灯泡照亮。紧接着地面突然向下移动，气温升高10度，一种浓郁而恶心的硫磺气味暗示你已经靠近锡矿了。一位大汗淋漓、瘦骨如柴的克丘亚男性从萨比诺脚边的地面钻出来。他爬过的隧道是垂直的，没有梯子，只有一些立足处。这隧道炎热而腐臭，如同埃舍

5. 万宝路，香烟品牌，起源于英国，最终在美国注册。品牌名称来源于公司伦敦工厂所在的街道 Marlborough。——译者注

6. 克丘亚人是指主要分布于南美洲秘鲁、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等国的原住民，使用克丘亚语，信仰天主教和安第斯传统宗教，是印加帝国（11—16世纪南美洲的古老帝国）后裔。——译者注

尔（Escher）⁷ 迷宫般螺旋向下。紧随他爬上来的是一群年长的矿工。“今天下面没有锡矿，我们没能找到，”他们抱怨道。他们的脸颊因为一整天的古柯叶而肿胀；工作八小时后，水已经被耗尽了。他们筋疲力尽地倚靠在岩壁上，以便歇口气，然后列队小跑到出口。其中一位矿工的头盔上印着切·格瓦拉的照片。

“当这些矿井关闭的时候，我们曾迁移到热带地区，住在简陋的城镇。但是想要适应那样的生活很困难，我们不得不过来，”萨比诺·法比加说。“你看，除了挖掘锡矿之外，我们没有其他可选的工作。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瓦努尼的主街道格外萧条。后街是一些落满灰尘的胡同，这些胡同通向河边。河水的颜色处在粪便色与银色之间。年轻的男孩在岸边捡拾废弃的罐头和塑料瓶。一长列眯着眼的人在合作社矿工联合会的办公室外耐心等待。合作社为矿工们安排了一位眼科医生，一周坐诊一次。他义务出诊，有很多工作要做。这里糟糕的伙食、河中的污染物，或是附近其他什么东西，让很多人的视力都出了问题。

沿着山谷望去，戴着圆顶帽、披着大方巾（克丘亚传统套装）的妇女在山泉水中淘取贵金属。这些妇女是全球锡矿市场价值链中最底端的一环。罗克珊娜说：

女性矿工要干所有的活。她必须当家庭主妇、医生、洗衣工、

7. 莫里茨·柯尼利斯·埃舍尔（1898—1972），荷兰版画艺术家。他的作品探寻内心世界和宇宙奥秘。复杂奇幻的变形结构颠覆了自然规律，重复排列的图形填充画面空间，甚至将平面转变为凹凸的球面。——译者注

厨师，还有教师。照看孩子，在他们生病的时候呵护他们，为他们洗衣服，做饭，然后还得去工作。她没有自己的时间，不能说“我今天工作，明天休息”。不，她要完成所有的工作后才能停下来。

在瓦努尼唯一景气的就是工人运动。它为大家带来了眼科医生；它为了当地学校能有更多的教师而战斗。每周六下午，联合会的成员一起在坑坑洼洼的足球场上铲球，或是在铜管乐厅轻快地演唱一首“红旗”（Bandiera Rossa）⁸。他们有一家矿工广播台、一家矿工电视台，还有一个合唱团，尽管我的向导抱歉地说他们“主要唱些悲歌”。二十年的经济衰退留下了苦涩的历史——工会和合作社的分裂——但文化机构使它们团结在一起。

瓦努尼的矿工们创造了另一片天地。看着如今的瓦努尼就像看见了100年前的德国，那个全球劳工运动的腹地。德国的工人们也曾为自己创造了另一片天地，一种由同志友谊、委员会、铜管乐队和合唱团构成的替代性生活方式。但那片天地最终也被它不能理解的力量撕裂。

1905年，德国

想象1905年8月4日，星期六，你是一位典型的德国工人，二十五六

8. Bandiera Rossa 在意大利语中的意思是红旗。《红旗》是意大利著名的工人运动歌曲，赞美象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红旗。——译者注

岁的男性，在汉堡（Hamburg）的一家机械厂工作。你的轮班即将结束，周末就要到来。你已经六天没有刮过胡子了，在去盥洗室的路上遇到同事时，你给他来了一次“胡子磨砂”——你的胡茬在他的脸上磨擦到他的眼泪盈眶。在盥洗室，许多同志回避工作，小声地谈论罢工（从圣彼得堡到芝加哥，罢工已经成为了这一年的主题）。当你正在小便池时，有人慢慢地从背后靠近，抓住你胡子的两端，用力拉扯。你抽搐着，听到同事铜铃般的笑声在过道里发出回响。

在工厂里一切都靠法律来规约：时间、工资、出差错时应付的罚款还有强制加班。但下班的铃声马上就会响起，这一周就要结束。同事过来拍拍你的肩膀，然后你们一起去赶火车：现在不会再有恶作剧，因为这是属于你的时间，而非老板的。谁也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一切，但当社会学家单独找到你时，你这样对他们说：

社会民主党（SPD）设想的未来阶段将会到来，一定会到来。我想，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新纪元，将和之前的体系一样需要时间酝酿。但愿我是对的，但我想历史前进的速度比以往更快。在我们的时代，现代科技如潮水般奔涌而来。它总是为我们创造新的生活方式：它使得阶级问题更加清晰，勾画出阶级斗争的战线。⁹

9. 锁匠，年龄不详，引自 Levenstein, A., *Die Arbeiterfrage: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sozialpsychologischen Seite des modern Grossbetriebes und der psycho-physischen Einwirkungen auf die Arbeiter*, Munich: 1912, p. 285. 这一引用和其他引用匿名征用自社会民主党工人，来源于第一次对于德国工人阶级中社会态度的大调查。

也许你的同事是一位悲观主义者。也许他最近在阅读今年工会会议的报告。在会议上，人们出于经费和信任的考虑反对大罢工的提议：

尽管如此，有时我还是会失去希望。人啊，无论你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还是工会主义者，或是两者皆是，都放弃希望吧。为什么？问题在于工会领袖。他们紧紧抓住日常琐事不放，而忽视战略性问题，终极目标就像乌托邦一样不可实现。他们像抠门的商人一样看待一切，担心经费。他们盯着备用资金，然后说：“这将花费太多。”¹⁰

六点，你将自己打理干净，到达工人健身房。你去登记，并更换衣服。和工作场所一样，这里只有男性可以进入，到处都是“公开展出”的肌肉。有人向你扔来一份《工人体育时报》（*Workers' Gymnastic Times*）。另一家资产阶级的健身房也已被收归在工人联合会名下。“粉碎一切！”——当小伙子们脱去上衣时，这朗朗上口的口号被大家争相模仿，声音传遍了整个屋子。

你和队友排在一起。你们有九位队员和一位队长。前方是你们的教练员。他很难对付，之前是位军人。但他打算不久后竞选，因此如果这些人不喜欢他，他们总是可以把他撵出去。他喊出问候语：“向自由致敬！”六十人的声音回应过来。然后他大声喊出指令，你们整齐地操练。

待在军队一年使得你更加坚韧。没有人谈论这些，但你们都在服兵役

10. 地毯织工，42岁，同上，p. 321。

期间经受了同样的考验——被营房里的下士踢头，衣服的扣子被拆得只剩下一个，受到全方位的羞辱。在工人健身房，纪律是严格的，但同志友情更加重要。有时候，《工人体育时报》的编辑会说，这里的同志友谊过剩了：

酒吧活动总是紧接在体育锻炼之后。他们抓紧时间跑到那里，像个真正的酒鬼般度过几个小时。不出几分钟，这个不太大的房间里就会被烟气充满，以至于人们看不清周围都是谁。¹¹

你移步到一间当地的酒馆，大家都在那里等候。一些人是你在工作中认识的，另一些则是在派对上认识的。空气中弥漫着浓烟，但此时的花园水草丰茂，挤满了同志。话题再次回到罢工和大罢工，到处都是争论的声音。到今年年底，会有三分之一的工会成员参加过罢工。伴随着汉堡市议会投票减半议员数量，“工人阶级部分”被准许挑选，有些人想要开放政治大罢工的政策。但没有人想要一次“拉丁人的、伪革命的起义”——工团主义¹²在这里是句脏话。

这个夜晚即将结束，唱歌的部分开始了。老一辈用社会主义者最喜欢的“谁敲打铜与石”开始，但年轻人更喜欢“我们是汽油弹投手”（We Are

11. Wilhelm König, “Turnen und Kniepe,” *ATZ*, 15 May 1902, pp. 109–10. 引自 Lidtke, V. L., *The Alternative Culture: Socialist Labour in Imperial Germany*, Oxford: 1985, p. 52.

12. 通常指法国劳工联合会书记费纳德·佩卢蒂埃的理论及法国总工会后的指导原则。主要内容是提倡战斗精神，发扬主动性，拒绝迎合社会党的需要，把精力放在工业战场上。
——译者注

The Petrol Bombers) ¹³。当大家都喝得足够醉了，你引吭高歌：

它在城市里燃烧
如此明亮，如此坦率，如此自由
它在乡村中燃烧
出于绝对需要
即便是军队都燃起火焰
我们目瞪口呆，被它震惊
这里有反抗
这里有炫目的火焰
这里是汽油，那里是汽油
到处都是汽油
老板，将酒满上！
让我们为汽油干上三杯！ ¹⁴

如果你停下来思考这一切，圣保利（St Pauli）的几升酒足以让你思绪万千，这首歌美在它的双重含义。它原本是关于巴黎公社的女性投弹员的歌曲，但这里包含了一层又一层的讽刺。没有哪位普鲁士的警官会相信社会民主党会诉诸女性暴力。“汽油”在这里就是知识，感谢社会民主党的图书馆和夜校，让汽油在整个德国绚丽地燃烧。这当然还是句妙语——“汽

13. 汽油弹，又称燃烧弹，是游击队等非正规部队，以及街头暴乱群众的常用武器。

14. Audorf 1878. 引自 *The Alternative Culture: Socialist Labour in Imperial Germany*, Oxford: 1985, p. 52.

油”实际上是你正在喝的啤酒，就像润滑油之于机器，它使得工人运动每夜在成千上万这样的酒馆顺利进行。《我们是汽油弹投手》是这样一首歌，它需要你在歌唱时眼角带着一种残忍而心照不宣的笑意。就像工作中那些实用的笑话，和“兄弟”、“未来国家”这样的词汇，没有外人能够真正理解。其他人也不配理解，这就是它们存在的意义。

第二天早晨，你有些头疼，但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社会民主党音乐节在市中心附近的公园举办。汉堡和周围城镇的全部工人合唱团都出现在这里：“制革工人”合唱团（Tanners）、“艾姆斯比特尔的公平”合唱团（Equality of Eimsbüttel），还有他们最大的对手“艾姆斯比特尔男声合唱团”（Eimsbüttel Male Voice Choir），以及“奥藤森的玻璃工人”（Glassmakers of Ottensen）合唱团、“朗根菲尔德的自由”（Freedom of Langenfelde）合唱团、“巴尔姆斯特的喜剧演员”（Funsters of Barmstedt）合唱团、“圣保利 1883 音乐团”（Saint Pauli Song Circle of 1883）……这还只是第一轮而已！¹⁵

还有为儿童准备的旋转木马，叫卖“早餐啤酒”的帐篷小摊，红色猎鹰（Red Falcons）¹⁶的骑行示威。当你四处游荡寻找心仪的女孩时，乐队开始弹奏音乐节进行曲“真实与坚定”（True and Firm!）。接着指挥点燃了一枚微型加农炮，作为提醒大家安静的信号，但没什么效果。

啤酒帐篷内传来玻璃的叮当声和各种各样混杂的噪音；玩闹的

15. 引自 *The Alternative Culture: Socialist Labour in Imperial Germany*, App. IV, Oxford: 1985, p. 52.

16. 红色猎鹰是指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儿童组织，一战、二战期间出现，流行于欧美。——译者注

儿童在听众之间来回穿行，觉得歌唱艺术不过是琐事一桩；这里有一位女孩大声且不羁地谈论着她那位歌手男友如何在舞台上星光熠熠；那里有一位妇女和别人攀谈着家庭琐事——音乐节的声波在这样的场景中不经意地流动……¹⁷

你看到女朋友和一群社会主义青年团（Socialist Youth）的同志在一起，于是决定和他们一同坐下，加入他们的行列。这是一个混杂的团体，这里没有什么好害羞的，你在追逐女生的时候不会有什么宗教的愧疚感。支部书记已经为你朗读过《女性与社会主义》，其中的一些篇章你已烂熟于心。

在这个新社会，女性将在社会上、经济上完全独立。她将不再臣服于任何一丝占有与剥削，而是将获得自由，和男性平等，并成为自己的女主人……在爱人的选择上她和男性一样自由而不受拘束。她追求别人或是被别人追求，结成一个共同体，只基于她自己的情感考虑。¹⁸

的确，所有社会民主党合唱团都只有男性，工会的分支、工厂还有健身房也是——但在派对上人人都是平等的，至少几近平等。

老板在一大堆啤酒桶之间蹒跚地行走。“祝他长命百岁！”你们一起喊道。当乐队演奏到“阿尔斯特河的月光”（Moonlight on the Alster）时，你

17. *Hamburg Echo*, 8 August 1905. 同上, p. 94.

18. Bebel, A., *Women and Socialism*, Ch. XXVIII, New York: 1910.

独自歌唱，声音盖过乐队的演奏。另一枚微弱的加农炮被打响，大家都笑了。你生活在地球上军事化程度最高的社会，那里每个人都持有步枪，但战争却是一个世纪前的事了。

随后，你们几位到园中漫步。你的女伴非常冷淡，但你知道她是社会民主党蔓生的社团自然之友（Friends of Nature）的成员，因此你像以往那样提议：“我们去散个步吧。”你们手挽着手，沿着河边漫步。远方的工厂处在一片安静的黑色之中。鸟儿在歌唱。你大声发问，你们中的任何一个能否活到看见未来图景。

你们一起坐在水草丰茂的河岸边，在毛毛虫和蜜蜂之间。此时她为你读起了《自然之友》杂志中的片段：

在过去百万年不断变化着的事物中，我们只是渺小的部分。这不断变化的事物，真正变化的只是它的形式。任何带着这样思想活着的人都不能怀疑启蒙与真理的最终胜利，他不能怀疑，自由与平等最终将通过以生产者为代表的工人阶级的努力而实现。¹⁹

此刻，太阳开始落山，你们的十指紧扣……

另一片天地：

在一战到来前，数百万德国工人都过着这样的生活。社会民主党的成

19. “Touristverein Naturfreunden,” *Arbeitersportfest*, p. 22. 引自 Lidtke, V. L., op. cit., p. 64.

员从1905年的50万增加到战争前夕的100万，使其成为更广泛的工人运动的核心；当时一共有250万人加入了工会，占全部劳动力的四分之一。

这是一个自成天地的小世界。你甚至可以在这里度过从摇篮到坟墓的时光。这里有工人托儿所，也有工人火葬场。最重要的是，这是个自助的世界。尽管社会民主党有4000个分支，工人们是靠附属的俱乐部过活的。他们对此精心地记录。到1913年为止，一共有2818个唱歌俱乐部，平均每个俱乐部有30个成员。每10位合唱团成员中就有9位是社会民主党党员，并订阅了90份党报的其中一份。除了工人合唱团、工人健身房，也有工人图书馆、工人戏剧社。当不准女性参政的法律放宽后，社会民主党的妇女分支也出现了——到1914年，五分之一的合唱团都接受女性加入。

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在理论上属于正统马克思主义。他们把“工人”这个词当作和游泳俱乐部一样无害的词来使用就说明了这一点。你从社会民主党的元老写的书中获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就是力量》、《妇女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乌托邦与科学》。这些书在社会民主党的1147家图书馆都提供借阅。借阅记录告诉我们，一位年轻的金属工人在他20多岁的时候最有可能阅读爱弥尔·左拉（Emile Zola）²⁰的小说。低俗小说被无情地被清除出这些社会民主主义图书馆。

尽管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沉迷于政治，党的官僚又常年为那些唱歌活动、骑行活动和深夜的乡间漫步担心，文化还是将工人和党团结在了一起。通过社会民主党，工人们有机会接触到“进步的”高雅文化，但他们会以自己的方式各自消化它们，以抵抗仍然声称有权干涉集会和审查报纸的

20. Hippe, O. (trans. Drummond, A.), *And Red Is the Colour of our Flag*, London: 1991, p. 12.

警察国家。

如果说这种大众社会主义文化看上去很像工团主义给美国和法国带来的工会生活方式，那是因为它们属于同一现象：大众工会主义、劳动力的激进化和大众消费的崛起。但对于1905年汉堡草场的人们来说，这种工团主义的胜利看起来像是混乱的“拉丁人思维”的微小产物。德国的工人运动并不是一种即兴创作，也非随着罢工浪潮和经济衰退。讲纪律的政党模范是工人运动成功的关键。尽管工会很强势，他们还有一个次要的职责，就是（正如党纲所概括的）经济斗争。

社会民主党知道，这个帝国和它的皇帝、它的三级投票体系和无用的国会，都是需要被推翻的。但社会民主党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它缓慢而小心地转动齿轮，说服工人阶级在选举中为社会主义者投票。它通过这种方式来推翻这一切。

即使是社会民主党被禁止的时期，以个人身份参选的党员也成功地获得了百分之七的选票。1890年放开禁令的时候，社会民主党的选票数量猛增到百分之二十。1903年，社会民主党以300万选票震惊了世界。1907年的策略性投票虽然导致在国会的议席减半，但社会民主党在1912年又得到了425万选票，成为了帝国国会的最大党，尽管帝国国会无权干涉皇帝的内阁大臣。

德国工人运动的兴起是全球工人运动的普遍现象；而它借助一个严格的、自足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则是国情的产物。但事实也非完全如此。德国社会主义政党在全球工人运动中发挥着它的主导力量。它鼓励社会主义领袖采用它的马克思主义和它的现实政治（尽管从未获得同样的成功），并在意大利、波兰、瑞士、比利时和荷兰建立相同模式的政党。

德国大众政党的成功将在未来100年塑造国际工人运动；这一模型向

俄国（那里工人阶级的成长没有受益于图书馆、合唱团和自由的工会）的出口将带来更加深远的影响。对于德国来说，这意味着：一旦工人运动瓦解，盛行于“政党战士”生活的纪律、男权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确定性将成为破坏性力量。世界上最强的工人运动将会遭受最大的溃败。

“压倒我们的事件”：

奥斯卡·希佩（Oskar Hippe）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萨克森州（Saxony）默塞尔（Merseburg）附近的炼焦厂，他负责往车厢里堆煤。有一天，印刷机的煤用得过快，14岁的希佩觉得难以忍受。他停下手头的工作，在休息期间让煤倒了一地。领班追着他满车间跑。“高速运转的印刷机旁有一堆小煤块……我出于自卫用那些煤扔了他……第二天……我被解雇了。”²¹ 他的父亲对他无计可施，将他送到了莱比锡（Leipzig）。在那里，他的哥哥——一名社会民主党活跃分子和建筑工人——也许能够教化他。事实上，希佩已经偷偷地在家里的干草棚读了三年马克思主义手册。

托妮·森德（Toni Sender）在法兰克福一家金属公司担任速记员。她十三岁就离家，拿中产阶级的舒适家庭换取了自由但低收入的白领工作。她建立了一个办公室职员工会，在1910年领导打字员和档案管理员开展了他们第一次示威游行。

那时，我们第一次见识到老普鲁士警察的警棍…大量武装警察

21. 爱弥尔·左拉（1840—1902），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家，代表作《娜娜》。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要求，返回自然、生活和人本身，精准地描写世间人情。——译者注

阻止我们的示威，立刻开始暴打我们。“我们做错了什么？街道不属于纳税公民吗？”我大胆地问。他们用一阵暴打回应我的问题……²²

在心里暗暗发誓要复仇的他们，开始了自我教育。

我和一小群朋友和劳动图书馆的管理员交流，开始熟悉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那些书理解起来很困难。我们需要时间来完成这复杂的学业，因此我们决定早晨上班之前在公园里碰面，一起学习。²³

她不太情愿地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它的会议大厅“没有美感”，它的发言人愚钝无趣。在法兰克福积极参加党的活动之后，她搬到巴黎，在法国社会主义党派中逐渐提升自己的地位，成为了一位夜校老师。

希佩和森德都是受到德国社会主义有关和平、国际主义的说辞教育的一代。之后发生的一切都会让他们感到恐惧而迷茫。1914年6月，一位波西尼亚学生刺杀了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奥匈帝国责怪塞尔维亚；俄国警告奥匈帝国不要干涉塞尔维亚；德国让俄国不要干涉这场危机；法国让德国停止威胁俄国；英国和法国站在一起，警告任何人都不要威胁持中立立场的比利时。这一切让那个洋溢着幸福祥和的欧洲夏日，在四周之内滑向

22. Sender, T., *The Autobiography of a German Rebel*, London: 1940, p. 19.

23. 同上, p. 21。

了战争的边缘。离世界大战，那个一直被视为理论上可能、但事实上不会带来威胁的事件，只剩下一周了。

所有人都知道社会民主党会反对战争。他们知道自己可能无法阻止一场战争，但是相信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会发起跨越边界的反战运动。7月25日，星期六，社会民主党报纸发行了紧急特刊，领导层呼吁大众示威以阻止战争：

具有阶级意识的德国无产阶级以人性与文化之名，发出对好战分子犯罪行为的激烈反抗……德国战士的每一滴血都不应该因为奥匈帝国独裁者对于权力的欲望而牺牲……同志们，我们呼吁你们立刻在群众性集会上表达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对于和平不可动摇的意志。²⁴

德国全国上下的工人都走上街头。7月28日，星期四，15万工人在莱比锡市中心集会。奥斯卡·希佩是其中一位。

我和我的哥哥、我的姐姐奥蒂丽（Ottilie），以及来自社会民主党莱比锡分支的同志们一同游行。我们浩浩荡荡地在城市中行进，举止红旗和横幅，高呼着反战的口号……第二天，报纸报道了发生在所有更大的城市和工业区的相似示威。²⁵

24. Vorwärts, 25 July 1914. http://www.zlb.de/projekte/millennium/original_html/vorwaerts_1914_2507.GIF.html

25. Hippe, O. (trans. Drummond, A.), *And Red Is the Colour of our Flag*, London: 1991, p. 12.

此时，欧洲社会主义的主要人物都在布鲁塞尔集会。奥匈帝国的社会主义领袖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以一段压抑的宣言开始了这次会议：动员开始了，戒严法已经生效，奥匈帝国的政党无计可施。当晚，成千上万的工人挤在布鲁塞尔最大的会议厅，结成反战同盟。当法国社会主义领袖尚·饶勒斯（Jean Jaurès）搭着社会民主党的国会煽动者胡戈·哈泽（Hugo Haase）的肩膀时，人们发出了欢呼声。两天后，俄国也动员起来。饶勒斯在回巴黎的路上被刺杀了。到8月2日，德国进入了战争状态。希佩记得：“我从小到大第一次经历这样巨大的失望……在8月3日晚上，一群同志聚在公寓里，所有人都很困惑，失望的情绪清晰地写在他们的脸上。”²⁶

他们并不孤独。在巴黎，7月26日总工会报纸公开宣布：“工人们必须通过革命性的大罢工来回应一切宣战。”第二天，巴黎出现了大规模反战游行。但是到8月4日这一天，战争宣布开始，法国工团主义领袖们开始在战争背后摇摆，以德国政党的投降作为借口。

德国国会的社会民主党成员全体为皇帝的战争预算投了赞成票。法国社会主义者别无选择，只能为保卫国家结成“神圣的同盟”。总工会报纸简单地宣布：“战争压倒了我们。”那些准备好早晨起来进行大罢工的积极分子眼里充满了泪水。没有人对这混乱的秩序有所准备。“挫败、失望、道德崩塌的感觉让我们溃散。”²⁷几周之内，前工会主义鼓吹者维克多·格里弗雷（Victor Griffuelhes）坐着政府的火车前往波尔多（Bordeaux），与内阁

26. 同上，p. 13。

27. Mendel, H. (trans Michaels, R.), *Memoirs of a Jewish Revolutionary*, London: 1989, p. 142.

大臣和公务人员一起从巴黎撤退，和德国人之前所做的一样。向战争的说辞投降之后，他现在又向这一逻辑投降——工会领袖会更加“安全”，如果他们能尽可能地远离实际的战斗。

托妮·森德记得德国政党投票赞成战争所带来的影响：“8月4号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德国社会主义者投票支持战争。一切都似乎崩塌了。他们怎么能这样做？”²⁸ 答案是，首先，他们没有办法阻止战争。其次，社会民主党领袖事实上很担心被指控为卖国贼：皇帝已经称他们为“没有国家的家伙”，而他们已经回应，保证他们“不会让祖国陷入危难之中”。第三，他们相信如果反对战争，社会民主党将自身难保，它在德国社会的根基也会被连根拔起。这使得党内成员不再在任何爱国主义的问题上摇摆，他们投票支持1914年8月4日皇帝的战争预算。为避免党内分裂，社会民主党让反战的国会议员和大多数人保持一致。

紧接着是进一步的迷失：社会民主党领袖说服自己，这将是一场保卫战。“我们在德国”，其中一位写道，“有责任抵抗来自沙皇的侵略，不得不完成保卫任务，以防止这个社会民主最高度发展的国家受到俄国威胁性的奴役……被沙皇奴役的德国将意味着不仅德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倒退几十年。”²⁹ 他们并没有暗示德国军队将侵略比利时，破坏自身的中立性，抹杀保卫战的概念。为战争投下赞成票后，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被允许加入皇帝政府的核心集团。他们在那里待了四年之久，渐渐地与工人脱节，无法再体会工人们的情绪。

28. Sender, T., *The Autobiography of a German Rebel*, London: 1940, p. 52.

29. Scheiedmann, P., *New York Volkszeitung*, 14 September 1914. 引自 Schachtman, M., “Old Wine in New Palis,” *New International*, Vol. 5, No. 6, June 1939, pp. 179–182.

* * *

“生活教给他们……”：

1915年春天，托妮·森德穿过了瑞士边境，为参加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次国际反战会议。她将一份和平主义宣言装在化妆包里带回德国，印了一大堆，藏在长披肩下，散发到法兰克福的各个街道。她还建立了一个女工反战群体。

我们每晚见面。我会简短地汇报那些当局认为不合适印出来的新闻。这些女性大部分是战士的妻子。她们的爱人当时正在战壕之中。在家里，她们几乎是在忍受饥荒。她们中的一些人在军工厂工作。她们思想解放而独立。在很短的时间内，生活教给了她们过去谁也没能解释的一切。³⁰

战争让全世界的女性进入军工厂。从克莱德河（Clydeside）到多瑙河（Danube），全新的社会生态几乎在一夜间形成：一群有技术的、男性工会主义者，和一群没有技术的妇女、年轻人共处一室，妇女享受着空前的个人自由。官方工会完全躲在战争后方，拒绝为有技术男性的尊贵地位辩护，也拒绝保护没有技术的妇女免受剥削。于是一个由工会商店主组成的非官

30. Sender, T., *The Autobiography of a German Rebel*, London: 1940, p. 65.

方网络承担起了基本的组织工作，他们在德语中被称为协调员（obleute）或是“保密员”。

1916年四月，奥斯卡·希佩到达了柏林火车站。他来到一家军工厂，和他的姐夫一起工作，他还按照当时的新潮，打了一条爱国主义色调的领带。“发生的第一件事”，他回忆道，“是我姐姐取下了我的领带，把它丢到铁轨中去。”³¹军工厂的所有员工都是工会成员，奥斯卡的同事之间隐约有些不安的情绪；许多人在卫生间窃窃私语。

1916年5月1日前夜，我姐夫告诉我第二天我们不用去工作，因为全部劳动者将在波茨坦广场（Potsdamer Platz）进行反战示威。我们在特定的时间到了那里。1万名工人聚集在广场上，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站在波茨坦地方车站的站台上对我们讲话。³²

李卜克内西是德国国会的社会民主党代表，曾在1914年8月不情愿地为战争投下支持票，但他在11月转而公开反对战争。他被叫去服兵役，然后在1916年1月被逐出社会民主党。作为一名服役军人，他知道他将要说出的一切会让他坐牢，但是他也知道这段讲话将带来巨大的影响。游行人群从工厂中安静地走出，以象征主义的形式告诉旁观者“小心说话”，以反抗对于李卜克内西讲话的媒体审查。李卜克内西告诉他们，

31. Hippe, O., *And Red Is the Colour of Our Flag* (trans. Drummond, A.), London: 1991, p. 15.

32. 同上。

穷困而不幸的德国士兵……他们遭遇的苦难无法用言语形容。四处的炮弹为死亡和崩溃播下种子。他的妻儿在家遭受着穷困和苦难；她看着自己，发现孩子哭着要面包……每个人都必须小心说话，因为战争中的奸商一定会从妻子和前线士兵丈夫的的穷困和悲惨中牟取暴利。³³

当人群为他欢呼时，他喊道：“不要为我呼喊，应该呼喊的是‘我们不要更多战争。我们要的是和平——就在此刻！’”这时警察来干预了。希佩回忆道：“示威群众一开始全力反抗，许多警察被他们从马上踢下来。”后来示威被驱散了，李卜克内西被捕，但是街头的反抗一直持续到夜间，希佩为了躲避警察的马匹被迫跳下了施普雷河（River Spree）。

接下来的一天，工厂几乎没有开工：厕所成了讨论间。工头和管理人员不敢打断工人人们的讨论。工会商店主们宣布，示威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我很快成了秘密会议的代表。³⁴

李卜克内西是社会民主党中的极左派，他和波兰社会主义者罗莎·卢

33. “Liebknecht’s May Day, 1916, Speech.” 引自 Liebknecht, K., *The Future Belongs to the People*, New York: 1918.

34. Hippe, O., *And Red Is the Colour of Our Flag* (trans. Drummond, A.), London: 1991, p. 15. 引自 Scheiedmann, P., *Neal*, Vol. II, p. 55.

森堡（Rosa Luxemburg）成立了斯巴达克同盟（Spartacus League）³⁵，一个地下革命组织网。但是，他在1916年的演说、审判和入狱引发了社会民主党更大规模的分裂。1917年1月，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成立。它的领导人是德国国会代表中的20位左翼，但是核心活动分子是商店主。李卜克内西的支持者也同时加入，但是维持了一个独立的斯巴达克主义分支。尽管许多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成员自认为只是支持德国社会民主的基本原则，也有一些新的力量在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属于托妮·森德这样的女性工人和奥斯卡·希佩这样的年轻人的政党，他们的整个世界都在发生变化，而非仅仅是政治信仰的改变。

1917年冬的饥饿补给（starvation rations）促使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增加到12万人。1918年，工会商店主为结束战争、获得更好的食物和缩短工时发动了一次罢工。30多万军工厂工人开展了为期10天的罢工，但最终失败了。希佩被解雇了，并被征召为士兵。他加入了德国军队，随即目睹了它的瓦解。

“红旗为新一天的红色黎明升起！”：

德意志帝国海军原本是皇帝的战略性武器，但是1916年在日德兰半岛（Jutland）反英国战争无果之后，它被搁置在了波罗的海和北海的港口。在这个钢铁时代，战舰的船员既包括技术工人，也包括普鲁士封建制度残余的高级军官。因此德国社会谱系的两端被迫在甲板下合作。“不管你是

35. 斯巴达克同盟是指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左派革命组织，原成“国际派”，因创办杂志《国际》尔闻名。——译者注

不是工作到死”，无畏舰莱茵兰（Rheinland）的船长告诉代表团的工程师们，“我们的原则是让战舰有条不紊地战斗。士兵是小事；我们想要多少就有多少。”³⁶

1918年10月，皇帝开始主张“荣耀的和平”，海军最高指挥部决定打响伟大的瓦格纳式的（Wagnerian）³⁷最后一战，一次对英国海军的自杀式袭击：“没有任何隐藏。军官们……彻夜狂欢。他们谈论着舰队的死亡行进……”³⁸但水手们在船上、在港口窃窃私语，“李卜克内西万岁！”当李卜克内西仍在狱中的时候，他已不仅仅是左派的反抗象征。俄国革命开始了；被称为苏维埃的工人委员会取代了沙皇和国会的地位。扬·瓦尔廷（Jan Valtin），一位不来梅（Bremen）水手的儿子回忆起这一手新闻从海军逃兵那里传来时的情形：

那时有个从列宁格勒（Petrograd）回来的水手来我家作客……他站在客厅的角落里，讲述世界上第一个工人政府布尔什维克（Bolsheviki）的胜利。他喝了大量的不加糖黑咖啡，说到声音嘶哑。房子里挤满了人。人们来来往往。他们问问题，摇头，辩论，许多眼睛闪着光。³⁹

36. 引自 Sheidemann, P., *Memoirs of a Social Democrat*, Vol. II, London: May 1929, p. 55.

37. 威廉·理查德·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 1813—1883），德国作曲家。此处形容战争如同瓦格纳的歌剧一般宏伟有力。——译者注

38. Valtin, J., *Out of the Night*, London: 1941, p. 8.

39. 同上, p. 7。

德意志帝国海军的叛变被描述为士气低落的挨饿士兵的自发行为，但事实上，这是由那些看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水手们精心计划的。一个革命委员会和一个内部组织在起义前一年多就准备就位了。恩斯特·施奈德（Ernst Schneider），一位海军评定员回忆起1917年夏天他们是如何在威廉港（Wilhelmshaven）的歌舞厅成功举行秘密会议的：

歌舞厅里挤满了水手、女孩和一些平民。管弦乐队在演出中场离开舞台，当舞台的大幕布突然落下，台下响起喊声：“都待在原地，别动！”然后，从帘子后面传来响亮的声音，感人而有力：“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发生的前夕。未来将不再有战争，不再有受压迫的苦工，不再有流血的大众。属于我们的日子就要来了。”⁴⁰

这次起义在1918年11月3日到来。军舰开始了“死亡行进”，但出发前夜的船员代表会议上已经通过了兵变的决议。“当局面得到控制，就让红旗在船桅或是鱼叉上升起。为新一天的红色黎明而升起！”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军舰驶回港口，水手们已经掌控了局势。扬·瓦尔廷记得：

那一夜我看见叛变的水手们挤进不来梅的征用卡车——卡车上有着越来越多的红旗和机关枪……人们走上街头。人们从各处赶来，摇摆的拥挤的身体和狰狞的面目形成一片汪洋大海，向

40. Schneider, E., *The Wilhelmshaven Revolt, 1918-1919*, London: 1944.

市中心涌去。许多工人都带着枪、刺刀和锤子。⁴¹

已经加入皇帝主战内阁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派了一个名叫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⁴²的强硬分子去结束兵变，但是水手们向德国的其他地区四散开来。

“人们获得胜利……”：

奥斯卡·希佩遭受了德国应召士兵所经历的全部暴行——在练兵车受虐待，在营房被鞭打——但是距离战争结束只有几周了，当他的军队走上前线，他可以感觉到士气低落。

一位陆军中校发表了一段简短的演说，说我们将要保卫前线后方的桥梁。我们穿过城镇，来到火车站附近。这更像是一次游行示威。火车里陆续传来反战的呼声：“平等配给，平等付薪，战争就会远离我们！”⁴³

他们收到命令，不带军火地登上前往前线的火车。当火车从车站出发的时候，子弹将其射得千疮百孔。这些弹火来自一个已经叛乱了的部队，他

41. Valtin, J., *Out of the Night*, London: 1941, p. 10.

42. 古斯塔夫·诺斯克（1868—1946），德国政治家，1919到1920年担任魏玛共和国的首任国防部长，社会民主党成员，一战期间是德国国会成员。——译者注

43. Hippe, O., *And Red Is the Colour of Our Flag* (trans. Drummond, A.), London: 1991, p. 29.

们沿着铁轨埋伏。希佩的军队被部署到蒙斯（Mons）前线，很快就受到了英军的侵袭。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撤退，以防被敌方俘虏。这是我们主动发起的。我们号召我们左右方的两个连队一起撤退。我们所在的位置离车站不远，一辆火车已整装待发……⁴⁴

远在法兰克福，11月8日早晨，托妮·森德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小组决定是时候采取行动了。他们号召全城的工会商店主在一家合意的酒馆里集会。当森德结束当天的工作时，她已经听到了这样的声音：“我到达中央火车站时看到了一群人。是水手们！他们从基尔（Kiel）来。他们的蓝色水手服似乎是个象征。我冲去见他们……”这是一个疯狂之夜的开始。森德和一位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去了一家当地的营房，在那里他们组成了一个士兵委员会，释放了那些因反抗而被囚禁的人。然后，她挤出了人头攒动的街道，来到了工会商店主的集会。他们号召第二天早晨在法兰克福举行一次大罢工，准备推选一个工人委员会。这时候他们了解到，在路的尽头，一群士兵也和他们一样在举行群众会议。她回忆道：

在革命的前几个小时，我们遇到了（被后来证明的）主要障碍：士兵委员会。很多士兵可以说是完全缺乏政治素养。他们要求

44. 同上，p. 30。

在尽可能减少骚乱的情况下结束战争……⁴⁵

当地的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被叫去参加士兵的会议。与此同时，森德和四位工会商店主动身抓捕正在床上睡觉的法兰克福警察局长。工人们正在街头游行，数个工人委员会成立了，监狱的大门被打开。“这群人⁴⁶离人民群众的生活有多远”，她揶揄道，“难道不是再清楚不过的吗？”⁴⁷

到法兰克福市长宣布支持工人和士兵委员会时，森德开始写传单，宣布一个共和政体的诞生。黎明破晓之时，共和政体果真来了。当皇帝还在仔细考虑他的退位时，法兰克福的工人和士兵不仅已经控制了局面，而且已经有条不紊地完成了一次现存民事力量（civic power）的变更。市长、新的警察局长、政府新闻局和当地报纸媒体都承诺向还未建立的共和政体效忠。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地区（Bavaria）走得更远，他们甚至宣布成立一个独立的工人共和国。

11月9日，皇帝退位。柏林的街头依旧平静，但工厂里工人们的控制行动就要爆发了。他们工作完早班的两个小时，直到早餐开始。之后，工会商店主们的领袖理查德·穆勒（Richard Müller）回忆说，气氛变得很活跃。

工厂很快就空了，很不可思议。路上挤满了大量的群众。示威群众从最大的工厂所在的市郊向市中心靠拢。这不是一次和平

45. Sender, T., *The Autobiography of a German Rebel*, London: 1940, p. 87.

46. 指士兵。——译者注

47. Sender, T., *The Autobiography of a German Rebel*, London: 1940, p. 92.

的示威，手枪、步枪、手榴弹随处可见。⁴⁸

刚出狱的卡尔·李卜克内西被人们要求登上皇宫的阳台，在那里他向 10 多万群众发表演说。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坐在国会的食堂里无比沮丧；汤稀得如同水一般，加上食堂被武装的工人占领了。一群示威者突然冲了进来，将菲利浦·谢德曼（这些社会主义大臣中唯一一位体力劳动者）拖到阳台。谢德曼属于那代将社会民主党从秘密组织建成群众运动组织的一代人。不像那些控制党内领导权的律师和官僚，他被认为与人民在一起。现在有人告诉他，卡尔·李卜克内西将在不远处宣布工人共和国的成立。汤的问题突然变得无关紧要。谢德曼惊诧于即将取得胜利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满腔的政治热血涌上头顶。

我已经站在窗前了。几千位穷苦的百姓用他们的帽子挥手示意。群众的呼声就像嘹亮的合唱。紧接着是一片沉寂。我只说了几个词便迎来了巨大的欢呼……皇帝退位了。他和他的朋友们撤离了皇宫。人民全面地战胜了他们。社会民主党领袖埃伯特（Ebert）将成立一个劳工政府，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将归属于它。⁴⁹

当他回到食堂时，谢德曼记得：“埃伯特知道我所做的事后面如铁色。他

48. Müller, R., *Die Novemberrevolution*, Berlin: 1976, p. 11.

49. Sheidemann, P., *Memoirs of a Social Democrat*, Vol. 2, London: May 1929, p. 580.

用力地捶桌子，对我喊：“这是怎么回事？……你无权宣布共和国的成立！”很明显，法兰克福的警察局长不是唯一一位脱离现实的人。谢德曼的行为——建立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联合政府——将德国从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命运中挽救回来，但要不是社会民主党得到了大多数的工人的忠诚和接纳，这一切是不可能行得通的。

那一周，谢德曼严格控制着柏林的工厂，他的回忆录说这些工厂仍运转良好：

社会民主党的领头们那时正受着政治军官和工厂中激进派系的非技术工人的折磨。他们不得不一次次让这些人回归理性，却因此被扣上逃兵、破坏罢工的罪名。他们像训练有素的、有阶级意识的工人一样承受着一切，忠于职守。⁵⁰

停战协议在11月11日签署。各类选举被定于1月19日。工人与士兵委员会有效地管理着德国，与政府并行而非将其取代。这是德国与俄国的重要区别。

武装力量支离破碎。随着驻扎主要营房的士兵们四散而去，社会主义律师们扮演起了警长的角色，只有军队中的精英团体岿然不动。社会民主党感知到支持左派的工人们中升起的怒火，因而发布了号召团结的“禁止兄弟间的战争”。但是不久后谢德曼将会写道，“在所有的战争之中，弟兄之

50. 同上，p. 565。

战最为可憎。这样的战争现在不得不在德国的工人群众中打上好几年。”⁵¹

“来自德国劳工运动的残余……”：

当奥斯卡·希佩的军队回到他们的家乡莱比锡附近的哈雷（Halle）时，希佩将自己打理干净，前往柏林与李卜克内西接头。作为法兰克福临时公务人员的托妮·森德经历了革命发生后的头几天，她组织军队从莱茵兰撤离，并为当地百姓供给粮食。很快她就发现那些先前反对民主的人现在开始呼吁选举尽快开始。

所有的反动派都看见了避免实质性变革的机会，高呼选举！民主！大部分社会主义者（右翼）没有对革命性改变做好准备，完全满足于议会制政府。士兵们也厌倦了，只想回家过上正常生活，他们加入了前者的阵营……。在整个战争期间，独立社会民主党完全脱离民意，它的所有活动都被禁止了。我们必须在某个根本性的决定发生之前获得民心。⁵²

奥斯卡·希佩对此有不同的看法。1918年12月，在被遣散的青年士兵的世界中，左翼和右翼的拉力同样大。对于希佩来说，战略是显而易见的。对普鲁士军国主义最后的大清扫即将到来，这将把所有的权力赋予工

51. 同上，Vol. 1, p. 21。

52. Sender, T., *The Autobiography of a German Rebel*, London: 1940, p. 114.

人与士兵委员会。在这之后，德国和俄国将命运相连，革命将在全世界展开。比方说，在波罗的海（Baltic）的海岸，恩斯特·施耐德的水手们无心徘徊，试图通过无线电直接与俄国舰队取得联系：“为了确保与喀琅施塔得（Kronstadt）保持永久的通讯。几百位全副武装的水手被革命委员会派去占领柏林附近的瑙恩（Nauen）的无线电台。”⁵³

正是因为没能拿下电台，派遣的失败让人民海军分部（People's Marine Division）成为了柏林的中心。同时，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也正准备让它的支持者投入战斗，谢德曼回忆道：“相比于那些激进分子——共产主义者从1914年被粉碎的德国劳工运动中招募的残余力量——我们的支持者在政治和生产上都训练有素。”⁵⁴

第一次冲突发生在工人与士兵委员会全国代表大会上。在希佩和施耐德这样的人眼中，大会作为红军联盟，应该取消选举，控制德国。但大会果断地投票反对这么做。当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说“我们当中有反对革命的声音”时，一些士兵用步枪指向他。

希佩记得，在这个阶段，“我们将（国民代表大会）视作走向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重要的武器……李卜克内西很清楚，如果我们想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必须赢得委员会的多数人。”⁵⁵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一个由社会民主党的成员组成的共和国士兵团建立了（Republican Soldiers' Corps），偶尔参加红军联盟的一些示威活动。有枪击事件发生。面对权力的真空，社

53. Schneider, E., *The Wilhelmshaven Revolt, 1918-1919*, London: 1944.

54. Sheidemann, P., *Memoirs of a Social Democrat*, Vol. I, London: May 1929, p. 565.

55. Hippe, O., *And Red Is the Colour of Our Flag* (trans. Drummond, A.), London: 1991, p. 35.

会民主党同意军官招募自由军团（Freikorps）——由右翼的前军事人员和学生组成的准军事团体。柏林全城可见写着“杀死李卜克内西”的海报。

现在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从独立社会民主党里分裂出来，成立了共产党（KPD）。⁵⁶它由第二国际的革命老兵组成，他们因莫斯科的建议变得强硬。在共产党成立的大会上，李卜克内西声称现在不是夺取政权的时候，但他在会上也遭遇挫败。像希佩和施耐德那样年轻的战士、水手没有心情退让；他们想要革命。其中一位共产党领袖回忆道：

整个柏林充满了紧张的革命气氛……那些无组织群众的代表来我们这里，只想要斗争，通过斗争解决问题，为了斗争而斗争。他们不能理解，在显而易见的情况下，新斗争并不会以胜利收场，而将以失败告终。⁵⁷

斗争的导火索是柏林警察局长被解雇，他也是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成员。成千上万的群众上街抗议。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和工会店主们决定，是时候和政府决裂，成立属于他们自己的政府了。虽然这一计划纯粹是内阁的策略，但对于奥斯卡·希佩来说，这似乎意味着最后的战役将要打响。

那场长达六天、史称斯巴达克起义（Spartacus Rising）的战斗，不可避免地以流血和牺牲结束。政府调遣了社会民主党士兵和右翼自由军团。左派猛攻了社会民主党的印花厂。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一个自由军团的分

56. 很抱歉，这段工人历史必须被缩略。

57. Paul Levi, *Rote Fahn*, 5 September 1920. 引自 Harman, C., *The Lost Revolution*, London: 1982, p. 70.

队逮捕，后于1919年1月15日被谋杀。他们的尸体被丢到了运河中。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左派与右派都在相互射杀。施耐德记得当时北海（North Sea）港口的场景：

这时候，战斗在威廉港的大街小巷进行着。以紧密纵队作战的反动者们遭遇重创，手榴弹从房顶和窗口向他们投来。他们的呼声“埃伯特！谢德曼！”被革命者的“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所淹没。⁵⁸

“弟兄之战”现在是工人运动的核心事实。它将不仅塑造德国历史，还将改变世界历史。

“这是新人类……”：

仅在几年之后，前士兵写的回忆录和小说等图书出版，人们开始理解过去四年的斗争对他们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这是“被战争摧毁的一代，即便他们或许已经从中破茧而出”。⁵⁹ 工人运动中的暴力分裂造成了这些破坏。战争前田园牧歌般的社会民主，那大世界中的一方小天地，不仅仅是分裂了，而且是消失殆尽了。

法西斯主义作家恩斯特·容格（Ernst Jünger）还记得那些战壕里的年

58. Shenieder, E., *The Wilhelmshaven Revolt, 1918–1919*, London: 1944.

59. Remarque, E. M., *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London: 1929.

轻士兵，那些完全习惯于高科技和暴力世界的人们，“对自己和他人冷酷无情”：

我被这样的认知所战胜：这是新人类，大动荡的先驱，中欧的精英。一个全新的种族，聪慧、强壮、充满意志力。它在此所透露出的一切，明天将成为轴线，生活将围绕其旋转得越来越快……战争没有结束暴力，而是拉开了暴力的序幕……它是一所伟大的学堂，这些新人类将打上我们的烙印。⁶⁰

左派也有同样的直觉——战争创造了关于工作的新的社会生态、反叛精神和心理类型，所谓“威权主义的反叛”。反纳粹编剧卡尔·扎克迈尔（Carl Zuckmayer）这样描述处在后战争创伤恢复期的一代：“我们的生活由这样的知识开启——关于世间最终极、最伟大的事物的知识，关于人类最可恶、极大地抛弃了人性的事物的知识，以及高于一切的同志友谊。”⁶¹纳粹主义从这种新人类身上创造出的东西众所周知。而我们可以在希佩、施耐德、瓦尔廷这样的男性和托妮·森德这样的女性身上看到它是如何影响德国工人运动的。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德国工人运动不仅在政治层面四分五裂，而且在社会层面也同样如此。独立社会民主党一分为二，一些回到了旧的社

60. Junger, E., “Fire,” in Kaes, A., Jay, M., & Diemberg, E., *The Weimar Republic Sourcebook*, London: 1994, p. 19.

61. Zuckmayer C., “Erich Maria Remarque’s 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in Kaes, Jay, & Diemendberg, *The Weimar Republic Sourcebook*, London: 1994, p. 23.

会民主党，一些投向了共产主义。结果是，德国共产党成为了俄国之外的最大的共产主义政党。大多数共产党成员都是像奥斯卡·希佩这样的年轻的体力劳动者。只有百分之十七的党员是女性。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中的蓝领成员陆续离开。像托妮·森德这样的白领，尤其是女性，则蜂拥而至。

事后我们看到，托妮·森德和奥斯卡·希佩是从战后创伤中涌现出来的两种“类型”的代表：受过教育的白领社会主义者，将自己交付于议会民主，在需要捍卫它时不惜发动群众斗争；自学成才的体力劳动者，效忠于苏维埃共和国，渴望一场战斗。历史现在让这两类人投入到斗争中，有时是共同反抗，有时则是互相对抗。

三次关键性事件将重新赋予并最终确立社会民主党领袖权威。首先是1920年3月的军事政变，史称卡普政变（Kapp Putsch）。社会民主党领袖先是试图用常规军镇压，但这些常规军拒绝战斗。于是他们向工会领袖求助，希望他们开展一次大规模罢工——这在十年前恐怕会让他们在喝白啤酒（Weissbier）的时候被呛到。罢工被证明有效，48小时后，军变陷入了瘫痪状态。

随着卡普政变溃败，共产党和许多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分子却拒绝退出。在鲁尔（Ruhr）的煤矿区，武装工人组成的军队暂时掌权。但是大罢工的政治作用是重建了社会民主党领袖的信誉，并且重建了那些终其一生都在嘲笑大罢工、却发动了一场大罢工的工会干部的信誉。

第二次危机是在1921年3月，奥斯卡·希佩处在这次动荡的中心。在萨克森州1912年的选举中，共产党获得了20.4万张选票，超过了两个社会民主党派的总和。希佩的家乡默塞尔不仅是共产党的重镇，一个更为极端的左派政党也在那里运作，它影响着洛伊那（Leuna）大规模的化工厂。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一场大罢工和起义在整个萨克森州发起，史称三月

疯狂（March Madness）。

武装工人在这片地区巡游，炸毁警察局和铁路桥。他们与警察、自由军团做全面斗争，直到最终被迫进入防御状态。希佩和 3000 名矿工、化工工人在洛伊那工厂内与他们决一死战。

我们不知道，除了我们以外，洛伊那没有其他人还在反抗。接下来的那个夜晚，警察开始袭击我们……洛伊那工厂的部分地区储藏着高能炸药。我们的领袖原以为敌方不会使用重炮，现在他不得不对此次袭击作出合理的回应。在那之后的第一天，我们的技工们开始制造一辆列车……⁶²

但即使有了装甲列车，也只是延迟了溃败的时间而已。他们被抓捕，囚禁在硝酸物筒仓里。“每天都有百姓被警察带进筒仓里来……如果有人被指认为共产党员，他就会被拉到墙边枪毙。”⁶³

这样的场景发生在欧洲工业最发达国家的中心，这里的革命原本在两年前就该结束。几年后，希佩被从筒仓里放出来，他记录下了对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警察军营的感激。在“弟兄之战”中，你现在所能希望的就是战俘能受到公正的对待。

62. Hippe, O., *And Red Is the Colour of Our Flag* (trans. Drummond, A.), London: 1991, p. 54.

63. 同上, p. 55。

“一次爆炸如期来临……”：

请再一次将自己想象成一位在汉堡工作的典型的德国工人，不过这次是在 1923 年。后战争时代的第三次，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次危机即将爆发。希特勒在巴伐利亚发动的啤酒馆暴动（Beer-Hall Putsch）⁶⁴ 已经失败，但他的纳粹党成为了一支政治力量，且将要获得百万选票。但共产主义更加强大：1923 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时，50 万工人上街参加共产党游行示威，由 2.5 万穿着制服的共产党民兵打头阵。他们全力准备这场所有人都能预见的冲突。法国军队占领了鲁尔区，工人运动将消极抵抗调整为占领。恶性通货膨胀出现了：1905 年你也许能一天赚 2 马克，现在可以赚 170 亿。失业率在 12 个月内从百分之六飙升到百分之二十九。国家依靠总理的法令运转，而非国会。社会民主党被推向左派。它是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Thuringia）地方政府的统治党，而共产主义者即将做出历史性的跨越；他们将和社会主义者一起加入地区联合政府。作为回应，军队准备进攻这两个地区。同时，共产主义者已经秘密地精心策划了武装起义，为到达紧急关头的危机做准备。

当然，“典型的德国工人”已经不存在了。工人阶级被高度通胀和外国

的占领弄得头晕目眩，但这里存在着两个政治团体，它们在面对危机时将采取非常不同的行动。

64. 啤酒馆暴动，又称慕尼黑暴动，是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等人在 1923 年 11 月 8 日到 9 日之间在慕尼黑发动的一次政变，为夺取慕尼黑和巴伐利亚的政权，但以失败告终。2000 余人走上慕尼黑市中心游行，他们与警察对抗。16 名纳粹官员和 4 名警察死亡，希特勒本人也在此期间受伤。两年后希特勒因叛国罪被逮捕。——译者注

1919年1月，波罗的海舰队最后的防线被打破的那一天，扬·瓦尔廷逃到了海边。他在1923年回到汉堡，一个令19岁的人感到厌倦的战后新人类的世界。

我带着高度的热情投入到党的工作中。除了共产主义者的攻击外，一切都无关紧要……为了履行对党的责任，我上了一条又一条船，走过一个又一个港口。晚上有会议、圆桌讨论和政治课程，几乎都持续到午夜。我无心思考衣服、娱乐和女孩。我觉得自己是党政机器中的活动齿轮。我变得贫困而艰苦，为此感到崇高而愉悦。⁶⁵

“我具有阶级意识，因为阶级意识是我们的家庭传统。”他回忆道。但是这种意识获得了不同的存在形式：那个由共产主义者创造的“世界中的世界”重新被新人类创造，他们是强硬而瘦削的防线战士，对自己和他人冷漠无情。瓦尔廷是共产党领袖的地下情报员，与前来指导革命的俄国军事顾问往来密切，这种秘密工作的浪漫滋味将伴随他一生。托妮·森德处在这场运动的另一阵营，她回忆起街头“令人恐惧的紧张氛围”。“人群漫无目的地瞎转，似乎察觉到了要发生的事，想要在第一时间目睹一切。”⁶⁶

一次大爆炸带着一场大罢工的诉求如期到来。为何它的支持者

65. Valtin, J., *Out of the Night*, London: 1941, p. 36.

66. Sender, T., *The Autobiography of a German Rebel*, London: 1940, p. 209.

想要让整个工人阶级卷入政治性大罢工？他们中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一道阀门必须被打开。他们认为一次大罢工将会改变整个局势。⁶⁷

法兰克福成立了一个联合斗争委员会，以反抗关闭一座工厂，动员群众支持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被围困的社会主义政府。森德回忆道：

一切都被共产主义者的固执所破坏。工会原则上反对大罢工，但为了拯救现状，他们愿意参加小规模示威性罢工……第二天只有局部罢工开始了。这显示出共产主义者虽然影响了大部分失业人员，但对在职人员影响寥寥。两天后，他们决定继续工作。⁶⁸

现在军队进来了，为了废除社会主义的地方政府。森德赶到萨克森州，目睹了那里劳工运动的瘫痪。共产主义者号召进行一次大罢工。工会代表大会被召集起来，但他们拒绝为大罢工投票。莫斯科和柏林之间的电报疯狂往来，导致共产主义起义在最后一刻被取消。

但没有人通知扬·瓦尔廷。他的电报没有送达。在汉堡，有1700位工人参加共产主义民兵组织。他们按照计划在10月23日午夜开始暴动。大罢工没有爆发，当地社会民主党分支对此次起义的计划也一无所知。瓦尔

67. 同上。

68. 同上，p. 213。

廷当时在艾姆斯比特尔工人阶级聚集的郊区，那里的社会主义男声合唱团在1905年曾是这个航海城市的骄傲。瓦尔廷的职责是用手榴弹袭击警察局，并保护那里的武器。黎明破晓时分，

共产主义者从周边的社区向汉堡行进。不久传来两声刺耳的汽笛——开始袭击的信号……我跑下四层楼梯，进到一个已经挤满了武装游击队员的大厅。也许五分之一的人有一把步枪，四分之三的人有一把手枪，其余人扛着铁锤和尖刀……⁶⁹

成千上万的社会民主党工人那天早上醒来后，看到这令人困惑的场景。他们被扛着步枪的年轻人挡在去上班的路上。许多人嘀咕着无产阶级专权，他们喃喃自语，“好吧，这不会持续太久”，然后扭头回家。这场起义持续了三天，最后一天瓦尔廷的袭击小组决定解散。

我感觉好像再也高兴不起来了……一切如此血腥。这让一个人想转过头对着天空咆哮，痛苦就是那么深厚。为什么？……没有逃走的机会。人们充满了敌意。连妓女都嘲笑我。“和他一起去绞刑架，”其中一位妓女一边摇晃空啤酒瓶，一边反复地唱起来。⁷⁰

69. Valtin, J., *Out of the Night*, London: 1941, p. 68.

70. 同上, p. 77。

目睹了汉堡斗争的俄国共产主义记者拉瑞莎·莱斯纳 (Larissa Reissner), 描述了两周之后的一场社会主义音乐节。从她那充满反讽的文字中, 我们可以看到 1905 年的陈旧仪式对于迷失的一代来说是什么样子。“一个巨大的、半满的、精雕细琢的大厅。几百位通常被压抑的、沉默寡言、纹丝不动的工人……圆形的、快活地向上翻开的瓶酒杯盖在任何一张桌上都找不到……”开场是一位社会主义者的演讲; 然后一个工人合唱团唱起了“田园牧歌的欢欣与纯洁之爱的喜悦”。

没有结巴, 没有一个错误的音符。很显然, 他们为这场乐团演出排练了至少两个月, 尽管他们饥饿、失业, 孩子因没有食物而咆哮, 法西斯主义者正筹划着战争。不, 一切都不能阻挡社会民主党祥和的文化、教育训练。⁷¹

这篇文章虽然是对社会民主的恶意攻击, 但它不经意地捕捉了 1923 年 10 月大部分德国工人所感受到的实质。被一个喧闹的世界包围, 他们退回到自己创造的那个世界: 社会民主大世界里的小世界, 不管它在外界的革命者看来有多苍凉。

“没有工人追随希特勒……”:

汉堡起义后, 扬·瓦尔廷将会逃避警察的追捕, 生活在边缘线上: 他

71. Reissner, L., *Hamburg at the Barricades* (trans. Chppell, R.), London: 1977, p. 37.

成了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情报员，苏维埃情报机关在旧金山的职业杀手，以及圣昆廷（San Quentin）监狱的囚犯。1929年他回到德国的时候，纳粹将即将成为德国国会的第二政党。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柏林各地的贫民窟与希特勒的褐衫队⁷²展开街战。因为经济衰退，百分之八十的共产党员现在都失业了。

瓦尔廷再次被招入共产党核心集团，他被允许会见共产国际主席格奥尔基·迪米特罗夫（Georgi Dimitrov），后者隐姓埋名地住在柏林威廉街（Wihelmstrasse）的一家书店楼上。迪米特罗夫散发着香水味，挥舞着雪茄，对他说：

希特勒的运动在工人中没有追随者……你不必为此分心。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是社会民主党。我们最关键的任务是消除它的影响力。之后我们会将希特勒和他的流氓垃圾倒入历史的垃圾箱……

然而在1932年的大选中，纳粹党以1375万张选票获胜，占总选票的百分之三十三。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合计选票占百分之三十七，但“弟兄之战”让工人运动输给了有力的在野党。希特勒在1933年1月成了总理，以国会纵火案（Reichstag fire）⁷³的名义镇压了共产党。后来社会民主党也在

72. 褐衫队是1921年8月3日成立的纳粹武装组织，队员穿褐色制服，佩戴“卐”字袖标。最初主要破坏其他党派的革命运动，后参加1923年11月8日的啤酒馆暴动。——译者注

73. 国会纵火案是指1933年2月27日，纳粹党策划焚烧柏林国会大厦，打击共产党和其他反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力量的事件。希特勒借此解散了共产党。——译者注

同一年被取缔。俄国之外最大的共产党和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就这样被摧毁了。

1933年2月，托妮·森德发现她的照片出现在纳粹刊物《犹太人之镜》（*The Jewish Mirror*）的头版。她逃到了纽约，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工作了一段时间，1964年在那里去世。

恩斯特·施耐德，波罗的海舰队的革命者，一直到1935年都在伦敦流亡。战后他作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在伦敦的码头工人中积极活动，并创办了一份叫作《口岸工人号角》（*Port Workers Clarion*）的报纸。

1937年，原本在纳粹集中营被判处死刑的扬·瓦尔廷，被盖世太保用作间谍。他被释放，并被要求潜入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铺开的德国共产主义网络。但控制他的人并不知道，他仍在为苏联情报局服务。情报局曾在他人狱期间给他传来了加密消息。当他拒绝执行来自莫斯科的更多任务时，他被绑架了，但最终得以逃脱。他也逃到了美国，在战争期间加入美军，后来被非美活动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调查。他在1951年去世。

奥斯卡·希佩在1933年成了德国共产党中的托派（Trotskyist）反对派。在希特勒的火炬胜利大游行之夜，他上街抗议。被纳粹囚禁期间，他忍受饥饿，被铁条抽打。1936年，他被释放出狱，移居到波罗的海上的偏远小岛，以此熬过战争的年代。1948年，因之前参加托派活动，他被东德的苏维埃当局判处25年徒刑。在1956年被释放之后，他搬到西德。在那里他加入了社会民主党，1990年去世。在1934年的审判中，他对法官说：

长期以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能让社会进入到更高的、社会主义的阶段。如果说我们无法在1933年，在资本和劳动

的冲突中抵达这个符合全人类利益的新社会，那么两个工人政党都该被怪罪。⁷⁴

74. Hippe, O., *And Red Is the Colour of Our Flag* (trans. Drummond, A.), London: 1991, p. 159.

全然无知的工人

中国工人阶级的诞生

译=张立

罢工只会扰乱和平，带不来任何好处。
我们认识到你们是无知的
故在此严厉警告你们勿再进一步盲目冒险
并恳请你们复工。

——警方反罢工诗歌，上海，1911¹

1. 《时报》1911年8月10日。引自 Smith, S. A., *Like Cattle and Horses: Nationalism and Labor in Shanghai 1895-1927*, Durham: 2002, p. 73.

2005 年，印度新德里

他们没有料到会有警棍的来袭；棍子砸下时的残暴吓坏了来自本田工厂的罢工者们。当时，他们中的约 3000 人正坐在一个花园的草坪中，警察让他们在那里等候。他们还把鞋子脱了。接着，到了下午 2 点 45 分，防暴警察就把他们包围了，封锁了所有的出口并用警棍暴打他们。“我见过骚乱，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暴力，”工会干部 V·S·亚达夫（V. S. Yadav）说。“如果人们护住自己的脑袋，警察就会拉开他们的手臂去打他们。”²

在这起事件中有 800 人被捕，其中 60 人是被强行从当地医院转移出来的，这家医院在当天下午共接待了 400 名伤员。第二天，当留在本田工厂里工作的临时工们听到关于在公园中发生的事的新闻时，他们翻墙而逃。其中一个人说：“我们害怕自己的下场会更糟，因为我们就在工厂里。”3 天后，工厂的日本经理同意了一个协商办法：支付工人罢工时间的全部薪水，重新聘用所有被解雇的工人，冻结一年内所有其他的要求，并承认工会地位。这对新近成立的工会而言，只是一个微小的胜利，但对整个印度而言，却是一响惊雷。

本田摩托（印度）有限公司（Honda Motorcycles and Scooters India Ltd.）在印度的工厂是该国最为先进的工厂之一。它坐落于古尔冈（Gur-

2. “Lathi charge on the HMSO Workers on July 25 2005 in Gurgaon: A Citizens Committee Enquiry Report,” New Delhi: 2005, p. 22.

gaon)——新德里边上的两个经济特区之一,采用了精益生产技术³和新的生产科技。其劳动力总体由正式工与临时工混合组成。

本田工厂有大约 250 名住在厂里的固定工。他们住在有空调的宿舍里。除他们以外,厂里还有 500—600 名外来的非技术员工以及约 2000 名睡在同一个厅堂里的临时工。⁴

尽管工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按照印度的标准,这里的工资还是很不错的:大部分人每个月的工资介于 58—70 英镑之间,比最低工资标准要高,加班还有双倍薪水。但是正如一个工人所言,他们是有所不满的。

我们被迫呆在工厂里面,工作环境很恶劣,“第四组安保”公司(Group 4 Security Agency)的保安持续看守着我们。大约有 2000 名工人不得不挤着睡在同一个屋檐下。里面根本没有新鲜的空气。有时我会跑到屋外的草坪上睡觉。工厂给我们提供了像电视一类的设施,也可以打电话回家,但我们却不能自由地

3. 精益生产技术(Lean production):一种通过精简生产过程,从而达到包括市场供销在内的生产的各方面最好结果的一种生产管理方式。其有别于传统生产方式的特色是“多品种”,“小批量”。——译者注

4. “Lathi charge on the HMSO Workers on July 25 2005 in Gurgaon: A Citizens Committee Enquiry Report,” New Delhi: 2005, p. 22. 除了来自工会官方人员的信息,该份调查报告(enquiry report)对其中所有的工人证词均做匿名化的处理。该份报告由一个汇集学者、工会领袖以及非政府组织调研人员的团队完成。

离开。⁵

麻烦源自于一件小事：有一个班组升了工资，而其他的班组却没有，而且每个人都被要求签署一纸空白的文件，工人们推测这是工厂让他们同意的一个方法。工人们开始绝食抗议，他们在午休时间拒绝进食和继续工作。2005年2月8日，他们选举了一个7人委员会来筹建工会。6月25日，A班的1500名工人在离工厂很远的地方召开了一次集会。2天后，2700名工人被解雇。没有人罢工也没有人提出任何新的工资要求。注册工会似乎已经激起了工厂经理的回应。

被解雇的工人在工厂大门外100米的地方开始静坐抗议。他们每两天登记一次，并且在那里逗留了1个月。到了7月18日，持续的谈判终于达成了一次性重新聘请400名工人的决定。然而，由于被挂在工厂大门的工会旗帜所激怒，工厂经理食言了。这便是7月25日那场最终以警棍镇压结尾的大规模示威事件的导火索。

本次本田的纠纷对印度工会而言是一记警钟。这些工会形成于一个与现在不同的经济模式之下：那时，印度的经济被保护起来免受全球竞争，国家拥有重工业，劳动法保障了“组织部门”中员工的一系列好处。

“一切都变了——过往来自政府的普遍社会压力已经完全消失了，”莫汉·拉尔（Mohan Lal）说。他是印度工会中心（Centre of Indian Trade Unions）⁶在德里（Delhi）的秘书长。我和他在工会不通风的总部里会面，

5. 同上，p. 15。

6. 是印度的一个全国性工会联合会，是目前印度最大的工会联合会之一。——译者注

头顶的电扇在尽力为我们送来清凉。在他身后是一尊列宁（Lenin）的半身像。隔壁房间里有一台打字机，但在这里，以及我在德里见过的另外3个工会总部里，都没有电脑。和他们打交道的公司老板都用黑莓手机进行全天候、跨五大洲的交流，但他们却几乎不接触外面的世界。莫汉·拉尔的工会主义（trade unionism）招牌不是用来处理这些问题的。

在我做车间工人的时候，厂里还有一些规章制度存在，但现在雇主可以为所欲为了，他可以聘请任意一个工人，也可以解雇任意一个工人——所以，一个总体的改变已经发生了。

尽管在过去十年间，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愈发明显，但印度的工会才刚刚开始尝试将产生于自由贸易的临时劳动力组织起来。当被问及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工会能否生存时，拉尔回答道：“工团主义的理论化层面是完好无损的，它不会变，会一直保持过去的模样。变的是工人们现在不明白这个哲理的含义了，不明白这个理论化的层面。”

拉尔告诉我，连工人阶级本身也已经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

他们不再按照旧的观念去思考了——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因为现在可卡因（glitter）对他们的吸引力更大。想要去影响他们是很难的。取而代之的是涌现了一批小型组织——本土社团、非政府组织（NGOs）——而非从前意义上的工会。他们在草根层面上工作，但缺乏一种总体的视野。

在德里郊外有两个经济特区。古尔冈在西边，诺伊达（Noida）在东

边。这两个特区的典型城市景观就是：一座玻璃幕墙写字楼边上，是一条修到一半的马路，马路旁有低矮的砖瓦小屋、牛、电动三轮车以及乞丐。在诺伊达，人们拥有的只是拉尔所鄙视的那种草根工会主义。印度劳工大会（Hind Mazdoor Sabha）在当地的办公室是一个只有两张长凳、一台手机、一台饮水机以及一把电扇的简陋房间。这里没有列宁的半身像。它位于工人阶级住宅区的中心，在这里，孩童在街头玩耍，女人在倒塌的矮墙边上拧干衣物，还有一群大黄牛懒散地待在一个堆满排泄物的小牧场里，它们的声音与气味充斥了整个街区。

舒汗（Chouhan）先生负责印度劳工大会在诺伊达的运营。比莫汉·拉尔小一辈的他正尝试为服装行业的工人发声，在这个行业里，雇佣合同只是一纸空文。那些在长凳上坐着的年轻人或是被他们的地下服装厂老板解雇，或是被老板欺诈。其中一人要讨回自己的薪水，另一个人则询问自己起初被扣除的保险基金里所积累的钱的数目，还有人回到自己的村庄去见家人。他们全都在工厂的大门前被解雇了，全都负债累累。

苏尼尔·乔汗（Sunil Chowhan）从事操作印刷机的工作。他20岁出头，留着一撮小胡子，衣服松松垮垮地挂在他纤瘦的身体上。

我认为自己是厂里最好的印刷机工人之一，所以我要求加工资。第二天早上当我去到工厂大门时，他们告诉我我被解雇了。我追着厂长要补偿金，接着我就去印度劳工大会投诉了。现在的问题是完全没有收入。我欠了债，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乔汗的丝绒服装工厂里，每日工时是8小时。但诺伊达的惯例是强

迫工人在厂里接到大订单时双倍加班。

有人那样做了，但我最多只会做 12 个小时……从墙外看起来工厂好极了，但如果走进厂里面，你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灰尘——灰尘落到我们的头上，头发都变白了。

诺伊达的服装产业服务于日益膨胀的出口市场，像这种情况，生产单位必须遵守一系列“相关法规”——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会活动分子都一定知道的。这些行为准则规范是各名牌企业在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运动家的施压下所制定发布的。但是这个体系并不被印度劳工大会办公室里的人看好。工会领袖说，企业一开始会设立一个“橱窗”工厂来操作他们的骗局，看起来，企业是在和“橱窗”工厂一样的环境里完成所有的服装生产工序。但这只是他们表演给从品牌母公司过来考察的经理看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这些规范似乎与工人的需求并不匹配。规范里坚持要在洗手间内配备厕纸，但一个男工人告诉我：“印度工人是不用厕纸的——我们用水。”他说相比于厕纸，他们更想要一份书面合同。

然而，书面合同在这里是很少有的。把工作分包给不规范的血汗工厂⁷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一般来说，在工厂里，作为劳动力承包商的工头会直接把工资发给工人。相应的，如果单干的工人要请假，为了避免丢掉饭碗的风险，他们也会把自己的工作分包出去。因此你会发现，这个看似是一个整体的工厂体系，事实上是一个由小型承包商和代理工人所组成的网

7. 分包 (subcontract): 指建设项目的总承包人将其项目中某些专业工程、单位工程或部分分项工程再分交给其他施工单位负责施工的一种承包方式。——译者注

络，工人中的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实际是在为谁工作。

2003 年，管辖诺伊达的北方邦政府（Uttar Pradesh government）⁸ 废除了工厂检查团。现在工会不得不向地方法官投诉。地方法官必须在当地的劳动部门调查投诉前颁布一个条令。截止至 2005 年 8 月，古尔冈地方法院共积压了 6000 个未解决的劳动纠纷案件。处理这些案件的办公室里，秘书职位已经空缺了整整一年，而且他们连一台打印机都没有。

印度的劳工运动诞生在英国的统治之下，并在国大党（Congress Party）⁹ 的家长式凝视下走向成熟。印度第一次大规模罢工发生在 1908 年，目的是为了声援入狱的国大党领袖，孟买的纺织工厂因此陷入瘫痪。最近的一次劳工行动是在 2003 年 3 月 21 日，多达 4000 万工人放下了手中的工具支持罢工。马克思主义政党控制着印度的两个邦，但再多的列宁半身像都没能阻止在工厂里工会权力遭到无情地持续削减。在诺伊达和古尔冈所发生的一切，正是印度一个崭新的工人阶级的诞生。

合同工、劳动力非正式化、日本经理以及警棍镇压；只提供外国资本主义式规范的经济特区——历史上也曾有过这样的前例，就发生在一个曾经像今日的新德里一样光彩夺目的城市里。

8. 北方邦政府（Uttar Pradesh government）：印度为联邦制国家，一级行政区域包括有 28 个邦、6 个联邦属地及 1 个国家首都辖区。每一个邦都有各自的民选政府。——译者注

9. 国大党（Congress Party）：全称“印度国民大会党”，是印度两大主要政党之一。该党主张坚持“民族主义、世俗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四项原则。——译者注

1919年，中国上海

快到6点了，到了换夜班的时间。在一个大型棉纺织厂前聚集了一群直打哆嗦的人，等待着印度警察打开工厂大门。他们面容黯淡而憔悴，肩膀蜷缩着，手插在打满补丁的棉服袖管里取暖。¹⁰

这座城市就是中国的上海。即将开始轮换的这一班将要持续工作12个小时，在深夜里会有一次半小时的休息时间。这些工人主要是外地人和妇女。

一个可怜人终于来到了工厂的门前，她把身上的东西卸下，在冰冷潮湿的地上堆成一堆，等待着吹哨。“你从哪儿来？”有人出于同情问道。半恐惧，半鼓起勇气，仿佛要振作起来去面对训斥似的，她挣扎着站起来答道：“虹口来的。”那里离这儿接近有三英里路程。但愿她是在织机上干活的工人之一，因为这样她就能在狭窄的长凳上有一个自己的座位了。而那些看着纺锤工作的妇女和儿童则必须整晚站着干活。¹¹

10. Gamewell, M. N., *The Gateway to China: Pictures of Shanghai*, New York: 1916, p. 217.

11. 同上, p. 224.

这里有棉花、童工和罢工行动；在一切的最后，还有一场血腥屠杀。在某个层面上而言，中国工人阶级的诞生与 1 个世纪以前英国的情况极为相似。但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上海有着电影明星、共产党人、帮会匪徒以及宗教团体。此地的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 80% 以上，人均卖淫者数高过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在西方人的眼里，这里就是艳俗的性爱天堂、金融高新区以及一个充满好莱坞风情的地方。“如此之有生气，如此精巧设计的运河系统，如此湍急奔涌的河流——此处的华美景象激发了诸如恐怖之事。”小说家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如是说，并评价到：“这就是生活本身。”¹²

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而言，城市中的居民看起来完全不能接受革命意识的宣传。

上海社会，分析起来，一大部分是困苦卖力毫无知识的劳动者；一部分是直接或间接在外国资本势力底下讨生活的奸商，一部分是卖伪造的西洋药品、卖发财票的诈欺取财者；一部分是淫业妇人；一部分是无恶不作的流氓、包打听、拆白党；一部分是做红男绿女小说、做种种宝鉴秘诀、做冒牌新杂志骗钱的黑幕文人和书贾；一部分是流氓政客……¹³

12. Huxley, A., *Diary*, 1926.

13. 陈独秀，《上海社会》，引自 Perry, E. J.,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1993, p. 85. 转引自 Perry, E. J. (美)，《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 104 页。

假若上述描述在你听起来仿佛奇异地预见了今日的上海，你无需感到惊讶。彼时，上海就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全球化都市。它作为一个通商口岸发展起来，里面有为了外国商人而建立的租界，这是今天经济特区的原型。战败于日本后，衰败的满清朝廷被迫同意外国人在此通商和设立工厂。1894年，上海已有3.6万工厂工人，到1919年，这个数字扩大到了26万。¹⁴

从农田到厂房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方兰英，一个来自苏北农村的农民姑娘，讲述了她的故事，这个故事对每个彼得卢时期的工人而言都是熟悉的。

我们很穷。十三岁时，一个来自上海的包工头到我们村里招收童工。他说：“上海好得不得了。你们可以吃鱼吃肉，米饭尽管吃。到那里，可以住洋房，挣大钱。”所以许多父母都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去做包身工。¹⁵

一旦进了工厂就会发现，这里的机器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但管理方式却是最落后的。被雇佣去缫丝厂里干活的孩子要在开水里剥蚕茧：“中国女监工在各个生产线间来回走动，间或惩罚一些做的慢的、或是被指责偷懒

14. Smith, S. A., *Like Cattle and Horses: Nationalism and Labor in Shanghai, 1895–1927*, Durham: 2002.

15. 访谈录，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引自 Perry, E. J.,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1993, p. 56. 转引自转引自 Perry, E. J. (美)，《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71页。

的孩子，她会把孩子的小手猛地摁进滚烫冒泡的大煮锅里。”¹⁶

不过如果说工厂里的罚金、暴力以及必要的沉默都和17世纪早期的英国一样的话，上海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与其他地方截然不同。到那里的工人必须处理协调一个迷宫一样的权力网络，这个网络使得工人难以辨明工人和老板间的界限，但要將不同群体的工人区分开来却奇异般地简单。上海的工厂首先不是一个“我们相对于他们”的世界，而是一个“我们相对于我们”的世界。

首先，劳动者内部存在着工作技能的划分。上海有一个涵盖了20万工匠的技术劳动力贵族阶层：金匠、木匠、印刷工人和铸造工人。在他们之下是工厂劳动力，其中8成是妇女和儿童，他们要忍受高速运转的工厂里那些严酷、繁重、机械化的工作，或是忍耐缫丝厂中极度高温的作业环境。在他们之下还有“苦力”人群：8万名拉人力车谋生的男性，5万名在码头的零工，2万名卖淫为业的妇女。每份工作都有其独特的亚文化。

在劳动技能划分之上还有地区民族间的竞争。上海的建筑业、造船业以及金属加工厂中的工匠主要是来自中国南部的外地人，讲粤语。上述每个行业都运行有一套行会系统——学徒制、拜师仪式以及各路地方神祇——以师徒间往来的庙宇作为主要活动地点¹⁷。在技术工人家庭中，只有男人才会外出工作。而工厂工人却住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来自中国

16. Gamewell, M. N., *The Gateway to China: Pictures of Shanghai*, New York: 1916, p. 232.

17. 上海工匠的行会：19世纪末，上海的外地工匠按照地缘关系组建各自的行会，也称“公所”、“会馆”。行会负责招徒授艺，保留有神祇牌位、上香以及宗教性庆祝仪式等传统。见Perry, E. J. (美)，《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南京：2001，第22—55页。
——译者注

东部和北部、普遍讲普通话的外地人全家都要工作；女人和小孩在工厂里上班，男人去做人力车夫、码头工人或者是捡垃圾。

按照对村庄的效忠，每个工作场所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划分。工厂的工头被允许招募自己的同乡。因此，中国工人和工头之间的纽带相比典型的工厂系统会更加持久。在某个特定的行业或工厂内，关于招募权的暴力竞争是很常见的。即便是这城市中的2万名乞丐也被按照各自的流出地划分成5个帮派。来自不同地区的劳动者会建立起互助会、育婴堂以及同乡会。由此，千里之外的村庄的等级秩序和传统得以在城市的中心被保留下来。怎么吃饭、留什么发型、唱什么歌——这些都是你在上海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里所依附的身份标记。

夏衍，中国社会报告文学之父，在描述棉厂外站在黑暗中的两队工人时捕捉到了这种分异：一边是本地的妇女，另一边是刚从宿舍被打醒过来的外来包身工。“在路上走，这两种人很少有谈话的机会。脏，乡下气，土头土脑，有口音，这也许都是她们不亲近那些乡下姑娘的原因。”¹⁸

帮会是一个更加复杂的要素。帝制时期的中国秘密社团无处不在，他们受殖民势力雇佣，经营鸦片交易。这形成了带有传奇色彩的帮会文化，无论何时，你只需粗浅地接触上海的社团便能发现这个现象。两个最主要的帮派，红帮和青帮，控制了毒品交易、卖淫、乞讨活动以及城市的滨海地区。他们的政治网络从绅士们的歌舞厅延伸至工厂，很多工头都是帮派的成员。刘阿九，一个纺织工人，回想起帮会在他工作生活上的强大影响力：

18. Xia Yan, "Contract Labor," in *Chinese Literature*, 8, 1960, pp. 47–63.

厂长经理故意让各种各样的“帮派”存在于工人之中,以便分化利用。新工人常常挨打,不许工作。无奈中你只好去找带你来上海的朋友。朋友所能做的便是带你去见某位帮会头子……新工人便要向这位帮会头子纳钱十余元,再花上五六元请大家吃顿饭。此外还要向招工者交钱五元。这样一来,就要花去二十余元。进帮后,你就得终生在帮。¹⁹

还有一种因素使得上海的效忠关系十分复杂:殖民主义。上海的两个租界分别被法国和英美政府管辖。这些租界比原有的老城区大得多,将老城区包围起来,占据了整个河岸。在租界里,“列强”²⁰进行直接统治,这些国家有自己的警察武装和法庭。虽然在里面居住的主要是中国人,但最有钱的中国人也知道自己只不过是这里的二等公民。租界体系将全球资本引入了上海,而且在上海的其他地区都因为军阀混战而政权交替的20世纪20年代里,它仍旧会生存下来。针对它的敌意还几次将中国工人和他们的老板联合起来。

在1919年前,罢工并不是一件新鲜事——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工资的贬值,罢工出现的频率增加了。但这些罢工是零星、缺乏组织的;有时工厂的工头会带领他们,有时行动是无人领导的,而且很快工人们就会从砸烂机器转变成举手投降。工匠也和工人们一样采取罢工行

19. 引自 Perry, E. J.,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1993. 转引自 Perry, E. J. (美),《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72页。

20. 原文为“powers”,在此意译为“列强”。——译者注

动，这反映了行会内部逐渐扩大的裂痕。但在当时工会几乎是不存在的。

对于当时世界上其他地区而言，中国的工人阶级显得无足轻重。当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在 1919 年的巴黎和会上成立时，一位英国公务员报告说：“中国没有出席……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她并不存在劳工问题。”没有人对此表示异议。²¹而在几周以后，这个观点就会改变了。

* * *

1919 年 5 月 4 日：

19 世纪末以来，中国的城市中产阶级中一直酝酿着一股反殖民情绪。民族主义领袖孙中山在 1911 年推翻了最后一任皇帝，却在北京被军阀取代其位。到 1919 年，中国因为军阀混战建立各自的地方政权而四分五裂，在这之后的 10 年间，这些军阀间将会进行一场混乱的权力斗争。

1919 年 5 月 4 日，中国政府同意将德国在华的殖民利益转移给日本的新闻不胫而走。数千名学生在北京示威游行，要求达成该协定的官员引咎辞职。全中国的救国委员会相互会面，交换意见，发送电报；五四运动中用上了所有非暴力的革命手段。当权者在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月时间后发

21. UK Department of Overseas Trade, "Report on the Commercial, Industri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in China," London: 1919. 引自 Chesneaux, J.,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Stanford: 1968.

动了镇压，数百名学生活动分子被捕。

上海对此的回应是上街抗议。商店罢市，学生涌出校园，呼吁工人加入他们的游行队伍。6月10日，10万名工人响应了学生的号召：“三罢”（罢市、罢课、罢工）的策略被发明出来。霎时间，上海的工人阶级深陷国内革命之中，且已成为这场革命的决定性力量。11日，亲日派大臣被解职，学生领袖被释放，和日本的协议也被取消。在不到一周的罢工行动中，上海工人做到了学生和商人都做不到的事。

殖民主义，于学生而言是对其国家文化的践踏，于信奉民族主义的雇主而言，是对其毛利率的侵害；于工人而言，则是每日虐待他们身体的暴行。在外国人的工厂里他们“做牛做马”，被当作牲口般对待。对外国工厂里的工人而言，接受身体检查是必须的，受到暴力是平常小事，被口头辱骂更是日常。要上厕所的工人还必须申请一个小小的竹片牌子：白色牌代表小便、红色牌代表大便。

1919年的大罢工里并不存在正式的工会；在多数情况下，是行会、同乡会以及工头组织的游行示威。帮会头子也给予了总罢工一定的支持，命令手下的乞丐和扒手在罢工期间暂停工作。但从根本而言，这次行动是自发的。它还为中国反殖民运动提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问题：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工人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及他们从中可以得到什么好处？他们只是戏剧中一个跑龙套的角色——就像中国农民几个世纪以来扮演的那样——还是他们会有什么新的表现呢？

工人们开始自己去解答这个问题。在罢工的第一天，24名工人聚在一起草拟了以下的声明：

普遍正义的原则一定能打倒暴政。我们，成千上万的上海工人

们，将会牺牲我们的生命去成为学生和商人的后备力量，来与野蛮的暴君做斗争。我们呼吁工人为自己行动，每个行业的工人组织起多种多样的小型工人团体。这样以后，便能够联合起来组成大的工人组织。第一步就是发起工人上街游行示威的运动。第二步则是在整个工业界组织大型的罢工活动。第三步则是牺牲我们的鲜血，成千上万工人的鲜血，去反抗野蛮的暴政。²²

这份宣言一经通过，他们便划开手臂，以血签字。在8年间，上海工人将会从民族主义的后备力量转为它的最前线——他们的确会经历一场彻底流血牺牲的斗争。

1919—1923年：

城市里隐形的底层人民很快发现，如果他们有能力让一个国际条约石沉大海，那么他们也可以尝试去争取自己的工资和工作条件。经济领域上的罢工和抗议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增多了，中国史学家称其为“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李忠（音），一个海军船坞的工人总结了当时人们的心情：

最坏的不是他们从我们身上获取利益，而是他们严重地虐待我们，我们工人是养活他们的人啊……就这样，我们被迫吃发臭的事物，穿发臭的衣服，住在发臭的房子里——我们的一切

22. “Proclamation of the Shanghai workers” (trans. Benton, G.) 引自 *Militant*, London: 17 March 1972.

痛苦都没有尽头。这种情况下，我的脸色常常发灰，还会流眼泪。难道我们不想拥有一个强大的工会吗？我们的第一要务是要解决工时和工资的问题，之后我们再处理其他的问题……²³

工人间的互助会是由工人与富有同情心的雇主合作建立起来的。电车工人、电力工人以及机械工人都各自成立了百人规模的独立工会。

1921年，共产主义活动分子李启汉开始鼓动位于主城区对岸的浦东区的烟草和丝绸工人们。他举办了一所工人学校，并通过学校和工人以及控制工人的青帮工头保持联络。在他组织的英美烟草厂第一次大罢工中，他采用了发誓效忠当地青帮老大的新颖策略，还通过了青帮的入门仪式，包括饮公鸡血酒。“在工会历史上的第一个阶段，有组织的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一个观察者记录到，“因此，没有得到当局政府允许而成立工人组织将会被判处死刑。”²⁴到了9月，他们发动了第二次罢工，李召集了机械工和工头们，向他们呼吁效忠帮会：

大部分工头都是青帮的，都结拜过兄弟。但大部分的工人不也都是青帮的人吗？欺负工人，就是欺负帮里的兄弟，这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啊。²⁵

23. Li Chung, “Letter of a Shanghai Dockyard Worker” (trans. Benton, G.) 同上。

24. Lowe, C. H., “Facing Labor Issues in China,” in *Shanghai Chinese Papers*, Vol. 11, Banff Conference: 1933, p. 661.

25. 1921年11月5日。引自 Smith, S. A., *Like Cattle and Horses: Nationalism and Labor in Shanghai 1895–1927*, Durham: 2002, p. 137.

到这一步为止，上海工人组织的故事走向与彼特卢事件以前兰开夏郡（Lancashire）工人的故事很相像：一个政治性事件触发了经济领域上的行动。但在这几个世纪期间，那个能够让刚起步的工人运动去实验、去纵容工人运动领袖的幼稚，以及去独自建立起工人组织的政治环境已经被破坏了。世界现已被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所主导。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已经对工人阶级所应该扮演的角色有了自己明确的看法。实际上，掌控着中国这两种潮流的知识分子早就预料到了工人阶级将登上历史舞台，他们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十多年了。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一开始就包含了对社会改革的承诺，但他对阶级冲突的敌意削弱了他对工人的同情。即便是用来描述工人阶级的词语也有着表示和谐而非冲突的内涵。工人——“社会的劳动部分”——从它知道自己位置的那天起就被视为是这个民族神圣的一部分。1919年孙的政党，国民党，就采用了8小时工作日、承认工会合法性、引入社会保险以及强制性仲裁的方法来平息罢工。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孙中山在中国南部的广东省建立了一个反叛性质的政府，并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开展了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以重整国民党。同一时间，大多是知识分子的共产党人，正努力使工人听懂自己的口音，他们把组建工会作为第一要务。

但英美烟草的工人罢工，使上海的中产阶级国民党人对共产党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警觉起来。他们成立了一个伞状组织，将50个友好社团与他们自己成立的、不主张罢工的工会团结起来。解放全民族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工会的组建中出现了。一开始，双方是肩并肩合作的。1922年3月，李启汉在一场大型的集会中发言后，纺织工人就成立了自己的工会。同月，缫丝工人在一个叫穆志英（音）的女监工带领下成立了上海女子工业进德会（Women's Industrial Progress Union），她是国民

党的支持者，也是青帮的一员。

共产党领导的工会首先展开了罢工行动，罢工9天后，日华（Nikko）纱厂的3800名妇女成功使得自己的工资增长1成。5月份，在资方违背了先前的约定后，她们再次进行了长达16天的罢工。但在这次行动中，工会的领袖被解雇了，青帮的头目利用他们的犯罪集团网络使得李启汉被逮捕。到了6月中旬，李还在狱中，纱厂工会已经完全落入了青帮的手中。

在8月的炎炎热浪里，穆志英带领2万名丝业工人走上街头罢工。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女性大规模罢工中，女工们使得全城40间缫丝厂停产。她们的诉求仅仅是在高温天气里得到一日的假期。女工们举着“性别平等”和“保护人权”的标语行进到租界范围内，但最终还是被警察驱散了，穆志英被捕，工会被禁。

1922年11月，在日华公司禁止了工会并且关闭了设立给工人子弟的学校后，纱厂工人再次进行罢工。当局政府试图逮捕罢工领头人时，英美烟草厂工人不顾路途遥远，团结一致走来加入了此次罢工行动。同样的，该区金匠和银匠也开始了罢工。浦东，这个位于上海黄浦江“麻烦的”一岸的小社区，现已对大型罢工驾轻就熟。这是一场浴血奋战的斗争。雇主们成立了反工会的联盟并雇佣工贼²⁶破坏罢工；工人们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殴打工贼并砸烂了他们的房子。11月末，浦东的罢工溃散了，上海非技术工人第一波工会浪潮就此画上句号。

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了这样的两件事。第一，不同产业的工人在浦东的棚户区聚集起来，个体的罢工行动转化成协作的、团结一致的行动。这不同于商人、学生和民众支持的大罢工，并招致了暴力的回应。一旦帮会

26. 工贼（strike-breakers）：工人运动中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破坏工人运动的人。——译者注

的匪徒意识到工会旨在维护工人们的广泛利益，而非只是为帮会获得其在企业中的位置的筹码时，再多的鸡血酒和香火都不能使他们继续参与到这种行动中。第二，国民党人展现了自己不需要共产党人的帮助也可以组织起工人的能力。这将会催生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新策略，就像我们之后将会见到的那样，这对于国民党人而言会是一个适得其反的后果。

无论如何，全国罢工运动的大门突然被猛地关上了。军阀吴佩孚公开斩首了35名京汉铁路大罢工中的带头人。全国的工人都意识到自己在军阀部队面前的无力以及工会的逐渐式微。在京汉铁路惨案发生后，上海的一个共产党领袖写道：“什么也没有剩下，仅仅还保有很小一部分的印刷工人和机械工人，再加上一部分店员。”²⁷这对于相互竞争以建设新中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人而言都是一次形象的提醒，那就是旧中国仍旧是摆在当前最为主要的问题。

1925年5月30日：

在1925年5月30日，一个名为埃弗森（Everson）的英国巡捕发现他的手下被一群愤怒的中国学生团团围住了，他抽出了手枪并在近距离下令开枪射击。“登时血肉横飞，惨不忍睹，群众大乱四散。”²⁸混乱中，12

27. 邓中夏，引自 Perry, E. J.,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1993, p. 76. 转引自 Perry, E. J. (美), 《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 [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108页。

28. 邓中夏，“Chung-kuo Chi-kung Yun-tung Chien-shih,” Beijing: 1949, p. 183. 引自 Rigby, R. W., *The May 30 Movement: Events and themes*, Canberra: 1980.

人被杀，17人受伤。埃弗森在针对该事故的报告中写道：“这之后交通很快恢复正常。”但他实已引发了一场在两年内就会造成高度异变的运动：上海工人革命。

五卅运动²⁹发生的根源，在于中国工人对外国管理者日益增长的怨恨，尤其是对日本人。日本内外绵株式会社（Nagai Wata Kaisha company）在上海就有11家棉纱厂。1925年2月，工人们罢工并成立工会，工会的口号就是“反对日本人打人”。行动蔓延到了附近的工厂中，其中包括日商的丝厂，并引发了暴力的后果。棉纺工人派发印有“他们经常叫我们‘废物’和‘丧国奴隶’”的传单。丝厂女工们呼吁到：

日本工头无视我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的事实，仍对我们拳棍交加……日本人把我们当作牛马牲畜，我们住的地方比牛栏、马厩还差……我们问大家，中国的国家主权现在在哪里？³⁰

1919年中国人在面对殖民势力时的普遍软弱的反抗，如今已经演变成了对具象为日本工厂经理的殖民主义的确切仇恨了。人们扔下他们的工厂头戴设备，振臂高呼：“我们不要戴东洋人的帽子！”日货遭到抵制。

紧接着，内外棉工厂里的一个日本工头射杀了一名工会纠察员³¹。罢工行动就此蔓延开来；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这起杀人事件在上海报纸中被

29. 五卅运动（The May Thirtieth Movement）：发生在1925年5月30日英国巡捕开枪射击抗议学生事件之后，上海民众罢工、罢市、罢课的反帝爱国主义运动。——译者注

30. 引自 Rigby, R. W., *The May 30 Movement: Events and themes*, Canberra: 1980, p. 28.

31. 工会纠察员（union picket）：在罢工中防止劝阻工人到工厂上班的人。

禁止报道，促使了5月30日学生们在租界内聚集起来，派发传单及做公共演讲。就在学生拒绝离开之时，埃弗森和他的手下开枪了。

为回应5月30日的暴行，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在城市里发起了“三罢”行动。第二天，超过20万名工人参与罢工，罢工人数是1919年时的两倍。此次罢工主要针对外国工厂以及码头船坞，还受到了中产阶级甚至是中国工厂主的支持。“社会的劳动部门”终于不再是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后备队伍了，它正在领导着这场战役。

此时，一股新的力量出现了：五卅惨案后的第二天，共产党人成立了上海总工会。不到一个月，便有117个工会并入总工会，它满怀喜悦地宣布自己代表了其下精确统计的218,859名成员。

反对殖民势力的大罢工持续了超过两个月。21艘炮船，数千名外国军队士兵以及工贼都对大罢工束手无策；最终，唯有靠英国切断了电力供应才使得中国工厂主收回了自己对罢工的支持。9月30日，彩旗纷纷，管乐声不绝于耳，最后一批棉纱厂罢工者齐步行进返回纱厂复工。

尽管在罢工结束后一度被禁，总工会作为第一个常设性的独立工人组织在上海崭露头角。它的光芒盖过了国民党的工会，成为了上海工人的主要组织。4年间，共产党成员数由57名增长到980名，并在1925年末达到了1万名。它的反殖民主义议题为他们在工人阶级内部赢得了小范围的支持者；反殖民斗争使其迅速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

1926年6月，上海总工会做好了动员缫丝厂工人的准备，这里是国民党工会最后的堡垒。在大罢工期间，穆志英曾命令缫丝厂工人继续工作；现如今，2.5万名工人为了抗议她收取的昂贵会费而加入罢工。穆志英对工人们这般无礼的回应是十分迅速的，一位共产党主要的妇女组织者回忆道：

穆志英身穿白色丝绸连衣裙，手里拿着皮包，坐了汽车，带着女工头们往各女工区域“劝告”女工们无条件地上工。女工们见了她很惊奇，以为她是厂家太太。后来听到穆志英厉声要找罢工的领头人时，才知道她是工贼；女工齐口回答：“我们都是领头人，打倒工贼！”³²

当罢工触及丝厂女工的世界时，劳工行动就已经触及到了上海劳动力的最底层。事实上，它现在已经和第一代劳工所带来的传统村庄文化相抵触。

勇敢而热烈的青年女工因要努力维持罢工，固然能脱离家庭的束缚，勇往直前。但是她们始终是要回家的。听说工潮后她们回家去的时候，即被父母兄嫂打骂羞辱，甚至于饭都没有给她们吃……有一位女子的父亲给她一条绳、一把刀，要她自己去选择。可怜的女工们。她们在罢工中吃不好睡不好，然后还不得不走向悲惨的结局。³³

五卅运动本可以成为一场专注于经济问题且独立于国民党的强大劳工

32. 杨之华，《1926年上海丝厂女工罢工运动之感想》。引自 Perry, E. J.,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1993. 转引自 Perry, E. J. (美), 《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243页。

33. 杨之华，《1926年上海丝厂女工罢工运动之感想》，第3—7页。引自 Gilmartin. C. K., *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adical Women, Communist Politics and Mass Movements in the 1920s*, Bekerley: 1995, p. 144. 转引自 Perry, E. J. (美), 《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245页。

运动的开端。但对共产党而言，这不再主要是一场经济斗争了；这是一场民族解放斗争，而国民党应该成为盟友。事实上，莫斯科（Moscow）方面坚持主张共产党应该成为国民党的一员。

* * *

“苏联的方法不适应中国的国情……”：

当共产党正在指导中国工人不依靠国民党工头而自己独立组织起来的时候，在莫斯科方面与国民党之间，正进行着一个国际层面上的颇为独立开来的合作进程。苏联（Soviet Union）是第一个承认孙中山在中国南方的反叛政府的国家。1923年，参与过俄国革命的资深老兵阿道夫·越飞（Adolf Joffe）和这位民族主义领袖³⁴签署了一份联合宣言：

孙逸仙博士认为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均不适用于中国，因中国无使此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越飞先生完全同意这种分析。³⁵

这是兰开夏郡的棉花工人们从未处理过的复杂状况——由一个纪律严

34. 此处指孙中山。——译者注

35. <http://www.stetson.edu/departments/russian/sunjoffe.html>, 转引自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D%99%E6%96%87%E8%B6%8A%E9%A3%9E%E8%81%94%E5%90%88%E5%A%E%A3%E8%A8%80>

明的国际组织明确告诉他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即便是当时得到最多莫斯科指示的德国共产党人，也因其有足够深厚的传统和强大的领导人而能和莫斯科争辩。然而，中国工人却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眼看着自己的劳工运动被莫斯科的微观领导所形塑的群体。

作为与越飞签署的联合宣言的一部分，国民党被重整为一个模仿布尔什维克建设的政党，党内配有政委、制服以及严厉的纪律。苏联将国民党的军事将领带到莫斯科接受训练，并在中国南部设立了一座军事学院。其中一个受训的学生就是蒋介石，他是盐商之子，也是国名党内冉冉升起的新星。1924年，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做好了超越从前的同盟关系的准备；莫斯科方面指示共产党员集体加入国民党。中国已经决定要首先拥有属于自己的民族革命。工人应该专心强化自己的组织并全力配合国民党打击军阀和殖民势力。

要理解这一策略的合理性，必须把它放在上海之外的全国背景下看。中国400万的城市工人阶级只占了全国人口的1%。剩下的人全是农民。再进一步看，中国的城市地区以外并没有多少资产阶级；在农村地区，只有反军阀而非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才能发动穷人。

蔡树藩曾是一名在武汉的矿工。该地顺扬子江而上距离上海有400公里。他在一个名叫毛泽东的青年共产主义策动人所组织的工人俱乐部里学会了读书。到1922年，14岁的他已经成为了一名罢工活动分子。

只有年轻的男孩才会参加罢工，老人们会更保守一些。所有的年轻男子都很积极，还会作为纠察员阻止老工人下矿工作……我们幸运地说动了负责吹哨上工的人去罢工，因为没有哨声，

所以没有一个人去上班！³⁶

在武汉南面约 200 公里之外的长沙，一个叫做王城（音）的少年铁路工人见证了五卅运动对工人采取实际行动的启蒙：“五卅罢工的时候，我是工会的纠察员。运动成功后，我们都很惊喜。我们发现了有组织的工人力量之强大，每个人都很开心。”³⁷ 不过对蔡、王二人而言，世道将会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国民党即将准备向军阀发起进攻，他们正处在国民党的行进路线之上。

1926 年，蒋介石发动北伐，这是一场旨在剿灭军阀深入中原，力求统一全国后，再蓄力反击殖民主义的军事进攻。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看来，北伐将会是中国的革命，是一场由在莫斯科受训过的将领所发动的、由城市共产主义工人相助的谋略战。而对大部分的中国人而言，他们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中的身份现在可以相互转换了。“我 1925 年加入国民党，16 岁时便成为了总工会长沙分会的一员，”王城说。

北伐开始后……所有工人都殷切地想要支援部队。我们的经济条件已经得到了不错的改善，也有了自己的工会，我们觉得帮国民党干活就是在为我们自己干活。³⁸

36. Tsai Shu-fan, Interview, in Wales, N., *Red Dust: Autobiographies of Chinese Communists*, Stanford: 1952, p. 84.

37. 同上, p. 90.

38. 同上, p. 93.

预计到国民党军队的行进进程，全国上下，工会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在上海，工人们已经开始准备迎接他们的解放。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1925年孙中山的辞世造成了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的分裂。蒋介石是右派的领袖，他在他的本部广东省将共产党的工会代表扔进了大牢。

国民党的军事战略版图上有3个向北的箭头。最为内陆的一只推进部队由国民党的一名左翼将领率领。同时间，蒋介石率领中部以及沿海省份的行进部队。铁路工人王城和矿工蔡树藩都幸运地处在左翼部队按计划顺利推进的路线上。长沙解放后，王城回忆到：“我们自己控制了铁路和所有的通讯系统来支援部队。”在国民党左翼将领所控之处，共产党的工人们成行成列地挤在他们身后。王城开始负责在长沙开办一个“劳工领袖培训班”。

……尽管我小时候只上了三年小学，而且几乎不会读书写字。这个培训班以国民党的名义开办了四个月，但事实上是共产党在直接负责。³⁹

到1926年末，王城回忆到：“所有长沙的工人都支持共产党了”。国民党政府搬到了武汉，并在它控制的区域里宣布了几个新的公众假日，包括五一劳动节和3月18号的巴黎公社纪念日。

但对于蒋介石所控制的中部和沿海两条行军路线上的工会而言，它们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在其军队所到之处，工会都开始遭到了镇压。而且他的前进路线直指上海。正当此时，扬·瓦尔廷（Jan Valtin）重新进入到

39. 同上，p. 92。

了我们的故事里。在1923年逃离了发生在汉堡的灾难、以及度过了在美国的两年监狱生涯后，这位终生的冒险家被他的莫斯科上级派到了上海。其任务就是去扰乱外国海军并防止他们在国民党军队抵达时进行阻碍。

我们对自己身上大胆到诡异的莽撞浑然不觉。我们的队伍由鱼龙混杂的共产主义者组成，其中包括少数日本人和两个渴望历险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我们带着一个便携型打印机和能在上海维持一周开支的100块钱，出发去给在扬子江下游的英法美日联合海军“拔牙”。⁴⁰

瓦尔廷手下的中国籍策反人扮作黄包车夫，并“不断给每个到达这里的海军派发印有煽动违纪以及哗变内容的传单”。他们还请了一些中国妓女派传单，但这个计划被流亡的俄罗斯妓女破坏了，她们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皮条客，最后，瓦尔廷不得不再次入狱并请那些西方水手帮忙。“除非我们先请他们喝酒，否则他们就会厌恶我们的指示。然而，我们给不起酒钱。”这之后过了三周，瓦尔廷的共产党上级就让他坐船离开上海了。他们准备调动更加强大的武器……

凌晨四点，在长沙一个春日的早晨，共产党人召集他们的支持者到火车站去听一个外国工会领袖代表团的讲话。铁路工人王城没有在他短暂的生命史里提及这件事，但基于他在工运中的重要性，他一定也在那人群之中。其中一个发言人回忆到：

40. Valtin, J., *Out of the Night*, London: 1941, p. 138.

在黑夜里几百双农民的眼睛直直凝视着，在时而被风雨吹灭的昏暗的瓦斯灯光里，他们的目光紧紧追随着演讲者的一字一句、一举一动。有仍在耕作不属于自己的土地的古铜色脸庞的男人，有铁路工人，还有那些经历过、参加过许多反对像吴佩孚那样的屠夫的战役的人。当我离开临时演讲会场回到火车上时，遍地是嘶声裂肺的哭声。国际工人代表团（International Workers Delegation）万岁！西方工人联盟以及被压迫的东方人民万岁！中国革命万岁！⁴¹

这个演讲者是汤姆·曼恩（Tom Mann）。他的策动者生涯将他从英国的码头带到澳大利亚的内陆，作为一个71岁极富经验的工会主义者，他自愿作为共产国际工会三人代表团中的一员来到中国。曼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现如今，这个永不停步的旅行者来到了这里，亲眼见证此处发生的一切。然而，在赣州，他却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一个姓陈的当地工会代表被蒋介石的特工杀害了。曼写道：“好多工会工作人员都被发生在陈身上的事情吓坏了，在这以后他们都躲了起来。所有的房屋都被军队占领了，工会只能秘密举行会议。”⁴²但现在，曼要么就是被一个看不到国民党内部邪恶的政治机器所围困，要么就是与它串通一气了。代表团每日能给欧美的左翼报纸发报。1927年3月的一则官方简报中写道：

41. Mann, T., *What I Saw in China*, London: 1927, pp. 22–3.

42. 同上, p. 11。

我们现在正处在占领南京和上海的前夜，帝国主义者捏造所谓的国民党内部有分裂趋势的报道……与他们说的恰恰相反，相比分裂，国民党只会更加团结。⁴³

1927年4月：

1926年秋，上海这座城市再次深陷于罢工以及其他各种劳工行动之中。共产主义背景的上海总工会尽管仍然处于被禁状态，但仍有能力组织一场有关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有效抗争。工人们开始持续怠工——这是一种在帮会和工头组织的工运里不可能实现的策略。正是这股经济领域的强大力量开始打破中国民族主义内部的权力平衡。五卅运动期间为罢工付出了成千上万美金的中国雇主，现在害怕共产主义领导的工会会失去控制。英法殖民主义者已经厌倦了军阀，并对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妓女纠缠他们的士兵很不满意，他们现在觉得蒋是个值得合作的人物。而帮会也决定他们要与蒋合作。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倾向”是再真实不过了。

1926年10月，上海的共产党人瞄准当地军阀内斗的时机发动了一次起义，并想为蒋的军队开辟一条新阵线。然而，此举惨烈地失败了。1927年2月的第二次起义，他们准备得更专业，但却再次遭到了军阀部队的果断镇压。在市里最主要的十字路口，20个罢工者的头颅被插在棍上示众，300个工会组织者遭到逮捕。

43. *La Correspondence Internationale*, 23 March 1927. 引自 Isaacs, H.,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econd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1968, p. 160.

上海总工会不屈不挠地再次开始组织自身的力量。它印发了阐述其温和主张的传单——赶走军阀，建立拥有自治权的上海政府，解放民众以及控制进口。它招募纠察员并给他们颁发白色的小勋章，命令他们在工作时带着但不要给其他人看见。3月20日，随着蒋介石的部队向上海推进，上海总工会召开了一场秘密会议，邀请300名来自效忠于国民党的各类机构的代表出席，共同商讨筹建上海临时市政府。

第二天，当蒋介石的侦察部队到达了上海市边界，上海总工会随即宣布开始大罢工与第三次武装起义。截至当天下午，共有80万工人参与了罢工。下午1点35分，在浦东英美烟草厂：

……我们关了机器。不久，来自日华纺织厂、祥生铁厂和小南洋烟厂的工人冲到我们车间喊道：“同志们，有徽章的，就请亮出来！”……现在，我把徽章拿出来，别在身上，跟随大家冲了出去。在大门口与涌来的男工会合，我们来到第三警察署。警察们惊恐至极，乖乖地把枪交给我们……用武器把我们自己武装起来后，我们列队前进——就像士兵一样。我们轮流站岗，维持公共秩序。⁴⁴

5000名工人纠察队队员成功攻占了城里多个战略要地，只有在城北闸北工业区据点的军阀部队仍负隅顽抗，200名工人在战斗中牺牲。蒋介石的

44. “路大修访谈录”，1958年8月24日。引自Perry, E. J.,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1993, p. 152. 转引自Perry, E. J. (美), 《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209页。

策略和 1944 年在华沙的斯大林一样，便是束手旁观等待起义被镇压，以此确保其进城部队能坐享渔翁之利。然而，这个计谋失算了，国民党的领头部队违抗命令加入了在闸北的激战。至 3 月 22 日黄昏，上海已完全处在共产党工会的控制之下，蒋介石的先头部队也和工人们建立起了亲密友好的关系。

起义成功后，按照计划，一边是工会命令工人复工并向临时政府移交权力，另一边是临时政府同意实施工会拟定的有限经济计划。总工会自己则忙着收编在起义期间成立起来的数百个新的工人团体。到 3 月底，总工会正式对外宣布其下共有 821,282 名成员，几乎占上海总人口的一半。⁴⁵

一个工会建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处理两种人——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它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实现组织武装起义的功能。然而，引领民族主义革命波涌起伏的洪流并不是它设计的初衷，更何况在这场战火蔓延数千里乡土的革命中，所谓的“解放军”还将会改弦易辙。但共产党正是为了应对这个情况而生的。它自称工人阶级的领袖，并在 1927 年以前就掌握了巷战和地下特工网络的使用技术。革命战争理应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有关共产主义活动分子如何提出要警惕蒋介石，又如何被莫斯科驳回，历史学家已经有了详细的叙述；这一连串事件将成为全球共产主义政党内部除名与镇压的催化剂⁴⁶。在这场灾难的前夜，一份官方简报反映莫斯科方面仍试图否认：“现已完全杜绝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以及上海无产阶级与革

45. Chesnaux, J.,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Stanford: 1968, p. 359.

46. Isaacs, H. R.,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1938. Brandt, C., *Stalin's Failure in China*, New York: 1958.

命战士之间的战争。”⁴⁷

1927年4月12日凌晨两点，几帮穿着带有“工”字袖标服装的人袭击了总工会在全城的工人纠察队。这些人是青帮的成员，他们拿着法租界提供的5000支步枪，奉蒋介石之命行事。这群暴徒占领了总工会总部，并将该建筑移交到蒋介石所成立的新工会手里，后者的行事立场在其一个官方声明里有所概括：“当工人领袖成为了让人忧虑的元素，擅权做出有危害以及扰乱法律与社会秩序的行动时，工人必须受到惩罚。”⁴⁸当晚，在总工会总部里的所有人都被排成一排射杀了。

马上，共产党人就发起了反对蒋介石军事政变的大罢工，10万人停工，码头、电车系统以及差不多一半的棉纱厂都陷入了瘫痪状态。4月13日，队伍庞大的抗议示威人群从闸北工厂区列队而出。蒋介石的士兵们开火了，他们用刺刀追捕工人，直追至他们的公寓里。300人被杀，更多的人受伤。尽管面对如此残暴的镇压，大罢工还是持续到了5月13日，据《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报道，在这种情况下仍有11.1万人参与了罢工。然而，蒋介石要追捕的并不是这些普通职工，而是共产党人。据估计，在这之后的几周里，5000名共产党支持者遭到处决；到年末，死亡人数已高达3万人——被左轮手枪从嘴里开枪打死的人还算是幸运的，剩下的人都被仪式性地斩首了。这便是蒋介石所谓的“工人必须被惩罚”。

这些受害人里就有李启汉。4月15日，他在广东的一次围捕中被捕并

47. Isaacs, H. R.,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1938. Brandt, C., *Stalin's Failure in China*, New York: 1958, p. 160.

48. Isaacs, H.,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econd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1968, p. 177.

被处决。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汤姆·曼恩会给在英国的工会活动分子报告，“在某些情况下，就如我们所见，保守分子逐渐汇集了他们的力量，并再次尝试去削弱这股浪潮。在某些地方，他们成功了，至少暂时是这样的。我们务必不能期望中国的革命在几个月内就能获得胜利。”⁴⁹ 在这份被传播印刷数千份的演讲稿里，他完全没有提及发生在上海的屠杀事件。而能够看到相关情报的扬·瓦尔廷则更为坦诚：“1927年，蒋介石与莫斯科决裂后对共产党人进行杀戮，和我一起在上海工作过的中国同志几乎都丧生了。”⁵⁰

从旁观到革命：

蒋介石的军事叛变并不是上海工人运动的终结；国民党所领导的工会还处在帮会成员的有效控制下，它在20世纪30年代也组织了多次有关工人生计问题的罢工行动。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也不是共产主义的终结——尽管差点就是了。在其他地方的一系列无畏牺牲的反国民党起义中，共产党人成功地隐匿了自己在城市中的存在感。在混乱中，铁路工人王城逃出了长沙并最终流落到了一个国民党将领的部队里，这里号称“每日都有共产党人遭到处决”。最终他的小分队逃脱了。

我们看到秘密的党组织的传单与标语，因此知道这附近有一个（据点）。我的手下藏在河岸的长苇丛里，我出去找到一个农民

49. Mann, T., *What I Saw in China*, London: 1927, p. 15.

50. Valtin, J., *Out of the Night*, London: 1941, p. 139.

搭话。他帮我找到了红军先锋队……⁵¹

偶然间，王城撞见了毛泽东带领的共产党游击队。20世纪30年代早期，在毛的领导下，共产党开辟了一条夺权的新路径。这条路径能够越过不仅是上海，甚至是全国的工人阶级本身。在极富传奇性的长征中，他们用农民战争对抗军阀、对抗日本人，以及在最后的决战中对抗国民党。王城和矿工蔡树藩都参与了长征；被解雇的矿工在早年便组成了毛的核心部队。到了1949年毛执政之时，他们二人都已成为了高级将领。蔡回忆道：“你问是谁破坏了中国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们）不相信工会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害怕打破和国民党的同盟关系。”⁵²

在这场使毛于1949年掌权的革命中，上海工人只扮演了一个辅助性的角色。兰开夏郡的棉纺织工人在彼得卢事件后的2个世纪里还保持着自己的角色，但上海工人已经丧失了他们在1919—1927年间享有的自由。

51. Wang Cheng, Interview, in Wales, N., *Red Dust: Autobiographies of Chinese Communists*, Stanford: 1952, p. 95.

52. Tsai Shu-fan, Interview, in Wales, N., *Red Dust: Autobiographies of Chinese Communists*, Stanford: 1952, p. 87.

苍天与大地共鉴

犹太工人争取文化自由

译=邓一鸣

苍天与大地共鉴，
星辰亦留作见证。
血之誓，泪之誓，
我们宣誓，宣誓！

——警谢苗·安斯基（Semyon An-sky）¹，
《誓言》，1902 年

1. 谢苗·安斯基（Semyon An-sky, 1863—1920）：白俄罗斯犹太裔作家、剧作家、犹太民俗文化研究者、辩论家、文化与政治活动家。其代表作为戏剧《恶灵》《两个世界之间》。——译者注

2006 年，玻利维亚埃尔阿尔托

人群静默，女人们在明亮的天空下眯紧了眼睛。下方是首都拉巴斯（La Paz）²，看起来小得不真实，也远得不真实，好像站在跳水板的边缘看一个游泳池那样。工人阶级街头商贩联合会（The Federation of Working Class Street Sellers）横跨着街道拉开横幅，上面是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肖像和“科学，统一，政治，经济”的标语。女人们在后面排成队，她们身着艾马拉人（Aymara）的传统服饰——斜戴的圆顶硬礼帽、金质耳环、鲜亮的格子披肩。一位年长者朝空中点燃两响烟花，一支由三列人组成的游行队伍出发了。一场运动正在埃尔阿尔托（El Alto）上演。

埃尔阿尔托是一座人口近百万的城市，其中八成是艾马拉人。在拉巴斯上方的平地上，埃尔阿尔托低矮的砖石房屋及其锡制屋顶一直延伸到天际。这是一座崇尚自力更生的城市，在过去 20 年间由最初迁离大陆的农民开荒拓土建造而成。在锡价暴跌之时，数万名矿工放弃了老本行，加入到他们中间。尽管艾马拉人、盖丘亚人（Quechua）和瓜拉尼人（Guarani）等当地原住民占玻利维亚人口的大多数，他们却遭受着不同程度的贫困和排挤，与生活在种族隔离制度之下的人们境遇颇为相似。政府无法为埃尔阿尔托提供水、医疗和教育，所以这些事埃尔阿尔托人也要自己来做。在埃尔阿尔托，常见的商店都会售卖砖石、管子、电线、钢铁棒、油漆还有灰泥；常听到的声响就是什么人在凉下来的夕阳里敲钉窗框的声音。

2. 拉巴斯（La Paz）：南美洲国家玻利维亚的行政首都，议会和政府机构所在地。玻利维亚的法定首都和最高法院所在地是苏克雷。——译者注

埃尔阿尔托因为推翻两届玻利维亚政府而名声大振。在地理位置上,它环绕着机场,扼守着连接拉巴斯和这个国家其他地区的两条要道,所以只要埃尔阿尔托一掐断交通,拉巴斯就会陷入瘫痪。2003年10月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在一个艾马拉村庄设置了路障的路段内,警方开枪射击,导致八人死亡,为此,工会发起了一场大罢工。而在埃尔阿尔托宣布实施的戒严令,则将深处暗涌的愤懑推向了潮头。埃利奥多罗·伊奎帕萨(Eliodoro Iquiapaza)说:

起初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私有化了,说这样会吸引更多的资金,创造更多的工作。可事实上更多的人陷入到失业之中。他们承诺玻利维亚将迎来强劲的经济增长,可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更为严重的危机,比当初企业还掌握在国家手中的时候更为严重。

伊奎帕萨是埃尔阿尔托的社区居委会联盟的代理主席。由于当地公共服务机制缺位且混乱,这些社区居委会应运而生;即使是现在,伊奎帕萨告诉我,这里的九个社区中还有两个没有自来水设施。社区居委会联盟在这座城市充当着另类地方政府的角色,它本身也是一个高效运转的运动网络;它可以授权为你建造下水道,也可以号召你参加一场起义。埃尔阿尔托社会具有百折不挠的生命力,这是因为艾马拉人把他们的社会网络和传统习俗带到这里,并秉持至今。他们做决定的传统做法是获得全体一致同意,而决定一旦做出,所有人必须服从。

伊奎帕萨说,在2003年10月,他们决定让玻利维亚陷入瘫痪。

如果你对人们隐瞒消息,他们会保持沉默。可是一旦将实情公

之于众，他们会揭竿而起。2003年，他们所做的不过是在保卫自己的生命。超过60人被杀害，还有400多人受伤、残疾而无法工作——其中有青少年，也有老年人；有男人、女人，还有幼童。

正是这次枪击事件使得这场反叛转变为一场革命。在追击战、挨家挨户的搜查、能源短缺和爆炸持续了六天之后，总统桑切斯·德洛萨达（Sanchez de Lozada）乘坐直升机逃去了美国。技术官僚政府维持了18个月之后又爆发了另一场起义，终于在2006年1月，埃尔阿尔托的人当权。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在2006年五一劳动节这天将玻利维亚的燃气工业收归国有，然而许多埃尔阿尔托人认为这仅仅是个开始。

亚伯兰·德尔加多（Abram Delgado）是十月青年运动的领导者——该运动因发生在2003年10月的叛乱之中而得名。我和他是在埃尔阿尔托公立大学见的面，他指给我看他们在起义中堆放砖石、存储汽油弹的地方。“我们在第二次起义中的行动更为协调有序，因为我们用上了手机。”他说。他们必须通过斗争才能拥有自己的高等学府，才能让自己的学位获得承认。还未完工的道路和未上漆的焦渣石教室使得整个大学看起来好像经历了一场战火。

晚上，我们去了城南的油气冶炼厂。我们组织了一场封锁交通的行动，使得任何人或物都不能进出拉巴斯。我们与警察对峙，差点被捕，不过最终逃脱了。之后，我们同农民运动、原住民和社会运动联合起来。我们和民众相互配合使用炸药……

几乎是史无前例地，埃尔阿尔托人向世界引进了工人阶级共和主义的一种新形式，即对“社会正义”的诉求和玻利维亚原住民对平等的强烈愿望相结合。随处可见的切·格瓦拉横幅就是其象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主义和原住民主义的结合是切·格瓦拉最初想要实现的目标，但他期待的是在乡村实现，而不是在充斥着衣着夸张的艾马拉青年³的双行公路上实现。亚伯兰·德尔加多想要一个更为深刻的改变——氏族公社（ayllu）⁴经济。

氏族公社是玻利维亚原住民乡村的一种传统社会网络形式，是一种基于血缘关系、共同财产和劳动交换的水平经济结构。这种社会网络在印加人（Incas）以前就形成了，德尔加多坚定而严肃地告诉我，他想要的是“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的生活方式的回归”：

我们这么说并不是要原原本本地回到那个时候的生活状态，我们倡导的是回归和重建那时的社会机制。氏族公社是一种社会共同体体系，以轮流和循环的方式进行运作。它不同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体系的线型的、分等级的结构，在这两种体系中，不管你愿不愿意，总有一个发号施令的头头。

在德尔加多和他的战友发动起义以前，对氏族公社感兴趣的就只有人

3. 原文为“ghetto-fabulous Aymara youth”，“ghetto-fabulous”是一种关于生活方式的表达，形容生活方式上追求富足的物质条件却不总是拥有奢侈品或财富的人。——译者注

4. 氏族公社（ayllu）：印加人的基层社会组织。耕地归公社所有，分三部分，分别属太阳神、国王和公社成员，产品用于供应祭祀和祭司生活需要、政府和军队开支以及维持公社成员生活。所有土地均由公社成员耕种，但耕作时需先种太阳神和国王的土地，然后耕种村社成员的份地和归村社所有之田。——译者注

类学家；可是现在，凡是对拉丁美洲中形势最为动荡的城市的政治局势感兴趣的人，都必须对氏族公社了解一二。这里的人完全有可能比莫拉莱斯政府的传统左派走得更远，力图打造出“城镇氏族公社”。

第一代抛弃圆顶硬礼帽和披肩的艾马拉妇女在公立大学（Public University）接受了教育，可同样是在这里，艾马拉语走向了复兴。“自从埃沃当权，更多的人开始说艾马拉语。”德尔加多告诉我。在埃尔阿尔托的大街上，没有人认为这场革命将仅仅以油气国有化告终。一些人像德尔加多一样，谈论起帕查库提（Pachakuti）⁵，印加神话里一场吞没乾坤的大洪水：

一切还没有结束，还有伟大的帕查库提将要到来。这场革命从2000年的社会运动、道路封锁、游行示威、绝食抗议和社会骚乱开始。对我而言，埃沃·莫拉莱斯是即将打开新世界大门的人，可是他也会说：“如果我做不了，需要其他人来完成这场转变。”印第安革命已经临近，但还没有到来。

玻利维亚的精英们——大部分是西班牙殖民者的后代——最为恐惧的就是这种族群民族主义和激进社会主义的结合。然而，尽管埃尔阿尔托的抵抗运动被奉为反全球化运动的一部分，但它的运作是孤立的，它主张地方主义和简政主义。社区居委会联盟的总部是一个依靠移动电话和人工打字机运作的地方；这里的活动分子可以与邻国人进行即时语音通话，不过在政治上，联盟总部与外部世界还是相当疏离的。

5. 帕查库提（Pachakuti）：是印加传说中一切之神维拉科查（Wiraqucha）用来摧毁巨人所建造的蒂亚瓦纳科（Tiwanaku）的大洪水。——译者注

族群压迫连同贫困、抵制为埃尔阿尔托人民创造了一个新的身份。他们也有了新的梦想，那是扫尽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痕迹、打造一个全新世界的宏伟计划。抛开这座城市的贫穷和肮脏，它似乎是地球上最接近那片“世外桃源”——20世纪早期的工人运动曾为之奋力抗争——的地方了。以前也出现过这样的地方，也出现过怀揣着大同小异的文化自由之梦的理想主义青年，不过他们没有幸存下来。

波兰布热济内

这是一个欧洲小镇，此时正值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里有几个货栈、一系列工场和杂货商店；从火车站会时常走出一些报社的人或者社会主义演讲者。这里闹过罢工，但也不至于震惊世界。鹅卵石街道上总回响着马车的哒哒声和孩童的蹦跳声。小镇曾经因为其服装业在当地小有名气，可是现在从表面上看来，没有什么特色——在工人运动蓬勃鼎盛的年代，这也是很多城镇的真实写照。

不过对于布热济内（Brzeziny）这个小镇，其大概情况我们几乎了如指掌。我们不仅知道这里曾有多少家裁缝店，还知道这些裁缝一个个姓甚名谁。我们知道为保证工会运动能顺利进行而不得不拘禁的那几个小混混叫什么名字。我们知道人们工作的时候相互争论些什么，平时唱些什么歌，哪些雇主比较大方，而哪些又比较吝啬。我们知道1928年5月1日，第一场五一劳动节大游行是沿着哪条街道进行的，扛着旗帜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我们还知道那人至今都记得：“旗帜很重——起风的时候感觉更重——

以至于到今天，我还能感受到它沉甸甸的分量。”

我们之所以对这个平凡的小镇了解得如此细致，有一个非凡的原因：它曾被纳粹摧毁。起初纳粹政权的盖世太保（Gestapo）⁶指使犹太（Jewish）社区领袖挑选出 10 个人质，接着他们就把人质绞死了。他们把所有的犹太儿童抓捕起来，然后送进了毒气室。

哭喊、乞求、恳求怜悯，这些全都没有用……当这些孩子被从他们不幸的父母身边夺走，塞进开往死亡营的卡车时，这些可怜父母的悲痛和哭号使任何文字描述都显得苍白无力。⁷

那天是 1942 年 5 月 15 日。就在第二天，所有的老年人都被抓捕起来了。在把他们送进毒气室之前，纳粹（Nazis）命令他们脱光衣服接受体检。

纳粹把他们所有人塞进一个小房间。然后那些德国医生拿我们的长者开玩笑。他们戳弄、拉扯女人的乳房和男人的性器官。这些医生的行为是龌龊而令人作呕的性变态才能做出的举动。⁸

6. 盖世太保（Gestapo）：德语“国家秘密警察”的缩写，由党卫队控制。随着纳粹政权的需要而发展为无所不在、无所不为的恐怖统治机构，纳粹借此来实现对德国及被占领国家的控制。——译者注

7. Blanket-Sulkowicz, A., “Destruction of Brzezín,” *Brzezín memorial book* (ed. Alperin, A., & Summer, N.), New York: Brzeziner Book Committee, 1961, p. 140. Excerpts used with kind permission of the YIVO Institute, New York.

8. 同上。

三天后，余下的人被运送到罗兹（Lodz）的犹太人限制区，这座城市在布热济内的西边，与它相距 13 英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是死在那里，就是在奥斯维辛（Auschwitz）被杀害。

德国人在布热济内亵渎公墓。他们把公墓里的颅骨堆放在一起——这些颅骨的主人曾聚在一起组织戏剧团，曾为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运动激辩，曾在周六的早上踢足球。然而，正是因为纳粹把布热济内摧毁得干干净净，幸存者们才决定它的历史记录得彻彻底底。多亏了 1961 年汇编成集的一本纪念册，我们才得以找到一个不多见的有利视角来研究工人阶级的历史——底层人物的视角从来都不是这个事件的中心，但它却可以全面地呈现该事件的面貌。

同盟来到布热济内：

1904 年秋，学徒伙计们有些不对劲起来。他们开始聚到树林里召开秘密会议。当他们一行人簇拥着回来时，货栈老板——人们常称呼他们为“栈主”（magaziners）——会一本正经地跟他们打趣：“你们今天的公务处理得如何呀？”有流言称有人在策划推翻沙皇俄国的统治。“我们的货栈老板们没有想到的是，”裁缝学徒艾伦·福格尔（Aaron Fogel）回忆到，“他们在树林的会议上谈论得更多的正是货栈老板本身，比谈论沙皇尼古拉斯（Nicholas）还要多。”⁹

布热济内的服装产业兴起于 1886 年，当时由几个犹太技工发展出一

9. Fogel, A., “Past Generations,” 同上。

种基于专业分工的生产体系：第一个人缝制西服袖子，第二个人缝制领口，第三个人专门处理纽扣眼，这样依次进行下去——他们全都在家工作。19世纪90年代，一批俄国犹太人涌入，使得小镇的人口翻了一倍，达到16000人。这些俄国人给服装业带来一套三级模式：栈主把一批批未裁剪的布料送到各裁缝师傅那里，再由他们雇用学徒、熟练工人和做针线活的妇女。按惯例他们一天工作18个小时——他们称这个为“108小时工作周”——每周的工作从周日早上6点开始，而那些实在缺钱用的工人从每周六日落时分就开始工作。戴维·伦斯基（David Lencicki）这样回忆一个典型的裁缝店的日常：

一套寓所……包含两个房间，都差不多是四米长四米宽的大小。其中一个房间一般安装了壁炉，是一个带厨具的工作间。工作间里摆着两到三个大机器——用来减轻工作负担，也可以熨烫衣物——还有一个用来做手工针线活的小桌子和六把椅子……另一个房间则摆着两张床、一两个衣柜，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一个沙发，还有一包包剪裁过的布样。¹⁰

这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犹太社区；回忆录里还描述了裁缝们一边工作一边互相应和、哼唱曲子的场景。可是一进入20世纪，艾伦·福格尔回忆到，“一阵新风开始吹拂起来”。一些小册子出现在工作间里，它们“催促人们追求更加人道的生活”。“这些小册子里写着：受雇的工人跟雇主是完全

10. Lencicki, D., “Brzeziner Tailors,” 同上, pp. 40–3.

平等的。”¹¹ 另一个学徒莫伊泽·弗兰克（Mojrze Frank）回忆说，“一束星光开始一点点闪亮起来”：

有一个叫作巴鲁克·霍伊克（Baruch Hoyker）[字面意思是“驼背”] 的人从罗兹来到这里。他本人也确实是一个驼背。他很有能力和学识，是被罗兹工人运动派过来的。他在布热济内待了很久，足以把所有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一个罢工委员会在这里委任成立，由一个干事管理。所有人每周须上交 25 戈比。¹²

一个周日的上午，大家终于知道学徒们的秘密会议讨论的究竟是什么了。

工作间里一切准备就绪。木炭摆在熨斗旁边，只等学徒们开工把它们点燃。机器被清理干净，并加满了油；裁缝师傅们已经平均分配好每个学徒的工作，并把机器缝纫工要用的针线包摆出来。时钟显示为早上 6 点，工人们却没有出现。¹³

裁缝师傅们赶到市镇广场，在那里他们才明白没有一个学徒按时去了工作间。裁缝师傅们发了些难以抑制的怒火就回家了，心里盘算着要如何处罚这些没来工作的学徒工。回到工作间后，他们迎来第二次震惊。

11. Fogel, A., “Past Generations,” 同上, pp. 21–30.

12. Frank, M., “A Bundle of Memories,” 同上, pp. 69–71.

13. 同上。

时钟指向8点,所有的学徒和熟练工人来工作了。进来的时候他们有一点尴尬,但仍然显示出他们只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8点的决心。我们的裁缝师傅们倒没有预料到这么一场“革命”。¹⁴

犹太工人总工会（General Union of Jewish Workers）就是这么来到布热济内的。总工会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同盟（Bund），由西方化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建立于1897年，目的是组织说意第绪语（Yiddish）¹⁵的犹太人参加劳工运动。到1905年，事情的进展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群知识分子接纳了意第绪文化，同盟成为一个旨在争取犹太“文化民族自治”的运动组织。其理论基础是，犹太人是一个500万人之众而受到沙皇俄国独裁政治压迫的民族，而布热济内的犹太学徒工则是这个民族的一部分，因此只有一场社会革命才能将他们解放。约瑟夫·沙伊博维茨（Joseph Shaibowicz）见证了同盟对小镇传统生活的冲击。

20世纪初，在同盟的施压之下，犹太工人与以前的工人领袖、陈旧的传统模式相决裂，在犹太人的生活中进行了一场政变。1905年，同盟在布热济内组织了罢工和街头斗争。¹⁶

14. 同上。

15. 意第绪语（Yiddish）：属于日耳曼语系，大部分使用者是犹太人。意第绪这个称呼本身可以用来代表“犹太人”，有时也特指“德国犹太人”。——译者注

16. Shaibowicz, J., “Brzeziny in History,” *Brzeziny memorial book* (ed. Alperin, A., & Summer, N.), New York: Brzeziner Book Committee, 1961, pp. 3–20. Excerpts used with kind permission of the YIVO Institute, New York.

为了应对眼前的危机，裁缝师傅们形成了自己的工会，这虽然违反了沙皇俄国的法律，但是由于他们贿赂地方官员，还在自己的会议室里悬挂了沙皇的肖像，他们的工会得到了容忍。学徒工人的运动又被称作青年联盟（United Youth），也是一个完全的非法组织。但是它的势头无法阻挡：

一波罢工的潮流在我们的小镇爆发。我们的无产阶级工人又提出了新的诉求。现在他们要求得到更高的工资和对熟练工人乃至学徒工人的人道待遇。如果裁缝师傅们仍然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工人们就会罢工。于是，机器停止了运转，工作间里相互唱合的曲子也停下来了。而门外倒是生气勃勃。¹⁷

这片生机遍布了整个沙俄帝国。1905年1月，当数千工人在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街头游行，向沙皇请求缩短工作时间时，几百人遭到了射杀。这场“血色星期天”大屠杀引发了一波罢工和政治抗议，并在年底的一场大罢工和革命中达到顶点。

“生死誓言”：

事实上，布热济内的犹太青年奋起反抗的不只是他们在当地的雇主。他们生活中一个最主要的麻烦就是一套以莫斯科（Moscow）为中心的粗糙的反犹主义体系。一百多年来，犹太人被强迫在所谓的“定居界”以内居住，

17. 同上。

这是一个从克里米亚（Crimea）到波罗的海（Baltic）的带状区域。他们被迫居住在被称为施泰克（shtetls）的犹太小镇或者城市的贫民窟里，他们不能拥有土地，也不能从事专门的职业。他们使用的主要语言是意第绪语，在小作坊里工作，并发展出一种以自助精神和柯希拉（kehilla）为基础的城市文化——柯希拉是运作于所有犹太社区的一种经选举产生的宗教政务会。

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以为，随着俄国经济的现代化，反犹主义——连同定居界、柯希拉和意第绪本身——将会消失殆尽。可是当工业化在 19 世纪 80 年代起步时，反犹主义思潮愈发强烈起来。沙俄警察组织了一群群种族主义者在犹太居民区横冲直撞，随意杀伤当地居民。居住法也变得更加严苛，1891 年，沙皇把犹太人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驱逐出去。正是这种超过 100 万人的强制迁移，使得布热济内这样的小镇人口翻倍。一系列工厂在城市里迅速兴起，而犹太工人却普遍被拒之门外。就算他们中有人能进入工厂工作，那也是一些小厂，而不是后来在俄国革命中名声显赫的有品牌的机械化工厂。

同盟成立的那一年，在今天的波兰、拉脱维亚（Latvia）、立陶宛（Lithuania）和白俄罗斯（Belarus）等地，城市人口中有 58% 是犹太人。“所有的犹太人中有九成几近于无产者。”沙俄的官方社会学家这样写到。¹⁸

正是这种越来越严酷的压迫加上扩大的城市化发展催生出新的一种民族意识。就在同盟成立的同一年，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World Zionist Organisation）成立。其领导人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e Herzl）主张，鉴

18. Quoted in Tobias, H. J., *The Jewish Bund in Russia: From its origins to 1905*, Stanford: 1972, p. 9.

于这种高涨的种族主义暴力，犹太人在非犹社会中无法生存，而向巴勒斯坦（Palestine）迁移并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新国度是未来的唯一出路。赫茨尔向欧洲领导人鼓吹道，犹太复国主义可以“使犹太人脱离革命性政党”¹⁹，此外，他完全否决社会主义道路。不过在布热济内这样的犹太人小镇，犹太复国主义的传播——自然是暗中进行——进一步营造了颠覆破坏和文化复兴的氛围，继而为激进运动提供了得以滋生的土壤。

而同盟的立场是拒绝犹太复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移民的策略，其口号是“我们的家园就在这里”。他们呼吁法律平等，确认意第绪语为学校和法律体系的官方语言，倡导文化民族自治——即有权组成独立的犹太人议会，向犹太民众征税，并用意第绪语提供教育、文化和社区服务。面对犹太年轻人中间流行的世俗主义生活方式，犹太复国主义者深感不安，而同盟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欣喜万分。

1902年，作家谢苗·安斯基用意第绪语写下一首名为“誓言”的诗篇。谱上曲后，它成了同盟的盟歌，一度在工人游行示威中和“红旗”“国际歌”一样广为流传。从音律上来看，它在各个方面都无可指摘，堪称杰作：诗文与俄罗斯经典的劳动者之歌的节拍、旋律相契合，雄浑的进行曲由低沉的小调演绎，合唱部分以“苍天与大地共鉴”开头，却仿佛把演唱者带入另一个世界——那是意第绪民谣，其和声只有与手风琴配合才能相得益彰——进而使人沉浸在犹太教堂合唱班的男高音里。在直到1905年的一段时间里，青年男女们秘密聚集在小型聚会上演唱这首歌曲，他们身上仍彰显着象征意义。《誓言》如同同盟本身，是一个包含着社会主义、国际主义

19. Patai, J., *Complete Diaries of Theodor Herzl*, Vol. III, p. 729.

和犹太文化的混合物；这首诗缓解了工人们对于狂热的渴求，其最后一段诗文表达了殉道的许诺，而这一许诺后来得到了应验。

对同盟无尽的忠诚是我们的誓言。
枷锁下的人们此刻非它不能得救。
红色的旗帜高高在上，迎风伸展。
怒火使它飘扬如波浪，血液将它浸染成鲜红！
我们起誓，生死不悔。²⁰

“同盟的话等同于律法……”：

圣彼得堡的“血色星期天”大屠杀发生后，沙俄帝国西部城市里的上万名工人在紧接着的五天里开展了罢工运动。罗兹附近的区域，包括布热济内，成为这场运动的中心：650个工作车间被关闭，估计有10万人参加了罢工。但是，随着沙皇公布了一些微小的让步，最初的这场动乱一结束，反犹运动马上展开了反击。同盟命令其成员从警察署强占武器装备，建立起武装自卫队。华沙（Warsaw）和罗兹的街头爆发了武装斗争。就连在小小的布热济内，“我们当中的社会主义者……开始组建起战斗团体，它们必

20. An-sky, S., “Di Shvue,” 1902. Translation courtesy Taube Center for Jewish Studies, Stanford University.

须担当犹太人的护卫队，在需要抵御无赖之徒的袭击时提供帮助”。²¹

布热济内的同盟民兵身着黑衣，腰系一条皮带，其名义上的首领是一个被称为盲眼乔内（Blind Chone）的裁缝师傅，但是它真正的首领是驼背巴鲁克·霍伊克，他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四处躲藏。很快，同盟接手了小镇的公共权力，据一位同盟的领导人称，这种现象在整个波兰不断上演。

同盟被视为某种神秘的存在，人们对它既惧怕又心怀希望。没有事情不在其能力范围之内，没有人不在其控制范围之内……同盟的话等同于律法；它的印记仿佛有催眠的效力。无论哪里有冤屈，哪里有欺侮，即使与工人运动没有丝毫关系……人们都会来找同盟作为他们的最高裁判官。²²

对于布热济内的学徒工人而言，这种短暂的掌控感不仅是一个改变他们工作方式的机会，也是一个改变其生活方式的机会。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小镇的权力完全掌握在青年联盟的手里。人们私下里互相谈论，他们不仅不在乎当权者制定的规矩，而且还开始违反犹太人的传统惯例。他们不再祷告……开始抽

21. Fogel, A., "Past Generations," *Brzeziny memorial book* (ed. Alperin, A., & Summer, N.), New York: Brzeziner Book Committee, 1961, pp. 21–30. Excerpts used with kind permission of the YIVO Institute, New York.

22. Litvak, A., *Geklibene shriften*, New York: 1945, p.180. Quoted in Tobias, H. J., *The Jewish Bund in Russia from its Origins to 1905*, Stanford: 1972, p. 309 (Khaim Helfand).

烟，甚至在安息日也抽。没有人亲眼看到过有谁在安息日抽烟，不过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隔墙有耳”。²³

1905年夏天，全国革命形势一触即发，艾伦·福格尔还记得当时的自己正站在一群虔诚的犹太教徒中间，一起在布热济内公墓祷告。这时，身着黑色衬衫的青年联盟在巴鲁克·霍伊克的带领之下来到公墓。这群信徒被迫听了一场严肃的革命性演讲。

“同志们，你们看看这里遍地的墓碑；墓碑下面逝去的人们曾经是和我们一样鲜活的生命。现在他们除了这些冰冷的石头，什么也没有留下。请你们相信，在我们的时代，俄国当局会落得一样的下场——唯一的区别是，他们连块石头都不会留下。”²⁴

民兵组织在街道上一边游行一边高唱“誓言”，高举的红色旗帜在空中飞扬。游行队伍经过的时候，就连当地的警官也会在路边立正注视。然而，就在罗兹被工厂工人和老板之间的尖锐斗争所撕裂之时，布热济内的裁缝师傅们却纷纷投向同盟，从而产生了生产关系中的一次重新结盟。

工人和师傅之间的联系发展得越来越紧密。师傅们学到很多经

23. Fogel, A., “Past Generations,” *Brzeziny memorial book* (ed. Alperin, A., & Summer, N.), New York: Brzeziner Book Committee, 1961, pp. 21–30. Excerpts used with kind permission of the YIVO Institute, New York.

24. 同上。

验，他们自己的组织也越来越完善。师傅们在他们狭小的祷告室里仔细考虑工人提出的每一条要求，如果有可以接受的，他们转而向货栈老板提出新的要求。²⁵

1905年10月，在一场大罢工面前，沙俄的帝国大厦在某一瞬间似乎真的呈现出倾颓之势。沙皇承诺成为宪政君主，主持选举，甚至承认温和政党的合法性。可是另一方面，他转而粉碎主要城市里已经形成的工人政务会，大屠杀团体也活跃起来，开始加紧迫害犹太人。布热济内没有幸免。

第二天，大约有40个裁缝遭到逮捕。有传闻说某些栈主有意向警察当局透露了革命分子的身份，因此那些被逮捕的人会被流放到彼得库夫（Piotrków）——事实上他们在那里被驱逐出境了。这件事使得工人们群情激愤——被逮捕者的妻子们把几乎所有货栈的窗户都砸破了，以此来报复栈主。²⁶

巴鲁克·霍伊克被搜捕出来，并被“残忍折磨”。学徒工人莫伊泽·弗兰克的师傅告诫他罢工一旦结束，要迅速隐藏行踪。

我回家待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一封信寄到了我父母的手中，信中说我应该没有胆量回到布热济内了，因为所有的工人都已

25. 同上。

26. Abramowicz, A., “The Workers’ Movement in Brzezín,” 同上, pp. 104–7.

经被逮捕起来。所有仅仅被认为协助实施了罢工行动的人，他们的住所都被哥萨克骑兵（Cossack）²⁷一一光顾。当然再也没人敢商量返回布热济内的事了。²⁸

学徒工们躲藏在一所正统犹太学校里，一个给他们传递消息的人目击了发生在布热济内的事情，他告诉他们：“我九死一生才从镇上逃出来。那里一片黑暗。犹太人自相残杀。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看到那样的景象，还有他们对青年联盟所做的事情。”²⁹

整个俄罗斯帝国都发生着同样的事情，同盟和其他劳工运动面临的是同样的遭遇。这个时候的同盟拥有超过 25,000 名成员，影响力波及上百万人。当你翻看同盟的老成员于 20 世纪 50 年代在纽约出版的影像历史时，你会看到事情如何发生着显著的变化。书里 1905 年以前的部分主要是身穿衬衣的中产阶级者的集体照，硬草帽和宽大的裙摆是照片人物的标配，里面甚至还有爱德华七世时代（Edwardian）的一种经典造型——最前面的两个人并排站在一起，各自撑起自己的手肘；翻看到 1905 年，仍然有集体照，只是照片里面的人更多了，每个人脸上的表情看起来更加冷漠。他们通常

27. 哥萨克骑兵（Cossack）：哥萨克人是一群生活在东欧大草原（乌克兰、俄罗斯南部）的游牧社群，在历史上以骁勇善战著称。18 世纪时开始被俄国沙皇用于征战，充当沙皇巩固统治、侵略扩张的马前卒。19-20 世纪，俄国当局经常利用哥萨克人镇压人民革命，因此哥萨克骑兵在革命期间丑名远播。——译者注

28. Frank, M., "A Bundle of Memories," *Brzeziny memorial book* (ed. Alperin, A., & Summer, N.), New York: Brzeziner Book Committee, 1961, p. 140. Excerpts used with kind permission of the YIVO Institute, New York.

29. Fogel, A., "Past Generations," 同上, pp. 21-30.

站在雪地里，手握左轮手枪举至胸口，有时还身穿制服——最前面不再是摆着梦幻般造型的青年，而常常是那一天在大屠杀中被杀害的人，身上盖着旗帜。

1905年，同盟在波兰和俄罗斯帝国的其他地区，已经成为犹太工人阶级的一个群众性政党。1910年，在严厉的镇压之下，同盟的成员数量急剧减至609名。同盟的很多活动分子，包括本章所引述的一些布热济内作者，都移民去了美国。但是同盟已然成为一个传奇，在东欧的犹太小镇和犹太人贫民窟中口耳相传。

1918年至1939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欧洲的地缘政治版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随之缩小，而同盟仍运作其间，并改变着世界的政治局势：俄罗斯变成了一个工人的共和国，波兰获得了国家独立，撤退的德国军队也即将发动一场自己的革命。此外，英国已向犹太人承诺，允许他们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家园。同盟在沙俄帝国取得文化自治的策略现在变为一纸空谈，而在新成立的波兰争取任何文化自由都将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任务，在波兰建立的过程中持续了三天的屠杀即证明了这一点。同时，通往巴勒斯坦的大门正在敞开，这增强了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信服力，也为“犹太复国主义工人”的运动提供了新的助推力，使其逐渐增强实力，与同盟分庭抗礼。另外，同盟本身的势力也有所衰退，其东部地区的成员消失在了苏维埃俄国的政治乱局里。曾经标榜为国际运动的同盟实际上已沦为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一个党派。

在1918年11月战争结束的这一天，一个左翼临时政府在华沙成立，相

应的工人政务会也在罗兹、华沙和卢布林（Lublin）形成，为临时政府提供支持。亚伯拉罕·阿布拉莫维奇（Abraham Abramowicz），布热济内的一个工会活动分子，回忆说“这像一道闪电一样”在小镇激起了反响。

在工人们取得小镇的管理权那天，工人政务会就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难题，即如何给饱受磨难而饥饿的居民们提供食物。工人委员会每天给不同的栈主下达命令，让他们负责 15、20 或更多工人的饮食。在工人政务会整个的短暂生涯中，这种方式一直持续下来。³⁰

但是这些政务会不过是些清谈馆，它们到 1919 年年中就被解散了。新政府无力制止一波反犹暴动的发生，因为就连新波兰的武装力量和警察都屡次参与了针对犹太人的谋杀、欺凌和经济抵制。

在接下来的 20 年里，犹太工人运动陷入两个政治派系争执不下的困局之中，这两个政治派系一个是国家民主党（Endeks）的右翼反犹主义，一个是从社会主义者转变为民族主义者的约瑟夫·毕苏斯基（Josef Pilsudski）所领导的右翼军国主义者。“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布热济内犹如一枚有着正反两面的硬币。”艾博·罗森堡（Abe Rosenberg）回忆到，“一面是社会共同团体的繁荣，世俗生活、儿童的基础教育、图书馆、讲座、电影院还有戏剧表演都欣欣向荣；另一面却是经济衰退和绝望情绪。”³¹第一次世界大

30. Abramowicz, A., “The Workers’ Movement in Brzezín,” 同上，pp. 104–7.

31. 同上。

战摧毁了布热济内的裁缝业。栈主们纷纷跟随撤退的俄国人去了东边，还有很多裁缝为了填饱肚子出售了自己的缝纫机。直到1923年以前，工作机会一直十分稀少。

同盟并不是镇上唯一的犹太工人政党。一些同盟成员分离出去，在波兰共产党犹太部门之下组建了小分部。此外这里还设有犹太复国主义工人运动（Poale Zion，简称犹工运动）的一个强大分支。它的意识形态混合了马克思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它主张先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再在此基础上实现一个更高的目标，即在犹太人的国家里展开一场“正式”的阶级斗争。它组织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并在那里建设了第一个集体农场（kibbutz）。1920年，犹工运动分裂为左右两派。其左派希望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说意第绪语的苏维埃国家，在那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身份平等，犹太人可以做火车司机，也可以做钢铁工人，而不仅限于裁缝和修鞋匠。这番美景，在一些有着后见之明的历史学家看来，不过在当时造成一片盲目的狂热，可是在那时，它是许多年轻人愿意为之付出生命的事业。在布热济内和其他一些与之相似的地方，左翼犹工运动跟同盟分庭抗礼，互相争夺货真价实的“意第绪街头的马克思主义”的提供权。

对历史上大多数社会主义政党而言，它们的主要目标都是取得政治权力，而怎样取得、何时取得是它们的主要分歧点。同盟和左翼犹工运动在这一点上却不存在分歧：它们都明白工人运动在波兰是没有机会取得政权的。作为主要的工人组织，波兰社会党（Polish Socialist Party）在某些方面与同盟十分相似，二者都是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政党。但由于波兰人的民族主义受到天主教反犹太主义的严重侵染，波兰民主党如果与一个犹太政党结盟，甚至仅仅表现出这种意向（通常它也不会有此表现），它就会向右翼民族主义者输掉波兰人的选票。

面对这种政治无力感,犹太工人运动的回应是在工人阶级社会团体内部发动一场文化和社会革命,以此作为无力改变外部世界的缓解剂。他们的成就在工人阶级的历史中几乎被淹没。但这场革命对布热济内的影响,据阿布拉莫维奇回忆,却是深远的。

戏剧团体迅速发展,体育俱乐部、图书馆,还有其他活动……

镇上真正不同寻常之处是激进活动发展之迅猛,是人们对待事情的极端态度,是无人能从中受益的广泛而无限度的狂热。³²

同盟从来没有支持过共产主义者关于革命的观点;它的策略是进行一场渐进、积累性的“社会革命”,而不需要走俄国式的夺取政权的道路。20世纪20年代初,通过在工作场所、社会团体和文化组织之间建立一个广泛的联系网络,同盟打算实施的正是它的这个策略。

这个策略的核心在于意第绪语。同盟的创立者是一群知识分子,他们不得不向他们设法招募的工人学习意第绪语,从骂人的粗话开始学起。现在,这个组织坚实地扎根于战后以意第绪语为母语的一代人中间。无论从哪个方面,他们都可以感受到意第绪文化的逐渐成熟与现代化,就算是种族主义政客对该语言的诋毁也无法改变这一点。现代意第绪文学之父艾萨克·佩雷斯(Isaac Peretz)是一位同盟的同情者。在他的诗作《训诫》(1888年)中,主人公嘲讽了这门被犹太人称为“老行话”的语言的衰朽态势:

32. 同上。

如果让我为异教人演唱，
我的歌声听起来会不太一样。
我不会使用意第绪这套“行话”，
因它没有合适的音调来表达。
它的字句形容不出爱情的引力，
还有荡漾在恋人心头的那抹甜蜜。³³

佩雷斯着手改进意第绪语的这个缺憾，此外还有一群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作家，他们在 19 世纪 90 年代之后创造出大量的意第绪戏剧、小说和诗歌。当说意第绪语的人们在自己的嘴唇间发出这种古老的音调、形成新的有趣的词汇和短语时，他们惊异地发现这门语言听起来“就像法语一样”。³⁴

到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工人运动建立起了一套基于意第绪语的机制网络。1920 年，波兰共有 58 所意第绪学校，其中有 23 所由犹工运动经营，14 所由同盟经营。到 1929 年则有 114 所小学、52 所夜校，甚至还有 1 所师范学院，总共覆盖了 100 多个市镇，注册学员共有 24,000 人。在布热济内，左翼犹工组织有着更大的话语权。

左翼犹工组织能够吸引到一批年轻而充满活力的成员，它为成年人开设了夜间课程。青年工人中有许多就是在那里接受了他

33. Wisse, R. R. (ed.), *The I. L. Peretz Reader*, Yale: 2002.

34. Kreingold, P., "I. L. Peretz, Father of the Yiddish Renaissance," *Fidelio*, Vol. XII, No. 2, Summer 2003, p. 35.

们仅有的教育。犹工组织还有一个运转良好的图书馆。³⁵

同盟甚至发起了一场儿童运动，所以你可能一辈子都与工人运动脱不开干系：学校、操场、青年俱乐部，进而到学徒期，这还不算结束。

1926年，同盟建立了一个名叫“晨星”（Morgenshtern）的体育组织。其出发点在于，与个人竞技类运动相比，“大众体育”更能在工人中间培养同伴之谊。因此，官方文件倡导骑自行车、体操和游泳等体育项目，而拳击运动被严令禁止，足球则不太受待见。“体育产业、足球商业……我们的运动员离开了……而加入左翼犹工运动，一些人对它的明星很是赞赏。”同盟的《青年报》如此奚落。³⁶不过事实证明，这项美妙运动的魅力不可阻挡。

艾博·罗森堡回忆道，在战前，镇上从来没有组织过体育活动，可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足球突然大受欢迎：

短时间内，踢足球成为一项极为盛行的运动。在夏日星期六的黎明时分，年轻人不再跟着他们的父亲去祷告，而是绕着迂回的小道以躲过暗中监视的眼线，最终来到操场。在那里，他们脱掉安息日的服饰，换上短裤、衬衫和专门的鞋子，开始以极

35. Fiszal Maliniak in Alperin et al.

36. Sh. Tshernetski, “Unsere sportier marshirn faroys,” *Yngt-veker* 10, 15 May 1929, p. 4. Quoted in Jacobs, J. (ed.), *Jewish Politics in Eastern Europe: the Bund at 100*, New York: 2001 p. 61.

大的热情投入训练。³⁷

罗森堡引人入胜地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比赛日。在这一天，“我们这一代中的杰出青年”——他们比其父辈更加高大、更加健壮——作为本地的竞争者参加比赛，全镇的人都前来观看，包括身穿长外套、头戴黑帽子的哈西德派犹太教徒。对方队员对守门员犯规，人群涌到球场，一场闹哄哄的争吵随即爆发。随着最后一声哨响，布热济内输掉了比赛。但是，当年长者去酒吧一边喝啤酒一边分析比赛战术时，年轻人却前往树林，在那里合唱社会主义歌曲、讨论政治。

一轮满月在深蓝色的夜空中游曳，树林在泛白的金色月光下闪烁着光辉。夜幕沉沉垂下，静谧而芬芳。我们终于把所有的歌曲都唱完了。我们却不想回家。前一天的欢愉逐渐稀薄下来，远处的黎明显得阴郁而沉闷。³⁸

同盟如何能抗拒得了足球呢？到1929年，同盟也有了几支属于它自己的足球队，而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它对拳击也给予了认可，理由是拳击有助于自卫。1931年，晨星派出一支由100名运动员组成的队伍参加维也纳（Vienna）工人奥运会（Workers' Olympics）——他们的集体照保

37. Rosenberg, A., "Jewish sports in Brzezín," in Alperin, A., & Summer, N., New York: Brzeziner Book Committee, 1961. Excerpts used with kind permission of the YIVO Institute, New York.

38. 同上。

留在纽约的同盟档案里，照片上的他们身穿时髦的制服排列在一起，女人留着时下流行的波波头，男人梳着当时偶像剧男主角款式的背头，他们与1905年的学徒工人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除了体育，人们对意第绪剧院也有着强烈的需求，工人运动带头行动来满足这种需求。在布热济内，同盟和左翼犹工运动各自组建了相互竞争的戏剧团，据一位参与者说，同盟“在一场激烈的斗争之后”，败下阵来。在全国范围内，同盟和左翼犹工组织在体育、剧院、文学乃至电影领域都展开了同样激烈的竞争，尽管正在这个时候，可能将二者联合到一起的经济困难和尖锐的种族主义，正一步步逼近这些犹太小镇。

征服世界：

这里所发生的事情不全是围绕着足球和文化；布热济内有一批积极的听众，为同盟和左翼犹工组织派来的政治鼓动者和演讲者捧场。雅各布·帕特（Jacob Pat）回忆了来小镇做演讲的经历，他后来成为一位在美国的同盟领袖：

很快人们成群结队地聚集在街道上，那是万人空巷的场面。犹太人纷纷走出家门，站在鹅卵石路面上。年轻人会凑得更近一些。“同志们，你们好。同志们，你们好。”全镇的人都看见了，他们都知道“演讲者来了”。他已经到这里了，是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来的。哈西德派犹太教徒（Hasidim）对这样的演讲十分不满；年长一些的犹太人也有些不安。这些演讲者会把孩子们带入歧途……可是他们无能为力；没人能做些什么。时代变

了，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

帕特记得迎接自己的场面笼罩着“喜悦和宗教般的敬畏”，这种氛围在几十年前只会在欢迎一位著名拉比（rabbi）³⁹的时候出现。他在镇上最大的场馆里对着 1000 多人做演讲。

那时候的我们齐聚在一个更为崇高的世界里，一个被点亮的世界……那声呼喊“同志们——男同胞、女同胞们”在大厅上空回荡，人们为自己编织着一个充满激情的梦想，他们梦想着一个全新的世界，生活着全新的人类，还有全新的犹太人拥抱着将要实现的更大的自由。无论是谁，若能有幸看到布热济内这群贫穷的年轻裁缝如何无畏地追求自己的梦想，他就会充满征服世界的力量。⁴⁰

如果我们还记得，在关于群众集会、足球和戏剧团的田园诗般的描述开始发生的那些年里，犹太人正在被剥夺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并经常遭到华沙和罗兹的街头帮派的攻击，那么同盟所营造的政治世界就的确显得如梦如幻、虚无缥缈。下面的文段摘自同盟的一位领导人所撰写的一篇社

39. 拉比（rabbi）：犹太人中的一个特别阶层，是老师也是智者的象征，指接受过正规犹太教育，系统学习过《塔纳赫》《塔木德》等犹太教经典，担任犹太人社团或犹太教教会精神领袖或在犹太经学院中传授犹太教教义者，主要为有学问的学者。——译者注

40. Pat, J., “About Sefer Brzezín and the Destroyed Town of Brzeziny,” in Alperin, A., & Summer, N., New York: Brzeziner Book Committee, 1961. Excerpts used with kind permission of the YIVO Institute, New York, pp. xvii–xx.

论，从中可以嗅到某种挫败感：

犹太工人对自己的事情忧虑得太少，而对别人的事情忧虑得过多……在为特定目的召集起来的犹太工人集会上，大家的讨论总是会偏离问题的重点而转移到各种各样的外国事务中去。犹太工人每天考虑的关于德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的事务，比他们考虑的眼前的问题要多得多，而这些眼前的问题才是我们必须解决的。⁴¹

约瑟夫·毕苏斯基的军政府在1926年上台之后，官方反犹主义有所松弛（相比反犹主义，他的反俄主义更加强烈），可是民间社会对犹太人的恶意依然没有消减。现在同盟对自己的策略慢慢做出了调整。此前它一直在抵制波兰议会选举，然而在1928年，它与波兰社会党结成了相对较为成功的选举联盟。那一年见证了布热济内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五一劳动节大游行，也见证了犹太工人与非犹社会主义者之间的积极合作。阿布拉莫维奇回忆到：

5月1日这天，不同派系团体的游行队伍带着各自的标语和旗帜前往集市，在那里形成了一场盛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天色还早，集市却早已人头攒动。游行队伍举着红旗、拉着横幅，喧嚷嚷地朝罗古夫大街（Rogow Street）的方向前进，其所经

41. Hertz, S., "Aynike Shtrikhn Vegn de Idisher Arbeiter Bavegung," *Socialistisze Bleter*, 1 June 1931, pp. 41–3. Quoted in Johnpoll, B., p. 179.

之处,用波兰语和意第绪语喊出的口号和标语震耳欲聋……左翼犹工党(我当时任党委书记)获得了扛旗的荣耀。旗帜很重——起风的时候感觉更重——以至于到今天,我还能感受到它沉甸甸的分量。⁴²

1929年,犹工运动领导之下的工人候选人联盟在市镇委员会中获得了席位,取代了主流犹太复国主义者,成为犹太人的代表。但是,不公正的选区划分使得委员会被基督徒控制。当犹太工人团体的领袖首次在委员会上演讲,要求保障失业者的福利时,他的演讲被粗暴地打断了。

会场顿时沸腾起来,大家吵得不可开交,这成为后来市镇委员会上犹太人和波兰人之间一系列矛盾的开端。局面就这样持续恶化,直到犹太人终于明白,市镇委员会内部是不可能在未来达成合作的。⁴³

42. Abramowicz, A., "The Workers' Movement in Brzeziny," *Brzeziny memorial book* (ed. Alperin, A., & Summer, N.), New York: Brzeziner Book Committee, 1961. Excerpts used with kind permission of the YIVO Institute, New York.

43. Maliniak F., "Brzeziny Between Two World Wars," in Alperin, A., & Summer, N., New York: Brzeziner Book Committee, 1961. Excerpts used with kind permission of the YIVO Institute, New York, p. 87-9.

虚假的胜利：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同盟的阵地一直在失守，而左翼犹工运动则步步紧逼。与左翼犹工运动结盟的青年运动——青年护卫队（Hashomer Hatzair）——有一个甚至比自卫加社会主义更有吸引力的政策，即自卫加巴勒斯坦。另外，由于左翼犹工运动强烈支持苏维埃（而同盟对之强烈反对），他们获得了与斯大林（Stalin）的俄国结盟的殊荣。因此在布热济内这样的小镇里，同盟只能在犹太复国主义工人组织之下屈居第二。

但是1935年毕苏斯基的死以及随之而来的官方反犹太主义的复兴，再次把同盟推向波兰犹太人当中的领导地位。“犹太人的数量过于庞大。”一位当政的上校在广播里宣告，“解决的办法只有大规模人口迁离……然而顺其自然不会使问题得到解决，犹太人也不会自行消失。我们必须当机立断，为波兰人争取贸易、工业和手工业的工作机会。”⁴⁴这无疑是在号召人们把犹太人赶出技能性的工作岗位，街头的种族主义袭击也变得越发有组织性。

新的形势如一桶凉水，冲击着同盟的领导力。一直以来，同盟的领袖维克多·阿尔特（Victor Alter）和亨里克·埃尔里赫（Henryk Erlich）力图使同盟的事业与外部世界的政治危机关联起来，可是现在，他们转而与波兰社会党正式结盟，开始严肃地进行选举工作。1936年以前，同盟从来没有正式参加过犹太柯希拉——宗教政务会——的选举，可是现在它开始参加了，并且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几百个议席。同盟在华沙、罗兹、卢布林、维尔纽斯（Vilnius）以及格罗德诺（Grodno）都成为多数党。在华

44. Colonel Jan Kowalewski, *Gazeta Polska*, 22 April 1937. Quoted in Johnpoll, B., p. 208.

沙，同盟获得了控制权，但是波兰政府在事实上解散了政务会，挑选了一群主流犹太复国主义者取而代之，管理这座城市。在罗兹，同盟、波兰社会党和讲德语的社会主义者结成联盟共同获得了城市政务会的实际控制权，可是政务会随即也被解散了。无论如何，选举的胜利来得太晚了。

1936年3月，小镇普日蒂克（Przytyk）发生了一场有警察背景的大屠杀。作为回应，同盟和左翼犹工运动号召波兰上下所有的犹太地区彻底罢工。主流的犹太复国主义政客拒绝支持这场罢工，结果颜面尽失。由此可见，在大灾难面前，犹太工人总是会大量地转向同盟寻求帮助。

1938年12月举行的市政选举是战前各政治力量之间进行的最后一场角逐，同盟从中赢得了多数犹太选票，在各大城市取得了绝对优势。同盟的政治标签一直以来都是面对种族主义暴力进行积极自卫，拒绝犹太复国主义，蔑视迁移出境，以及希望与波兰工人结盟。现在，欧洲和美国对难民关闭了国门，于是犹太工人转向了这个一直以来都在告诉他们“我们的家园就在这里”的组织。工人们转变了他们的拥护对象，这不仅是民族团结的姿态，也是激进社会主义的姿态，但是同盟的领导人还是下定决心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乘胜追击。

在同盟获得选举胜利之际，亨里克·埃尔里赫用挑衅的口气定下了在接下来的惨剧中同盟处理与犹太复国主义之间关系的基调。

[犹太人的统一] 容不下与反动分子的合作……犹太复国主义已经变成反犹主义的盟友。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用了世界各地生活境遇恶化的犹太人。他们自视为波兰的二等公民。他们的目标却是在巴勒斯坦成为一等公民而把阿拉伯人变成二等公民。因此同盟在与波兰反动势力的斗争中，是不能把犹太复国主义

者当成合作伙伴的。⁴⁵

相反，同盟自视为将犹太人和波兰工人联合起来的唯一媒介。对于同盟的领导人而言，1938年的选举经历让他们明白，他们终于可以代表大多数波兰犹太人发言了，而且与波兰工人的联合终于要发生了。尽管境况艰难，团结在一起却使得犹太小镇的生活感觉不那么糟糕了。

伊克霍克·查那索维奇（Icchok Janasowicz）是布热济内人，在移民到阿根廷（Argentina）后成为一位著名作家，他总结了犹太工人组织在小镇毁灭前夜所创造的成就：

即使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岁里……小镇的生活方式依然保留着明确的家长制的特点，并且这在工薪者和师傅之间、师傅和栈主之间的斗争中留下了印记。没错，他们在布热济内发动的是与罗兹一样的社会斗争，罢工也不是不频繁，可是所有的斗争都没有大城市的那份尖锐和苦涩，而且几乎没有一次引发了严重的仇恨……虽然我并不想在与其它城镇的对比中夸大他们态度里质朴平和的特质，但是这种特质肯定是存在的。⁴⁶

1939年9月，德国侵略了波兰，这份质朴与平和被摧毁了。纳粹在战

45. Erlich, H., "Naye Folkshtaytung," 31 July 1938. Quoted in Polonsky, A., "The New Jewish Politics and its Discontents," in Gitelman, Z. (ed.), *The New Emergence of Modern Jewish Politics*, Pittsburgh: 2003, p. 37.

46. Janasowicz, I., "My Gate to the Great World," in Alperin, A., & Summer, N.

争爆发的几天之内就占领了布热济内，他们烧毁了犹太教堂，并在1940年建造了一个犹太人限制区，把6000犹太人塞进他们自己家乡的几条狭窄的街巷里。柯希拉同纳粹德国国防军交涉，达成一个为德军缝制军装的协议，从而推迟了他们对犹太人的驱逐，使犹太人限制区存活了两年。可是，在希特勒于1942年1月发布“最终解决方案”⁴⁷的命令后，限制区的命运有了定数。

小镇有一个夜间课程的工人社团，一间包含七个年级的犹太世俗学校，六个图书馆，四个戏剧团，两个合作社，一个职业工会，两个工匠工会，同盟的活跃支部，左、右翼犹工运动，此外还有“革命者与共产主义者”。这是一位幸存者所描述的布热济内工人运动之成就的最后清单。1942年5月，布热济内被摧毁了。在被运送到罗兹限制区的被驱逐者中，有15名是同盟在布热济内的支部成员。

限制区的抗争：

同盟在波兰的最后一次活动是其历史上最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举动。1943年4月17日这天，同盟在华沙限制区的青年运动与左翼犹工运动的青年、主流犹太复国主义者联手发起了一场针对纳粹的注定失败的起义。三年来，同盟在带刺的铁丝网后面艰难地维持着工人运动，并且直到大多数华沙的犹太人遭到屠杀，它都拒绝与犹太复国主义战士结盟，然而就在这

47. “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针对欧洲犹太人的系统化的种族灭绝的计划及其实施。阿道夫·希特勒把它称作“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译者注

三年的最后时刻，它终于做出了抗争的决定。

德国入侵后，同盟在全国范围内的领导人——埃尔里赫和阿尔特——被命令离开华沙、逃往东部。然而苏联已与纳粹签订了瓜分波兰的协议，在苏联对本地区的同盟分部进行大规模镇压的过程中，他们二人被斯大林的秘密警察逮捕了。在华沙，资深的同盟领导人什穆埃尔·齐格博伊姆（Shmuel Ziegelboim）掌权，他被委任在由纳粹建立、用以取代柯希拉的犹太政务会任职。然而，齐格博伊姆在一次演讲中督促人们坚决抵抗任何有关建立犹太人限制区的尝试，在这之后他就被秘密转移出波兰，在伦敦（London）担任波兰流亡政府的同盟代表。

1940年11月，华沙限制区在一圈带刺的铁丝网和刺刀后面建成。一场混乱的迁移持续了两周，有人迁出去，也有人迁进来，到最后同盟发现这里只剩下不到50万犹太人，7人住一间，而同盟将在这样的环境中继续运作下去。在这里，企图逃跑的人会被处死，犹太儿童被禁止接受教育，一个充满肆意的杀戮、欺压和勒索的政权很快成立了。伯纳德·戈德斯坦（Bernard goldstein）在限制区建立之前的华沙担任同盟自卫队的领袖，现在，他试图通过一种细胞体系来重建自卫队，在这种被称作“虾兵蟹将”的体系中，所有的人都只能跟自己的顶头上司单线联系。

1941年年中，纳粹放松了对教育的禁令，夜校和幼儿园开始挤进住宅区和办公室的角落，同盟的青年网络迅速复苏。戈德斯坦回忆到：

教育和文化活动重新被赋予了重要意义……实际上为了使我们自己从被包围的无助感中解脱出来，我们试图重建和巩固所有战前就存在的机构，以此来创造出从前的生活图景，哪怕只

是幻象。⁴⁸

在限制区的前 18 个月里，大家都心知肚明，抵抗只能采取消极的方式，可是同盟仍在刊发一份非法报纸《快报》（*The Bulletin*）（后来改名为“召唤”，*The Call*）。1942 年 4 月 17 日，盖世太保执行了第一批大规模处决，其借口是打击违法报刊。大量印刷工人和学者被圈禁起来集体枪毙。那天夜晚开始了华沙限制区行将毁灭的第一个阶段，盖世太保团伙对犹太人随意踢打、射击和劫掠，把要驱逐的人抓起来。然而这个时候，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的集中营还没有建成。就在 1942 年 7 月 22 日，灭绝行动大规模地开始了。盖世太保命令犹太政务会以每天 1 万人的速度把 6 万“没有生产力”的犹太人驱逐到他们所谓的工作营，并扣押了人质以确保其服从。犹太政务会主席亚当·茨尼阿库夫（Adam Czerniakow）宁死也不愿签署命令，最终服毒自尽。

此时同盟在华沙的领导权开始向其青年运动“未来”（Zukunft）转移。左翼犹工运动在战争伊始就象征性地自行解散了，但是左翼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青年护卫队——依然保持活跃。在主流犹太复国主义者中间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其青年团体——犹太复国主义青年先锋队——成为其领导力量。在千钧一发之际，两次大战之间的这一代“杰出青年”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问题：什么时候斗争和该如何斗争。

在未来青年运动的领导之下，同盟已经决定组织起武装抵抗，但是目前他们还处于收集武器的阶段。

48. Goldstein, B., *Five Years in the Warsaw Ghetto*, London: 2005.

我们无时不刻不在期盼着久期不至的武器装备被运载来的消息。但是我们清楚，武装抵抗将会使整个限制区都难逃厄运，而不仅仅是那6万人。无论我们有多么确信，整个限制区在任何情况下都难逃一死，但又有谁能够承担得起使灾难提前来临的责任呢？⁴⁹

有传言称德国人已经开始实施大灭绝行动，问题在于限制区里大多数人都都不相信这个传言。因此武装抵抗缺乏群众支持。相反，人们纷纷争抢工作许可证和工作机会。富有的犹太人宁愿以全部的财产作为交换以获得在小工场里当个扫地工的机会，从而逃脱被驱逐的厄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当犹太复国主义青年团体第一次伸出橄榄枝要建立一个联合军事力量时，同盟拒绝了。其原因除了双方的夙怨之外，还因为同盟坚信，他们会迎来一个波兰联合起义——因此与铁丝网外面领导抵抗行动的波兰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是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

面对群众的消极和迟钝，同盟着手干了两件事：一是刺穿华沙群众中间拒绝接受真相的氛围；二是说服协约国做出实际行动来阻止大屠杀，在必要的情况下对德国群众施以惩罚性措施。要想让世界看到大屠杀的证据，就需要一些个人英雄主义的举动。

同盟派青年组织者扎尔曼·弗雷德里希（Zalman Friedrich）去特雷布林卡执行一个死亡任务。弗雷德里希自小在同盟的学校里长大，校订过同盟的体育报刊，在同盟的青年团体里学习过政治和文学。他无畏地接受了

49. 同上，p. 95.

任务。弗雷德里希身材高大，发色金黄，据戈德斯坦称，是“纳粹宣传官员眼中的完美形象”，他的任务是翻过铁丝网、逃出限制区、跟随一批被驱逐者被运送到目的地，然而再返回。1942年7月，他跟随一列火车来到特雷布林卡，并在附近的树林里发现了两名逃亡者，其中一个还是同盟的成员，他在那里对他们进行了访谈。他们向他形象描述了纳粹所使用的机械化处决方式。弗雷德里希随即九死一生返回限制区，整理了有关特雷布林卡的第一份目击证据，并发表在同盟9月20日那天的报纸上。

所有运送华沙犹太人的火车都驶向了特雷布林卡，在那里他们以一种骇人听闻的方式将犹太人杀害……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占地1到2公里……那些刚被运送去的人们……被脱光衣服，200人一批地被押送进“喷浴室”……然后他们再也没有出来过。⁵⁰

与此同时，同盟的活动分子里昂·费纳（Leon Feiner）把协约国的秘密探员简·卡斯基（Jan Karski）先是偷偷带入限制区，然后帮他乔装成护卫潜入死亡集中营。在带着有关大屠杀的证据穿越了被占领的欧洲之后，卡斯基与同盟的伦敦代表齐格博伊姆取得了联系，并把发生的事情当面告诉了英国和美国的政治高层，尽管大西洋（Atlantic）两岸的这两个国家一开始都对此难以置信。

1942年9月至10月，30万犹太人从限制区被驱逐出去，在盖世太保和犹太警察的鞭抽脚踢之下押送至转运站。在那里他们被装进卡车送去了特

50. *Oyf der Vakh*, 20 September 1942. Quoted in Blatman, D., *For Our Freedom and Yours: The Jewish Labour Bund in Poland 1939–1949*, London: 2003, p. 103.

雷布林卡。凭借着勇气，同盟通过贿赂的手段竭尽全力从转运站救了些人出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被派去同护卫做交易的成员反而也被抓住并被驱逐了。马雷克·埃德尔曼（Marek Edelman）是同盟的一位青年组织者，他回忆到，“我们在这期间几乎损失了所有的同志。我们团队中最初的500多人现在只剩下几十人了”。⁵¹

同盟通过工会与工厂的经理建立了不错的关系，而有工厂的一张通行证就意味着能够免于被驱逐的命运，同盟也用自己的打印机印制了几千张假证。由于织布厂的工人给了一个藏身之所，伯纳德·戈德斯坦躲过一劫，但是他的密友索尼娅·诺夫哥罗斯基（Sonia Novgorodsky）——她也是一位同盟活动分子——在工厂的一次突然搜捕中被抓获，并被驱逐了。埃德尔曼回忆起她被抓的前一天他俩之间的一次谈话，在这次交谈中他们深入探讨了这样一个深深扎根于工人之中的运动所面临的最主要的困境。她对他说：

我不属于这里。看看还留在限制区的那些人，他们不过是社会的浮渣。工人群众大批大批地被送往转运站。我必须跟他们一起去。如果那时我能在卡车上、以及在那之后跟他们待在一起，或许他们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即便是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⁵²

51. Edelman, M., *The Ghetto Fights*, London: 1990.

52. 同上。

到10月份的时候,对限制区的“清除工作”几乎完成了。限制区只剩下6万犹太人——包括3.3万工厂的工人,3000名政务会的职工,而其他的人全部躲藏在地堡里,他们是所谓的“黑户”。戈德斯坦遭到抓捕,但他在被驱逐之前成功逃脱了,他这样描述自己逃回来后的所见所闻:

一切都变得陌生起来。这里看不到嘈杂的推推搡搡和被秘密带走的人群了,而这样的景象在不过六七个星期之前还是限制区的常态。商店门大大地敞开,里面空无一物。房屋也都被遗弃了……阴郁的荒凉笼罩着每一个角落。⁵³

在这个关头,同盟决定加入犹太人战斗组织(Jewish Fighting Organisation)。现在已经不存在会在战斗中牵累广大平民百姓的风险了,因为他们大部分人已经死了。戈德斯坦收到命令,要突围到“雅利安人”那边去与波兰抵抗组织取得联系,并获取武器装备。犹太人战斗组织的司令官名为莫迪凯·阿涅莱维奇(Mordechai Anielewicz),是来自青年护卫队的一位24岁的青年组织者;而马雷克·埃德尔曼则在战斗组织的司令部内担任同盟的代表。从那天起,他说,“所有的同志好像是一家人一样,彼此亲密无间。共同的奋斗目标把我们紧紧团结在一起。在这段半年多的时光里,我们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口角或者争斗,这在不同信仰的拥护者之间是很罕见的……所有的人都在这场生死攸关的英勇抗争中平等地努力着。”⁵⁴

53. Goldstein, B., *Five Years in the Warsaw Ghetto*, London: 2005, p. 130.

54. “Second Report from the Jewish Workers’ Underground Movement 15 November 1943,” in Edelman, M., *The Ghetto Fights*, London: 1990, p. 97.

在12月的月底,犹太人战斗组织收到了波兰抵抗组织寄来的第一批武器:十支手枪。德国人发动了突然袭击,迫使他们在街头展开巷战,从而在1月18日引发了第一次较大的交锋,参加这次战斗的大部分犹太战士都没有活着回来。这次交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限制区外,欧普(Oppel)军工厂的犹太强制劳工激烈抗议,要求回到限制区内参加战斗。在限制区内,托本斯(Toebbens)工厂的德国老板发表演讲,公开谴责犹太人战斗组织,在场有一位名叫简·玛伍尔特(Jan Mawult)的犹太警察也听了这场演讲,他后来参加了最后的起义。

不管是什么原因,人们进行抵抗的想法越来越强烈……战斗组织挂在了每个人的嘴边,人们嘴上谈论它,心里也想着它。托本斯在辩论中对战斗组织的提及实际上为这些战士们的事业赢得了更多的拥护者,这比他们自己几个星期的宣传还要有效。⁵⁵

此时犹太人战斗组织开始了游击战术,主要破坏敌方的工事设施,并建立了自己的兵火库。在那场决定性的起义到来之际,据埃德尔曼称,每一位游击队员配备了1把手枪、10到15发子弹、5个手榴弹和5个燃烧弹,每一个分队配备了3挺步枪,另外,整个组织只有1挺机关枪。

战斗组织设置了两种分遣队,一种是“特别驻防部队”,他们驻扎在限制区周围的战略性地点,另一种是以工厂为基地的分队。同盟坚持把自己的大部分战士安排在工厂里面,同盟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更是毫不

55. Mawult, J., in Grynberg, M. (ed.), *Words to Outlive Us: Eyewitness Accounts from the Warsaw Ghetto*, London: 2004, p. 253.

退让。戈德斯坦写到：

同盟包揽了几乎所有的工厂战斗分队，而只提供了四支特别驻防部队。我们担心工厂的据点过于薄弱……我们的目标是拓宽抵抗战线，赋予战斗更大的群众性……我们对人民群众的依赖事实证明非常明智，因为在最后的战役打响的时候，我们的工厂分队有能力把所有的工人吸收进来。就连所谓的“黑户”——他们是没有身份证明的非法居民，住在任何能藏身的地方——也加入到我们的战斗中来了。⁵⁶

1943年2月，广播上传来消息，称维克多·阿尔特和亨里克·埃尔里赫因“从事针对苏联的颠覆活动”被处决了。埃尔里赫在圣彼得堡劳工代表会议上提出了关于波兰独立的动议。而阿尔特则参与了共产国际（Comintern）的建立。他们二人一起担当了同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头面人物。戈德斯坦写到：

在我们得知我们的两位最受爱戴的同志和领袖，在斯大林的国家政治局（GPU）的地牢里被枪毙的时候，最初的那几天，所有的人都怀着深深的悲痛和愤懑低下了头。他们脸上的表情，直到今天还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⁵⁷

56. Goldstein, B., *Five Years in the Warsaw Ghetto*, London: 2005, p. 156.

57. 同上, p. 152.

纳粹党卫军（SS）于1943年4月19日星期天凌晨6点进攻了限制区，这标志着他们对余下的犹太人的清除计划开始了，也标志着被历史铭记为“华沙犹太人限制区起义”的长达一个月的战役开始了。尽管德国军队配备了坦克和机枪，全副武装、以850人之众的队伍在道路上列队前行，但他们完全没有做好战斗的准备。犹太人战斗组织的各分队率先开火，朝着敌人的坦克投掷燃烧弹。德国人发动了第二次进攻，却遭到一个大炸弹的袭击，伤亡惨重。到了下午两点，埃德尔曼写到，“在限制区的范围内没有留下一个活着的德国人”。

战斗的第一阶段持续了五天，结束之后，阿涅莱维奇在其最后一份公报中作出了总结：

事情的进展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德国人两次被我们打得落荒而逃，跑出了限制区。我们的一个分队连续抵抗了40分钟，还有一个分队抵抗了6个多小时。我感觉所发生的事情是伟大的，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意义非凡……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转而使用游击战术。⁵⁸

犹太人战斗组织明白，他们的这场起义与世界大战中一个更为巨大的转折点是分不开的。1月的时候，德国人就已经在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投降了——现在战士们说起了“限制区格勒”。与此同时，波兰工人阶级也开始士气大振。犹太人战斗组织于4月23日向波兰工人发布公告：“我们这

58. Kann, M., *Na oczach swiata*, Warsaw: 1943, p. 33.

群犹太人限制区的囚徒向你们致以最诚挚的兄弟般的问候……这场战斗关乎你们的自由，也关乎我们的自由，更关乎我们共同的作为人类、社会和民族的尊严。”⁵⁹

第一个星期过后，损失了2辆坦克、93名士兵的德国军队面对袭击按兵不动。相反，他们有条不紊地在一些区域放火，把犹太人战斗组织逼退到地堡之内，“五一那天，限制区的战士们发动了一次为期一天的‘进攻’。傍晚，他们举行了一个对他们被大批杀害的战友的点名仪式，并一起唱了‘国际歌’”。⁶⁰

5月8日，德国军队找到了战斗组织的司令部所在地，并用毒气进行攻击。约有80名战士在里面遭到抓捕。很多人，包括阿涅莱维奇，自杀了，他们宁死也不愿投降。5月12日夜晩，伴随着零零星星仍在进行的战斗，广播上播报了一则新闻，称齐格博伊姆——同盟在波兰流亡政府的代表——为抗议协约国对于大屠杀的无动于衷而含恨自杀了。他在遗书中写到：

我那些华沙限制区的同志们手握着武器，在最后这场英勇的战斗中倒下了。我没能像他们一样倒下、和他们一起倒下，但是我是他们的一部分，我也将归属在他们的集体坟墓里。临终之际，我希望表明我对世界的不作为最为深重的抗议，抗议整个世界冷眼旁观着犹太人的毁灭。⁶¹

59. ZOB 23, April 1943, in Goldstein, B., *Five Years in the Warsaw Ghetto*, London: 2005, p. 168.

60. Goldstein, B., *Five Years in the Warsaw Ghetto*, London: 2005, p. 171.

61. Zygelboym, A., 11 May 1943, Yad Vashem Archives, O-55.

“我们所有人都悲痛地明白阿图尔（Artur）自杀的用意。”戈德斯坦写到，“他用自己所做的一切努力为我们增加筹码。”⁶²

弹药耗尽之际，波兰抵抗组织安排犹太人战斗组织从下水道逃离。埃德尔曼的分队成员此时已饿得骨瘦如柴，他们在地道里待了48个小时之后终于逃离了限制区。扎尔曼·弗雷德里希本来已成功逃离，却又被抓住枪毙了。戈德斯坦留在了华沙，并于一年之后在那里参与了一场范围更大的波兰起义。直到6月份，同盟与限制区的两个战斗分队都保持着联系，在那个时候，大约70名战斗组织的战士在树林里重新部署为游击队。5月16日，纳粹党卫军的总指挥官总结了这次行动：

在所有被抓到的56,065名犹太人当中，约7000人在大规模行动中于前犹太人限制区内被处决，6929人被送至特雷布林卡处决，因此共有14,000名犹太人被处决。除了被抓住的56,065名犹太人，估计有5000至6000人死于爆炸或者大火。⁶³

“世界变得愈加贫乏”：

大多数工人运动是为了改变世界而存在，但是同盟却面临着一个独特的问题——创造了它的这个世界被证明不可能被改变。对此，同盟的回

62. Goldstein, B., *Five Years in the Warsaw Ghetto*, London: 2005, p. 169.

63. *The Stroop Report*, Jewish Virtual Library. <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Holocaust/nowarsaw.html>

应是创建一个世外桃源，当这片桃源被封存在布热济内那样的犹太小镇时，其田园诗般的特质达到了顶峰。同盟通过华沙犹太人限制区起义，从那片桃源向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发送了最后一条讯息。

那些看着同盟兴起、并能将它与波兰以外的工人运动相比较的人会知道，同盟是独一无二的。它不必与它所运作其中的民族文化划清界限；相反，它助推形成了该种文化。因此，同盟留下了或许是工人阶级的历史上最为成功的集中建立社区组织的范例。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是一位反对同盟及其意识形态的犹太共产主义者，然而他对同盟的成就大加赞赏：

我有幸与他们共事的日子距今已有 25 年……在此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这种宽阔的政治视野、这种对于理想的忠诚、这种献身精神以及大无畏精神，正是这些特质赋予了东欧上一代犹太工人以生气。当那一代工人的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候，我知道世界将变得多么贫乏。⁶⁴

但是那颗心脏并没有完全停止跳动。马雷克·埃德尔曼活下来了，他冲出历史的洪流，为人们阐释同盟的哲学和那场起义留下的教训。他说，

我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决不是国家专权。人的主观性应该得到强调。你需要好的物质条件，高水平的文化氛围，大把的自由

64. Deutscher, I., "Preface" in Mendel, H., *Memoirs of a Jewish Revolutionary*, London: 1989.

还有友谊。这些都不是唾手可得的,而是需要经过漫长而曲折的道路……⁶⁵

埃德尔曼发表这些言论的那一年,他过得十分忙碌:他刚刚从监狱被释放出来,他仍在帮助一个半合法的工人组织同一个行将瓦解的独裁政权作斗争。这个组织名为团结工会(Solidarnosc)⁶⁶。那一年是1989年。

65. Rose, J. "Interview with Marek Edelman at his home in the Polish city of Lodz," 21 March 1989, in Edelman, M., *The Ghetto Fights*, London: 1990, p. 116.

66. 团结工会(Solidarnosc):是波兰的工会联盟,于1980年创立于格但斯克的造船厂,由列赫·瓦文萨(Lech Wałęsa)所领导。团结工会在波兰共产主义政权垮台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导致一系列在中欧和东欧的和平反共主义运动的胜利,即1989年革命。——译者注

希望带来的喜悦

当工人们控制了工厂

译=费竖心

有时这里会传来歌声和笑声，还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和新鲜感。这里有飘扬的红旗，门口的守卫，庭院里的露营地，相当于集体公有的食物，对未知的等待以及希望带来的喜悦。

——《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ra*)¹,

米兰 (Milan), 1920 年 9 月 2 日

1. 《晚邮报》：创立于 1876 年的意大利日报，是意大利成立时间最早、阅读范围最广、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持有中间偏左的政治立场。——译者注

2006年，阿根廷内乌肯

对于劳尔·戈多伊（Raul Godoy）来说，这是在僵持数月之后的最后解决手段；对于鲍勃·特拉维斯（Bob Travis）来说，这是为了避免机床被搬走而做的仓促决策；对于毛里奇奥·盖里纳（Maurizio Garino）和西蒙妮·韦伊（Simone Weil）来说，这不亚于在工厂发起解放运动。这个让各方都心存疑虑的举动是一次静坐罢工（sit-down strike）。盖里纳在1920年是都灵（Turin）钢铁工人协会（metal workers' union）的会长；韦伊在1936年是在巴黎（Paris）的雷诺公司（Renault）²工作的卑微技工；特拉维斯在1937年是密歇根州（Michigan）弗林特市（Flint）汽车工人的头儿。戈多伊则领导着阿根廷的一家瓷砖厂——萨农陶瓷（Zanon Ceramica）³，截止至本文写作时，他和他的460位同事仍控制着这座他们在2001年夺取的工厂。他说道：

一开始，没有人知道是否整个工厂的工人都会被解雇，所以我们只部分地占领了工厂。也就是说，我们当时继续按照正常的轮班制度工作，把这作为保证机器和库存不会被搬走的一种手段。我们有种不确定的心情——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

-
2. 雷诺公司：法国的汽车生产商，创立于1898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接管成为国有公司；现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汽车品牌之一。——译者注
 3. 萨农陶瓷厂：现更名为FaSinPat（即“Fábrica Sin Patrones”的缩写，意为“没有老板的工厂”），是在阿根廷工厂复兴运动中表现最突出的工厂之一。——译者注

萨农工厂是内乌肯（Neuquén）最大的工厂之一，装有一套高科技的装置，所以在 2001 年 10 月，当工厂主们试图关闭装置，解雇工人并且搬走烤炉时，这座工业城镇陷入了恐慌之中。但是那时经济危机的走势已经失控，同时还引发了一轮货币贬值以及银行挤兑风潮。随着失业率攀升至 20%，失业的示威者们走上街头，堵塞了高速公路。在 2001 年 12 月，上百家工厂落入了雇工们的手中。“这是一场起义，”戈多伊说。“每个人都觉得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性，激进的要求被提上了日程，因为情势处于爆发的边缘。我们都是那个进程中的一员。”

他们接管了萨农工厂，投票决定要继续生产瓷砖，并且因为法庭判决工厂主无权驱赶他们而倍受鼓舞。

没有老板，没有领班，我们自下而上地组织生产，就像我们曾经在我们的工会里所做的那样。我们投票表决生产计划——例如瓷砖的种类、数量、设计和供应商。每个部门选举出一个协调员，由那个人把每天产生的问题提交到每天的协调员会议（Coordinators' Meeting），协调员会议就像是一个工人委员会。

在协调员会议之上是一个定期召开的、为期一天的全体工人大会，负责中期的决策。工人们最先做出的决策之一，就是减轻工作负担。

我们采取三个八小时制的轮班，每个人工作同样的时长，领取同样的薪水。而且我们的工作速度是过去在老板手下的速度的一半。曾经我们使用瓷片压制机的速度——这个环节决定整个生产流程的速度——是每分钟 14 到 15 下，这是很可怕的事

情，因为这种工作速度会让你的胳膊完全失去知觉。现在我们的工作速度放慢到过去的一半，但我们仍保持在一个很好的产出水平上。

将生产流程分类只是他们所遇到的问题的开始。起初，固定的供应商拒绝为他们供货，而且他们生产的货物也因为缺少税务登记号码而被没收。但是他们与广大的社会反抗组织的联系起了作用：那些被军事独裁者谋害了子女的母亲们所成立的社团，也就是“五月广场母亲”（Monthers of the Plaza De Mayo）⁴，捐出了她们的发票号码，而那些与萨农陶瓷厂的前主人们结怨的当地人则为工人们提供了陶土。

在被 2001 年的起义所占有的所有工厂之中；约有 160 间工厂一直处于工人们的控制之下。一些工厂要求被永久地国有化；另一些工厂则希望保持合作社（cooperatives）的形式，或者希望政府出资，让工厂在新经理的带领下恢复生产力。在它们所经历的群众运动退潮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都处在与阿根廷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商业活动环境里，仿佛处在一个平行宇宙中一样。在萨农陶瓷厂，自从工人们占领工厂以来，他们通过雇佣失业运动中的人们增加了近 50% 的工人，并且为他们的产品打造了一个稳定的市场。“在占领运动之前，”戈多伊说道，“这里曾经每年有平均 300 起需要上报的事故，其中一半是严重事故，而且通常有一起是致命的。但自从占领运动之后，这里发生了 33 起事故，没有严重事故，也没有致人死

4. “五月广场母亲”：在阿根廷军政府治下的 1976 至 1983 年间约有三万名左派学生、知识分子、记者、工人“失踪”。自 1977 年起，每个星期四下午失去儿女的母亲们都会在阿根廷总统府前的五月广场进行抗议游行。——译者注

亡的事故。”

能持续这么久的工厂占领运动是很罕见的。在历史上，这些运动通常在激烈的转折点上爆发，并引起强烈的反弹。但是这些阿根廷工人的占领运动存活了下来，因为这顺应了在 2001 年危机期间上台的左倾民族主义政府的要求。已经对每日的琐碎工作习以为常的男男女女，发现自己成为了这场反全球化运动的主角。人们已经制作了三部关于萨农工厂的电影，并且对于“世界上最大的工人控制下的工厂”这个标签津津乐道。

这些人了解工厂占领运动的历史吗？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戈多伊说他了解。“很多工人把这看成是左翼分子的幻想，但是当他们别无选择时，他们会开始明白这是唯一一个真正的、值得为之奋斗的选择。”他说道。但是这都有哪些先例呢？他列举了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阿根廷发生的一次占领运动，在皮诺切特（Pinochet）⁵上台的几年之前智利人的占领运动，还有玻利维亚（Bolivia）和秘鲁（Peru）的一些工厂。至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的几十年间如海啸般席卷意大利（Italy）、法国（France）和美国（USA）的静坐罢工，这些都看起来更像传奇，而非历史。然而这些罢工运动有着本质上的相似之处：在参与者基本的情绪反应之下，都有一种喜悦和自由的感觉。戈多伊说道：

我们感觉更自由了，尤其是因为我们在奋斗。当你开始战斗的

5. 奥古斯托·何塞·拉蒙·皮诺切特·乌加尔特（Augusto José Ramón Pinochet Ugarte, 1915 年 11 月 25 日—2006 年 12 月 10 日）：智利总统和军事独裁者，于 1973 年发动政变武装夺取政权，建立右翼军政府，统治智利长达 16 年；上任后镇压左翼分子和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译者注

时候，当你开始看见问题所在并且认出敌人的时候，当你明白老板和工会的官僚机构在做什么的时候，你开始感到自由。我们可以把我们所做的事情展示给世界，尽管我们只是沧海一粟，但是我们的经历显示了工人们能做什么……

1920 年，意大利

1920 年 9 月，意大利北部所有工厂管理者都在听从他们工人的指令。米兰一家报社的通讯员写道：

我们走访了不同的工厂，并且注意到在几家工厂里……那些领班们，白领工人们，甚至主管们都在听从来自工厂委员会（factory councils）的命令。在其他的工厂，在马瑞利（Marelli）⁶，布雷达（Breda）⁷，斯帕达奇尼（Spadaccini）等工厂里，领班们，主管们和办公室职员们都已经躲得远远的，生怕遭到产业工人們的报复，生产活动……在工厂委员会选出的工人

6. 马瑞利公司：意大利的汽车生产商，具有 90 多年历史，目前在汽车零部件和高技术系统设计与制造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译者注

7. 布雷达公司：意大利的机械制造厂商，创立于 1886 年，于 1962 年被接管为国有；从事有关铁路、航天器和军火的制造业务。——译者注

们的……指导下进行……⁸

五十万冶金工人们统治着他们的工厂，而管理者们只有离开或留下这两个选择。占领工厂式罢工运动（sit-in strike）是在两年的骚乱、自发性罢工以及普遍的反抗之后发生的，但这并不是混乱或者社会崩溃的产物，而是熟练工人们为夺取对工作生活的控制权而精心计划的一次尝试。

意大利的重工业是现代化和高度集中的。热内亚（Genoa），都灵和米兰的城市群组成了一个“工业三角区”（industrial triangle），这个地区的劳动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增长迅速。意大利的工人运动之所以不同寻常，是因为它同时拥有一个强大的工团主义工会（syndicalist union）⁹，和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会（socialist union）。CGL¹⁰是社会主义工会联合会，有1,930,000名成员，并且像在德国一样由温和派领导。在1914年之前就掌权的意大利的自由主义政府认可了该工会领导者在薪资和工作条件方面的顾问地位。但是许多占领工厂运动的激进分子并不在CGL里。工团主义工

8. *Il Domani*, 11 September 1920. 引自 Bell, D. H., *Sesto San Giovanni: Workers,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an Italian Town, 1880–1922*, New Brunswick: 1986, p. 122.

9. 工团主义工会：指支持工团主义（syndicalism）的工会，即赞同以劳工运动为主导来推翻资本主义，主张工人主导和管理工厂，提倡战斗精神和通过组织劳工开展罢工运动来达成目标。通常这类工会都具有无政府主义传统，并与社会主义分子的工团主义区分开来。——译者注

10. CGL：即 *Confederazione Generale del Lavoro* 或 *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r*，是由社会主义激进分子创立于1906年的一个意大利工会，后于1945年加入意大利总工会（*Italian 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ur*）。——译者注

会 USI¹¹ 有 800,000 名成员,它依据直接的行动来塑造整体的展望。在重要城市,都灵,情况变得复杂:冶金工人的工会 FIOM¹² 既包含了工团主义者,也包含了社会主义者。

这两个群体彼此对立,但那种破坏了德国工人运动的“兄弟内战”尚未在意大利出现。毛里奇奥·盖里纳,一个工团主义的冶金工人,还记得在都灵冶金工人会议厅里的政治氛围: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加入 USI 或者 FIOM,并且自然地沉浸到直接行动 (direct action)¹³ 的精神里。是的,甚至连改良主义者也能发表他们的观点——他们有最大限度的言论自由——但他们只有几个人……我们是朋友,我们在真正意义上进行合作——没有敌意,没有内讧。¹⁴

11. USI: 即 Unione Sindacale Italiana 或 Italian Workers' Union, 是由一群工人创立于 1912 年的意大利工团主义工会,在墨索里尼执政时期受到迫害,在 20 世纪 90 年代解体。——译者注

12. FIOM: Federazione Impiegati Operai Metallurgici, 于 1901 年创立,主要由冶金工人组成,是意大利最古老的工业联盟,在 1906 年加入现在被称为的“意大利总工会”的联合体。——译者注

13. 直接行动: 指一个团体针对一个社会事件采取行动去揭露现有的问题、强调一种解决方案或者揭示一种可能的情形。可分为非暴力直接行动与暴力直接行动,前者如非暴力不抵抗运动,包括罢工、占领工厂等;后者采取政治暴力,如绑架人质、破坏财产、制造袭击等。——译者注

14. “Intervista a Maurizio Garino,” FIOM, Turin. <http://www.pmt.cgil.it/Fiomtorino/Scuolomoderna.htm>

在这种氛围里，工团主义工会和社会主义工会里都出现了有相似的战略追求的社团。他们的共同目标是用工厂工人代表（shop steward）运动取代传统的工会领导。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¹⁵ 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他被直接行动的主意所鼓舞，在 1918 年搬到了都灵的工业区，并且创办了一家报纸专门组织工会代表运动，即“新秩序”运动（L'Ordine Nuovo）¹⁶。这份报纸在 1919 年的劳动节首次发行。在这期间，盖里纳和他的工团主义社团正准备夺取冶金工人工会的控制权。不久后，这两个人就意识到了他们正走在同一条道路上。

在 1919 年八月，菲亚特-森特罗（Fiat-Centro）¹⁷ 工厂的工人们解散了他们官方的工会委员会，成立了意大利第一个“工厂委员会”（factory council）。这基本上是一个由工厂工人代表们组成的委员会——尽管他们自称为政治委员（commissar）——他们每个人都是被一组大约 20 名工人选举出来的，并且要向这些工人汇报。盖里纳回忆道：

15.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 年 1 月 23 日—1937 年 4 月 27 日）：意大利共产主义思想家；于 1913 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后因推崇布尔什维克主义而脱离社会党，1921 年带领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等人创立意大利共产党，1923 年担任意共总书记。1928 年被墨索里尼政府逮捕，完成著作《狱中札记》和“文化霸权理论”的建构。——译者注

16. 为组织“新秩序”运动，葛兰西等人于 1919 年创立《新秩序》报纸。该报纸的发行量在 1920 年支持罢工运动时达到最高点，后于 1925 年逐渐停刊。——译者注

17. 菲亚特汽车公司：即 Fabbrica Italiana Automobili Torino，于 1899 年在意大利都灵创立，目前是世界一流汽车公司，旗下品牌包括菲亚特、阿尔法·罗密欧、玛莎拉蒂和法拉利等。——译者注

工厂委员会的关键特点在于群众能够立即召回任意一个代表。每个车间选出一名政治委员，让他代表这个车间去学习整个生产过程，然后跟他小组里的同志们交流所学的知识，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彻底消灭工厂内的管理层面的等级制度……现在这些委员会必须在两个方面做好准备：为最终用社会主义生产取代资本主义而在技术和组织上进行准备；第二是准备好革命性文化所需的要素，用来打造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¹⁸

换句话说，菲亚特的工人们认为他们既在学习控制他们的生产线，也在学习意大利社会。

葛兰西在他关于菲亚特-森特罗工厂的投票的报告里把这种观点阐发成了全国范围的战略：

运用共产主义社会力量的工人组织……只能是一套在工厂里选出的委员会体系……在全国和地方层面的等级结构中进行协调，实现上述工人阶级的团结，以及跨工种的工人的团结。¹⁹

其他工厂很快就采纳了这个理念，葛兰西也被邀请在一轮接一轮的会

18. Garino, M., “Intervista a Maurizio Garino,” FIOM, Turin. <http://www.pmt.cgil.it/Fiomtorino/Scuolomoderna.htm>

19. Gramsci, A., *L'Ordine Nuovo*, September 13 1920. 引自 Williams, G. A., *Proletarian Order: Antonio Gramsci, Factory Councils and the Origins of Communism in Italy 1911–1921*, p. 115.

议上做演讲。在 1919 年 10 月 31 日之前，这场工人运动已经有能力召开一场聚集了来自 30 家工厂、代表着 50,000 名工人的代表们的大会了。

在那次会议上，由葛兰西执笔的“车间政委计划书”（Programme of the Workshop Commissars）被采纳了。该计划书倡议所有的非宗教性质的工会都融合成一个单一的组织。计划书上写道，工厂工人代表们必须在工厂的工作条件方面掌握控制权。但是这些习惯了快速创新、对已知真理保持敬畏的工人，并不想去阻拦技术进步：

政委必须学习并且督促身边的同志们去学习资产阶级的生产体系和工人的作用，呼吁大家为了减轻工作负担和加速生产而提出批评和建议……无秩序的生产或者剥削劳工的规定都不能带来幸福生活……出于类似的原因，政委们必须学习厂方管理人员提出的内部的技术创新方案，并且要等到与同志们讨论完毕后，政委才能对方案做决策……²⁰

这是工厂委员会理念的问题所在：在葛兰西看来，这是用一个方法解决两个问题——权力的问题和控制的问题。这既是经营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方法，也是一个为未来发展而教育工人的方法。但是当决策时刻来临时，意大利工人们会面临一个选择。他们是想要工厂委员会统治意大利，还是仅仅在工厂经理的建议下运营工厂？如果你的头脑激进，那么这会是一个选择的好机会，但是意大利工人们将要毫无准备地面临抉择。

20. Programme of the Workshop Councils. 引自 Williams, G. A., *Proletarian Order: Antonio Gramsci, Factory Councils and the Origins of Communism in Italy 1911–1921*, p. 130.

尽管社会主义工会联盟的领导们嘲笑工厂委员会运动，但是他们无法忽视它。1919年11月1日，工厂委员会在都灵接管了FIOM的领导权。他们推出的领导者是毛里奇奥·盖里纳。这个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工会的组织在一个工团主义分子的带领下，很快就要开展一些直接行动了。他清楚地说明了计划：“首先，立刻行动起来；第二，保证在起义期间继续生产工作；第三，为可能的共产主义管理方式奠基。”²¹

11月8日，写有工厂工人代表宣言的葛兰西的《新秩序》在午餐时间一售而空。菲亚特、蓝旗亚（Lancia）²²、阿尔法·罗密欧（Alfa Romeo）²³……这些有着工厂委员会的公司的名单如同意大利汽车产业的名人堂。在1920年2月之前，大约150,000名工人成为了都灵工厂委员会的一部分。在4月的时候，这场运动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FIOM跟雇主们谈妥的全国性合约里规定，工会委员会不应进入到工作场所内，而且只能在工作时段之外开会。工厂委员会违反了这项条款，并紧接着为获得官方的认可而奋斗。当一些工厂工人代表被解雇时，一场大罢工在都灵的冶金工厂拉开了序幕，并且跨区域地蔓延开来。

21. Garino, M., “Consigli di fabbrica e di azienda. Relazione presentata al Congresso dell’Unione Anarchica Italiana” (Bologna 1–4 luglio 1920), in *Umanità Nova*, 1 July 1920. 引自 *Class War, Reaction & the Italian Anarchists*, FCdAI, n.d., p.26

22. 蓝旗亚：创立于1906年的意大利汽车品牌，该商标后于1969归菲亚特集团所有，是高档轿车。——译者注

23. 阿尔法·密欧：在1910年之前创立的意大利汽车品牌，并于1986年加入菲亚特集团，以高端跑车和轿车等著称。——译者注

在罢工期间,意大利社会党(Italian Socialist Party)²⁴的全国委员会正在开会。会议的首要议题是如何把苏维埃带到意大利来——也就是说,如何在意大利的土壤上建立俄国的革命模式。他们的计划是建立地方性的委员会,由社会党亲自组织,这样他们可以宣告社会党将在战后意大利的管辖方面扮演一个常驻角色。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者们都没有想到工厂工人代表能发挥什么作用;实际上,他们把工厂工人代表视为革命运动中一个让人讨厌的干扰因素。因此,他们拒绝支持罢工。由于被孤立,都灵的罢工运动最终失败了。

但是社会主义工会的领导者们现在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因为意大利货币里拉(lire)贬值,通货膨胀正在“吃掉”工资。一个普通家庭每周的生活开销从1919年6月的120里拉涨到了1920年12月的190里拉。一个冶金工人的每日最低工资是13里拉。工会要求一次达到40%的工资涨幅,但这个要求被雇主们有意拖延,因为雇主们现在决定要建立他们自己的一个全国性联盟,即“工业联合会”(Confindustria)。1920年8月,雇主们的带头人正式拒绝了涨薪的要求,并且对工会的人们说出那段著名的话语:“任何谈判都是没有用的。实业家们不会同意涨一丁点工资。自从战争打响以来,他们一直在做亏本买卖。我们已经受够了。现在我们要你们也尝一尝这苦头。”²⁵

FIOM的全国领导布鲁诺·布奥西(Bruno Buozzi)深受战前的社会主

24. 意大利社会党:曾名意大利劳工党,于1892年在热内亚成立,是当时左翼势力的中心;1914年将墨索里尼开除出党,1919年加入第三国际后于1923年退出,曾多次参加组建联合政府。该党对意大利的左派势力影响深远,于20世纪90年代解散。——译者注

25. Buozzi, B., “L’occupazione delle fabbriche,” *Almanaco Socialista Italiana*, Paris: 1936, p. 79.

义式工会主义的传统（socialist trade unionism）的熏陶。他长期跟工团主义唱反调，宣称他自己“反对那种要求组织、组织者必须服从群众，哪怕群众缺乏秩序的理论。这样的一种理论——坦白地说——使得组织变得毫无用处。这虽然创造了反叛者，但没有创造出革命意识”。²⁶但是雇主们的态度意味着布奥西不得不组织一场反击。放任工资被侵蚀会让他所害怕的一切发生——被工会所抛弃，工厂委员会的发展壮大，还有他的地位会被工团主义分子所取代。因此他呼吁在工厂里进行一场消极怠工（go-slow）运动。在事后看来，这明显是一个既抵制全国性罢工，又同时给雇主施压的办法。他命令道：

把产量降到最低；任何人都不要离开工厂；任何人都不要用不趁手的工具；尽可能拖长维修每一台机器的时间；不要做你职能以外的工作；不清洁或保养机器直到它停止运转；即使公司因为这种行为解雇了任何一个人，也要让他来上班……²⁷

最终，作为对好战分子们的妥协，布奥西命令道：“如果工厂宣布停工，那就占领工厂并且为你们自己工作。”²⁸ 这是可以“用一切可用手段”去做的事情——工会暗语里允许使用暴力的意思。一边是群众的压力，另一边

26. Buoizzi, B. 引自 Cordova, F., “Bruno Buoizzi, il Riformista” (memorial speech). <http://www.fondazionebrunobuoizzi.org/documenti.htm>

27. Summary by the prefect of Turin. 引自 Spriano, P., *The Occupation of the Factories: Italy 1920*, London: 1974, p. 143.

28. 同上。

是顽固老板的压力，在双重压力下，虽然布鲁诺·布奥西的本意是避免战斗，但是他即将开启一场史诗级的斗争。

1920年8月31日早上，米兰的阿尔法·罗密欧汽车工厂的经理们宣布了停工。FIOM迅速地命令它的成员占领了城里的300家工厂。这座城市的新闻报导道：

从外面看来，昨夜这些工厂展现出一番奇景。一个人穿过成群的妇女和儿童抵达工厂，来来回回地给罢工者们——自愿的工厂囚徒们——带来晚餐。在更靠近他们的地方，到处都有白天营地的残骸散落在人行道或者草地上。工厂入口被成队的工人严密地看守着。目光所及之处连一个官员或者警察的影子都没有。罢工者们完全是这片地方的主人。无论是谁经过这里，无论是乘轿车还是出租车经过，都要像穿越战场前线一样地服从命令。²⁹

作为回应，雇主们决定把这次停工变成全国性的停工。当消息在9月1日传到全意大利的生产线上的时候，工人们平静地做好了过夜的准备。警察没有被大规模地动员起来，雇主也没有阻拦工人占领大门和办公室。他们想要一决胜负，他们也希望这是一次决定性的输赢——他们的目的不仅是接管局面并且击垮工会，而且还要控制自由派政治家乔瓦尼·乔利蒂（Giovanni Gioliti）掌权的政府，因为在他们看来，乔利蒂在工会事务上表

29. *Il Corriere della Serra*, 31 August 1920. 引自 Spriano, P., *The Occupation of the Factories: Italy 1920*, London: 1974, p. 143.

现软弱。

在9月4日星期六之前,400,000名冶金工人已经占领了全意大利的工厂。虽然在许多小城市里这只是一次牵涉到一两家工厂的、小型但激动人心的地方性的事件,但是在热内亚、米兰和都灵的工业三角区里,这场运动牢牢抓住了整个社会的目光。

这番景象无法不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在接近晚上的时候,夜空映出红卫兵们(red guards)跨在墙上、手持武器的身影,尖利的警报声响彻了整条阿达河(Adda),久久回荡在瑞色贡(Resegnon)的上空。³⁰

关键在于,这仅仅不是一次静坐罢工,而是一次大规模的当班消极怠工(work-in)——也是史上第一次。这些工厂被要求继续进行生产,但只以现有的怠工速度来生产,也就是平均12小时轮一次班:其中8小时工作,4小时休息或者当门卫。这样安排的意图很明确,工会的领导们通过保持生产来表明这次运动——尽管是大规模的——并不是一次针对政府权威的挑战或者一场革命的前奏。但是这并不是都灵的工厂委员会的领导们的想法。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次展示在工人掌控下的大型反抗运动试验的契机。

在都灵的非亚特-森特罗工厂,工厂委员会接管了生产的管理权,但只停下来在他们著名的老板吉亚尼·阿涅利(Giovanni Agnelli)的桌子周围

30. Massoul, H., "La leçon de Mussolini," *Mercure de Paris*, 1934. 引自 Spriano, P., *The Occupation of the Factories: Italy 1920*, London: 1974, p. 143.

拍了一张团体照就继续开工了。这里跟许多第一天被接管的工厂一样，技师们和办公室职员们继续呆在这里帮忙。来自菲亚特-森特罗工厂委员会的第一份官方公报（communiqué）写道：

工人的内部委员会与技师的内部委员会达成了一致，呼吁全体工人坚守岗位，并且像以前（怠工时期）一样相互尊重、继续工作。工人们！展现你们有能力在没有雇主的情况下运营工厂。你们的内部委员会将会照顾你们的利益，并且在合适的时机召集你们。³¹

在这场反抗行动之前，菲亚特-森特罗工厂的产量是一天 67 辆车。在怠工时期，产量降至一天 27 辆车。在工人们的管理下，产量回升至了一天 37 辆车。都灵是葛兰西和盖里纳传播工人掌控工厂的信条的地方，也是这场工人运动试验达到高潮的地方。这里的运动跟米兰有着显而易见的区别，米兰是工人占领运动受传统工会领导的地方。

在米兰，第一件让你震惊的事物是每个堆栈和烟囱里都有飘扬的红旗。在都灵，即使今天已经是我们占领运动的第四天，都很少能在工厂外面看见代表成就的标志。虽然一面临时挂出的红旗，就如同在护墙上的一个孤零零的哨兵，但是里面蕴含着许多能量。工人们更想把注意力集中在私人工厂和城市工业中

31. Parodi, G., "La Fiat Centro in mano agli operai," in *Lo Stato Operaio*, Issue IV, No. 10, Paris: Bureau d'Editions, 1930, p. 638.

心的劳工技术组织上。³²

占领运动激起了一场横跨意大利的社会危机，因为这种行动的传播范围超出了冶金工业，尤其传播到了化学和纺织工业，造船业和修船厂。但有一个关于钱的问题。在许多工厂里，参与占领工厂运动的工人要求拿工资，而且由于 FIOM 的领导层没有提供除了募捐之外的办法，忠诚度较低的人已经开始背弃这场反抗运动，而更多的好战分子则希望升级反抗运动的规模。由于全意大利的 FIOM 分支机构都在请求各地工会们发起一场大罢工，所有人的心思都放在了 9 月 10 至 11 日，也就是 CGL 全国大会的预定日期。

这场会议是在工人运动历史上最特别的事件之一。这里的革命理念，一度只是被小型的、不合法的团体所保留着，现在却正在一个发达国家的工会会议上被公开辩论和投票表决。当大会开始时，这里约有 500,000 名工人在场。CGL 的领导们想要从它们的当地机构那里了解的是，这些工厂是否都已经条件成熟到足以发动一次反抗运动——从他们的铁丝网后发起突然袭击，并且接管武装力量。答案是否定的。就算是武装得最好的工厂也只有 5000 发机关枪弹药。因此他们决定选择谈判，而不是夺取控制权。

但是他们并不迷恋社会主义政党领袖的花言巧语。意大利社会党是像

32. Colombino, E., article in *Avanti*, 2 September 1920.

德国 SPD³³ 或者英国工党 (British Labour Party)³⁴ 一样的大党派, 但是不像它的同行们, 它早在 1919 年就通过全体表决加入了共产国际 (Communist International)³⁵。意大利社会党的领导们是温和派, 不像其他同行们在实践中那么地有革命性, 但是他们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传统的、不可抛弃的信仰。面对党内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愤懑, 他们拒绝让“兄弟内战”在他们的土地上发生。

现在, 在 CGL 工会大会的第一天, 社会主义领导者们宣布, 鉴于这是一场“政治性的”罢工, 所以他们的工作就是去领导它; 他们会接管罢工运动的控制权, 并且组织工人阶级夺取权力。被这个宣言所刺痛的工会领导者们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提议: 拓宽当班怠工运动的目标。怠工的目标不再仅仅是一次高达 40% 的工资涨幅, 而是还要“令雇主们承认工会控制工厂的基本原则”。他们会增加对冶金工人的经济援助, 但不会组织剩余的工会罢工运动。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看起来则像是一场闹剧: 他们决定对这件事进行投票表决。集体表决机制本来是为了决定类似于加薪要求或者工会选举之类的事情, 但现在却用于决定意大利的工人是否现在要起义和夺权。这个提案

33. SPD, 即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也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该党于 1875 年成立, 来源于工人运动, 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性质, 主张社会正义。现为德国五大政党之一。——译者注

34. 英国工党: 在 19 世纪晚期受工会运动影响而于 1900 年成立, 是英国的一个中间偏左的政党。现为英国三大政党之一。——译者注

35. 共产国际: 第三国际 (Third International), 是于 1919 年在列宁领导下建立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 后于 1943 年解散。——译者注

因为 591,245 票对 409,569 票而否决。这场革命实质上已经被叫停了，FIOM 内部投票停止占领运动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罢了。

雇主们显而易见地松了一口气。但是当他们现在想要发起决定性的一击时，自由主义的总理乔瓦尼·乔利蒂却自有主张。当他发现能够设计出工厂里永久和平的机会时，他提出了自己对于工人控制权的方案。工会们应该被吸收进工厂的联合领导层中，担任管理职位，而且还永久地保留在决策过程中的地位：

终极的解决办法就是将工人们整合起来，如果有必要的话就让他们掌握一些股份，让他们充分地参与到工厂的组织结构中……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明白工厂的真实情况和盈利状况。

这个想法并没有那么异想天开。菲亚特-森特罗的老板吉亚尼·阿涅利做出了一项非常不情愿的决定，把公司变成了合作社形式，并且发表了一句著名的抱怨，“当一个人有着 25,000 名敌人时怎么可能做得成事情？”在那场关键的、投票反对革命的会议的四天后，《晚邮报》的编辑阿尔贝蒂尼（Albertini）和自由主义政治家乔瓦尼·阿门多拉（Giovanni Amendola）进行了以下对话。

阿尔贝蒂尼：要避免革命的唯一办法就是让渡权力给 CGL。

阿门多拉：要做什么？

阿尔贝蒂尼：（让给）工厂委员会，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

至少这样会让工厂里有些秩序……剩下要做的就是辞职并且把权力让给 CGL。必须有人对他们说：你现在是主人了，所以合法地拿走权力吧。³⁶

乔利蒂关于工人参与工厂管理的提议，使得本来会是一个羞辱性质的屈服变成了工会和社会主义党派里温和派领导者的胜利。该党概括了大多数工人是如何看待工厂占领运动的结束的：

在所有的战争里，无论输赢，总有人能找到事情批评，就像他们甚至在批评今天工会的重大胜利一样。正因为如此，我们发现有些人因为工人阶级在这样的历史性时刻没能完全废除私有制而感到懊丧……让我们别再心存幻想了。近期的事件都是在给未来的、注定要完成使命的、精神进步的群众谱写序章。³⁷

结果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工会运动的士气瓦解了，葛兰西着手组织那些散兵游勇，后者将创造出意大利共产党。与此同时，雇主们——对乔利蒂感到失望——把资金全都投入到法西斯运动中去。两年后，工会们

36. 电话交谈的文字记录参见 Spriano, P., *The Occupation of the Factories: Italy 1920*, London: 1974, p. 190.

37. *Il Domani*, 25 September 1920. 引自 Bell, D. H., *Sesto San Giovanni: Workers,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an Italian Town, 1880-1922*, New Brunswick: 1986, p. 128.

将被一个叫墨索里尼（Mussolini）³⁸ 的男人麾下专门瓦解罢工者的帮派强制解体。布鲁诺·布奥西将会在流亡的途中写道：

去讨论工厂占领运动是否本来可能引起那些阻止法西斯势力崛起的政治行动、并且将意大利导向社会主义道路，可能只是在浪费时间。然而，如果我们想要后人以史为鉴的话，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说出来：意大利社会党真正缺乏的是决心……这个政党应该意志坚定，无论是在革命方面，还是在参政方面。³⁹

“让慢的人快起来……”：

这种规模的静坐罢工是一个新现象，但同时，一种开始改变工作环境的科学化管理方式也出现了。在 20 世纪的头 20 年，亨利·福特（Henry

38. 贝尼托·阿米尔卡雷·安德烈亚·墨索里尼（Benito Amilcare Andrea Mussolini，1883 年 10 月 27 日—1945 年 4 月 28 日）：意大利总理、政治家和法西斯主义领袖。曾于 1925 至 1943 年在意大利实施独裁统治。早年信仰社会主义并加入左翼政党意大利社会党，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观念转向战争狂热，鼓吹法西斯主义，并退出社会党。——译者注

39. Buozzi, B., “L’occupazione delle fabbriche.” 引自 Spriano, P., *The Occupation of the Factories: Italy 1920*, London: 1974, p. 135.

Ford)⁴⁰和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⁴¹发明了新的生产方式:标准化产品的大规模生产,流水线生产作业,以及对人工“精确到时间和步骤”的精细化管理。这些反过来创造了一种新型工人,也就是半熟练技工(semi-skilled operative),也正因为打破了熟练技工对工作节奏和质量的垄断。

泰勒是理论家,福特是实践者。福特的第一条生产线是在1913年密歇根州的海兰帕克市(Highland Park)开张的,旨在将工人们的生产力平均化,“让快的人慢下来,让慢的人快起来”。因为众议院对在工厂里矛盾源头的一次口头表决,泰勒关于科学化管理的理论在1911年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关注。泰勒的目标是将技术工作细化成一个个可量化的小任务,从而逐步破坏熟练技工的独立性。

在泰勒和福特的体系里,自动化工作的代价都是更高的薪水。在“理性化”(rationalisation)之前,海兰帕克市的劳动力有13,000人,但是福特每年要雇佣和解雇50,000人。当福特将薪水从一天3美元提高到一天5美元,并且将工作时长从9小时缩减到8小时,人员流失率降到了5%。事实上,福特的高薪水并不仅仅是对高生产力的奖励,而且也是在为大规模制造出来的汽车创造市场。

40. 亨利·福特(Henry Ford, 1863年7月30日—1947年4月7日)是美国汽车工程师、企业家和福特汽车公司的建立者,世界上第一位将装配线概念实际应用于工厂并获巨大成功者。——译者注

41.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1856年3月20日—1915年3月21日)是美国管理学家、经济学家,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代表作是《科学管理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译者注

不考虑其他的问题，我们自己的销量取决于我们付出的薪水。如果我们支付高工资，那么这些钱会被消费并且让零售店店主、分销商、制造商和其他生产线上的工人富起来。而他们的富裕程度也会反映在我们的销量里。⁴²

福特主义（Fordism）和泰勒主义（Taylorism）将会塑造 20 世纪的工业版图，但是在最初的时候，这些新科技遭遇到了抵制。在 1913 年，法国工会联盟 CGT⁴³ 警告它的成员：

工人们被贬低到与牲畜一样的地位了，他们被禁止去思考或者反省；他被贬低得如同一台没有灵魂的机器，高强度地、无止境地进行生产直到他被过早地透支，变得毫无价值……泰勒主义是冷酷无情的；它淘汰那些没有价值和那些不再正值盛年的人。⁴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交战国禁止罢工，大批非熟练工人的涌入

42. Ford, H., *My Life and Work*, New York: 1922, p. 147.

43. 法国工会联盟 CGT：即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创立于 1895 年，是法国五大主要工会联盟之中最早的。早期采取无政府主义的工团主义立场，曾于左翼政党法国共产党结盟，现在立场趋于温和。——译者注

44. CGT pamphlet, 1913. Reproduced in *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Vol. PUF 1976–80, Paris p. 528. 转引自 Beaud, M., *A History of Capitalism 1500–1980*, London: 1981.

“稀释”了熟练技工市场，这使得新技术的推广具备了理想条件。然而，在美国之外的地方，新技术只被完整地应用于一些示范性工厂，其中有部分原因是因为工会的反对。但是，在战争之后，工会领导们对新技术的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也就是广为人知的“理性化”⁴⁵。在意大利，布鲁诺·布奥西写道：

这些美国的技术专家们虽然自称是反社会主义者，但是却提出一套理性化生产和分配体系；尽管被追求利润的动机所驱使，实际上却是不自知的潜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理性化产生的偏见是幼稚的。⁴⁶

在法国，法国工会联盟 CGT 的领导者们也倒向了同样的观点。在 1920 年之前，工会在工厂社会学方面的领袖亚森特·迪布勒伊（Hyacinthe Dubreuil）拥护在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的巴塔（Bata）鞋厂⁴⁷形成的一种“工人的泰勒主义”（Workers' Taylorism）。工人们应该欢迎理性化生产和新技术的到来，但是要对工作速度和创新过程的参与度加以控制。在美国，熟练技工工会的领导者塞缪尔·冈珀斯（Samuel Gompers）在 1924

45. 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化”指的是一种强调结果导向的理性的生产方式。理性化的生产过程要求尽可能地量化知识、经验和工作量，并根据最终目标和已知的生产规律来制定生产过程或提高现有生产流程的效率。——译者注

46. Buozzi, B., “La razionalizzazione,” *La Libertà*, Paris, 16 December 1928. 引自 Buozzi, B., *Le condizone della classe lavoratrice in Italia 1922-1943*, Milan: 1973, p. 10.

47. 巴塔鞋厂于 1894 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创立，现在有超过 5 200 家门店遍布全球。——译者注

年去世，这为工会们将泰勒主义作为进步而接纳开辟了道路。

转向泰勒主义不仅仅是现代化的结果；工会领导们可以看见这其中的优点和必要性。更高的生产量可以缩减工作时间；团队合作根除了最后一丝的工匠精神，就像布奥西观察到的那样，“让工人和管理者之间的合作变得更紧密”。最重要的是，通过削弱个体工人在工作节奏上的自主性，科学化管理将控制权的问题提升到了整个工厂层面。法国冶金工人艾伯特·吉吉（Albert Guigui），总结了工会想要跟泰勒主义达成的妥协：“至少在一个车间，有时候是在整个工厂里，专业知识从个人传递到团队。对于那些失去了专业技能的工人，工会可以提供工厂掌控权作为交换。”⁴⁸ 泰勒主义真正在法国工厂里得到广泛运用是在1926年之后，而且重点再次落在新机器和家长式作风的计划上，而不是在精确计算的、有纪律的工作上。

然而，两次战争期间的三次大型静坐罢工浪潮全都集中在汽车工厂里并不是巧合。汽车工人总是被当成泰勒主义理论实验的小白鼠，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产业，能否像亨利·福特一样高效事关工厂的生死。美国汽车产业的一个共产主义政党的组织者沃尔特·摩尔（Walter Moore），尽全力向门外汉们描述了一个按泰勒理论设计的工作车间的内部情况：

你是否曾在这个国家里见过一座烧着的房子？人们撕开地毯，扯掉家具，把所有东西都从门外里丢出去，在白热化的高温里工作，而巨大的火舌正直冲天际。好吧，这是一间工厂，这样

48. Guigui, A., & Ganivet, P., “Le contrôle ouvrier,” in *L’Homme Réel*, June 1934. 引自 Dolle-ans, E., *Histoire du Mouvement Ouvrier: De 1921 à nos jours*, Paris: 1953, p. 102.

的工作只会在工厂里不断上演；这火焰从不熄灭。⁴⁹

因此，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主要的工厂战役里，雇主们面临着一支更加自动化、更加与工作隔绝但同时物质生活水平更高的劳工队伍。在那些工人之中，有对理性化生产过程的妥协，但是没有对损害工人权益的认同。

1936 年，法国

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的法国，当一名共产主义者是一件让人沮丧的事情；而做一名社会主义者可能会更让人沮丧。法国共产党（French Communist Party, PCF）⁵⁰ 的党员人数下降至仅仅 29,000 人。有着 191,000 名成员的社会党（Socialist Party）⁵¹ 看起来将注定永远是议会的在野党。即使你把法国工会联盟 CGT 里的亲共产主义分子和亲社会主义分子都算上，他们在那时候的人数也不如在 1918 年时的注册人数。1931 年，大萧条（De-

49. <http://www.historicalvoices.org>

50. 法国共产党：即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于 1920 年创立，曾是法国最大的左翼政党，现在其会员人数名列法国政党第三，在法国政坛仍有重大的影响力。——译者注

51. 社会党：即 Parti socialiste，于 1969 年成立，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现在该党持中间偏左立场，是法国最大的左派政党，与右翼的共和党并列为法国当代两大主要政党。——译者注

pression)⁵²时期降临了。接着,在1933年1月,希特勒(Hitler)⁵³在德国上台了。

法西斯主义在法国的突然来袭改变了很多事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法西斯示威者在1934年2月试图冲击议会,导致了15人死亡。CGT号召了为期一天的大罢工,让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走出工厂,并且迫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领袖们抛开“兄弟内战”,进而团结起来。在1934年10月,法国共产党PCF发起了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⁵⁴的号召,放下了它之前那些关于社会主义者比法西斯分子更糟糕的言论。在1935年9月,两个工会联盟投票决定合并起来,他们的会员人数也因经济纠纷的浪潮而增加。

25岁的社会主义者、学校老师西蒙娜·韦伊直觉般地意识到,即将来临的危机取决于工厂内部的力量;无论如何,在参加了太多次反法西斯游行后,她已经被学校系统所排斥,而工厂的工作是她所能得到的全部。她在比扬古(Billancourt)的雷诺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她的日记和笔记记

52. 大萧条,即 Great Depression,是1929至1933年之间的全球性的经济大衰退,也是二十世纪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广、强度最大的经济衰退。——译者注

53.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年4月20日—1945年4月30日):德国总理、独裁者和纳粹党领袖,宣扬泛日耳曼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于1933年至1945年在德国掌权,并于1939年发动波兰战役,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译者注

54. 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即 Front populaire,是由法国共产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社会党和各大工会于1935年共同创建的左翼政治联盟,旨在反对并解散法西斯组织;于1936年赢得法国选举并进行改革,通过“马提翁协议”;后因内部分歧过大,于1938年瓦解。——译者注

录下了这个地方成为战场前几年的情况，这是一份关于典型的福特主义工厂生活的珍贵无双的记录。

她描述了一个逐渐达到金属冲压所要求的速度的生产过程：每小时压制 400 片金属已经很多了，但是工作目标是 800 片——每分钟重复同一个任务超过 13 次。她第二天才想办法达到目标。“我从这份工作经历中到底收获了什么？”她在被她的领班大声训斥之后问道。

……一种我没有任何权利去做任何事情的感觉（而且还要小心不能失去它）。一种在精神层面只能靠自己过活的能力；一种在潜伏着长期侮辱的状态里生活，同时避免觉得自己正在受辱的能力；一种尽情享受每一刻的自由或者同志情谊，仿佛它们会永存下去的能力。⁵⁵

就是这样的感情，支撑着上百家工厂里的工人们为人民阵线的热情。在工厂里的时候，他们感觉自身毫无价值；走上街头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是能把法国从法西斯主义手里拯救出来的唯一力量。人民阵线在宣言中呼吁人们保卫公民自由权、瓦解法西斯主义小分队、捍卫世俗的教育以及工会权利。它同样承诺了在不削减薪水的情况下减少每周工作时间，以及一个新的、为工人提供养老金和失业救济的社会保障体系。在 1935 年 7 月 14 日的巴黎，五十万人公开宣布支持人民阵线，经济上的愤懑随之溢出到了政治领域。

55. Weil, S., *La Condition Ouvrière*, Paris: 1951, p. 95.

在1936年5月3日的法国大选上，人民阵线赢得了绝对多数，街上到处都是载歌载舞的人们。法西斯主义被迫出局，部分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容忍了彼此之间的差异，也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把诉求变得更温和。但这只是开始。西蒙娜·韦伊将工厂的平时氛围描述成“没有人抬起头来，从来没有；没有人露出微笑；没有人说哪怕一个字；在这里的人该觉得多么孤独啊”。⁵⁶但是大选的胜利让他们抬起了头。一股静坐罢工浪潮即将开始，其规模将远超意大利。

在法国，这里并没有革命激情的背景，没有工厂委员会运动，也没有像《新秩序》一样鼓励工人占领工厂的报纸。所有的法国工人都知道，普通的罢工运动通常以失败告终；如果事态在警戒线边上恶化，警察就会出动。而且他们知道，工人们已经使用过占领战略并且获得胜利——20世纪30年代的波兰（Poland）、罗马尼亚（Romania）和英国（British）的煤矿上，就已经有过零星的静坐罢工了。⁵⁷

现在，在大选胜利一周后、人民阵线掌握政权前，在勒阿弗尔（Le Havre）和图卢兹（Toulouse）地区的城市里发生了两场几乎一模一样的罢工。它们都是因为工厂解雇那些请假参加劳动节游行的工会成员而引起的。在大选大获全胜后发生这种事情，如同在所有相关的工人的脸上甩了一记耳光。在两起案例中，工人们都宣布罢工但整夜留守在工厂里；在两起案例中，纠纷都是通过当地市长的仲裁而得到了迅速的解决。5月14日，第三家工厂——一家飞机制造工厂——也决定采取静坐的策略。直到5月24

56. 同上，p. 144。

57. Danos, J., & Gibelin, M., *June '36: Class Struggle and the Popular Front in France*, London: 1986, p. 249.

日，共产主义日报《人道报》(*L'Humanité*)⁵⁸才评论了这些罢工运动，并且指出他们赢得了罕见的、完全的胜利。

然而在那时，罢工运动的势头已经抬头，而且问题并不在于这些解雇事件，而是在于人民阵线本身的计划。在三家主要的机械制造业工厂里，工人们沿着新政府在霍奇基斯（Hothkiss）做出的承诺写下了一份诉求清单，而在巴黎郊区勒瓦卢瓦（Levallois），工人们夺取了工厂。他们要求得到工会的承认、一次大幅度的涨薪、带薪假期和废除加班，再加上事后不追究工人责任，以及占领期间的全部薪资照付。他们赢得了所有。

现在，巴黎机械制造工厂里的大多数工人也决心争取同样的东西。通过静坐，他们就能得到原本要靠投票才能得到的东西，因此他们决定不必等社会主义分子的总理莱昂·布鲁姆（Leon Blum）掌权了。法国工会主义的“心脏”要地雷诺-比扬古（Renault-Billancourt）被占领，昭示着一场全国性的危机。截止至5月28日，100,000名工人正在他们的工厂里面睡觉。就在社会评论家们咬着笔头苦思冥想罢工运动的原因时，西蒙娜·韦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关键——人民阵线。

当一个人感觉到压迫的力量变弱了，他在这些年默默忍受和累积下来的痛苦、侮辱和怨恨，立即就变成了一股强大到足以挣脱束缚的力量。这就是罢工运动的全部解释了，别无其他。⁵⁹

58. 《人道报》：于1904年创立的法国的一份全国性日报，由法国共产党实际控制，为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做出了贡献。——译者注

59. Weil, S., *La Condition Ouvrière*, Paris: 1951, p. 148.

到了布鲁姆就任的当天，占领工厂罢工运动已经从机械制造业扩展到化工、食品、纺织、家具、交通运输和石油产业。除了属于人民阵线的三家报纸之外，所有报纸的印刷工人都停工了。

法国总统命令布鲁姆立即通过广播向全国人民保证，等到议会会议开始就立即建立社会保障项目。但是罢工运动并没有停息。它扩散到了法国的每一个省里，并且进入到工会过去鲜少涉足的产业。巴黎的三家百货超市都被占领了，巴黎世博会（Paris Expo）被工地上的建筑工人接管了。从演播室到女引座员的整个电影产业都在罢工，他们为罢工者们增加了“无产阶级”的放映节目。反过来说，这也改变了这场运动的特征，并且让它超越了意大利冶金工人曾达到的高度：每一条主要街道，每一个居住区都被改变了。

1936年7月8日凌晨，布鲁姆从中撮合了第一次“马提翁协议”（Matignon Accord），该协议是以他和工会领导、雇主们的会谈地点所命名的。面对这场社会动乱，雇主们彻底地认输了。布鲁姆在1942年维希政府（Vicky regime）⁶⁰的审讯期间，用朴素的笔调记录了这些事件，他描述当时的场景：

CGT的代表对大企业的代表们说道：“我们会尽全力去做每一件事，但我们不能保证成功。鉴于现在事已至此，最好的办法是给它时间，顺其自然。可能现在你们会开始后悔，自己曾用

60. 维希政府：即 Régime de Vichy，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控制下的法国政府；于1940年成立，将支持纳粹主义视为保持法国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必要手段；后在1944年被戴高乐领导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赶下台，许多官员因叛国罪、战争罪和配合屠杀而被处决。——译者注

连年的通货紧缩和失业去系统性地铲除我们的工会好战分子。现在几乎没有人能对他们的工友施加影响，以执行我们的命令了。”接着我仍然能够看见坐在我左边的里什蒙（Richemond）先生垂着头说道：“这是真的，是我们错了。”⁶¹

“马提翁协议”确保了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对工会的承认和12%的工资涨幅，并且用分级的方式让工资最低的人获益最多。接下来，还有以法律形式保障的最低工资、事后不追究责任、带薪假期和40小时的每周工作时间。罢工运动卓有成效地绕过了议会程序，并且自下而上把布鲁姆的全部宣言在他就任的四天内都付诸了实施。第二份“马提翁协议”在三天之后签署，以免工人们在新的全国性协议实施前再次提出涨薪。

经验丰富的CGT领袖莱昂·茹奥（Leon Jouhaux）通过广播向全国宣告了这次胜利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这是老派的工团主义（old-style syndicalism）比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Bolshevism）更有效的证明。

一整个阶级在同一时间内赢得了生存状况的重大改善，这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这些事件无疑都证明了，不需要一个独裁的、威权的国家来使工人阶级的地位提升到国民经济协作者的高度。⁶²

61. “Leon Blum devant la Cour de Riom” 引自 Danos, J., & Gibelin, M., *June '36: Class Struggle and the Popular Front in France*, London: 1986, p. 249.

62. 同上，转引自 Danos, J., & Gibelin, M., *June '36: Class Struggle and the Popular Front in France*, London: 1986, p. 249.

在这时，光是在法国的诺尔省（Nord）就有 25 万工人正占领着工厂。法国各省公布了有关六月罢工浪潮的官方数据，一百八十万工人在 12,000 个工厂发起罢工，其中有四分之三的工厂被占领。⁶³

但是光有“马提翁协议”还不够。工人们发现他们一头雾水的管理者们仍旧尝试去霸凌和贬低他们。当许多罢工的解决方案表达关于工资和工时的诉求时，有关尊严的议题也长期存在——以及缺少尊严——在管理者和雇员的关系中。这一点，再加上罢工运动的纯粹的欢乐，对于解释下一步发生的事情大有帮助：这场运动拒绝解散。

违背了工会、政府和法国共产党的意愿，占领运动持续进行着。就在工会内部艰难地推进罢工结束的时候，共产主义领袖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发表了他广为人知的宣言：“人们必须知道怎么去结束一场罢工。”

正是在这个相对较晚的时期，这场占领运动开始呈现出一些已经在都灵出现的、具备苏联雏形（proto-soviet）的形式。在整个机械制造业里，大量的代表会议在 CGT 的支持下召开。6 月 10 日，韦伊表达了对罢工运动只会导致工厂国有化和“回归苦力活”的不断增长的恐惧：

我可以看见另一种可能性。说实话，在现在这个时候公开地说这件事是很微妙的……很难！每个人都必须要承担他自己的责任。我个人认为，如果你知道如何利用时机的话，那么时机会变得有利于创造第一个工人掌控的雏形。

63. Graham, H., & Preston, P., *The Popular Front in Europe*, London: 1987, p. 67.

并不只有她一个人这么说。多列士也将 700 位共产主义组织者召集起来开了一次大型会议，并且通知他们，让工资议题退居幕后，以及全力以赴让工人掌控生产都是“毫无疑问”的事。这则信息被《人道报》用头版报道出来，并且成为了工厂里共产主义组织者演讲的主题：工人没有控制权。到了 6 月 13 日，这场罢工运动开始松懈了。

是什么将两场为保护被解雇的好战分子们的占领工厂式罢工，演变成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工厂占领运动浪潮的？并不是因为煽动；尽管工会和共产主义分子都在那时参与了进来，但他们都没有为占领工厂的罢工策略煽风点火。也不是因为处于一种“革命性的境况”；政府危机已经得到了解决，并且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也在消减。与其这么说，还不如说是机会主义指导下的一次大规模行动，因为工人们看见了一次性改变工厂里的权力对比的机会。

然而，还是有些别的什么东西在发挥作用的，一种对于工厂内解放的本能渴望。劳工史学家莱弗朗（Lefrane）将其称为“一种强烈的集体狂欢式的逃避主义”（a great feverish escapism）。当时是活动分子的历史学家丹诺斯（Danos）和吉伯林（Gibelin）回忆道：

运动的感染力、从众性，确实在很多案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这次事件中最新颖的东西是一种吸引力的源泉——它创造了一整套新的情景——从平淡乏味的日常工作中逃离的感觉，私人生活和工作世界的屏障被打破，工作场所被转变成居住场所，行动欲被满足，那种每个人都想在重要变革降临前“做点什么”的需要也被满足了。所有因素都在占领运动的扩展上发

挥了作用，并且有助于解释参与者们普遍的热情和兴致。⁶⁴

1936年5月到6月的运动被两场群众游行归类到了一起。第一场游行是在5月14日，旨在纪念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⁶⁵的牺牲者们，吸引了600,000人参与。第二场游行是在巴士底日（Bastille Day）⁶⁶，超过一百万人走上巴黎的街头。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工人们发现他们正生活在一个仙境里，在这里，罢工是可以获得胜利的，工厂从一个满是机械化苦力活的地方转型了，街道上点缀着生机勃勃的红旗和同志情谊。这场运动实现了重要的社会变革，改变了工厂力量对比，但也制造了一些难以触及的东西，一些让苦涩的普通罢工尝起来滋味甜美的东西。韦伊写道：

罢工运动十足地让人喜悦。一种纯粹的、不掺杂质的喜悦……我去工厂里看望了几个月前一起工作的伙伴们……经由微笑着的看守大门的工人批准进入工厂是多么地快乐。在我们过去被束缚在机器上的车间里自由漫步是多么地快乐……听见笑声而不是机械发出的冰冷的噪声是多么地快乐……昂着我们

64. 同上，转引自 Danos, J., & Gibelin, M., *June '36: Class Struggle and the Popular Front in France*, London: 1986, p. 132.

65. 巴黎公社：即 la Commune de Paris，是在1871年3月18日至同年5月28日期间统治巴黎的政权；巴黎市民由于不满法国对普鲁士战争的失败，谋求巴黎自治和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后因拒绝接受法国当局的管理而被血腥镇压。它通常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早期实验。——译者注

66. 巴士底日：是每年的7月14日，又称法国国庆日，是纪念1789年7月14日巴黎群众攻克了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狱、从而揭开法国大革命的序幕的日子。——译者注

的头走近管理人员是多么地快乐……在这些沉默的机器中间按人类的生活节奏去生活……当然艰苦的试炼会在几天之内开始，但现在没有人去想那些……终于，第一次，这些沉重的机器周围将萦绕着不同的记忆，是一些有别于沉默、约束、屈服的纪念品。⁶⁷

1936年的占领工厂罢工运动，标志着一个主要工业国的工人们集体放弃了对“科学化管理”的幻想。这是一个牵强附会的判断吗？好吧，听听当事人的说法吧。这是曾在法国推广泰勒主义的雪铁龙牌汽车（Citroën）⁶⁸的所有者们。今天标致-雪铁龙汽车（Peugeot-Citroën）公司在官方记载的历史里承认道：

尽管泰勒主义提高了产量，提高了非熟练工人的就业率，但是很快事情就变得明显起来，提高产量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工人们逼到极限。独立性的降低让工人们发现他们的知识和社会前途在下降。单调乏味的工作和无需动脑的模仿是让人沮丧的。⁶⁹

《马提翁协议》带来的收益是短暂的；1938年，当人民阵线被那些后来

67. Weil, S., *La Condition Ouvrière*, Paris: 1951, p. 148.

68. 雪铁龙（Citroën），是于1919年创立的法国汽车品牌，后归属于标致-雪铁龙集团，现是世界闻名的汽车品牌。——译者注

69. PSA Peugeot-Citroën, 2004 Corporate History. http://www.psa-peugeotcitroen.com/en/psa_group/history_b4.php

向纳粹们献上法国的政治家们所取代之后，这些收益就在雷诺工厂的枪口威胁下被削减了。但是罢工者们消除了顽固的法国管理者们那种把他们从美国教科书学来的严酷的泰勒主义强加于人的能力。而且，无论如何，那些美国教科书在几个月内也要被改写了。

* * *

1937 年，密歇根弗林特

美国的政治领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于 1933 年就任总统，承诺推行新政（New Deal），基本上就是采取国家干预和法团主义（corporatist）政策来将经济拉出低谷。1935 年的“瓦格纳法案”（Wagner Act）赋予了工会新的合法权利，去为获得承认和抵抗雇主而组织工人以及投票。在 1936 年 11 月，因为有工会运动的积极支持，罗斯福以压倒性的优势再度当选美国总统。

工会里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FL）⁷⁰ 的人资格仅限于熟练技工；它的领袖们实际上反对将

70. 美国劳工协会：于 1886 年创立，是美国最早的工会组织之一和二十世纪前半叶最大的工会组织，因反对产业工会而与下文中的产业工会联合会（CIO）对立，但两者于 1955 年合并而且延续至今，目前是美国影响力最大的劳工组织。——译者注

非熟练技工组织起来。他们尤其反对的是非熟练工人被跨评级、跨专业技能地纳入一个所谓的“产业工会”的组织里。领导 AFL 的极端稳健派领导人一直都记得世界产业工人组织（Wobblies）⁷¹ 带来的可怕回忆，他们并不想去重现“一个大工会”。

但是，一场改革正在在 AFL 内部萌发。1935 年，它成立了产业组织委员会（Committee for Industrial Organisation, CIO），明确表明它是用来联合产业工会的。在 1936 年 9 月，AFL 领导层驱逐了 CIO 工会，却在实质上给自己打造了一个一百万人规模的强敌。从 AFL 领导人阿瑟·沃顿（Arthur Wharton）的评论中可以略微体会到工会之间的战斗之激烈：

很多雇主们现在意识到了 [《瓦格纳法案》] 是我们国家的法律，也准备好了去跟劳工组织进行协商。这些雇主们已经表达对于跟 AFL 组织谈判的偏好，而不是跟 [CIO 领导们] 和他们的帮派打手、流浪汉、被劳工组织驱逐的成员、彻头彻尾的恶棍、犹太人的劳工组织以及他们的共产主义附属机构。⁷²

71. Wobblies: 世界产业工人组织（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的昵称，于 1905 年创立，与社会主义和无政府劳工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支持“一个大工会”，理念，主张所有工人团结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后因主张激进而与美国劳工协会分道扬镳并受到当局打压，逐渐衰落。——译者注

72. Wharton, A., Directive to IAM chairmen, 30 April 1937. 引自 Matles, J., & Higgins, J., *Them and Us: Struggles of a Rank and File Union*, New Jersey: 1974.

在通用汽车公司⁷³发生的弗林特纠纷让 CIO 声名鹊起。通用汽车在那时雇佣了汽车工业 60% 的劳动力。尽管通用汽车公司是在泰勒主义和福特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的，但它是被科学化管理众神殿里的第三位伟大思想家艾尔弗雷德·斯隆（Alfred P. Sloan）所经营的。斯隆的成就包括把经济管理手段引进工厂，以及设计一系列不同价位的、不会彼此竞争的汽车。今天，一所世界顶尖的管理学院就是以艾尔弗雷德·斯隆的名字命名的⁷⁴。利奥·康奈利（Leo Connelly）在 1936 年是一位钻床工人，他回忆了斯隆在工厂层面的管理风格：

你知道的，他们像对待一条狗那样对待你。如果你想去洗手间，你得去请求他们的许可，然后他们会在你去的时候打表计时看你去了多久，然后他们会在你回来的时候打表看你到底去了多久，你知道的。像那样的事情，那就是全套被引进的东西。⁷⁵

通用汽车公司的装配线工人弗雷德·哈恩（Fred Ahearn）回忆道：

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完全筋疲力尽了，我的双手太肿了，以至

73. 通用汽车：创立于 1908 年的一家美国的汽车制造公司，旗下拥有雪佛兰、别克和凯迪拉克等品牌，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之一。——译者注

74. 艾尔弗雷德·斯隆于 1895 年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后来资助该学院成立了现举世闻名的“斯隆商学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译者注

75. <http://www.historicalvoices.org>. 密歇根大学关于弗林特纠纷的历史档案的线上资源是无偿之宝。

于我都没办法让手指并拢在一起。还有，比起在晚上吃我的晚饭，我宁愿躺下睡觉然后第二天早上起床再吃，我不知道我是否能第二天坚持着去上班，也不知道我是否会被裁员。⁷⁶

通用汽车公司一年赚取一亿七千三百万美元的利润。它每年花其中的一百万美元在侦探们身上，这些侦探假扮成活动分子，试图雇佣有工会思想的工人，并借此来铲除他们。通用汽车公司支付给工人人们的平均年工资是 900 美元，而当时界定贫困的收入门槛是 1600 美元。

当市场萧条的时候，生产线提速是让厂商们保住盈利的最简单、野蛮和有效的办法。工人们只能工作得更辛苦，并且厂商能够轻而易举地迫使工人这么工作——这就是泰勒主义的支持者所信奉的。今天，在一桶冷矿泉水旁边交谈闲聊被认为是工作场所生活的一部分，但在斯隆的通用汽车公司里可没有这种“茶水间闲聊时刻”。

这确实是一种快速的工作节奏。有一个饮水机在我身后——你大概已经听过一些这样的故事了，而我可以告诉你这绝对是真的，那台饮水机离我不超过十英尺⁷⁷——我工作了一小时，想要喝杯水，但我没空去拿水。⁷⁸

76. 同上。

77. 1 英尺等于 0.3048 米，10 英尺即为 3.048 米。——译者注

78. <http://www.historicalvoices.org>

雇佣和解雇都残忍无情。凡是工作速度不够快的人就会被解雇。新来的人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在这么快的工作节奏里根本没法吃饭。其他人在饭后的休息时间里自愿工作，以便赶上生产线的节奏。在雪佛兰汽车装配线上工作的雷·霍兰（Ray Holland），解释了1936年的通用汽车公司所定义的招聘和留用：“我曾经被告知，也真的见到过他们雇佣了一百个人然后在当天就解雇了一百个人。那就是事情的全部了。你不知道你是否能有一份工作。”⁷⁹

AFL 和 CIO 的幕后角力被无意地选在了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的通用汽车公司，也就是这些用工行为会被人们质疑的地方。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是由 CIO 的支持者们在1935年建立的，但是在1936年的夏天时，它被 AFL 的支持者霍默·马丁（Homer Martin）所领导的，他是一个温和派。他命令工会的左翼在弗林特开展一次入会招募活动，在他的设想里，这次招募一定会变成一场灾难，而且会让左派失去信用。但恰恰相反，汽车工人联合会开始迅速成长。罗伊·诺特（Roy Knotts）回忆道：

你被要求秘密地加入，因为你不知道谁是在你真的加入之后去揭发你的人，你懂的。如果他们开始了解你，你就会被要求加入。而且你也知道你周围的这些人正要加入或者已经是其中的一员了，你知道，但是你不会说出来。但是你知道他们已经加入了。并且你会或多或少地发现，如果你在那时不加入，那

79. 同上。

就不会有人再跟你说话……⁸⁰

11月中旬，罗斯福在总统大选中的压倒性胜利标志着打倒艾尔弗雷德·斯隆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单独的罢工已经在通用汽车帝国的部分工厂里爆发，但是还没有旨在获得承认的全国性罢工运动被组织起来，直到三家具具有战略意义的工厂准备完毕：费希博德公司（Fisher Body）⁸¹在弗林特和克利夫兰的工厂，以及雪佛兰在弗林特的4号工厂，这些工厂为其他所有的工厂提供他们所需的模具和底盘。CIO的支持者鲍勃·特拉维斯领导了罢工准备工作。12月17日，工会提交一份要求得到承认的声明。12月18日，在克利夫兰的工厂开始罢工并且被工人们占领了。随着费希博德公司在弗林特的工厂于1月1日如期开始罢工，管理人员准备把关键的冲压模具从工厂里搬走。这激起了占领工厂运动。

当前来搬走模具的铁路货车抵达的时候，工人们从一间间库房里冲出来，高呼“罢工了！”当时大型罢工运动在美国意味着严重的问题。这些工人知道他们会被武装警察、国民警卫队（National Guard）和私人侦探袭击，所以他们做好了相应的准备。

工厂里面的工人立即开始建立防御工事来抵抗任何进攻者。他

80. <http://lib.umflint.edu/archives/knotts.html>

81. 费希博德：于1908年创立的车身制造公司，是通用汽车公司重要的供应商，提供凯迪拉克和雪佛兰等品牌的车身，后归属于通用公司旗下。——译者注

们把大量未完成的别克（Buick）⁸² 车体搬到所有的入口前面，建起一个庞大的屏障。他们用乙炔炬在每一扇门周边都焊了一道钢铁门框。每一扇窗上都覆盖了防弹的金属片，他们还在金属片上还凿了孔，把消防水管的带子穿过孔连结起来。他们随时都准备着用湿布捂脸以便抵御催泪瓦斯的袭击。大量的金属部件置被放在战略性地点。喷漆枪被用来喷射工厂定位的那些可能的入侵者。⁸³

1月3日，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召开了一次全国大会。来自十个城市的三百名代表在弗林特开会，并且阐明了他们的诉求：对工会的承认、没有事后追责、裁员时采用后聘用者先解雇的原则、提高最低工资、每周工作5天和30小时的工作时长、一点五倍的加班费、取消计件工资制度，还有降低装配线的生产速度。在1月的第一周结束之前，100,000名通用汽车公司工人正在罢工当中。

在工厂里，每一个工人都有特定的任务，一天值班六小时。在每个24小时期间，他们值班三小时，休息九小时，然后继续值班三小时和休息九小时。每一天下午3点的时候都有一场集体大扫除。无论天气有多冷，所有的窗子都大开着，一队队工人呈波浪形移动，在他们中间是有着整个工厂长度的流水线，就

82. 别克：于1903年创立的美国汽车品牌，后归属于通用汽车公司，是一款高档轿车品牌。
——译者注

83. Linder, W., *The Great Sit Down Strike Against GM*, New York: 1965.

像新的一样干净。

通用汽车公司最开始的回应是申请法庭的禁令，工会被要求在 24 小时之内将工人们撤出工厂。然而，当报纸揭露这位法官拥有价值 219,000 美元的通用汽车公司股份时，公司决定不强求执行禁令。相反地，在 1 月 11 日，通用汽车公司尝试用武力夺回工厂，先从较小、较脆弱的费希博德 2 号工厂开始。

在这个以布尔河战役（Battle of Bulls Run）而闻名的地方，警方进攻大门失败后，开始从窗户里喷射催泪瓦斯。在工厂里的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女性成员简尔娜·多兰热（Genora Dollinger）回顾了他们是如何反击的：

我们没有任何肢体接触。这完全是在射击，你知道的。我们有从工厂里拉出来的水管、铰链和石块，这就是我们的全部了。那些铰链是有点重的那种铰链，你懂的；旧车门的铰链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棍棒派不上用场；这里没有白刃战。那些警察有步枪和铅弹；有燃烧弹；还有催泪瓦斯集装箱。我们会跑出去抢——男人们做这档子事速度很快，他们是更优秀的投手，我没有尝试去做那样的事情——扔催泪瓦斯弹，并且把警察赶退。还有那些燃烧弹，他们通常会拿到那些东西——我意思是他们会去尝试这么做；这么干的时机是非常重要的。⁸⁴

84. <http://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newspape/amersocialist/bullsrn.htm>

当一大群聚集围观战斗的女人冲破警戒线、加入罢工者们的时候，警方撤退了。

第二天，8000 名罢工纠察员抵达，他们不但来自通用汽车公司的其他工厂，而且还来自整个汽车工业。国民警卫队已经被动员起来，而僵局还在继续。这场罢工运动在弗林特市内有广泛的支持网络，罢工者们的伙食就是在市内集中起来生产和运送的。此时通用汽车公司的大多数工厂都已经关闭了：生产量从一天 50,000 辆下降至 1500 辆。弗林特开始不再只是一个标志着产业工会主义（industrial unionism）的全国性标志，而且还是一个事实上的密歇根州内所有工会的聚集点。在一次为声援这次工厂占领运动而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游行里，有 150,000 人聚集在了底特律。

在工厂里的占领者们被分进 15 个“社群”（social group）里，主要参与巡逻和清扫的日常任务。在费希博德 1 号工厂的 1200 名工人中，一天要召开两次会议，其中一次是中央组织委员会会议（central organizing committee）和负责“食物、警察、信息、卫生和健康、安全、‘私立法庭’（kangaroo court）、娱乐、教育以及运动”的小组委员会会议（subcommittee）。⁸⁵

通用汽车公司宣布将在 1 月 18 日开始谈判，一些工厂开始疏散工人，并且挂着一条写有承诺“今天是通用汽车，明天就是福特！”的横幅。但是事态开始明朗化，通用汽车公司准备承认自己的亲公司立场的工会，而不是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谈判结束了，现在整个产业工会运动都对弗林特的工人是否能获胜拭目以待。

工会组织者做了最后一搏。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从底特

85. Linder, W., *The Great Sit Down Strike Against GM*, New York: 1965.

律赶来的传奇式的工会组织者，带着工会里的一队剽悍之徒抵达了弗林特。一个罢工运动的积极分子回忆道：

你可能看到过一些老电影，电影里面这些伙计们都带着小提琴，而他们并不是音乐家……他们说鲁瑟有他自己的“音乐家”，你看，因为他们带着这些小提琴盒。⁸⁶

鲁瑟的“小提琴家”们马上就会为雪佛兰4号工厂奏响小夜曲，那里有7000名工人一年为一百万辆汽车生产引擎，而且现在还维持着工作状态。

工会唱了一出调虎离山的好戏。他们从一场在费希博德车体工厂的激烈战斗开始，跟警方互掷瓦斯弹和铁铰链，制造了大规模的混乱。与此同时，工会的积极分子们匍匐前进来到雪佛兰工厂，拉下开关，命令每一个人停止工作。支持罢工和反对罢工的工人之间爆发了零星的几场战斗，但很快就结束了。在一场临时召开的会议里，约有半数工人同意在工厂过夜，并且占领工厂；在同一时间，一场大规模的妇女示威游行来到了工厂附近。工业起重机被用于建造三层楼高的屏障。工厂里的其中一位组织者乔·塞恩（Joe Sayen）在向工人们演讲时说道：

我们要让全世界都明白我们在为什么而战斗。我们在为自由和生活，以及自由的权利而战。这次是我们的好机会。如果我们失败了怎么办？如果我们被杀了怎么办？我们只有一次生命。

86. Skunda, J. 见 <http://lib.umflint.edu/archives/JSkunda.html>

这就是我们可以失去的全部了，而且我们可能会死得像个英雄，而不是像奴隶。⁸⁷

十一天后，通用汽车公司签署了一份协议，在弗林特和其他二十家工厂里承认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地位。协议还开启了有关涨薪的谈判，并且把每小时计件工资率提高了5%。此后两周内，在底特律有87家工厂被占领。克莱斯勒（Chrysler）⁸⁸，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⁸⁹和美国钢铁公司（United States Steel）——在那时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公司——每一家都随后跟CIO签署了承认协议。在通用汽车公司分工厂工作的工人约翰·斯彻（John Thrasher），记录了他们小分队收拾东西离开占领工厂罢工现场的时刻：

随着我们第一次工会运动胜利后的喜悦的消散，人们的脑海里充斥着离开这个死寂的工厂的念头……一个人会发现他开始再次思考自己的家庭生活将会变成什么模样。那些在罢工前发生的事，似乎都在他们的脑海里消失了。仿佛时间是随着罢工才开始流转。如果现在回家，然后明天回来与永不停歇的发动

87. 引自 Linder, W., *The Great Sit Down Strike Against GM*, New York: 1965.

88. 克莱斯勒：又译作佳士拿集团，是于1925年创立美国的汽车品牌，与福特汽车、通用汽车合称为美国汽车制造三巨头，旗下拥有克莱斯勒、吉普、道奇等知名品牌。——译者注

89. 通用电气：于1879年创立的美国电气制造业公司，现是世界一流跨国企业，经营包括电子工业、能源、运输、航空航天、医疗与金融服务等业务。——译者注

机和沉寂已久后重新开工的机器为伍，事情会变得怎么样？不过，这是留给未来的问题了……现在大门已经敞开。⁹⁰

“我们是快乐的……”：

每一次罢工运动都有自己独特的特征，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罢工运动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却没有一个固定模式。每一场运动都是激进派和温和派在工会运动斗争中的组成部分；每一场运动都发生在雇主们被约束起来的政治环境中；每一场运动都赢得了战术上的胜利。在每一场大型静坐罢工运动的核心部分，都有一个主要的汽车工厂：在都灵的菲亚特-森特罗，在巴黎的雷诺-比扬古，在弗林特的费希博德。每一家工厂都在当时被视为科学化管理的典范。阿涅利、雷诺和斯隆创办了这些工厂，作为自动化生产、无技术和可替代的工人、可移动的生产线、精细的时间和动作规划的特定空间。而且在每一个案例中，这些机器也被用作反叛的工具。

现代工厂里的工作强度，使得工厂变成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因而占领工厂的经历似乎比单纯的罢工更能向工人们展示在工厂里直接获取个人自由的途径。于是他们抓住了这次机会。在每一个案例里，静坐罢工的形式都是为了避免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规模罢工运动的主要陷阱：暴力和掠夺工会的资金。弗林特罢工运动的积极分子亨利·克劳斯（Henry Kraus）阐释了法国的罢工运动是如何启发美国人的：

90. 引自 Linder, W., *The Great Sit Down Strike Against GM*, New York: 1965.

静坐罢工的整个想法基于这样的现实，那就是如果你出现在普通的罢工中，罢工是违法的，你不能在密歇根州罢工……除此之外，还有使用暴力的问题。你参与罢工，你有一条警戒线，但对方肯定会设法打破它，然后逮捕人们……所以，当我们看见他们在同时期的1936年发起了一场非常成功的罢工，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出色的，这就是我们在寻找的答案，我们必须要做一些事了。⁹¹

重要的是，每一场罢工运动都以劳资关系发生一番变化而告终，就像一位弗林特罢工者所回顾的那样：

我们被更当成人来对待了，还有，如果你想要跟你的主管说话……你可以停下来跟他们说话，并且告诉他们你的问题，这是以前你不可能做到的。他们会忽视你，或者如果你不好好表现他们就会恐吓你，你只是一个制造麻烦的人，你会丢掉你的工作。所以在这些方面，事情有所改善。⁹²

对于那些罢工运动的参与者来说，最持久的回忆是那些最无形的事物：在他们曾通常被当成机器上的一枚齿轮的地方，体会到个人自由的感觉。当西蒙娜·韦伊在1936年7月参观雷诺工厂时，她捕捉到了那个兴高采烈的

91.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U-M Flint Labor History Project (interview transcript).

92. <http://lib.umflint.edu/archives/Markanovich.html>

瞬间：

彻底的放松。这里没有了那种激烈而紧张的气氛，那种在过去经常伴随着罢工运动出现的、决心混合着压抑许久的焦虑的感觉。我们确定无疑地充满决心，但不再焦虑。我们是快乐的。⁹³

93. Weil, S., *La Condition Ouvrière*, Paris: 1951, p. 148.

后记

路易斯·米歇尔，长着仙女的翅膀

译=赵宇超

世间并无英雄主义，人们只是被事件吸引。

——路易斯·米歇尔（Louise Michel）

杰克（Jack）是一名矿工。他从13岁起就在阿斯特利格林煤矿下井作业了。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杰克曾经将一本小说扔进火里，就因为书中有“杂种”这个脏词。不过他还是吉尼斯黑啤酒的忠实顾客，据说在放荡不羁的日子里，他曾在一家薯条店把一个法西斯主义者扔出窗外；他还曾在酒吧打群架，把一个人的眼睛都打出来了；至于在当地的赛马场输光自己的薪水，更是常有的事。

杰克娶了埃伦（Ellen），一个工厂女工。当杰克搞大了埃伦的肚子后，她被赶出家门。他们是如何在 1921 年和 1926 年漫长的矿工工人罢工中生存下来的呢？在罢工准备期间，他们认识的运煤船船员在经过他们居住的巷尾时，会将一些煤踢进运河里。在罢工中，杰克会潜入运河的底部，取回煤，用卖掉它们的钱来买食物。

他们的女儿艾琳（Irene）回忆起 1930 年代时，总是眉头紧锁，摇一摇头。杰克和埃伦从不主动提起二战前的年月——哪怕最细微的回忆也得撬开他们的嘴才能得知：那些收房租的人，那些上门调查经济状况、要求他们卖掉家具的人，还有家门口气场可怖的放高利贷者。到了 1970 年代，他们剥去家里墙上的壁纸，裸露的水泥面上，密密麻麻都是粗糙的白色圆点。“艾琳用石灰水和海绵弄成了那样儿，”埃伦回忆到，“我们当时没钱买壁纸”。

埃伦第一个存活下来的男孩是约翰，在此之前还有两个孩子没能活下来。当约翰在战后不久找到第一份工作时，这个家庭一直为之奋斗的世界变为了现实。约翰开始工作的这家煤矿是刚刚才国有化的。没人需要再缴付医疗保健费用。后来，约翰又在铁路系统找了份工作，同样是国有化企业。很快，他们不再为贫穷所困扰。实际收入上升。在 1950 年代的某个时候，有人买了台相机。第一次，这一代的家庭成员终于不止是圣经背面所写下的名字，而是可以通过其它方式被铭记。

约翰在最早的照片里，穿着一件剪裁得体的西装，梳着油光水滑的头。他有两份工作，白天开卡车，晚上在伴舞乐队演奏。两份工作都是工会组织下的——即便爵士乐让位给了摇滚乐，所有演奏的音乐家都必须拥有工会会员证。在他开卡车的电气工程厂里，工会是一个机构。或者更应该用复数形式来描述它。监管机器运行的工程师和电工们，拥有他们自己独立的工会。约翰猜测，他们的薪水几乎是一名司机的两倍，并且支持保

守党。到了1960年，约翰成为他们家族里第一个拥有自己房子的人，尽管那栋房子的厨房地板上铺的是石板，厕所还在室外。我就出生于那栋房子里。

接下来的18年，我就成长在这座互相间紧密联系的工人阶级小镇。那儿的人们都有一份“铁饭碗”的工作，人人都参加工会；每逢选举，在那儿赢的总是工党。他们生产棉花、起重机、电路系统板、石棉和巨型电缆。他们挖煤——凭着远处作业的升降机的转轨，你就能判断时间。在这18年中，尽管在我父亲的工厂里，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矿工罢工和无数次的小规模罢工，我却从未见过一面红旗飘起或是一次示威游行。我第一次看到矿工们集合用的横幅，是在一场傍晚的板球比赛中。球员们身穿白色球衫，落日在煤矿的升降机背后缓缓下沉。那看来已经是他们梦想的极限。没人提起过资本主义这个词，使用它会被视为过分激进，而只有中产阶级的人才是激进分子……何况谁想当中产阶级呢？

矿工们为之奋斗的，是矿井口的澡堂，是退休金计划，是免费医疗，是体育场和有休闲的运动放松时间——但尤其是要有工作。如果有人提到大萧条，老一辈人那种本能的颤栗会使你明白，就像教科书或纪录片告诉你的一样，失业和负债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现在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为之奋斗的一切。假使万一有人，不明白矿工们所恪守的绝对非激进原则的话，另一个其集合时使用的横幅上的标语“社会主义不会一蹴而就”即表明了一切。

1945年之后的四十年间，发达国家内部的工人运动正是如此：到处可见、非暴力、与政治无关、一成不变的——和我书里描写的世界相比完全不同。为了弄清为何工人运动全盘瓦解，首先，你得了解它们是如何发生的。

* * *

在 1945 年，法西斯主义被消灭，但全世界的工人运动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指引工人运动向前发展数十年的独立、激进以及纯粹的无政府主义精神被抹杀殆尽。在美洲、英国、意大利和法国，为了消灭法西斯主义，工会与资本家和保守派政客并肩合作。而回报工人的，是福利国家的建立，是欧洲“社会模式”，或者以美国为例，一个精简版的、只涵盖核心劳动力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德国和日本，在其盟国占领者的强压下，拥有强大的工会组织和福利模式。在意大利，工人运动如此声势浩大，以至于一个基于保密和腐败的平行政府不得不成立，从而运转整个国家。

在民主国家，工会在 1945—1989 年的经济生活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它们不仅是工作场所内契约的守护人，也是养老、医疗、有关策略性阶级和解的社会契约的守护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再一次深入推动了对工作场所的科学化管理。在战争中及战后，生产线上的生活看起来特别像工会思想家在 1920 年代所希冀的那种工人泰勒主义。同样地，意大利和德国的自由政府在 1920 年代初期提出的“工业化民主”已经成为现实。那种“工会人生之路”并未立即消失，而是成了一种平行的存在，与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分离，但并非互相对立。终于在最后，它彻底消亡，只剩几处左翼的山区要塞：威尔士山谷、托斯卡纳山城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码头。

在苏联、中国和东欧地区，强加给工人的是另一种交易：为了对其从属地位和民主权利的缺失进行补偿，工人——尤其是从事重工业的工人——被确保会有一份社会工资和终身制的工作。并且，在斯大林主义盛行的国家中，工人阶级还在公共意识形态领域内被大肆歌颂。东欧的工人们试图通过零星的革命争取更多——民主和国家独立——但都遭受了坦克的

镇压。在其它地方，工人们只能认命。其生活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著名的苏联工人间流传的俗语：“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支付我们工资”。1947年之后，世界工人阶级有史以来第一次被策略性地分裂；共产主义国家工人们与西方国家的工人们过上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

至于革命和阶级斗争，它们沦为了冷战期间，东欧和发展中国家中各方力量对比波动的棋子。四十年来，依据地理位置的不同，工人阶级的反叛者不是被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暗杀，就是被其收编训练。同时，始于1920年代工人运动中“兄弟之战”的伤口开始愈合。一部分是因为在西方民主制之下，共产主义并无野心要颠覆现状。另一方面，共产国际本身就在1943年斯大林的命令下土崩瓦解了——为了向盟友展示一种善意的姿态。

接着，到了1980年代，这些战后的妥协就四分五裂了。经济危机的到来，重新唤醒了在整个70年代工会沉睡不醒的战斗之魂：从博洛尼亚到底特律，工作场所激进化之迅捷震惊了大批资本家。作为回应，西方世界的政府撕毁了和工会达成的协议，采取了新自由主义政策，从而导致了大规模失业。西方政府通过了反工会法，并且准许资本跨国自由流动。1980年代具有讽刺意味的照片，捕捉到的是美国空中交通指挥员工会的领导人们，他们的手和脚都被捆锁着。到了我的父亲约翰去世的1986年，他再次意识到了失业人口的存在。并且他又看到了老一辈矿工的横幅——充满了关于进步和发展的恭维式的图像——最后一次舞动着，投入一场由注定失败的工人团体引领的战斗，而结局是粉碎性的挫败。

历史现在迅速地前进着：1989年共产主义政权在世界各地垮台后，仅存的共产主义政权中除了朝鲜的金家王朝，中国和越南也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一切反过来又开辟了全球化的时代。

全球南方的工业化发展，伴随着东方世界的市场化进程，使世界范围的工人阶级规模翻了一番。现在欠发达国家内的近十亿有工资的工人，加上印度、中国和前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¹ 会员国内的 14.7 亿工人，反衬得发达国家内的 4.6 亿工人格外微不足道。² 并且，前者们的生活如此紧密相连，这是前所未有的。全球化使得生产过程跨越大陆和时区的界限。电子通信系统使不同国家间工人们的生活，对彼此来说更加透明且相似。

在看到这些改变对现代工人运动到底意味着什么之前，值得考虑的，是这些变化对工人运动史来说意味着什么。在二战后的长期繁荣中，工人阶级史不得不被重塑，以此来对其现状进行辩护。虽然斯大林主义在东方世界叱咤风云，在西方世界也影响深远，但它只是莫斯科版的历史——尽管它被普遍接受为最权威的。在这个版本中，1848 年之前，工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或多或少被看做是卡尔·马克思到来之前的伏笔。巴黎公社运动中，尤金·瓦尔兰是有错的一方，而支持革命恐怖主义的中产阶级分子则是正确的一派。1889—1914 年间，由非技术工人掀起的伟大高潮的故事，要透过第二共产国际的视角来看。比尔·海沃德，吉姆·拉金，汤姆·曼恩和伊丽莎白·格利·弗林都在 1920 年代成为了共产党员，抛弃了反政治的工团主义立场。那么这到底有什么大不了的？德国社会主义团体内分裂的故事，讲起来是一场胜利而非悲剧。1927 年上海工人的事迹，经过毛泽东

-
1. 前经济互助委员会（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成立于 1949 年，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协调经济发展的协会，在 1991 年随着其会员采用自由经济体制而解体。——译者注
 2. Freeman, R., “Doubling the Global Workforce,” 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paper, 8 November 2004. <http://www.peter-soninstitute.org/publications/papers/freeman1104.pdf>

主义的重塑，成了一场单一反抗外资所有权的斗争。犹太同盟的记忆，鲜活地留存于一堆报纸档案中——存放在一幢摇摇欲坠的纽约褐沙石建筑内，它们被一群老人悉心看管着，而其记录用的文字，是当年那些工人的孙辈们所无法读懂的。

而社会民主主义这边的问题是忘却。基尔·哈迪尔作为建立了工党的人而被铭记。可他在1914年8月痛斥战争的演讲，及在现场面对起哄暴民的经历，却被遗忘了。布鲁诺·布奥西，一名意大利工会领袖，曾反抗革命式的工作场所激进主义。他被后人铭记，但更多的是对他在1944年在德国占领者手中英勇就义的哀悼，而非对其留下的工会遗产的缅怀。重新统一起来的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曾在布奥西监管下的基督工会，都未活过冷战的爆发。

甚至连沃尔特·鲁瑟现在都备受推崇。此人被时代周刊赞为前100位美国的“建立者和巨擘”之一——当他抵达弗林特罢工的现场时，身旁两侧簇拥着一群手持小提琴琴盒的壮工。

1940年，即珍珠港事件发生一年之前，他提议转化现有可利用产能，投入到自动化的军事生产中……该计划遭到了大公司方面的严厉批评，因为后者不愿放弃任何赚钱的生意。日本偷袭了珍珠港之后，工业生产迅速向军事生产的转变，证实了鲁瑟最初远见的价值。³

3. Bluestone, I., "Walter Reuther," *Time*, 7 December 1998.

简言之，战后“官方”劳工史的记载，致力于合理化1945年在雇佣者和工人之间——不论铁幕内外——订立的协议。

只有通过边缘部分的考察，学术界才开始逐步切入这块庞然大物。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开创了一派基于微观案例而非宏观叙事的劳工史研究。更多对犹太同盟、法国工团主义和1920年代中国工人的了解和认识，来自于那些追随汤普森研究路径的学者们的工作成果。但这种“新”劳工史所缺失的，往往是故事和意义。为了回应莫斯科叠加在事实上的叙事，现代学者倾向于避免从幸存者的生命故事里挖掘“宏大真相”。

我认为，在我发掘出的故事里，包含有两大真相。第一，工人们在急速工业化带来的恐惧和苦难下组建工会，是出于经济动力，这股力量同样使互为对手的公司展开竞争，并且使管理者们削减开支。随着他们组织起来，他们就从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那儿了解到，只有消灭资本主义才能获得自由。正是他们悲惨的生活方式中的某些事情，让他们成为了新社会的“旗手”。但最初，他们真的尝试去做的，是在旧社会内部创造一个新社会——建立合作社，为工作场所内的自主权而斗争，并且创造一种工会人生之路。只有当这种“世界里的世界”根本无法实现时，他们才开始对抗公司权力。然后，当历史向其呈上了一盘丰盛的大餐——包括就业、富足和一定的控制权——正如发生在1945年后的欧洲一样——红旗就再一次被收到了博物馆里。

第二个大真相是，当经济全球化之后，全球性的工人运动便开始成形。这种情况只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另一次就是现在。但二者是有区别的：在全球化首次出现的大时代里，主要的经济单位是民族国家，大公司有时会比国家更为强大。但当战争到来之后，它们

就与政府结盟，因为这样做符合其切身利益。从而，在第一次全球化阶段，普遍的民族主义活动极为猖獗——这股强大的民族主义势力最终使工团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坚持的以解决争议为基础的国际主义活动陷入困境。

现在的局面非常不同。今天，跨国公司是主要的经济活动形式。除此之外，全球性的消费文化正在打破所有属于工人阶级社区内部本土、保守和封闭的存在。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工人阶级首次出现。但它还未出现如同过去工人阶级开创的1889年那样伟大的时刻，而那些想要做到这一点的工人们却非常现实地明白障碍物是什么。

首先，工作场所出现了高度的等级分化。1920年代，在工会、科学化管理和大众消费文化之中，新出现了一个白领阶层——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强化了这种情形的存在。不仅发达国家内的劳动力被高度“整合”进了公民社会，而且全球化下诞生的新劳动力，和100年前的劳动力相比，也与生俱来地拥有更多权利、更多接触到媒介和公平的途径。然而，以工会、合作社和政党为形式的自发组织，对他们而言似乎不再是迫切的需要。即便在有些地方依然需要，自发组织不是被对本地村庄和宗教的忠诚所淹没，就是被有组织犯罪的问题所困扰——这些同样的因素使当年上海的工人们难以建立稳定的组织，并且难以在镇压中生存下来。

第二，科技进步孕育出了个人主义文化。信息技术革命培养出了一代想法更加我行我素的年轻人。他们更关心个人的权利而非集体的。并且，会让工会组织者们失望的是，他们不太愿意加入组织。如果说，1890年代的工会人生之路是提供给年轻工人们唯一的积极身份的话，今天，年轻工人们更加擅长于拥有多重身份：白天是深圳的鞋厂工人，晚上则化身为游戏魔兽世界里的矮人，周末又变身为复古朋克摇滚青年。随着手机和网吧的盛行，上述情形在全球南方都风靡起来。

第三，当年彼得卢的棉纺织工人们有谢利和罗伯特·皮尔为其遭遇辩护，1889年的伦敦码头工人有碧翠丝·韦勃。可在全球化进程中，因为官方的社会主义政党采取新自由主义方案，并将其当做一致的共识，一种全新的社会改良主义出现了，并且是出自一群不太可能的人之中。

1999年西雅图街头的反全球化运动并非空穴来风；它是环保活动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那些深受墨西哥萨帕塔游击队⁴的超现实主义影响的人们集合起来的大联盟。就从它本身来说，它依然与工人运动是分开的，正如当年空想社会主义者与法国里昂的丝绸工人保持分离一样。但该运动连同许多拥有上百万美元资产的全球援助机构，正被当权者的无动于衷推向更激进的立场。而在那些理应监管经济秩序的机构总部中，一场意识形态危机同样在酝酿着：他们的确发现，现有的“扶贫”措施反而加剧了贫困化。而令西雅图游行重塑历史的，是有组织的劳工的存在。你能对一名匹兹堡的钢铁工人说些什么呢？你不能如实地将他描述成一个绝望的自由主义者，尤其不能当他冲向一列防爆警察的时候。

突然之间，人们开始一致地反对经济全球化，这种反对并不仅仅基于无政府激进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怀乡病。如果那时，世界各地的董事会成了公司廉洁的杰出模式，这场运动或许会被置之不理。但安然公司（Enron）、世界通讯公司（Worldcom）、帕玛拉特公司（Parmalat），以及主流科学家和政治家都开始承认，灾难性的气候变化是一项主要危害。大致来说，掌权者必须倾听这场运动发出的呼声，大公司里标榜“企业社会责任”的执行官和追求“碳中和”的监察者的数量激增，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4. 墨西哥萨帕塔游击队：是20世纪初墨西哥南方农民武装，是1910年墨西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领袖萨帕塔以“土地与自由”为革命的目标。——译者注

这波新的社会改良主义思潮势头强劲。对一名在发展中国家对抗贫困、对抗针对工会的暴力的工会活动分子来说，通过一个主要的非政府组织（NGO）得以在西方媒体上曝光，往往是比罢工更为有效的武器。汤姆·曼恩和碧翠丝·韦勃在 1889 年罢工结束之后，对伦敦市市长和天主教会都可以施加一定的影响力，但相比他们的现代同行——行动援助（ActionAid）和乐施会（Oxfam），这种影响力并非系统性的，也无法公开。

有组织的劳工是这场运动的一部分，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主要工会的领袖们，并不能像主要 NGO 的负责人一样，可以很容易地让投资银行家来接听电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在的运动处于 1889 年前的阶段，尽管当这一运动进入 1889 年后的阶段时，它将和海沃德、格里弗雷和曼恩之前领导的运动非常不同。同样清楚的是，中国是这个等式中的一个巨大未知数。在中国，人权被严重剥夺，NGO 几乎没有影响力。中国庞大的城市劳动力是全球工人阶级中仅剩的还未被卷入全球化论争中的一群。如果中国的情况发生改变，许多其它变量都要随之改变。

* * *

由于 1980 年代以来发生的事，我的家人们在战后繁荣期的生活，看来好像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故事，而像比尔·海沃德、李启汉、路易斯·米歇尔那些人的生活，反而看起来更加现代。在印度和中国的血汗工厂里，在容纳了全世界六分之一人口的贫民窟内，还有在自西雅图之后、使全世界的领导人不胜烦扰的示威游行上，他们的故事都在重新上演。

他们都度过了伟大的一生。如果我笔下选择描写的人物有一个共同点的话，那就是他们都拒绝成为教条主义者；他们为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

理论时而提出的疯狂的、不合理的推测感到尴尬；他们还深深地融入了自己用斗争保卫的人民的生活。他们为了——正如吉姆·拉金所说——“花瓶里的鲜花和桌子上的面包”而努力奋斗。我不相信他们生来就是英雄；他们只不过——如同路易斯·米歇尔曾经写到的——被非同寻常的事件吸引而走上了革命的不归路。

比尔·海伍德原本会作为一群白人硬汉的领导者而被铭记。但正是几百万穷困潦倒的移民来到了美国的家门口，才给了海伍德一个契机，让他能跨越美洲大陆。随着移民将劳动力的人口组成变得面目全非，今天，世界上每一位费尽唇舌的工会组织者都拥有那个机会。

李启汉原本只会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在1927年遭到处决。但他不相信中国工人都是愚昧无知的，他将他们组织到工会里，并且为了博取帮会分子的信任和他们共饮公鸡血酒。这些事实使李启汉以一位有感召力的工会领导人的身份脱颖而出。今天，5亿中国工人仍在等待沿着李启汉在1920年代开启的道路，向前迈出第一步。

至于路易斯·米歇尔，她原本注定成为又一个激进的、波西米亚式不受陈规束缚的梦想家，为贫民窟孩子们的快乐而写诗。但当工人们决定控制巴黎，还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时，这个世界展示出了足够大的空间来容纳她的梦想和诗篇。我曾经见过年轻的露易丝·米歇尔，在格伦伊格尔斯（Gleneagles）峰会外的空地上，伴着桑巴音乐起舞。她的脸上涂抹着颜料，身穿粉色的仙女翅膀。她要学的还有很多。

中英对照表

人名

A·B·坎贝尔	A. B. Campbell
艾伦·福格尔	Aaron Fogel
艾博·罗森堡	Abe Rosenberg
亚伯拉罕·阿布拉莫维奇	Abraham Abramowicz
艾伯拉罕·比斯诺	Abraham Bisno
亚伯兰·德尔加多	Abram Delgado
亚当·茨尼阿库夫	Adam Czerniakow
亚当·斯密	Adam Smith
阿道夫·越飞	Adolf Joffe
艾伯特·吉吉	Albert Guigui
艾伯特·帕森斯	Albert Parsons
阿尔贝蒂尼	Albertini
奥尔德斯·赫胥黎	Aldous Huxley
亚历山大·米勒兰	Alexander Millerand
艾尔弗雷德·斯隆	Alfred P. Sloan
爱丽丝·亨利	Alice Henry

安塞尔·莫洛伦佐	Anselmo Lorenzo
安东尼奥·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安瓦尔·阿里	Anwar Ali
阿里斯蒂德·白里安	Aristide Briand
阿瑟·沃顿	Arthur Wharton
阿图尔	Artur
阿斯特利格林	Astley Green
奥古斯特·斯皮斯	August Spies
奥古斯特·布朗基	Auguste Blanqui
巴枯宁	Bakunin
巴鲁克·霍伊克	Baruch Hoyker
碧翠丝·韦勃	Beatrice Webb
贝内蒂塔·刚萨尔维斯	Benedita Goncalves
贝朗杰	Berenger
伯纳德·戈德斯坦	Bernard goldstein
比尔·海沃德	Bill Hayward
比尔·海伍德	Bill Haywood
盲眼乔内	Blind Chone
鲍勃·特拉维斯	Bob Travis
布鲁诺·布奥西	Bruno Buozzi
C·F·欧利里	C. F. O'Leary
卡梅利纳	Camelinat
卡米尔·沃德利	Camille Vardelle
卡尔·扎克迈尔	Carl Zuckmayer

卡谢尔	Cashel
赛琳	Celine
切·格瓦拉	Che Guevara
舒汗	Chouhan
女市民佐尔格	Citizeness Sorge
克拉伦斯·丹诺	Clarence Darrow
亨利·圣-西蒙	Count Henri Saint-Simon
丹诺斯	Danos
戴维·伦斯基	David Lencicki
杜法尔	Duval
埃伯特	Ebert
爱德华多·吉利蒙	Eduardo Gilimon
爱德华多·怀尔德	Eduardo Wilde
爱德华·汤普森	Edward Thompson
埃利奥多罗·伊奎帕萨	Eliodoro Iquiapaza
伊丽莎白·格利·弗林	Elizabeth Gurley Flynn
埃米尔·巴罗	Emile Barrault
爱弥尔·左拉	Emile Zola
恩斯特·容格	Ernst Jünger
恩斯特·施耐德	Ernst Schneider
埃舍尔	Escher
艾提安·斯坦尼斯拉斯	Etienne Stanislas
埃托	Ettor
尤金·德布斯	Eugene Debs

尤金·瓦尔兰	Eugène Varlin
埃弗森	Everson
埃沃·莫拉莱斯	Evo Morales
费迪南德·拉萨尔	Ferdinand Lassalle
费尔南德·佩卢提尔	Fernand Pelloutier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弗雷德·比尔	Fred Beal
弗雷德里克·恩格斯	Frederick Engels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	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加里波底	Garibaldi
简尔娜·多兰热	Genora Dollinger
乔治·奥威尔	George Orwell
乔治·威斯汀豪斯	George Westinghouse
乔治·克列孟梭	Georges Clemenceau
乔治·索列尔	Georges Sorel
奥尔基·迪米特罗夫	Georgi Dimitrov
吉伯林	Gibelin
吉亚尼·阿涅利	Giovanni Agnelli
乔瓦尼·乔利蒂	Giovanni Giolitti
乔万尼提	Giovannitti
格伦伊格尔斯	Gleneagles
塞缪尔·冈珀斯	Gompers
古斯塔夫·诺斯克	Gustav Noske
古斯塔夫·勒弗朗谢	Gustave Lefrançais

济普	Gyp
哈里·奥查德	Harry Orchard
哈山·祖马	Hassan Juma
亨利·巴克尔	Henry Buckle
亨利·福特	Henry Ford
亨利·亨特	Henry Hunt
亨利·克劳斯	Henry Kraus
亨里克·埃尔里赫	Henryk Erlich
亨利	Henry
希特勒	Hitler
霍默·马丁	Homer Martin
胡戈·哈泽	Hugo Haase
侯赛因·萨比特·阿里	Hussein Thabet Ali
伊克霍克·查那索维奇	Icchok Janasowicz
艾萨克·多伊彻	Isaac Deutscher
艾萨克·佩雷斯	Isaac Peretz
杰克·米勒	Jack Miller
雅各布·帕特	Jacob Pat
詹姆斯·康诺利	James Connolly
詹姆斯·诺里斯	James Norris
简·卡斯基	Jan Karski
简·玛伍尔特	Jan Mawult
扬·瓦尔廷	Jan Valtin
杰伊·古尔德	Jay Gould

尚·饶勒斯	Jean Jaurès
让-巴普提斯特·蒙法康	Jean-Baptiste Montfalcon
让-克罗德·罗曼	Jean-Claude Romand
吉姆·拉金	Jim Larkin
乔·希尔	Joe Hill
乔·塞恩	Joe Sayen
约翰·鲍林	John Bowring
约翰·伯恩斯	John Burns
约翰·斯彻	John Thrasher
约瑟夫·毕苏斯基	Josef Pilsudski
约瑟夫·贝诺特	Joseph Benoit
约瑟夫·雅卡尔	Joseph Jacquard
约瑟夫·沙伊博维茨	Joseph Shaibowicz
约瑟夫·托特里耶	Joseph Tortelier
胡安·罗德里格斯	Juan Rodriguez
朱尔斯·瓦莱斯	Jules Vallès
朱尔斯	Jules
卡尔·李卜克内西	Karl Liebknecht
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基尔·哈德尔	Kier Hardie
金正日	Kim Jong Il
克虏伯	Krupp
勒康特	Lecomte
列宁	Lenin

利奥·康奈利	Leo Connelly
莱昂·布鲁姆	Leon Blum
里昂·费纳	Leon Feiner
莱昂·茹奥	Leon Jouhaux
路易斯·摩尔根	Lewis Morgan
路易	Louie
路易·米歇尔	Louis Michel
路易·拿破仑	Louis Napoleon
路易斯·米歇尔	Louise Michel
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即拿破仑三世）	Louis-Napoleon
路易-瑞内维勒梅	Louis-René Villermé
马塞尔·博迪	Marcel Body
马雷克·埃德尔曼	Marek Edelman
玛丽索·瓦拉	Marisol Huaylla
马丁·艾恩斯	Martin Irons
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马丁·怀特	Martin Wright
莫里斯·多列士	Maurice Thorez
莫里斯	Maurice
毛里奇奥·盖里纳	Maurizio Garino
马考米克	McCormick
梅里马克	Merrimack
迈克·修瓦利	Michel Chevalier
莫汉·拉尔	Mohan Lal

莫伊泽·弗兰克	Mojsze Frank
莫迪凯·阿涅莱维奇	Mordechai Anielewicz
摩尔斯	Morse
墨索里尼	Mussolini
拿破仑·波拿巴	Napoleon Bonaparte
拿破仑	Napoleon
尼古拉斯	Nicholas
奥多诺万·罗萨	O'Donovan Rossa
奥斯卡·希佩	Oskar Hippe
奥蒂丽	Ottilie
潘诺	Penaud
珀西·比希·雪莱	Percy Bysshe Shelley
彼得·布拉泽胡德	Peter Brotherhood
彼得卢	Peterloo
菲利普·加斯凯尔	Philip Gaskell
菲利浦·谢德曼	Philipp Sheidemann
皮埃尔·查尼尔	Pierre Charnier
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	Pierre-Joseph Proudhon
皮诺切特	Pinochet
戴安娜王妃	Princess Diana
珀斯泊·安方汀	Prosper Enfantin
拉古瓦施	Raghuvanshi
劳尔·戈多伊	Raul Godoy
雷·斯坦纳德·贝克	Ray Stannard Baker

理查德·弗里曼	Richard Freeman
理查德·穆勒	Richard Müller
里什蒙	Richemond
罗伯特·布林科	Robert Blincoe
罗伯特·皮尔	Robert Peel
罗伯托·查韦斯	Roberto Chavez
罗莎·卢森堡	Rosa Luxemburg
罗莎莉·博达斯	Rosalie Bordas
罗克珊娜·埃斯特雷亚·默卡多	Roxana Estrella Mercado
罗伊·诺特	Roy Knotts
鲁本斯	Rubens
萨比诺·法比加	Sabino Fabrica
萨缪尔·班福德	Samuel Bamford
塞缪尔·冈珀斯	Samuel Gompers
桑切斯·德洛萨达	Sanchez de Lozada
萨拉·卡彭特	Sarah Carpenter
谢苗·安斯基	Semyon An-sky
雪莱	Shelley
什穆埃尔·齐格博伊姆	Shmuel Ziegelboim
西蒙·格利	Simon Legree
西蒙妮·韦伊	Simone Weil
史密斯	Smith
索尼娅·诺夫哥罗斯基	Sonia Novgorodsky
斯大林	Stalin

史蒂芬·欧路瑞米	Stephen Oluremi
苏尼尔·乔汗	Sunil Chowhan
泰伦斯·V·保德利	Terence V. Powderly
西奥多·哈维兰德	Theodore Haviland
西奥多·赫茨尔	Theodore Herzl
泰奥菲勒·费雷	Theophile Ferré
托马斯·伯克斯	Thomas Birks
蒂奥	Tio
汤姆·曼恩	Tom Mann
托妮·森德	Toni Sender
托尼	Tony
尤利亚·斯蒂芬斯	Uriah Stephens
V·S·亚达夫	V. S. Yadav
维克多·阿德勒	Victor Adler
维克多·阿尔特	Victor Alter
维克多·格里弗雷	Victor Griffuelhes
维克多·努瓦尔	Victor Noir
维多琳·布罗谢	Victorine Brocher
维斯汉巴	Vishambar
沃尔特·摩尔	Walter Moore
沃尔特·鲁瑟	Walter Reuther
威廉·塞尔维斯	William Sylvis
扎尔曼·弗雷德里希	Zalman Friedrich

地名

阿达河	Adda
堪萨斯州艾奇逊	Aitchison, Kansas
艾克斯	Aixe
阿姆科科	Amukoko
安第斯山脉	Andes
阿根廷	Argentina
大西洋	Atlantic
奥斯维辛	Auschwitz
奥匈帝国	Austria
巴伊布兰卡	Bahia Blanca
波罗的海	Baltic
班加罗尔	Bangalore
巴塞罗那	Barcelona
巴士拉	Basra
巴蒂尼奥勒	Batignolles
巴伐利亚地区	Bavaria
白俄罗斯	Belarus
贝尔法斯特	Belfast
比利时	Belgium
美丽城	Belleville
柏林	Berlin
比格斯普林斯	Big Springs

毕尔巴鄂	Bilbao
比扬古	Billancourt
伯明翰	Birmingham
布莱克本	Blackburn
博伊西市	Boise
玻利维亚	Bolivia
博洛尼亚	Bologna
伯伦亚	Bolognese
孟买	Bombay
波尔多	Bordeaux
不来梅	Bremen
英国	Britain
布里克斯顿	Brixton
布洛肯山丘	Broken Hill
布鲁克林区	Brooklyn
布罗托	Brotteaux
德州布鲁斯维尔	Bruceville, Texas
布鲁塞尔	Brussels
布热济内	Brzeziny
布达佩斯	Budapest
布宜诺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
珍珠咖啡厅	Café de la Perle
运河街	Canal Street
金丝雀码头	Canary Wharf

国会山	Capitol Hill
加泰罗尼亚	Catalonia
智利	Chile
克莱尔顿	Clairton
克拉肯威尔	Clerkenwell
克利夫兰	Cleveland
克林顿厅	Clinton Hall
克莱德河	Clydeside
克里米亚	Crimea
红十字山地区	Croix-Rousse
捷克斯洛伐克	Czechoslovakia
多瑙河	Danube
德索托	De Soto
德里	Delhi
底特律	Detroit
多洛雷斯	Dolores
都柏林	Dublin
艾姆斯比特尔	Eimsbüttel
埃尔阿尔托	El Alto
埃尔克哈特	Elkhart
埃利斯岛	Ellis Island
弗林特市	Flint
沃思堡市	Fort Worth
法国	France

热内亚	Genoa
戈德菲尔德	Goldfield
大中央车站	Grand Central Station
格罗德诺	Grodno
古尔冈	Gurgaon
哈雷	Halle
汉堡	Hamburg
豪萨	Hausa
秣市广场	Haymarket Square
埃内邦	Hennebont
海兰帕克市	Highland Park
好莱坞	Hollywood
瓦努尼	Huanuni
哈德逊河	Hudson
伊布	Ibo
爱达荷州	Idaho
伊凯贾	Ikeja
印度	India
意大利	Italy
日德兰半岛	Jutland
尤文图斯	Juventus
基贝拉	Kibera
基尔	Kiel
喀琅施塔得	Kronstadt

库尔德	Kurds
拉博卡	La Boca
拉巴斯	La Paz
拉哥斯	Lagos
兰开夏郡	Lancashire
朗根菲尔德	Langenfelde
拉脱维亚	Latvia
洛桑	Lausanne
劳伦斯	Lawrence
勒克鲁佐	Le Creusot
勒阿弗尔	Le Havre
莱德威尔	Leadville
莱斯特广场	Leicester Square
利镇	Leigh
莱比锡	Leipzig
洛伊那	Leuna
路易斯·摩尔根	Lewis Morgan
利摩日	Limoges
立陶宛	Lithuania
小岩城	Little Rock
利物浦	Liverpool
利沃诺	Livorno
罗兹	Lodz
罗亚尔	Loire

伦敦	London
朗爱克街	Long Acre
朗维尤	Long View
卢布林	Lublin
里昂	Lyon
麦克莱斯菲尔德	Macclesfield
曼彻斯特	Manchester
马萨诸塞州	Massachusetts
墨尔本	Melbourne
梅尼孟丹	Menilmontant
默塞尔	Merseburg
密歇根州	Michigan
米德尔顿	Middleton
米兰	Milan
蒙斯	Mons
蒙马特	Montmartre
莫斯科	Moscow
内罗毕	Nairobi
瑙恩	Nauen
内乌肯	Neuquén
内华达州	Nevada
新喀里多尼亚岛	New Caledonia
新十字	New Cross
新德里	New Delhi

新英格兰	New England
新南威尔士	New South Wales
纽约	New York
尼日利亚	Nigeria
诺伊达	Noida
诺尔	Nord
诺丁汉郡	Nottinghamshire
奥德姆	Oldham
奥藤森	Ottensen
巴勒斯坦	Palestine
潘帕斯平原	Papas
巴黎	Paris
加来海峡地区	Pas-de-Calais
秘鲁	Peru
彼得卢	Peterloo
列宁格勒	Petrograd
费城	Philadelphia
皮埃蒙特省	Piedmont
彼得库夫	Piotrków
匹兹堡	Pittsburgh
波兰	Poland
莫朗桥	Pont Morand
皮里港	Port Pirie
波茨坦广场	Potsdamer Platz

普鲁士	Prussia
普日蒂克	Przytyk
昆士兰	Queensland
红河谷	Red River
莱茵兰	Rhienland
格兰德河	Rio Grande
施普雷河	River Spree
落基山脉	Rocky Mountains
罗古夫大街	Rogow Street
罗马尼亚	Romania
罗萨里奥	Rosario
蔷薇街	Rue des Rosiers
哈克索街	Rue Haxo
鲁伯特街	Rupert Street
萨德沃思荒原	Saddleworth Moor
圣伯纳德教堂	Saint-Bernard de la Chappelle
索尔福德街区	Salford streets
萨维尔街	Savile Row
萨沃伊省	Savoy
萨克森州	Saxony
斯克内克塔迪	Schenectady
西雅图	Seattle
密苏里州锡代利亚	Sedalia, Missouri
山客普尔	Shankarpur

西里西亚	Silesia
苏活区	Soho
索马里	Somali
南澳大利亚	South Australia
圣保利	St Pauli
圣彼得广场	St Peter's Fields
圣彼得堡	St Petersburg
圣马丁堂	St. Martin's Hall
斯大林格勒	Stalingrad
斯托克波特	Stockport
悉尼	Sydney
泰姬陵	Taj Mahal
特柳赖德	Telluride
图林根州	Thuringia
托尼潘迪	Tonypandy
图卢兹	Toulouse
特雷布林卡	Treblinka
都灵	Turin
托斯卡纳山城	Tuscan Hill Towns
北方邦	Uttar Pradesh
范布伦街	Van Buren Street
瓦拉纳西	Varanasi
沃克斯堂	Vaux-Hall
凡尔赛宫	Versailles

维多利亚	Victoria
维也纳	Vienna
维尔纽斯	Vilnius
瓦科	Waco
沃平	Wapping
华沙	Warsaw
滑铁卢	Waterloo
威尔士山谷	Welsh Valley
威廉港	Wilhelmshaven
雅拉河	Yarra River

译者简介

赵宇超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陌生人社交与流动人口，健康传播，性别和新媒体使用。偏好实际和实践，不喜埋头做论文。关注政治议题，好读历史与文化书籍。

杨硕

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博士，研究方向为发展中国家人口迁移与 NGO 工作。

吴蓄涵

现就读于美国西北大学，心理学和和法律（legal studies）双专业。成长于魔都，从14岁来到新西兰开始的三年养老生活，到大印度两年的魔幻现实主义乌托邦，再到美国密歇根湖畔——我常以为人活着应当努力开眼看世界，并心怀感念地、笨拙但真诚地参与世界。

李静云

复旦大学传播学专业本科生，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性别研究专业交换生，音乐剧爱好者，特长是兴趣广泛。

彭欣

华盛顿大学（西雅图）比较文学、电影与媒体博士在读，芝加哥大学人文硕士，研究方向为电影史和电影理论。

王不动

物理学博士，自由译者，知识拾荒者。喜文，好空谈，崇尚心灵交流，笃信思想的力量，贪恋世界的倏忽闪光。名言：“这是一本好书！”

张舒语

莱顿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专业硕士在读。译有伊格尔顿《论文化》。翻译给我亲近文本的机会，也给我离开文本回到世界的机缘。

张立

社会学本科生。

邓一鸣

本科毕业于湖北大学，学习国际文化交流专业。热爱语言学习，喜欢阅读传播学，历史宗教和国际政治方面的书籍。喜欢感受不同社会科学之间的相通性，喜欢思想碰撞过程中茅塞顿开的瞬间。

费竖心

90后，本科就读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毕业于纽约大学，乐于为传播知识尽绵薄之力。

邱林川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信息传播技术、社会阶层与阶级、全球化及社会变迁，著有《Goodbye iSlave》《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新媒体事件研究》等。

张烨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助理，政见 CNPolitics 成员。

钱争予

北京大学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硕士，政见 CNPolitics 设计师，Type is Beautiful 编辑。

Cover image courtesy of Wikimedia Commons.
La vague. Jean Désiré Gustave Courbet, 1869–1870.

政见 CNPolitics 是一个完全由志愿者组成的独立团队，我们致力于拆掉知识的“高墙”——我们跟踪全球社科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将其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给中国大众，让普通人也能接触到来自学界的思想资源。

网站：CNPOLITICS.ORG | 微信公众号：CNPOLITICS2011